

序

薛 暮 桥

徐雪寒同志坎坷的一生，也是坚强的一生。我和雪寒同志结交已60余年，他的革命生涯是颇不寻常的。

雪寒同志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担任过杭州地委组织部长，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参加党的。1928年初，雪寒同志在宁波被捕，移押杭州陆军监狱，和我同在狱中，一起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的难友至今仍以“牢监大学”的“学生”而自豪。1929年12月我刑满出狱不久，在著名学者陈翰笙同志领导下，与钱俊瑞、孙冶方、姜君辰、王寅生等同志从事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同志又介绍我到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讲授农村经济。雪寒同志在1933年夏刑满出狱，和这年冬天刑满出狱的骆耕漠同志，都经我介绍，先后到中国经济情报社工作。中国经济情报社是钱俊瑞、姜君辰等同志在《中华日报》创办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每周一版，为了撰写和提高经济论文的水平，需要订阅许多报刊，搜集大量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和保管，以便于使用。于是，中国经济情报社便应运而生。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经费，完全依靠十几位朋友从他们所得到的十分微薄的稿酬收入中扣留一部分来维持。所以我们在搜集资料同时，必须不断写作。我们掌握的资料相当

丰富，论文的内容也较充实，逐渐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我们所写的稿件，除在《中国经济情报》专刊发表外，其它报刊也乐于采用，纷纷约稿，而且篇篇都能发表。为扩大宣传阵地，1934年我们又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紧接着在1935年建立了新知书店，由雪寒同志主持。在这期间，雪寒同志显示出了他在宣传理论工作方面的出色才干。

雪寒同志在中国经济情报社撰写和发表论文的时候还很年轻。有人可能要问，一个中学还没有毕业的青年，怎能写出这样高质量的经济论文？我以为答案只有两条，一条是在牢狱中和出狱后认认真真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一条是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而后者是当时许多理论工作者所严重缺乏的。正如我们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必须从农村调查入手一样，我们研究其他经济问题必须同样搜集和掌握大量的资料。只有从实际出发，具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科学地分析研究这些资料，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雪寒同志在1934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写的文章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了工业、农业、铁路、海关、市场到货币、金融、财政等各个方面。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一、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何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加剧农村经济破产；二、英、美、日帝国主义如何瓜分中国的市场，攫夺中国铁路、海关、货币、金融、财政等的主权；三、军阀割据和内战如何造成市场的分割，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加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1936年，英美帝国主义用高价收购白银，迫使中国废止银本位制，改变为依附于英镑和美元的法币，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是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雪寒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丰富的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一部分著作随着作者学识的增长，愈到后来愈精采，特别是《殖民地化过程中的

中国工业》、《英美共管中国货币吗?》、《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华以后》和《列强对华投资问题》等篇章，确具真知灼见，对了解当时经济情况很有价值。

雪寒同志在这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救国会里共产党团的积极分子，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同志联系十分密切，他们领导的新知书店成为救国会活动场所之一。新知书店最初由雪寒同志担任经理，华应申同志担任副经理。从穷文化人中集资2000余元开办，一间办公室白天供从事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之用，晚上当宿舍，几个工作人员大家打地铺。他们的工资不但很低，连房租也由工作人员分担。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新知书店除了定期出版《中国农村》月刊，还结合当时形势，陆续出版了《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乡村建设批判》、《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通俗经济学》、《大众经济学》等著作。我写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和《农村经济基本知识》，也是新知书店出版的。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新知书店在雪寒同志经营下，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业务迅速发展，成了白区经济学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新知书店从建立的一天起，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工作的。1935年在上海创业时期，它直接受党的中央文委领导。1937年12月迁往武汉以后，长江局的出版机构——中国出版社的书刊都由新知书店负责出版和发行。新知书店一跃而成为在全国拥有十几家分店的大书店，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在根据地，新知书店也陆续设立了分店。通过新知书店这个重要的渠道，根据地的广大干部有机会获得更为丰富的文化食粮；根据地的许多著作，包括我在抗大所著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新知书店也得以在大后方、敌占区和香港等地以及海外广为传播。直到新中国诞生前夕，新知书店和邹韬奋、李公朴等同志创办的生活书店和

读书出版社在香港合并，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提供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作为书店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雪寒同志，他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的一天来到了”，雪寒同志奉命去华北战区考察、并针对当时中国的农村工作，在《中国农村·战时特刊》连续发表评论，阐述战争形势，提出粮食储备、武装农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征兵和动员乡村小学教师等等问题。1938年1月16日，他发表了《赶快建立东战场的游击区》一文，建议上海和江南地区的爱国青年不要都到武汉等地流亡，而是要到农村去组织农民，打击侵略者。在新四军筹建之际，雪寒同志发表这样的主张，是颇有远见的。在此前后，我受陈毅同志委托，也曾在1938年1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撰文提出同样的主张。记得陈毅同志曾说，国民党军队在溃退时，在上海、南京一带丢下了三四十万支步枪，如果上海的党组织不是动员一二万爱国青年到后方去，而是动员他们组织农民捡起这些枪枝，建立游击部队，那么，东战场的抗战力量势必大为加强。雪寒同志的主张，是符合陈毅同志的战略思想的。

1943年雪寒同志到根据地工作，曾任华中银行副行长，从此在实际经济工作的各条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7月，他发表《华中解放区的货币》一文，总结了根据地发行“抗币”的经验，指出“抗币”的发行数量只要能按市场需要而进行适当调节，使货币量符合市场的流通需要，那么就可以维持一定的购买力，维持一定的币值。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法币，南京伪政权滥发伪币，币值狂跌，物价猛涨。但根据地物价，由于控制“抗币”发行数量，能够维持基本稳定。“抗币”币值稳定，人民乐

于使用“抗币”，所以能把法币、伪币驱逐出根据地市场，还能渗入敌占区。1943年初，我去山东根据地工作，也曾奉命主持对敌货币斗争，同雪寒同志的经验不谋而合。我所写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见《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一文，也谈到这个问题。在我国北方的几个根据地中，华中根据地是物资最丰富的地区，贸易大量出超，如果不坚持由“抗币”独占市场，那么，出口的大量物资换回不断贬值的伪币和法币，遭受的巨大损失将难以估量。

1946年春到1948年夏，雪寒同志奉命在上海、香港一带为党建立一批银行、钱庄、对外贸易机构等经济企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也更加丰富了他对金融贸易工作的实践和知识。

上海解放后，雪寒同志随军接管对内对外贸易工作，与吴雪之、卢绪章等同志一起，通过市场斗争，打击了货币投机商及大米、纱布、煤炭的投机倒把活动，为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生活作了大量工作。随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1949年9月，雪寒同志又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为整顿华东地区的铁道运输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1952年，雪寒同志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主要从事我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飞来横祸突然袭击雪寒同志，1955年发生潘（潘汉年）、杨（杨帆）事件。潘汉年同志奉党中央命令，多年来从事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工作，出生入死，卓著功勋。不幸在1954年冬，竟被错定为叛徒、内奸、国民党特务而被捕入狱。雪寒同志因与汉年同志有工作联系，遭到株连，被最高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公民权利5年。1965年提前假释出狱。因刑期未滿，同过去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往来。十年动乱期间，雪寒同志又被送进“牛

棚”批斗，1969年后长期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打倒了“四人帮”，情势缓和下来，1977年冬被批准回到北京。1978年3月，许涤新同志在胡乔木同志支持下，延聘雪寒同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经济研究》杂志编辑。其后，汉年同志冤狱平反，雪寒同志也有幸得以昭雪。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雪寒同志随之恢复了党籍。这时，我请他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重新施展他的才华。

1981年雪寒同志发表的两篇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把30年来有关人口理论的研究作了极其认真细致的综合比较，决不是泛泛空论，仍然保持过去的写作作风。近几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对于商品生产、特区经济建设、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坚持综合平衡等问题，他都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卓越的见解。1983年发表的《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一文，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腾出一部分财力来支持工资、物价的改革，这是一项重要的见解，如果得到采纳，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会减少很多困难。

这里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83年国务院采纳了我们建立中央银行的建议，委托经济研究中心组织银行界来讨论这个问题。由于各专业银行意见分歧，争论很多。雪寒同志耐心地分别听取了汇报，又到上海充分倾听了各种意见，然后向国务院提出了综合性的报告，以供采择。同时，他还发表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一文，阐述了他的观点。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也是几年来争论不决的问题。我国对外贸易长期来由对外贸易部独家经营，出口企业对世界市场都不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允许地方和少数企业直接经营，但又产生多头经营，互不通气，以至在国外市场上出现了互相削价竞销的现象。经济研究中心受国务院委托研究外贸体制改革问题，我们支持对外贸易部统一领导，变多头经营为联合经营的设想。雪寒同志与有关部门通过反

复调查研究，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

《学习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文章。众所周知，冶方同志从50年代以来，因主张重视价值规律和把计划工作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因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冶方同志获得国内学术界的推崇，一致认为他是一位坚持真理的经济学家。在冶方同志的理论观点遭到批判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几乎都企图以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雪寒同志在1984年发表上述文章，肯定冶方同志经济理论的历史功绩，同时指出他崇扬价值规律而不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承认利益差别，是有矛盾的。继雪寒同志的文章发表之后，在1988年3月，我也发表了《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基础上》（载《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一文，指出冶方同志当时提出的价值规律，是产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不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与十三大提出的“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仍有显著的区别。这一情况生动地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前进和创新。我相信冶方同志假使能够活到今天，也一定会同意这个意见并感到欣慰。

雪寒同志近年来还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收录在本文集的有10余篇。这些文章大部分是为了悼念比我们去世早的战友，而且忠实地记录了在30年代及稍后一些时期他们的革命活动和生活；两篇是创建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和上海解放后参加接管内外贸易工作的回忆。有不少是我们所能知道的第一手史料。

雪寒同志因为饱经折磨，1978年恢复工作后又日夜操劳，1985年起健康情况减退，但1987年以后仍能写出口口问题和体制改革等不少文章。历史使他患了一定程度的忧郁症，在同朋友叙谈时常常流露出忧国忧民而又无能为力的苦闷心情。但他从来不谈自

己所受将近20年的冤屈。现在他的文集即将出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同时希望他恢复健康，为我国的经济改革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1988年5月1日

目 录

中国的火柴工业	(1)
蚕业统制之前途	(13)
中国邮政的症结	(19)
积极兴筑中的中国铁道	(25)
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	(31)
列强在华的航空争霸战	(38)
中国农村中的高利贷	(50)
东北农村经济的特质	(56)
中国关税的二重性	(70)
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	(76)
英美共管中国货币吗?	(86)
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华以后	(93)
救济棉纺业危机诸方案的检讨	(99)
中国工业问题	(107)
列强对华投资问题	(116)
中国财政问题	(128)
抗日战争和粮食准备	(138)
时评六篇	(148)
农村工作讨论会应当怎样进行	(168)
论当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172)

华中解放区的货币·····	(180)
巩固地发展我国与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间的贸易·····	(188)
调整我国人口再生产的关键性决策·····	(192)
评我国三十年来人口理论的研究·····	(198)
坚决贯彻农村人口政策·····	(218)
谈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生产·····	(223)
关于经济特区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226)
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	(232)
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	(235)
试论外贸出口的“假亏”问题·····	(244)
综合平衡仍然是制订计划的总原则·····	(254)
学习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	(260)
发展商品经济，改造和振兴上海·····	(271)
从强化宏观控制入手，搞好综合经济改革·····	(279)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	(288)
当前金融形势和银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293)
关于我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308)
制止通货膨胀是当务之急·····	(316)
通货膨胀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319)
论经济效益与承包经营·····	(324)
价格全面改革分两步走为好·····	(335)
关于治理整顿的几个问题和建议·····	(340)
诗人徐雉同志的一生·····	(349)
怀念出版战线的老战友——华应申·····	(361)
回忆潘汉年同志二三事·····	(369)

学习孙冶方同志的崇高的情操和品德·····	(374)
缅怀于毅夫同志·····	(378)
衡老把一生献给伟大的祖国·····	(383)
韬奋同志对中国出版事业的伟大贡献·····	(390)
回忆与涂新同志五十年往来中的片断·····	(400)
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	(405)
上海内外贸易系统接管工作回忆·····	(429)
后 记·····	(438)

中国的火柴工业

一、历史的简单回顾

中国火柴工业之成为新兴工业部门之一，还不过30年历史。帝国主义势力向中国推进，促成了它的诞生。外国火柴最初输入中国，大约在前清同治光绪之间。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川重庆地方，已经有了第一家国人自制火柴厂；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龙有隆起公司，重庆有森昌正等厂，相继开业，终光绪之世，全国已有火柴厂14家。宣统年间（1909—1911年），新创11家。民国成立以后，这种工场手工式的小规模火柴厂，依旧以缓慢的步调在增加。市场上操垄断之大权的，也由欧洲火柴而转为日本火柴了。

欧洲大战，给予本国火柴工业以抬头机会，国人自设火柴厂，在数量上突然增加。仅1920年一年中，新成立厂家有23家之多，自制火柴在市场上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但是好景犹如昙花一现，随着大战结束，欧洲与日本火柴便排山倒海一般侵入，尤其从1927年以后，瑞典与日本火柴资本在中国狂暴的兼并，使基础薄弱的中国火柴工业陷于生死存亡的苦难中。1932年瑞典火柴大王克罗格的逝世，并不能消除此种苦难，因为接着而来的就是日本火柴之猛烈的倾销。虽然1931年1月所颁布的新税则，对于这新兴的工业起了一些保护和刺激的作用，但是帝国主

义者却从火柴的商品形态的输入，转变为资本的输入，即在中国直接设立火柴制造厂，实际上反而加强了对中国厂的威胁。民族资本家自然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刊物说：“……目下外货火柴，多在中国境内设厂制造，此种税率之增加，几等于虚设”。这是明白地昭示我们，在帝国主义主宰的现存秩序下，殖民地的民族工业不是可怜地缩小再生产，便是完全灭亡。另外，1933年11月所颁布的新统税率，把火柴工业无情地推入全军覆没的危机中，最近半年来事实就明白告诉我们：中国的火柴工业就是在这两种势力的夹攻之下，百般挣扎，维持他们的生命。

二、火柴工业的阵容

火柴本身与人民日常生活有较为密切关系；同时，在轻工业中，它又是技术比较简单，能在较小的规模上进行生产的一个部门。所以三四十年来，它的发展范围颇为广泛，兹据1934年《申报年鉴》，列表如下：

省 别	厂 数	资本总额 (元)	省 别	厂 数	资本总额 (元)
江 苏	17	2 382 800	江 西	1	10 000
浙 江	8	950 000	云 南	14	155 000
安 徽	2	300 000	贵 州	4	90 000
河 北	9	1 760 000	福 建	不详	75 000
山 东	24	1 390 000	广 东	21	674 000
山 西	6	303 000	广 西	1	40 000
河 南	8	280 000	甘 肃	2	15 000
陕 西	2	50 000	湖 南	1	100 000
四 川	23	4 981 000	湖 北	2	500 000

火柴厂之相当地普及各处，据此已可概见。但是就工厂的数量上看来，不均衡发展是很显然的，譬如安徽、陕西、江西、广

西、甘肃、湖南诸省的工厂数及资本总量，还不及山东一省。殖民地民族工业之发展，如何地接近和依存于帝国主义的通商口岸之交通及原料，而作畸形的成长，火柴工业便是一个明白的证明。

资本有机构成的低下，成为中国火柴工业的最大弱点之一。作为全国最大的四大火柴厂所拥有的资本，大中华为2 367 300元，山东振业为100万元，天津丹华为120万元，杭州光华为50万元；而且如大中华公司，事实上乃是由四个公司六个分厂合并而成，所以它的资本数量虽然较多，但其真义实非意味着生产之集中与统一。这情形愈到内地，愈为显著，譬如云南永通、东升、济兴、仁和等厂，资本不过1000元，其微薄实足惊人。

上引表中，关于各省总资本的统计数字，我们还应加以缜密的审别。譬如四川一省的资本总数，竟超过了江苏、河北、广东三省的合计数，仅从常识来判断，也可推断其有失之过大或过小的毛病。同时，若根据上表来计算每厂平均资本额，多少对于贫弱的火柴资本总加上美丽的粉饰。然而平均数最高的河北每厂尚不曾超过20万元，有八个省份的每厂平均资本，倒有5万元以下的。下面的表，是根据《中国经济年鉴》所载，142家不论已停或未停的火柴厂（其资本可得而知者）归纳计算而成，它不论对于历史的或是当前的状况，都可供我们作个概略透视：

40万以上至120万元为6家；10万以上至40万元为11家；5万以上至10万元为38家；1万以上至5万元为60家；1000以上至1万元为27家（大中华公司分厂分别计算）

在全数142家工厂中，10万元以下的竟占总 数88%以上；就中，1万元以下的厂家所占的比重，又比较巨大。资本有机构成这样低下，使火柴工业部门比其他先进工业如面粉生产等，更多

几种弱点：

(一) 生产机构之半手工业性表现出生产技术的非常低下。这在火柴资本家愤激地叫喊在华外厂技术设备的精良上，便可明白：“中国境内所有火柴厂生产力最强的，大都为外商火柴厂，例如上海某外商火柴厂，在装盒上也用机器，这种机器在一秒钟内可装百盒之多，国货火柴厂都没有这种设备”。

(二) 这情形同时在生产品的种类上反映出来。内地一般火柴厂，譬如四川等省，其火柴制造，还是停滞在硫磺火柴的阶段中。华北诸厂，所出产的多为硫化磷火柴，至于比较进步的安全火柴，只有苏浙诸省在制造。有些人以为火柴制造业这样的分工现象，可以用地理的气候关系来解释，这当然是非常幼稚的看法。

(三) 生产成本的加重，竞争力的薄弱。在华外厂每箱火柴在同等条件下，其成本费要低三、四元或五、六元，自然使中国厂家的竞争能力降低，而不得不让1/5的市场为外商所占。国货火柴积压，也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所以纵令不加外力的打击，本身的危机已够不幸了。

至于国货火柴的产量，尚无系统的精确的统计。1933年《申报年鉴》下列的数字，可供大概的参考：

年 别	产 量 (箱)	销 量 (箱) ①
1927	644 100	709 314
1928	803 200	726 000
1929	719 300	650 200
1930	543 963	499 019

① 1 大包 = 12 打 = 144 合，1 箱 = 50 大包 = 600 打 = 7 200 合。折合今制为 7.2 件。

产量与销量间距离之增大，表现火柴市场问题的愈加严重。反之，火柴市场对于火柴生产的影响，也显然可见。各厂随着销量的减少，已在逐渐废置生产力而降低产量。这趋势至1931年以后，渐趋转变。据《中国经济年鉴》的估计，中国厂家每年能生产4 500万罗。(一罗=12打=144合)。据财政部财务署的调查，除粤、桂区不明外，1933年6月为止，苏、浙、皖、鲁、豫、湘、鄂、赣、冀、晋等区，一年间生产约90余万箱。又有一说，国货火柴年产额约百万箱，大概都近似正确。但是外厂生产量也和中国厂家生产能力的提高在同时增进，因此火柴市场上产销之间的距离更大了。

最后，是火柴工业上原料来源普遍地依赖外国。火柴上所需用的木材如白杨，槲木，椴木，都赖日货接济；我国川陕甘豫等省，虽然也产白杨，但以运输不便，反不如用洋货合算。自东北陷落后，中国厂家所仰赖的国产安东木材，又为日人所垄断。至于药料，国内产量较少，同时又因为价格较洋货稍高，“故虽明知其为国货，亦只得暂时忍痛不用”（见大中华公司为江西硝磺局事呈部会文）；所以重要药料如赤磷等，几乎全部仰赖外货。1927年，火柴用原料之输入，计值2 258 177两，至1930年增至2 482 754两。火柴业在目下固有小利可图，然而整个的命脉则操在外人手里。

火柴工厂分布之普及与向帝国主义通商口岸之集中，火柴资本有机构成之低下，产量增大与销量间之不一致，原料十九依赖外国，凡此种种，构成中国火柴工业的主要弱点。

三、关税增加后的两个结果

1931年1月财政部所颁布税则，将火柴关税从7.5%，增加

到40%，这就在火柴市场上促动帝国主义资本与民族资本间颇为剧烈的变动。在1930年之前，中国火柴出口的数量急激地下落，出口总值从1923年的137.5万两，降至1930年的11.6万两，同时外国火柴输入却有惊人的增加：

年 别	货物量 (罗)	总 值 (两)
1926	3 703 130	1 455 870
1927	6 025 830	2 455 132
1928	6 426 966	2 573 743
1929	8 412 642	3 316 242
1930	8 508 194	3 664 061

自1931年关税提高后，外国火柴入口突然下跌，有如下表：

年 别	货 物 量 (罗)
1931	2 683 322
1932	370 980
1933	72 975

这样急转直下的情势，使乐观主义者相信中国的火柴工业已全部得救了。但是二年余来的事实告诉我们，海关贸易册上所表现的数字的减下，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火柴业威胁的减弱。

在中国火柴市场上，帝国主义在华直接制造的火柴，一开头便高踞在民族工业的头上。马关条约供给了这个权利，日本在1901年开设名为中日合办的有磷光火柴厂于重庆而实现这种权利。其后吉林、大连、奉天、东亚诸火柴公司，遍设于东北三省。华北一带，日本先后设立分厂于天津、济南，青岛更是日本

在华火柴业的大本营，先后有明石、华祥、青岛、山东、益丰诸厂的创立，长江流域，则以上海燧生厂（现改名为美光厂），及镇江燧生厂为基础。和日本对华火柴业具有同样威力的瑞典资本，其经营机关为瑞中洋行与1928年新组织的民光公司。仅民光一家，经售如意等牌火柴27种。当1927年瑞典与日本火柴合力对中国火柴施行猛烈的压迫，几至绝灭了当时东三省与广东的民族火柴工业。在日、瑞两国资本这种直接侵略的条件之下，关税提高，究竟能否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火柴市场上的势力归于绝灭呢？！

事实上恰正相反。列强迅速地由制成品的输出，改变为资本输出，这样它若无其事地摆脱了关税的负担；资本的雄厚，技术的精良，使华厂更相形见绌。外厂的生产量迅速地增加了，目下在鲁、豫统税区中，它的推销量，竟占该区总产销量35%，苏、浙、皖区中，仅沪、镇两地的燧生厂产量，已占该区总产销量17%，冀、晋、察、绥区中，天津三友厂一家，占该区总产销量3%，上面的数量，实际不过事实的一部份；据《火柴月刊》称，现在全国每年70万箱火柴销量中，外货已占1/5强。至1933年8月为止，在一年半中，有美商3家，日商2家，英商1家，向商标局请求审定火柴新商标。帝国主义者商品形态上所表现的输入之减少，很快地而且是更有利地从在华工厂的增加上收回去；它们不必顾虑原料被垄断的危险，不必负担增加后的关税，它们对于中国政府只要缴付与中国厂商同等的统税，它们以雄厚的资本及精良的技巧，来榨取中国低贱的劳力，在一切有利的条件下，外厂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厂，其速度实是非常可惊的。同时日柴的输入在总输入上所占的比重，也相提并进。自1930年的4%，增到1931的7%，到1932年增为11.9%。所以无论在输入上与直接制造上，日本成为中国火柴工业最主要的威胁者了。到最近为止，日本在中国火柴业仅燧生、青岛、双喜等6

家，产量每日总计竟达240吨(6月30日《中华日报》)！这种情形之将继续下去，尤其是在目下华商受着统税的重大打击之下，可以说是毫无疑义。火柴业中民族资本家的领袖刘鸿生氏，在他预备对全国生产会议提出的议案中，慷慨地陈述外厂的威胁后，他又说：“在条约未改订之前，直接加以限制，事实上殊不可能”，同时他又小心翼翼的请求政府“用间接方法”，来帮助华厂，如“政府酌予华厂以相当之奖励金，则成本减轻，竞争自易，洋厂虽欲肆其压迫，而亦不能不有所顾虑”。由此可见问题之严重，已使忍耐自重的人们也焦急地有所申请了！

关税增加后另外的一个结果，是一年半来火柴业民族资本所表露的兴旺现象，及这现象背面的真实危机！

第一点值得注意的，为中国厂家的增设。仅1933年一年中，新增工厂有东源、中国、楚胜、大明等11家，其分布区域是山东4家，江苏3家，广东3家，湖北1家。除广东3家不明外，计添加资本42万元。

但工厂的增加同时并不曾引起技术的改进和资本有机构成的高度化。火柴工业的发展，丝毫不曾采取并合，扩充或是统一的大生产的步调。工厂的增加反有使每厂的平均资本额减低之势。火柴工业的容量是在增大了，但素质却并未进步，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点。

第三点是产量的增大。据财部统税署就三统税区调查，一年来火柴生产量的变动如下：

年 度	苏浙皖区	鲁豫区	湘鄂赣区
1931年7月—1932年6月	22万余箱	31万余箱	2.7万余箱
1932年7月—1933年6月	28万余箱	37万余箱	4.3万余箱

上表所代表的区域虽不遍及全国，但趋势是了然的。仅仅这些区域中，其增产额已达13万余箱！国货增产，应该加强对市场的决定力，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而夺回1/5的销售量。但是，事实完全相反！上述第二点的民族资本增加之不健全性，在这里产生了必然的结果：首先是生产技术并未增进，生产成本费不能降低；而外商火柴在同等条件下，却“火柴成本很轻，价值较国货要低4元至6元不等”，能贱价10%出售。其次是新设诸厂资本不够周转，群求脱货，不但不能因增产而提高抵抗力，反而因群相竞争混乱了自己的阵营，这样市场之相对狭隘竟成为市场绝对的缩小。火柴市价便一泻千里：乙种安全火柴从前每箱售53—54元，跌至40元以内，硫化磷火柴从前每箱售20元左右，现在跌至11—12元，跌价竟在原价1/3以上。好景如昙花之乍现，恶运驾临在这新兴工业部门了！

四、半年来的新障魔难

巨大的铁锤，最后又打击这稚弱的工业！本来，制造火柴，只征关税，不纳厘金。1931年2月裁厘举办统税，火柴亦列为统税品之一种。现在为了“剿共”，为了建设，总之为了财政上的支出，1933年11月，火柴新统税有异常的提高，试观下表：

	类别	原征(元)	现征(元)	增加(元)	增加%
大号安全火柴	甲	5.00	13.50	8.50	170
	乙	7.50	10.40	9.90	132
	丙	10.00	21.00	11.00	110
小号安全火柴	甲	0.833	2.25	1.367	170
	乙	1.25	2.90	1.65	132
	丙	1.666	3.50	1.834	110

对于硫化磷火柴，照原定税则，系“依各地方特定办法暂征收之”（见1931年颁布之《火柴统税征收条例》），在新税则中，有如下规定：

甲	每大箱征10.60元	每小箱征1.80元
乙	每大箱征13.50元	每小箱征2.25元

对于安全火柴，新税则所增加的指数，已了如指掌。至于硫化磷火柴，据该业中人言，较各地方特定旧税例，“其增加亦在一倍半以上”，且“在比例上又远过安全火柴”。在从前，火柴统税，只不过占货值1/6，新税增加后，统税竟占货值的1/2以上”！

有人在反对财部新税的不合理，以为低级火柴为大众所需要，税率应低；同时新税则对于大众日常所必不可省的低级火柴，所增加的税率越高。可是财部征税，既明白地为了“国库支绌”，那末自不得不向销路多的所在大把地抓。冀鲁诸省火柴商悲惨地请求收回成命，以及火柴厂联合会一再的要求，都不能打消财部增加收入的铁样决心；火柴业的前途，就这样决定了！

新税实行之后的现象是：中国厂家的衰落与危殆，外厂特别是日厂的活跃。货物要出厂，税是要厂方先以现款缴付的；这巨大的新的增税额，几乎吃干了中国厂家微薄的流动资本，再也转不动机轮。出厂之后，若照旧价出卖要亏血本，提高价格，又苦无销路。于是存货山积，迫不得已而相率减工或停工。《大公报》1月23日载，当时天津华商火柴积货已达3万箱，值100万元。山东济南之振业、鲁兴、东源三公司，自12月起，即预备减少生产力一半。天津之北洋火柴公司、荣昌公司，均先后借故停工。青岛华盛、信昌、华比、兴业等7厂，全部停工。华北火柴业，几乎因之一扫而空！其他各处，事实上亦“已陷入减工状态”。然而，“在华设立之外商火柴厂，恃其雄厚之资力，于统税加征后，

营业反见活跃；同时舶来火柴，输入亦日见增加”；在这种显明的对照之下，谁能不说统税增加是“造成舶来火柴倾销的机会”呢？（5月7日《中华日报》）

中国厂商因统税增加所受到的威胁，还不仅如此而已。自新税实行后，漏税火柴，竟如怒潮汹涌，不可阻遏。这种漏税地域，税务署税字517号函所附令文中，也能明白指出：“尤以冀晋察绥区之天津，与粤桂闽区之福州等处最甚。”这里，显然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特定的势力圈有密切关系。至于漏税火柴之所以骤然增加，是因为“统税骤增巨额，奸滑贪婪之徒，势必视为大利所在，又何乐而不为？”（中华火柴业联合会4月间呈税务署文）。仅福建一隅，冒牌火柴有红牌等17种。漏税进口之地点，为马江，松下等17处，类皆中国舰艇巡弋之区。其销售区域，几遍全闽。大中华火柴公司福州分事务所呈报总所的公函中说：“此项漏税火柴，多系自台湾用民轮输运来闽，……往往与沿海奸乡团警吏串通一起，偷过关税统税……故其售价特廉，每箱售20元，尚有盈余。以致完税火柴销路断绝，营业大受影响。”由此可见漏税火柴组织规模之扩大与公开，“在私运的时候，背后都有某国人和台湾人包庇的，海关与统税机关虽明知之而无如之何！”

统税增加促成了漏税火柴的猛进，而国家的政治力量，又无异对漏税火柴加以保护。火柴工业在两大势力的夹攻之下，其欲苟存，又乌可得乎？！

五、结 论

总述起来，中国火柴工业所受的桎梏是：（一）帝国主义在生产与市场领域上经常的威胁；（二）以“开源”为本位的苛重税率的摧残；（三）本身机构的脆弱。

这种因素是寄生在整个经济基础上的，因之，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只见其继续发展。7月1日新税则的改订，将制火柴用的梗及匣片之木材，提重征税105%，这自然不能不增加火柴的成本。最近财部又命令将扁匣火柴改为乙种征税（原为甲种），以裕税收。此外如军事当局领导下的毁灭国内统一市场，作地方的市场割据，如粤省在统制名义下，重征外省输入火柴，以及川、鲁、湘各省，莫不类此。诸种势力对此较为幸运及稳定的新兴工业——火柴，大有非聚以坑之不为快之势！

反观民族资本家，在理解或是解救自己危机上，丝毫没有根本击毁所受桎梏的勇气。他们除了自己也不敢相信地尽是希望政府救济外，最简单的是采取二个步骤：（一）提高售价，暂时来解救自己；（二）将损失尽可能地转嫁到工人大众身上，加紧其剥削。这在他们是最简单的办法，事实上也已在迅速地执行了。前者如6月初苏皖浙等六省，一致相当提高货价；后者如春间天津英昌厂对于工人复工所订条件之苛刻，夏间大中华镇江分厂用闭厂来达到减低工资之目的。民族资本家所能做的仅是这点，火柴工业的前途如何才得救呢？

（原载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

第1集。生活书店1934年12月初版）

蚕业统制之前途

构成目下中国蚕业危机的基本形态，第一是茧价的滥贱，超过了农民无偿劳动所能容忍的限度；第二是经济能力的薄弱，决定了农民只有绝望地放弃了改良种的饲养，而以上种来代替；第三，农民舍去了或是减少了蚕种繁育，以致桑田迅速地被毁，改种其他作物。这种趋势，在1934年春季茧市结束的过程中，更有力地表现出来了。缫丝工业根本的绝灭，农业恐慌以多种形态加速展开，在这种交互的基本威胁之前，苏浙诸省农村的主要副业——蚕业，其前途真是摇摇欲坠，不可终日！

政府为了挽救这种颓势，早已付以甚大的注意。譬如全国经济委员会专设蚕丝统制委员会，就是为了担负此种使命。其他如浙江，在管理改良蚕桑事业委员会这个机关之下，默默地推行统制政策，已非一年。江苏自1934年春以来，也在建设厅领导之下，组织蚕业改良委员会，对于统制全省蚕丝事业，曾作猛烈的活动。到了财政、实业两部会同江、浙两省议订挽救蚕丝业计划，其办法更有比较具体的规定：除了奖励植桑，改良桑园，改进技术等比较次要的以外，它的主要方向是在茧行统制与蚕种统制两大目标下进行。统制政策之成为政府解救目前蚕业危机的基本方案，已是毋庸置疑的事件了。

在财、实两部会呈行政院的计划书中，有改良收茧办法的提议，其目的在使农民解脱了高利贷及商业资本家的中间层剥削，

而以“农民丝厂直接贸易为原则。”但是实际上统制茧行显然不是由这样“原则”出发，它的动因是或多或少地与解救政府财政困难有其渊源关系；所以江苏建设厅所规定的统制法规，其重心就自然地移到“强令收茧者每担缴纳保证金3元”（第6条），以及“每收干茧一担，当缴改良费12元”（第8条）这类条文上来了！无锡茧行商人呈院部会文中，简直了当地指为：“此种变相捐款，更甚于从前之厘金，病民害商，孰甚于此？”（5月25日《无锡人报》）。这类纯为增加税收的统制法，对于挽救蚕业危机的关系，实使人无从捉摸！

另一方面，江苏省蚕业改进委员会第五届大会，为了镇压茧行们反抗统制，通过了13条“严厉取缔”的办法。其中第4条是“凡收茧商所填收茧日报表，如有以多报少者，将其短报部分之茧，没收充公；”第5条是“凡收茧商所收之茧，未经填送干茧起运请求书，报请发给干茧纳费证及干茧通行执照，而擅自起运者，将其无证照起运部分没收充公。”这种办法，很明显地都是仅在如何防范商人规避缴费这一点上设想，所以也在暗示出所谓茧行统制的具体内容，实不过是要征收一种变相的苛捐。在该办法第9条中，又规定“凡以模范改良区产茧冒充普通区产茧，希图免纳改进蚕桑事业费者，将该茧全部没收充公。”这样所谓模范改良区所产之茧，其所以异于普通区者，实不过是多缴纳了一重费用。于是在政府划区积极进行蚕桑业挽救办法的潮流中，乃有江阴县茧商向实部及农村复兴委员会通电反对该县划为改良区，要求确认为普通区的离奇现象，现行茧行统制政策下的暗影，实是颇堪心悸的了！

事实上，政府与收茧商人之间，在意见上并没有多大的距离；商人除了因为该项政策增高税率而外，他不需要再说什么，更不需要来反对统制。所以，今年春季江苏反抗茧行统制办法闹

得满城风雨的当儿，因政府接受了“每干茧一担，缴改良费3元”等3项办法而迅速地解决了。但是，除了巨大的税款新收入以外，茧行统制究竟曾否减轻农民所受商业资本家的种种垄断和播弄，或是使缫丝厂家能够不受“茧商从中周转买卖，”而降低其“茧本？”这实是我们不应忽视的问题。

在1934年春季的蚕茧市场上，农民依然或是更甚地受到收茧商人对于茧价垄断的剥削。无锡、江阴、萧山、海宁等地的茧行同业公会，还在开秤收茧之前，便限定茧的最高价，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对茧市场发生了影响。金坛县为了实行茧行统制，使27家茧行归并成4家，皆为大商人所垄断，得以任意杀价，结果使农民大众起而反抗，激成流血风潮，然后再由政府调动保安队将农民镇压下去（见1934年6月7日《申报》）。在浙江萧山，也因为收茧集中于少数大商人之手，得以极端垄断市场。商业资本家的剥削机能，丝毫不曾因为茧行统制之雷厉风行，而感受何种影响。商人在向农民转嫁其所缴纳的改良费的过程中，自然更强化了垄断杀价的机能，这样，茧行统制自然成为远离农民大众的政策。农民除了忍痛地比市场价格更低廉地出卖其蚕茧外，只得晒茧土缫，毫无保障地希望丝市回涨来解救他们了！

政府对于茧的贩卖市场所施行的茧行统制政策，它有多大能力来挽救蚕业危机，我们已不难由其根本动向及其实际事态推论而得。但是政府在挽救中国蚕丝业的巨大计划中，尚不以这样意义来统制茧行为满足，于是有所谓蚕种统制，又雷厉风行起来。可是它实际的成果是怎样呢？

整个农村的极度贫困，茧价狂泻似地低贱，使农民无从梦想育蚕过程的改良。贫困促使他们热望茧的丰收，而同时又在根本毁灭他们的希望。江浙间一般农民迅速地复育土种，为的是他们没有现金可以购买高价的改良蚕种。这种情形，在1934年春季改

良种生产过剩上，可以看出来。不但苏省蚕种多余了20—30万张，就是实行统制的浙省，也多8万张，无法销售。蚕种统制在某种程度上固能强迫人民饲养改良种，但是它克服不了农民的贫困，这是问题的核心呀！

目下，江苏省在积极进行蚕种统制，分布统制办法8条，决自1931年秋季起实行。在模范改良区中，其主要办法是：（一）各蚕户所需蚕种张数，秋种于6月30日前，春种于10月31日前，填表呈报；（二）秋种种款于当年7月20日以前，春种种款于上年12月31日汇解；（三）前项种款解到后，即按照所解种价，配给蚕种，但各蚕户领种数量，不得超过预报数量，过期亦不得请领。

在上述3项售种办法中，政府办事确是非常便当，既不必负种价拖欠的危险，又无蚕种生产与销售间不一致的弊病。但天下往往不会有对立的双方同时得利的，政府为了能便利地进行其所谓统制，在农民却转变为意外风险的加重。在丝的市场价格极度动荡的威胁之下，农民在6月30日以前，已经不得不决定秋季的育蚕量，甚至到次年3月间才开始育养的蚕量，现在非在前一年的10月决定不可。姑不论农民究竟有没有能力作这样的决定，而第3项办法，又逼使他们非盲目地规定不可；否则，他们再也没有蚕种可以领得了。农民在这老长期间，需负担多育或少育的一切损失。尤其是第2项办法，关于预先缴纳种款的规定，强使农民远在领到蚕种的数月以前，已经必需将种价缴付，假使说统制蚕种是政府救民的仁政，这样，也使农民无福来享受仁政的福泽与好意！自然，人们决不忘记，政府有统一种价，每张一律5角的规定，好像会减轻人民负担；但其实按照1934年春季无锡种价，其最好者如大有种场出品之虎牌种，已跌价至每张7角5分，至寿星等牌，每张仅售4角，那么农民究竟能得到

几多种价上夸张的优待呢？显然的，政府的良政美治，对于贫困的农民，不是更受压迫，因而更深地堕入高利贷者的掌握之中，便是被强迫地放弃继续育蚕的机会。秋蚕育养一开始之后，事实便会昭告我们的。

对于一般普通区内，苏省公卖蚕种，其定价每张要高1角（即6角），（见该统制条文第4条乙项第2款）。此外还有所谓特殊情形的改良区，其售价每张要加2角，即为7角（同上丙项）。这种模范区与普通区之间公卖价格的不同，显然的是为了政府曾经在模范区里面征收了巨额的改良费之故。征收改良费与蚕种公卖间的血缘关系，便是如此而已！

农民是分散的，他们只是默默地用事实来答复。但是蚕种统制所加于商人的负担，他们便不甘缄默。在6月里，江苏省府对于秋种收买的办法是：“行销苏省，每张7角5分，先付5角，共需款32万元，余2角5分，俟出茧在茧价中抽补。此32万元，春季茧捐中可拨18万元，余由财厅筹拨”（见6月24日《大晚报》）。但是最近“苏省蚕业改进会，为顾全事实起见，重行变更办法，为每张先付1角半”（见1934年8月7日《中华日报》）。这便引起无锡苏州武进蚕种业公会几次开会反对，以为“省方规定，显与最初功令相反”，而坚决要求“取消输出外省销售之成命，并要求先付种款每张5角5分，否则拒绝浸酸。”请愿结果，负责当局答复：“关于种价，厅方规定，先给5角，除1角5分，已付各场外，其余3角5分，须视秋茧成绩，再行补发”（均见上报）。目下3县代表还继续在向省方请愿中。可是这样一来，政府既然不必从“春季茧捐中拨18万元，”更不必要财政厅垫付14万元了。但是农民为了获得秋种，早在7月20日以前，已不得不以每张5角的代价，将种款缴付给“蚕业改进管理委员会”了！

蚕业是不得不救济的，政府除了增植桑树或是改进技术等办法还停留在计划书上以外，茧行统制与茧种统制已在猛烈推行，然其前途已如上述。所以蚕业危机的解救，还是中国农民大众本身的一个课题！

（原载1934年8月13日《申报·经济专刊》）

中国邮政的症结

在1932年5月间，上海邮务工人曾经为巩固“邮政基础方案”而实行罢工。在同月26日结束罢工的宣言上，说了这样的话：

“……惟不能不冀政府当局，从善如流，以公正之态度，具最大之决心，实施本会等所提之巩固邮基方案”。

此后二年又四个月的岁月整整地过去了，由于上述事件，政府曾聘请专家，在邮政经济制度委员会的组织下，“缜密地”考虑挽救中国邮政制度危机的方案。该会所提出的办法，也曾在立法院通过，作为正式法规，但是当局的“公正态度”或“最大决心”，也仅仅到此为止了；交通当局并不希望把法案付诸实施，于是最近上海邮工再度酝酿怠工风潮，重又不得不促使人们对于邮政前途加以注意。

据9月7日《大美晚报》载称：“真正造成此项工潮之原因则为历届悬案之迁延不决。其最要者，若邮政储金汇业局之合并等等，若欲追溯工潮之起因，盖非一朝一夕所由成也。”这是对的，两年多的岁月，当然不能再算作“一朝一夕”；而我们按诸7月31日上海邮务两会联合会议所决定的为首四项议案，更证实问题依然在旧轨道上打转：一切纠纷底焦点，主要地集中在储汇局的分设与合并上！

储汇局原是邮政总局的一部份，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邮政的恩惠——高度的资本主义组织化，同样地也遗留给它。它从1919

年的154 051元存款，增加到1928年的16 118 120.34元。在拮据万分的交通当局，怎样能够不受原有组织的束缚，而可自由地运用这款子，自然成为迫切的问题；于是1930年1月交通部呈行政院文中，认为中国邮储数量不能达到资本主义诸国的巨大，乃是“病在未设专管机关”；再经刘书蕃的苦心擘划，储汇事业终于离邮政独立，直接归交通部管辖。一个重要的步骤完成了，储汇事务脱离洋人式的资本主义的束缚，投进了官僚的怀抱；下面的引文，颇为率直地道出这点：

“储汇局分立之真正动机，无非在破坏邮政之经济独立，与优良考试制度，安置私人而已。……试观储汇总局成立以来，……在申汉宁设储汇分局，多设局长……及其他委员等一三百人，其薪金养老金房金办公费等，每年虚耗不下一二百万元。……皆由私人荐保录用”。（1933年7月1日汉口《邮工》月报。）

在上述意义之下，主张以邮政人员充任储汇局副局长以下各职的办法，在朱部长所积极主张的“用人另订专章”之下，自然难得实现。而储汇局的支出从1930年的582 000余元，迅速地增加到1931年的711 000余元；盈余从5 620 756元，减到1 921 095元，毋宁是当然结果。官僚玩弄下的储汇局，其工作的浪费，随着也达到最高限度（根据1932年度《储汇事务报》）：

储汇局所开汇票	2 669 690.09元
储汇局开支费	702 069.30元
邮局所开汇票银数	164 440 701.80元
邮局开支费	1 951 853.67元
每元汇票平均开支数两者之比，为30元：0.01元	

其实所谓储汇分立，除了新设一总局三分局之外，实际上储汇事业还是由全国7 776所邮局代理。同时，上述事务报又告诉我们，当年储汇局所收汇费为34 460.01元，邮局所收者为

3 057 851.41元，但按照会计独立结果，凡储汇收入，全归储汇局所有，储汇局从盈余中再拨七成，作为邮局代理储汇之费用。经过这样巧立名目，拨入邮局之数，仅为1 344 766.61元了。交通当局将储汇事务独立；再将邮政主要收入在会计独立名义下攘夺以去，最后邮政所应得的盈利也能合理地加以侵蚀；邮政经济自然不能不日趋暗淡与危殆。交通当局却转用挖肉补疮办法，借口邮政亏耗，将普通邮资从每封3分，一跃而加为5分，挂号快递等之苛重邮资，更使平民大众，无法享受近代交通之福利，本年度寄递信件减少了9 000万封以上，实是证明恶势力摧残下邮政发展是日趋萎缩与凋残了。

储汇事业脱离邮政，不仅使邮政经济受到威胁，同时由于“交通部遂视该局为政治运用莫大的财源”（见监委罗介夫弹劾刘杨舞弊文），使储汇业务本身，也受了莫大的腐蚀。一部分被暴露于世人之前的刘杨舞弊案，提供我们判断事理的真实根据。在6次不动产的投机买卖中，侵吞款项达100万；公债投机，亏损至150万；而大夏招商局等不可靠的徇私借款，亦达8次。这不过被透露在日光下的黑影的一部分而已。前后两任局长能用国家庞大机关，作数百万元的舞弊，其原因自然不得不归结到最高交通当局与储汇局局长之间的默契（参见罗氏弹劾文）。1932年上海邮工为要求储汇局的经营与投资重归邮局节制而实行大罢工，在上述重重掩护下，有如上引宣言：终于不得不将救护邮政的方案，托诸“希冀”的空想上去。

刘杨舞弊案的暴露，并不能提醒当局对整个重新作全般的考虑。储汇局最近与电政司所订立的收支合同，更说明当局怎样地不把储汇局的投资方向和政治目的分离开来。历年军阀内战的频繁，以及7 000万元以上的外债，使中国电政早已达到破产的地步。仅以1929年之统计为例，有无线电报亏款320余万，电话

亏款200余万元，合计达500余万元。对于这样的国营事业，储汇当局半秘密地给予信用的透支，必然使人将它和刘书蕃长局时的各次徇私借款，作等量齐观。和储汇局前途有密切关系的邮工，自然要首先提出抗议：

“全国电政按月开支，超出收入约50万元之巨，此数悉向储汇局逐月透支……查储汇局乃民众血汗，并非国家公款；运用储金，应依照邮政储金法慎重处理。今储汇当局未取得电政之可靠担保，遽予电局以巨额透支……”（见7月28日《申报》上海邮务两会请交部纠正邮电收支合同文）。

在8月3日《申报》上，刊载了储汇局徐副局长向新闻记者所作愤激的声辩。局长除了竭力声辩并不曾有50万透支外，更竭力说明电政是每个月有盈余的营业。电政既然因徐局长的声辩而成为有盈余了，自然，局长在另一谈话中便率直地承认储汇局确曾允给电政以10万元的透支。其实，50万与10万，不过是量的差异而已；问题倒是在电政能否真如徐局长所说的月有盈余，以付还透支。而储汇局方面，对于浙江上海各邮会要求当局者宣布原订透支借款合同中第5、6、7、8、10各条内容，仅仅用静默来答复，更使各地邮工对于透支合同的抗辩，振振有词！

各种事实都在证明新兴交通组织——邮政上，两种势力的对峙状态；构成对立中心的储汇局问题，仍在作直线式的发展。储汇局既不能重新容纳在邮政体系中；更不曾改变其投资的方向。但是交通当局却并不曾忘记怎样摆布邮政；邮电合设，便在法令森严下，又雷厉风行起来。

储汇之所以分立，是为了扩充业务；邮电合设的理由，是为了节省经费与便利民众。这里虽有名义上的矛盾，却同样都不愧为精思奇构的产物。假使仅从邮电合设本身来讲，我们难于了解所谓便利或节省。全国1120所电报局，合于合设条例的，有

1 072所。除了通都大邑的口岸外，合设与分立，对使用者的利害，原无二致。从合设上惟一谈得上节省的，惟有房租。从这里所能省下来的，本少得可怜，更何况实行时有物质的困难，以及迁移上更动装置的损失（据《浙江邮工》上载称：浙江邮电合设，电局方面至少须多费2万元）。所以若是仅从合设的字面上着想，便每每会疑惑到交通当局怎样不从电政危机的主要契机——苛重的帝国主义者的外债，封建军阀的摧残，官僚政治的腐蚀——上解救电政？显然，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邮电合设，与储汇局电政司之间签订透支合同，并不是截然无关的二件事，而是一个计划的两面！它们不仅是使中国邮政在组织上更进一层的混乱，更代表着中国邮政事业一个新的倾向。帝国主义者所一手创定的中国邮政，对于工作人员所给予的相当保障，目下自然地成为讨厌的存在物。交通当局事前迭次申说邮电有仿欧美合并的必要；而在此次合设中，复又竭力向邮工声明并不是合并。然而用饥饉的久在官僚侵蚀下的电政，来冲淡邮政中近代组织下的薪给制度；由合设而至于合并，将高度组织化的庞大邮政，成为新的俘虏物，实是邮电合设的真谛所在！各地邮工用不安的眼光来透视这“合设”的内在意义，竭力反对这新的企图，但显然失败了！

在这样攻势进展下，第二次邮政会议开幕了。基底已被抽空了的邮政——平时主要收入的储汇局被划出独立；每年130万元对航空公司的津贴，每年呈缴部方的108万元的管理费等等，使邮政经济空前地产生了1 500万元的亏蚀！将亏损责任推给东北邮权的失陷，显然并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困难。1924年盈余7 753 065元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所要待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便只是弥补问题。8月5日的《大美晚报》便载着“1934年度预算，须以1933年度预算为准绳，除员工薪给，从严考核，照章酌

量增加……”这样耐人寻味的消息。

当邮务两总会代表赴京请求出席会议，邮政会议开幕的9月1日《申报》上，有这样记载：

“闻此次所议事件，大都关于邮务及员工待遇。……查邮局员工待遇，在从前确属可观；惟自邮权收回后，当局假借名义，几经更改，已至改无可改限度。倘当局再不体恤，员工固有切肤之痛，而邮政亦必有崩坏之虞。……但愿交通当局，能开诚采纳代表意见，庶事态不致扩大。”

这是了解上海邮工态度上重要的消息。他们从两年前巩固邮基方案的运动上，退守到反对减薪保护自己的阵地上。同日，两会晋京代表被会议拒绝参加，接着答复的行动，是两会指导人员总辞职，继之以挽留领袖的默默的怠工。

据12日南京电报，交部负责人宣称，上海邮工怠工，已“无条件复工”；更重要的是“表示当局非常宽宏大量：交部决不追究”。工人的反抗，既是无条件地压平了；以后的岁月，将是迅速地实行不曾公布的邮政会议的决议案；但是对于邮工，对于国民大众，其情形又将怎样呢？！

（原载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

第1集。生活书店1934年12月初版）

积极兴筑中的中国铁道

就过去历史说，我国铁道建筑的特征：第一，是帝国主义者政治上和经济上统治中国的真实基础；第二，它乃是中国的统治者跟帝国主义者紧紧地勾结的媒介物，一切巨额的铁路借款，至今尚在吮吸着国内生产大众的血汗；第三，列强在这处女地上所玩的抢风玩艺，使她蒙垢忍辱；铁路并不曾困紧了国民经济的总体，反而促成国内市场离心和分割。所有这些都成为半殖民地中国生产大众苛重的负担。

70年来（1863年上海27家洋行要求筑上海苏州间铁路起），这种倾向在曲折委婉中进展。尤其是世界经济恐慌的继续，第二次大战前的险恶风云，促使帝国主义狂热地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从事战争准备。不仅为了资本输出上的得利，更为了上述的军事意义，半殖民地的铁路建筑便被强迫地促进起来。

近年，特别是1934年度以来，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废墟上，各种形态的积极兴筑铁路，委实成为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根据8个月来散见在各地报纸的消息，有24条比较主要的铁路，在兴筑、测量、整顿和拟议之中。同时更根据这种事实的进行过程，我们不得不指出最近中国铁路建筑的动力及特征是：1. 各帝国主义者在前述的意义下，从事更积极地统制中国；2. 同时华商金融资本家也在竭力助成这个过程，替过剩游资探求攫取高额利息的廉庄大道；3. 各个军事集团，为了安定社会的秩序，更为了相互争雄作深入的军事准备，都分别地在推进铁路建筑。

在第一个过程中，1896年后争夺筑路权的历史，更露骨地搬来重演；所不同的是，现在在各种建设的名义下，帝国主义者的目的反被正义化了。自然，这仍旧无法掩盖列强间的你争我夺。英帝国主义者比起新兴的美国来，虽然有减容光；对于急躁骄扬的日本，更是瞠乎其后。可是它更知道怎样充分地利用历史上的筑路特权，来巩固它在华南的统治，急急乎求底定长江下流的势力。庚款的退还，恰恰提供了它最好的工具。它率直地规定，退还庚款总数2/3，当用于铁路建设事业，并且更规定以完成粤汉路为主要目的。它是怎样地梦想着：以新加坡的强大武力为根据，经过香港，由此登陆，循广九路，随着粤汉路的积极进展，而达到中国的心脏武汉三镇。目下该路的完成，虽尚需二年，可是它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求粤汉广九两路接轨，不惜用重利诱致或是实力讽示当地地方当局俯首就范。另外一端的湘鄂段，也已有贷借英庚款20万镑加以整理之说。最近香港报纸上更泄露这样的消息，西南两省政府，在共同要求之下，为迅速完成从三水（粤）起到贺县（桂）止的这条大铁路（该路与英国直辖的广九路接轨），正积极进行借用英国或美国的资本1 000万元，以该路作抵。英国在华南积极活动，从此向华中深入，这不过是它活动方向的一面。同时它更不忘情于长江下流。京沪、沪杭甬两路主人中英银公司和建设银公司，合贷1 600万元巨款，求积极完成西兴曹娥段铁路；钱江大桥550万大借款（英庚款拨借150万元，经委会200万元，华商各银行200万元），也在同样要求下成立。英国资本在半殖民地中国的铁路建筑上，如何积极地力求囊括一部，完成首尾相呼应之势，已经无待解释了。

三十年前法国资本对于建筑中国铁路，力求北下南上铁子式的种种活动，现在重新积极起来。从河内东走至桂边的铁路，以及自同地北伸深入云南昆明（及支线达建水）的滇越路，使西南诸省在

政治上经济上都乖离了本部诸省，而与法属安南联结得更为紧密。1934年8月1日，法国资本完成了北上梦想的第一步，法国实业自组团代表人柯米斯基与四川善后督办署，签约代建自成都至重庆间铁路。自然现在的当局也乖巧了，也曾在条约上明文规定路权自主，代建铁路完全属于技术范围。可是四川军阀的伎俩终究掩不过事实，该草约第4条上^①，马上把真相毕露，虽有更巧妙的化装术掩护也是徒劳。法国资本这种惊人的胜利，变相地获得了在四川投资筑路权，自然也是另一国家的失败。四川是川汉铁路的终点，是英国资本的禁脔呀！英法资本此后在四川的白热斗争，定必可观。

法国资本在北方活动的成效，并不下于在南方。历史所给予它的遗产，是正太路和那么长那么重要的陇海路。用比利时国徽乔装的法国资本，只要充分利用这些特权便够了。当陇海路东段积极向连云港伸筑的时候，比使穆纪佑便来视察工程，那时情形，使我们不得不发生疑问：建造这条铁路，是不是为了中国利益呢？该路潼西段工程，现在也应开发西北的需要，正在积极进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当局曾倡议该路抵达西安后，不再前进至兰州，却折而南下，越汉中而达成都，为西成支线。这里虽然还仅是拟议，还没有具体的计划可资推究；但是从陇海路与成渝路建筑权以观，一种宏大的南北呼应的形势，便显现在我们眼前了。

英法在四川的冲突，尚隐而不显；但是日法在华北，对于借

^① 该约第4条：“建筑成渝铁路所需经费，除以甲方（华）在建筑工程进行期内，所有交付之年金支付外，其不足之额，作为甲方对乙方（法）之欠资，此项欠资，自成渝铁路全部建筑工程完成之日起，由甲方在15年内付清，并按每日欠资余额，给予年息6厘……”（见8月2日重庆《商务日报》）。建筑300公里以上之铁路，其经费仅为300万元（按即年金），这里自然不得不产生所谓欠资；且欠资之偿还期既有15年之长，复给予利息，实际上便是借款筑路，所不同者，法国不仅得到投资利息，更得到筑路利润而已。

款筑路特权的利害冲突，已不容情地爆发了。春间法国巴黎电气公司，与铁道部订结贷款5 000万法郎，兴筑大潼路的条约。日方满铁三菱诸公司以为这妨害其既得的权利（日获有沧石铁路建筑权），于8月间突起反对，要求共同投资。列强对于目下中国积极进行中的铁路兴筑，所具有的主动的作用和利害冲突，在此次事件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东北的沦陷，使日本在中国铁路投资的争夺战上，比重大大地减低。但是它不仅消极地阻止法国资本在华北方面作铁路投资的活动，更积极地要求整理铁路旧债，以便在它新的势力范围中打开投资的大门。这里日本首先和它政治上的企图迅速地联贯起来。从北平西北行，横穿察哈尔山西绥远3省的平绥路，是蕴藏巨大的可能的。从该路起，我们可以西向而达宁夏（铁部最近筹建包宁路，正在接洽借款中），北向而入外蒙；这样平绥路自然便成为日本狩猎的目的地。5月间乃有该路局长与日本东方发展会社谈判520万镑借款之说。说得好听点，这仅仅是整理旧债；可是假使和日本在华北所采取的整体步调关联地观察起来，自不难于理解：这不过是它开始攫取该路的一种方式罢了。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铁路争夺战上，不仅用直接借款（如中英银公司），退还庚款，代包筑路等等手段，来完成各自的目的；同时还透过了华商银行的手，来大放其烟幕。监察院关于大潼路借款提出弹劾后，上海5家银行竟马上声明，那种借款并不有损国家利益，他们当向巴黎电气公司担保该借款契约继续有效。这种行为够算负责而豪侠的了。外资和华商银行的这种关系在玉萍铁路借款上表现得更为具体。本年春季，为兴筑该路而发行的2 400万公债，转向沪银行界抵借1 600万元。然而华商银行实际所支付的只是800万元，其余由德国奥脱亚而夫铁厂担任供给材料借款800万元，给予年息6厘；为求德国资本感觉到投资安全起见，

由华商银行向德国资本担保还款。这样中国自己以为玉萍路完全是“民营”的了，可是在德国资本家看来，却是“中德合筑”

（见国民新闻社8月25日柏林电）！华商银行这种作用更在扩大，最近整理平汉路大借款3 000万元，其中有1 200万便是类于上述的担保购料借款的。列强投资的安全在各种各样的方式中增加了；因此中国铁路债券在伦敦市场上涨价了；中英银公司董事本纳德也在称赞中国铁路的进步了。

在上述第一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华商银行对于外资投入铁路中所尽的作用。其实，它们的利益，不仅因附随在列强资本后面，而得到部分的营养。它们更因政府的建设费“一无所有”，得而大量地将资本投入铁路建筑，为游资过多的痼肿病开拓一条出路。而且也惟有铁路才能多多益善地容纳了多量资本；利息的优厚，担保的坚实，公债辗转的抵押，对于铁路营业苛重的干涉（如杭江路银团），同为这一过程中的特征。玉萍路以赣省筑路公债1 200万（盐税附加作抵）铁路建设公债1 200万（该项公债九八扣发行，利息6厘）向沪银行界抵借1 600万，利息8厘。钱江大桥公债，与英资合作，中国银行等合贷200万元，利息1分，以本桥财产与收入，及浙江省清理旧欠公债票面132万元，1931年金库券票面余额50万元为抵押担保。淮南煤用铁路建设委员会以1933年电气公债600万，向华商银行抵借300万元；最近新成立的整理平汉路3 000万大借款，以该路在汉口之地产作抵。粤汉路英庚款公债150万镑，除汇丰向外商承销外，华商方面构者以“中国银行为最多”。此外如筹建包宁路，需款1 000万元，平绥路改道费用等，均已在“接洽借款中”。又如江南铁路公司资本仅300万元，其承筑之京韶路长1 200公里，需款3 000万，将来可说必需借款的。像这种潜藏着的贷款可能性，虽然十足有被外资所捷足先得的危险；但是就眼前事实说，只要利息优厚，华商银行固然

可以单独投资，但也深愿与外资合作。列强侵蚀下的铁道投资，它的“残馐冷羹”，真够华商银行家“过门大嚼”了！

推动或是主宰最近铁路兴筑的第三个因素，便是国内军事当局所做的各种准备。譬如就南浔路1933年7月到1934年6月的营业看来，军事列车占营业车次96%，帐面上盈余虽有611 000余元，实际反亏89 000余元，因为收入中有305 475元为军事记帐。自然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但反之，一方面亏损，另一方面又要求新建铁道，这并不矛盾。例如1934年讨闽时杭江铁路所发挥的功能，其代价可算够大的了。玉萍路南玉段严限于13个月内竣工，赣鄂铁路严电筹筑，其军事的意义都很重大。粤省积极筹筑自广州直达粤闽、粤赣边境的广汕路，粤桂军事当局迫不及待地拟借外债以完成三贺路，都是企图造成一个地方的中心。四川军事当局的成渝路，晋当局求完成同蒲路，都使铁路成为部分割裂整体的一种手段。这里，我们更可知整个半封建的经济机构，是具有多么大的决定力！自然这种地方的与军事的铁道兴筑，又是分别地与投资者的利益相一致的。

上面所论述的资料，仅以1933年8月来的事实为限。对于从前的，如由英庚款所一手包办完成的浦口轮渡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在华商银行支配之下，杭江铁路的完成，都不及加以申述。此外如河南筹建禹许铁路，建筑费由县府向人民摊派；西南当局主持下的筑路，纷纷摊派民股，同样地确是在加重破产中农民的负担。固然在抽象的意义上，开发铁路的伟大意义，我们可以给予最大限度的同意；但这并不妨害我们从具体事件中，指出帝国主义等等乃是决定中国铁路兴筑的真正原因。也惟有在这样的相互关联上，才能认识中国目下筑路的意义及其必然的后果！

（原载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第1集。
生活书店1934年12月初版）

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

一、中国国内市场的特质

国内市场的存在和完成，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当发展后的产物。当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扫荡了前时代的自然经济及其上层建筑的政治障碍，对市场愈加获得决定的作用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民族的或国家的界限便被要求而逐步形成。这个问题，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事实上却有种种复杂而歪曲的形态。第一，各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国内市场的形成上发挥的推进和阻碍的功能。严格说来，这里与其说它在扫荡旧的经济机构的时候，完成了推进的作用，倒不如说它和特定势力相结托相扶持，部份地使市场趋于分割，更来得确切；至少在帝国主义阶段，后一作用比前一作用更主要。第二，固有的商业资本的开拓功能，受了本身法则的支配，并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半封建的农业生产继续维持，提供了分割市场的真实基础。日渐萎缩的民族工业，也不能负起统一国内市场的责任。第三，寄托在这种关系上的各种上层机构，如地方军阀程度不等的政治割据，名目繁多的重叠税捐，币制紊乱和国内汇兑行市的巨大差异，度量衡制度的不统一等等，都使国内市场的彻底形成，受到种种限制。有人曾说整个的中国已经严密地隶属于国际市场，这是不错的；不过它自己却不能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因而一般国民大众正经受着比加拿大

甚至连印度还不如的苦难。

这些内在的主要因素，规定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特质。松懈的市场纽带，随时可因上述某一因素所起作用之加强，而有一定的被破坏的可能。政治上名义的短期统一，一切上层改革，由于种种关系所限制，不易有何成果。譬如国内市场的厘金裁撤以后，立刻为各种各样的营业税和产销税所替代，在广东甚至变成村税乡税。再如政府竭力推行度量衡新制，然而一方遭遇到各地基尔特式的商人的顽强反抗，同时在推行者手中往往变成藉以渔利的工具，以致难有结果。特别自世界经济大恐慌以来，内在的各种矛盾势力却达到了总爆发的饱和点。首先是各帝国主义在华资本战争的激化，愈加要求特定势力范围的划分，东北已开其端。其次，适应上述要求，军事集团的分立倾向，愈益明显，他们为了准备内战，就从事一切活动，以谋收入之增加。最后是国民经济的普遍衰落，现银向通商口岸的畸形集中，造成了都市与农村间，内地诸省与沿海诸省间商品流通线的缩小。这种种横在社会底层的矛盾因素，提供了目下国内市场被分割的根据。

二、国内市场的开始分割

在不远的过去，前述的市场分割便以比较简单的形态开始了。譬如去年湖南军事首领，用维持省立第一纱厂的名义，采取封锁市场的办法，设置棉花管理所于长沙，分所于常德、衡阳、岳州等处，限制沪汉各地纱厂生产的棉纱输入省境，该省主席答覆财部的电文中说：“棉纱为人民必需之品，湖南地广人稠，每年需用，为数甚巨，本省纱厂所产之纱，既感不敷分配，则推销国内各纱厂出品，实为必要之图……惟年来本省市场，棉纱充斥，销路疲滞……近以竞卖关系，竟不惜贬价倾销……而本省纱

厂成本较沪汉各厂为重，更属不能维持”（1935年2月19日《大公报》）。当然，将如后文所述，湖南省当局限制“外纱”入口还有别种居心，不过这段话也如实地表明：脆弱的中国国内市场，是如何容易为各地的自卫要求所击碎（当时长沙市棉纱同业公会首先反对，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也继起抗议）。此外如山西省，自阎锡山扩大地盘战争失败，二次回晋之后，为了巩固割据，准备再战，便在山西省推行经济门罗主义，草拟十年建设计划，实行“食盐督销”、“企业公营”、“贸易统制”等分割市场的办法。但前者（湖南）仅以加征每包棉纱管理费大洋2角就算了事；而后者（山西）一时也不曾有真正建设的积极动作，不过变成横征暴敛的另一手段。所以平民竟称“十年计划”为“十年饥饿”，称阎氏执行该计划的金融机关“垦业银号”为“坑人银号”。

直到最近，经济割据便用最露骨的形态爆发起来，首先是上述的山西省，其次是西南的广东。据1935年9月2日天津《大公报》载称：“晋当局拟提倡土货，抵制外货，已规定统制贸易办法。凡晋人出省购货，及外商来晋售货，并外货经过晋境者，须事前经省政府核准，始能购买，否则决予严厉之处分。并特函正太路车站，检查所及公安局，自1日起实行检查，并命各商号一律遵照”。此外尚颁布了8条规则，日用品如火柴毛织品瓷器等皆用省产替代外来产品（该条文请参看9月6日上海《江南正报》）。又据9月22日《大公报》北平通讯，说明山西省所以急于断然实行市场分割，其原因为：“该省自经19年战事，经济基础因现金大量流出而动摇，故阎锡山氏返晋后，苦心孤诣，谋挽颓势”。现在绥靖公署参事张至心氏所主持的经济统制委员会，就是为了完成此种目的和上述的规定而建立的。

这种运动在广东，就更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推进。4月间西

南当局通过了三年实业建设计划，实施糖、水泥、钨等产品的专卖。该省建设厅草拟了保护实业办法16条（详文见9月22日《申报》）；同时根据条约第7条“省内完全华资之民营实业，遇有受外货倾销之压迫时，得呈请施行保护税，倾销税或其他有效之方法，以维国货之市场”的规定，又颁布了征收省外输入货品保护税则13条（详见9月27日上海《商报》）。主要征税货物为各色棉纺织品，肥皂，酒精，磁器等，其征税率竟达50%。据9月19日《中华日报》驻广州特派员通讯说：“广东财政厅长区芳浦，为增加本省财政收入起见，特决定征收省外输入货物保护税……现决定即日施行，开始征收施行此项特税，由本月15日开征。并为节省经费，及划一税收机关行政起见，不再另行设处征收”。此外如命令省内各种建筑用水泥在1万元以上者，须用省立西村第一水泥厂出品（五羊牌），对于启新、龙潭等厂水泥入口，必须领得该省政府许可证及缴纳大学捐等1元3角，用这种种方法，来完成阻止外货入省的目的。

在前述广东省所采取的步骤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有相同的目的，现在且分两点来说：

（一）企图平衡一省的人超，同时也是想消除日益扩大的财政危机。前者是国民经济所受的半殖民地式的宰割的结果，后者主要的为了准备战争而输入武器。（二）农村的极度破产，促使地方官场以及土著工商团体，发生以分割市场来保护自己的幻想。譬如广东皆以官场资本经营工厂，抵制外省货物输入，以攫取本省市场上的独占利益；再如广东的一部份商人和厂家拥护“保护税则”（请看9月27日《时事新报》），就是想使此种幻想趋于实现。他们为了完成这种要求，以风行于现今各国的统制经济政策为烟幕，而其结果不过使国民经济的整个机构更落后更衰退而已。

三、走上彻底的殖民地化之路

国内市场分割或经济割据，这是军阀混战的一个变形。自从1930年大混战结束后，露骨的内战便缓和下来。但是，在这和平的外表下愈益滋长起来的，是地方军阀由政治割据而加强的经济割据；国民经济这种离心的分化，同时由于上层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各自形成了以某一帝国主义为主的经济集团，作为中国由几个列强共同统制的半殖民地，分裂为几个殖民地的前奏曲！

我们现在更分下列三点，来检讨上述市场分割运动所必然引起的各种影响：

第一，这种市场分割，促成了国内工商业更进一步的破产。稚弱的民族工业，当东北市场被陷的时候，所受的打击是多么大！广东的高额保护税，最先影响到的也必然是这种羽毛未丰的民族工业。假使这里再考虑到市场缩小而引起在华外厂的竞争，以及考虑到华南华北对于民族工业的中坚如纺织等部门，是一个怎样重要的国内市场，那末这种市场的分割，必定成为民族工业陷入最后灭绝之境的一个契机。中国的工业恐慌将更因国内市场这样绝对的缩小而加重。在这种趋势之下，自然，基尔特的地方工商业单独繁荣的迷梦，必然为事实所击破而同归于尽！

第二，促进分割市场的因素之一是帝国主义者，但市场分割之后，反使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这就是说，特定区域的市场割据，实际上往往是适应某一帝国主义者的要求的；因此，所谓保护税则只是杜绝民族工业商品的销路，绝对不能阻遏帝国主义商品的侵入（不论从资本构成高低所决定的倾销力来说；或是从保护税征课的货物对象来说；或是从地方军事集团不敢毁弃不平等条约所给予的关税权垄断权来说，都是如此）。而且事实上

还要用更直接的方式，来贯彻帝国主义的间接倾销。譬如广东专卖制度经营机关——国货推销处，其主要推销物的糖，并不是当地著名的土糖，而只是用军舰成千成万包地载运来的香港洋糖。

7月7日重庆《商务日报》汕头通讯说：“现潮汕商人已停止运糖入口，由广州方面用军舰运2 000包来汕应市，以前商人所办入者，一概封存。此后商人非领照不得贩糖，民间虽有其蔗，而不得私有其糖矣”。当地桔水商人，反对桔水统制法专以订购分销香港公司桔水为务，“请以土货为重”（见9月20日广州七十二行《商报》），这些事实，更说明了推销国货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同时，在这里，市场分割运动必须与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及最近地方政府狂潮地吸引外资这事，相关地加以观察。广东政府为完成上述3年实业计划，向英，美，瑞典等国已借了1,000万元以上，借款总额达3 000万元。最近煤油借款200万元又告成立，以及粤省秘密派人向香港某银行接洽，请在粤投资创立工商银行，援助省办各种事业的经营（见8月31日香港《工商日报》）。向帝国主义借款，并不是绝对要不得的事，但以中国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来说，以国内军阀惟私利是图来说，借款必然以出卖国家政治经济的利益为交换条件，这只是替帝国主义多造成束缚民族经济的吸血管罢了！此外如山西省的西北实业公司（阎氏实行经济割据的大本营之一）所属的炼钢厂，乃是和斯科达公司合作投资的成果。这样，帝国主义者透过并助长市场分割，来更进一步的加速中国的殖民地化的过程。

第三，市场割据更强化了政治割据。通过巨额的保护税收，或是因垄断市场而攫得巨大利润，暂时弥补了因准备战争而造成的必然后果——财政危机。因而对于内战的继续酝酿，当然又成为一种兴奋剂。同时这与帝国主义者在半殖民准备大战的企图也不无关系。市场分割将必透过政治分割而更直接地断送整个国民

经济的前途。

总之，从国内市场一般的松懈，而至于显然的分割，这是一个重大变故，这给中国经济更加重打击，而日益陷入殖民地的阶段。落后的经济机构提供了分割的可能性；帝国主义者主持甚至是扶植了这种运动；而封建的军事集团就全面地执行起来。尽管粤省全部履行保护新税则还待1936年1月1日，但这不能改变问题的严重性。上海商人派遣代表赴粤，请求撤消保护税率，或是南京政府明令取消征税法令，都不能改变某种形态下的分割。客观的社会存在，可以充分说明中国国内市场的特质及其公然分割并非偶然，因而也不是像有些学者所希望的那样，它将自动地消除！反之，帝国主义的，以及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各种统治势力，为了自身的存在而挣扎，必然地要促使或明或暗的市场分割日趋尖锐。

（原载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
第2集。生活书店1935年12月初版）

列强在华的航空争霸战

航空业是中国最近代的新兴交通组织和军事设备之一，同时它也最完全地代表了半殖民地交通业的各种特征。一般说来，帝国主义者首先是为了替商品开拓深入腹地的市场，其次是为了资本输出的巨大利润，最后是为了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准备，对于半殖民地（殖民地更是如此）交通事业的开发，始终站在影响、促进乃至主动的地位上。中国一切近代的交通组织如铁道，航业，都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成立，各自构成帝国主义者统治半殖民地的一个分枝或一个细胞体。

在中国，目下航空业的开发，第一，因为帝国主义愈益临近瓜分中国、相互间战争，以及反苏联战争这种种矛盾的尖端，他们愈益要求交通组织履行预筑阵营的战争作用，于是开发市场或利导资本输出两种机能所占比重，就远较军事意义为低；第二，因为近代战争由平面而趋于立体，空中战争所发挥的威力愈大，谁能获得在华航空霸权，谁便能相当地保证未来大战时胜利的重要条件；第三，对华航空飞机及航空用件输出的激增，利润的巨大，成为帝国主义军需工业争取市场的对象；最后第四，航空工业技术的高度化，民航事业资本数量相当的巨大，使生产技术落后，资本市场畸形存在的中国，愈加不能在航空业上求取独立的地位。这种种基本的客观及主观的原因，使中国航空业彻底殖民地化：一方面是经常仰赖飞机及航空附件的输入；另一方面

是国内民用航空完全在列强包办或独占之下。

但是美国和德国（注意它和东方侵略者渴求战争的同——性）在华航空权的独占，并不意味着诸帝国主义互相争夺在华航空权的斗争已经消失。这不过是说，美德两国资本在这里是竞争的最先胜利者，而竞争并不会就此终止。尤其是因为太平洋均势的破裂，帝国主义间矛盾的尖锐化，使英法日诸国皆群起而要求插足中国的民用航空，要求打破目下美、德两国绝对优势的独占。美国不仅努力巩固现有的优势，且进而积极进行中美直接飞航，以及中菲航路的试航；至于德国则在海陆两路力求欧亚飞航权的确立，新近容克式大型飞机循海轮航路试飞的成功，实际决不仅是卅字党个别的胜利。中国境上一碧无涯的澄空，再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界了！

一、美德两国在华航空权的确立

我们在上节已经指出帝国主义开拓或争取在华航空权的真实意义，因而也知道帝国主义彻底操纵或独占在华航空权，乃是新兴的航空业所以不同于其他交通事业的地方。事实上，美国资本的中国航空公司和德国资本的欧亚航空公司，已经代替了中国民用航空的全部。这就是说，在较为具有历史的交通组织中，它们毫无传统的势力；但是在这新兴的交通部门中，它们是最先获得胜利的主人。自然国内有许多人士是在中美，或中德合办这个名称之下自我满足了，但是殖民化的本质，总是无法掩饰的。

美国资本是侵入中国航空权的最先胜利者。中国航空公司便是它的猎获物。公司成立于1929年春间，原为中国自营的航空公司，但这不过是过渡到出卖给彼方的一条桥梁。在成立不久之后，便根据南京政府所颁布的组织条例第5条的规定，和美国航

空发展公司订立航空运输和航空邮务合同，将沪汉，京平，沪粤三航线归发展公司承办。自营的民航公司，到这里摇身一变而为中美合资经营，而且实际上合资还只是出包的名义而已。过后，发展公司将该项合同的权利让给美国的飞运公司，同时我国舆论也群起反对该项条约，以为中国损失权利过多，政府遂不得已明令取消该项合同。此后和美国资本经过几多次的交涉，“到了1930年7月，便成立中美航空新合同，规定公司资本为 国 币1 000万元，华方负担55%，美方负担45%，所谓航线的经营和规划等等“技术”工作由美方负责，营业或名之为“业务行政权”的则归华方负责。到了1933年4月，美国飞运公司又让权给联美公司（即太平洋航空公司）。但无论怎样，美国资本始终攫住这项“合同权利”，使一切活动在合资的美名之下变成更为合法。

中国航空公司依据合同，得以经营沪蓉、沪粤、沪平三线。第一线直贯长江腹地，第二、三两线贯联自南至北我国沿海的最主要的城市。这等航线，从1929年10月起至1933年10月止，已经全部完成。

欧亚公司的成立，实际是由德国汉沙公司的促动，经外交部介绍，和交通部提议双方合作开辟欧亚航线。在1930年2月签订欧亚航空邮运合同，1931年3月公司正式组织成立。全部资本为510万元，中国负担2/3。但合同又规定“此2/3之半数，由德方按年息7厘垫借”。业务行政为华方主权，规定技术方面“暂由德方负责，但以3年为限”。此种纸上的规定，究能变更事实至何程度，实属疑问。我们不知3年时间到几时才算完结？德国资本藉着合资公司的名义所作的活动，几时才会终止？

合同规定这个公司能经营三个外国航线：（一）自上海经南京，天津，北平，满洲里，苏联，到欧洲；（二）自上海经南京，天津，北平，库伦，苏联，到欧洲；（三）自上海经南京，

甘肃，新疆，苏联，到欧洲。第一线于1931年5月开航，航程长2 240公里，“九·一八”以后，被迫停航。第二线因外蒙问题，不能解决，并不曾实现。所以现在实际所通航的只是第三线。这里又因为新疆政变，兰州迪化至塔城二段，先后停航，因而实际所通航的只是沪兰一段。欧亚航空的目的既不曾达到，无怪急急乎另求通路！此外在德国控制之下的尚有国内干线一条，自北平经郑州、汉口长沙而达广州。

假使说中国本身有民用航空业的话，那末可以说全部是在美、德两国资本的组织或主持之下。自然我们不会忘记粤桂主持下的西南航空公司，但是它的资本不过官股30万，它的航路只局限一隅，和两大资本集团控制下的情形相比，只是可怜的点缀罢了！下面的表可以看出中国民航事业的情形：

最近全国民航状况表

线名	经 过	全 长	公司名称	开办年月
沪汉	上海, 南京, 安庆, 九江, 汉口	974公里	中国航空公司	1929.10.
汉渝	汉口, 沙市, 万县, 重庆	891公里	中国航空公司	1930.11.
×渝蓉	成都, 重庆	217公里	中国航空公司	1933.11.
沪平	上海, 海州, 青岛, 天津, 北平	1 427公里	中国航空公司	1931.1.
沪粤	上海, 温州, 厦门, 汕头, 广州	1 620公里	中国航空公司	1933.10.
×亚欧	上海, 南京, 天津, 北平, 满洲里	2 240公里	中国航空公司	1931.5.
沪新		4 054公里	欧亚航空公司	
	上海兰州段			1932.
	×兰州迪化段			1933.
	×迪化塔城段			1933.9.
平粤	北平, 郑州, 汉口, 长沙, 广州	2 200公里	欧亚航空公司	1933.5.
兰包	兰州, 宁夏, 包头	820公里	欧亚航空公司	1934.11.
广龙	广州, 龙州	640公里	西南民航公司	1934.6.
广琼	广州, 琼州	906公里	西南民航公司	1934.9.

“×”为现暂停航之线。

这里很能够明白看出来，全国主要城市的航路全都握在外资

手里。自然，两公司在五年之间所以完成这么飞跃的发展，是和国内政府一定军事目的或政治要求相关联的，换句话说，外国资本控制中国全部航空权，惟有通过中国政府热心的扶翼，才能如愿以偿。中国欧亚两公司最近增加资本了，而他们的地位也已一天一天的强固起来，请看下表：

1. 中国航空公司历年营业发展表

年 份	飞行哩数	乘客哩数	乘客人数	邮件公斤数
1929年	93 167	106 875	854	3 932
1931年	1 341 794	2 365 567	1 570	59 052

2. 欧亚航空公司历年营业发展表

年 度	飞行哩数	客运人数	货运公斤数	邮运公斤数
1931—1932	136 200	941	4 131	421
1933—1934	486 902	1 074	43 092	4 079

注：本表根据1935年《申报年鉴》，但其所列数字与1934年欧亚公司营业报告数字，均有出入。1933—1934年邮运公斤数《年鉴》列4 169 777公斤，疑有误，表中该项数字，系根据该公司营业报告列入。

上表数字所表现的飞跃的发展，实际只是美德两国资本在中国航空上所建立的业绩而已。这或许也可以说是合资双方的成功，但我们在下面便可知道美德资本怎样各在利用所谓“技术”责任，自在地规划着航路开拓，而合资公司对于他们抗拒新的争霸者的侵入这一点，是尽了怎样的功能。

二、列强争取航空权的斗争的激化

美国资本在这竞争中是最优势者，同时也是最积极者。在中

国航空公司名义下一切的活动怎样也脱离不了美国航空托拉斯的支配。它在交通部25万元资助之下，积极经营，自重庆到云南昆明的航线，现已试飞完竣，据说极有成绩。渝昆线的力求实施，固由于中央政府团聚西南诸省交通的要求，对抗着西南民航公司的南宁贵州线，广州重庆线和南宁昆明线的计划；且因为美国资本的侵入，同时又引起法国资本的反对或嫉妒，而构成美法对西南航空权的争斗：

“法国邮务航空公司拟新辟安南之西贡与云南昆明及两广间定期航空，与中国航空公司发生反目。中国航空公司主张该公司对中国领土上开设航空之优先权，1934年春间早已实行西南航空路之试验飞行，故竭力反对法方夺取西南航空权。安南当局曾扣留中国航空公司试验飞行之飞机，由中美向法方交涉，幸得和平解决，而西南航空权斗争之根本问题，极难解决也”（1934年6月24日外论社通讯）。

交通部援助下开发川、滇、黔三省航线，主要作用在适应南京政府加强统制西南诸省的要求，可是却因之引起法国的反对。这种反对，延迟了西南航空线实现的日期，而替在华航空争夺战增加一个有力因素。但另一方面，因为在华航空权争斗的主要关系国，是英美两国，美法间的冲突一时也不致十分尖锐。

中国航空公司曾经企图以现有的沪蓉线为根据，自成都将航线伸展到西藏拉萨。这条航线的筹辟，据说“为中国欧亚两公司互相筹辟之新航线，欧亚公司近向国府交通部交涉新辟该线，外部乃向英方探试其态度，英方表示阻止意思”。在名义上的中国境内，航线开辟实际是代表了怎样的势力关系，再也没有比这更明白了，这是英美冲突的一点。其实，英美航空的冲突主要不在藏印境上，而是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美国支配了沪平、沪粤两线，实际上便是囊括了太平洋西岸的中国海全部。这个胜利便成为中美直接通航的根据，而惟有中美通航才是太平洋航空公司

(即中国航空公司美方资本)最主要的目的。因为中美飞航路线只有南北两线，北线自美国阿拉斯加，经苏联西伯利亚各地，再经日本而达上海；南线由美国洛杉矶出发，经檀香山至南洋群岛、小吕宋、爪哇、菲律宾而达广东。在太平洋矛盾愈形尖锐化的现在，北路航线绝无实现可能。因之在美国方面，“为便利航行及其他关系，决择南路飞行”（1934年11月17日上海《商报》）。所谓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这时才充分地发挥“先锋”的职责。1935年3月，中国航空公司在美方副董事长毕斯壁氏主持领导之下，首次从事上海至菲律宾间的试航，经福州，香港，东沙群岛，普爱湖，桑地亚，弋岛到马尼拉，全长2719哩，据说成绩异常优良。从旧金山经檀香山抵达菲律宾，这段路亦不成问题。现在中菲航线既已成功，问题只是怎样使两条航线联接为一，使这种联接合法化。10月17日《中华日报》载称：“据本埠民用航空当局谈，关于中美通航事，美国方面确在积极计划之中。惟该项计划，须通过英属之香港，将来英方是否能允其通过，尚属问题。将来如英方不能同意，美方势必向我国提出请求，经在广东等处设站停落，但一国境内之民用航空权，系有绝对自主经营之权利，故我国恐不能轻易允许”。可是中国根本没有绝对自主的航空经营，自然无从履行“绝对自主经营之权利”。所以一个月之后，同报又报告相反的然而真实的消息：

“关于华美间太平洋长途航空线，系由美国华盛顿方面建议，此事现由双方政府人员，开始讨论，积极进行，共商开辟航路办法。将来决于中美合办之中国航空公司，由中国方面增加投资50万元，予以扩充，主办航空事宜。至飞机及技术人员，则由美国供给。试飞工作及航路航站等，均由美方计划。闻太平洋中飞机场之设置，亦将由美方出资建筑”（1944年11月8日《中华日报》）。

这样，中美间太平洋飞航交涉，实际可说已完全成功，美国

资本只要愉快地履行其预定目的就是了。这个胜利，实际是怎样的意义呢？

“此线完成，其影响所及，不仅交通上发生变革，而军事的太平洋制空战，将愈益激化”（1934年11月7日 外论社通讯）。

在美国绝对优胜之下，英国在航空争霸上的成就，就显得特别落后。英国帝国航空公司本来就计划开办英伦到新加坡定期长途航线，但是因为不能直达远东，不论在营业上或其他重要关系上，都没有意义。所以早已向中国方面暗示，打算将该线自新加坡伸展到上海。于是马上遭到美资的反对：

“中国航空公司方面，以英方开航京沪线，其广州至上海段，与沪粤线相同，颇有妨碍，故请其由新加坡展至香港为止，再与我方联运”（1934年6月16日上海《大晚报》）。

这个打击，并不曾减弱英国争夺南太平洋航空权的意念。它一方面拗强地反对中美通航在香港设站，而一面要求以香港设站为允许新沪通航的交换条件。因为上述美国最近的胜利，愈益使英国采取积极的攘夺手段，而发生驻华英公使向南京交通部提出，要求承认帝国航空公司新沪线营业权，在形式上，争夺实是充分尖锐的了：

“现在列强对华贩卖航空机及航空权之竞争，愈趋于剧烈，而英美两国华南航空权争夺战，尤堪注目。泛美航空公司，所计划之中菲航空线……于本年7月间向交通部呈请许可营业，传闻交通部已有准许该公司有营业权之意，拟于1934年12月底以前，开始定期航空，但英国帝国航空公司向交通部呈请许可香港上海间航空线之营业权，在泛美公司以前（按即在1934年3月初），至今尚未予以许可。付度交通部当局之方针，或将只许泛美公司（中国航空公司的美方股东）有航空营业权，而对于英帝国之呈请则置之不复，欲完全抹杀英国公司之权利。……此次英公使贾德干氏在南京向外交部提起交涉，要求认可英帝国航空公司之新沪航空线营业权”（1934年11月3日上海

《每日新闻》)。

从此我们可见英国怎样野心地要打破美国太平洋航空权的独占，反之亦正可表示出所谓中外合办的民用航空，在帝国主义诸国看来是怎样的东西！据10月30日路透社电，英国航空部次官沙逊曾对新加坡人员谈：“深信新加坡帝国航空业务展至中国之困难可望消灭，渠意通至中国之航空事业，终可实现。”这样看来，英国的积极要求，或许会取得美国的让步，而插足在远东航空竞争网中。

英美在西南航空权的冲突，已如上述。因为地理的当然也就是军事的关系，法国对华航空权的攘夺，仅限于西南诸省。远在6月之前，法国航空公司早已注意该方面的联络。自西南民航公司成立之后，法属安南航空当局，颇拟在广州设站，开辟西贡广州线等。法国直接以该省地方当局为交涉对手：“惟闻粤省当局，对此尚无确切表示，以主权关系，尚在酌夺之中”（1934年6月16日《大晚报》）。“主权”到底怎样“酌夺”，才能保留，现在无从知道。但是法帝国主义的目标，已显然可见。

此外参加对华空权争夺的是德国和日本。德国资本支配下的欧亚航空公司，不管所谓三年技术责任早已届满，仍在积极争取欧亚两大洲航空权的实现。9月初，容克式大型机沿海试飞的成功，替德国打开了欧亚航空的新道；我们只要看到大型机驾驶者的谈话，就能知道德国资本是怎样地踌躇满志了。现在欧亚航空公司不顾营业的损失，开辟兰州到包头的荒凉的航线，其目的也不过是达到陆路上垄断欧亚航空权罢了。

日本对华航空权争夺战上所表示出的特点，是对美国资本的中国航空公司的发展，表示出异常的不安。因之它每每最先透露出美国资本胜利的消息，而对于欧亚公司的活动，多半是不加攻击。自从中美通航愈加具体化之后，便引起日本极大的不安和极

强的对抗。计划设立和太平洋代管岛的航空网，设立和潜艇路线平行到波宁岛的航空线，用来和中美航线相交错。同时，又积极要求实施华日间直接航空的计划。10月11日日联社东京电称，日本财界正在计划创设有资本5 000万元的航空运输公司，建设东京，大阪，福冈，上海，香港，新加坡间航空路线。11月24日《世界新闻》社长崎电讯中又说：“关于中日间航空线之建设，中日两国共同努力，行将实现。在日本内地之起点——福冈地方，已开始各岛飞行场之扩张工程，……福冈长崎上海间中日联络飞行，将于明春开始”。这样，日本的加入竞争，也已剑露鞘外了。

美国资本支配下中国航空公司的扩大和强固，英美对于远东航路的对立，美法在西南间的冲突，德国积极进行欧亚线的努力，日本要求中日通航的实行，这一连串的事实，一方面表示在华航权的争得，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统治或掠夺半殖民地的主要标的；另一方面是特定国家在华航空权的扩大和列强冲突的尖锐，益发将中国民用航业陷于殖民地化的状况。

三、飞行机输入竞争的激化

虽然帝国主义对华航空权的争取，构成了斗争的主要内容。但这种内容更由航空用具以纯粹商品的输入，而得到明白的补充。这并不是说，航空权争取和航空用具输入间没有关系，反之，他们常常是非常密切相关的。譬如中国航空公司实际上完全是美国航空机用具的消费者。但因为民用航空同其他交通组织是一样的不发达，甚至是在萌芽中，所以对华航空机的输入，主要限于军事之用。外国航空家在上海勇敢的表演或谦卑的结纳，正是为了夸耀彼等机件的优越，以博得我国政府的销纳。下表是三

年来航空机及其附属品输入数额(金单位)：

1932年	1 863 414
1933年	6 080 648
1934年	4 455 577

经济恐慌的深化，并不曾阻止住新式军器输入的怒潮。争取这样巨额的输入品，自然是各帝国主义的要求，下表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金单位）：

国 别	年份和输入额 (金单位)	
	1933年	1934年
美 国	4 594 544	3 193 008
法 国	36 769	756 138
英 国	217 553	376 007
意 国	—	241 774
德 国	414 895	64 755

世界最大军需品供给国——美国，对华航空机输入上始终占着首位。在1933年，它的数字已相当的减低。这种减低，和英法的跃进，都在证明他们之间竞争的剧烈，并不下于航空权的争霸战。此外，中国各海关航空机输入量，在两年内也有巨大变更。华北有巨大的减退，上海和西南三港（广州，九龙，梧州）的增大，这都是和一定的地方政权的盛衰相关。帝国主义最合意的顾主，恰恰能在这里满足地找到。

总结起来说：从民用航空到航空的军事工业上，全部都在帝国主义的独占操纵中。这种操纵和独占。除掉经济上的垄断以外，同时更带来了一定的政治独占。外资（特别是美国资本）全部包办了民用航空，列强在这新兴交通部门日趋强化的冲突，对于

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交通事业的发展前途，下了最好的注脚。以后的岁月，怕就是这种种势力继续作更深刻更猛烈的竞争的时候罢。

(原载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
第2集。生活书店1935年12月初版)

中国农村中的高利贷

一般说来，小农生产的落后性必然伴随着贫困，使农民经常地渴望高利贷的救济；也就是说，非受高利贷的“合理”的榨取不可。在中国，因为半封建生产关系的顽强统治，和经济上的半殖民地的特质，使高利贷的活动，特别接近于所谓“东方式”。前者是指社会平均利润的缺如，借贷资本利息率的规定，以其超经济的绝对剥削的限度为限度，而形成所谓高利借贷；后者指金融市场对于帝国主义的依存性乃至全受垄断，银行资本的全部活动领域，始终不曾脱离借贷资本的领域；因之不仅没有和高利贷资本在本质上的对立，反之，只是方式上有所差异而已。这里高度的地租使农民不能积蓄，缺乏资本，甚至是经常的饥饿，苛税勒索、军役兵灾的负担，人祸所造成的天灾的经常爆发等等，都造成了农村中高利贷跋扈的前提。

农民的负债，在一方面正是表现农民的贫困，但另一方面，负债又体现着高利贷资本侵入农民的一定成果。中央农业实验所曾有调查报告，1933年各区负债的农家，占农家户数的百分数，平均达62%，其分区情形如表一。

西北区负债的百分数特高，显然和更露骨的军事勒索，军阀内战，以及大旱灾的连绵不断有关；东部区和中部区所谓富裕之乡，农民负债也达到可惊的高度。以全国平均而论，62%的农户已成为高利贷的俘虏。在这里我们苦于没有较为精密的统计，来

表一 中国六区二十省负债农家比例表

区域	所包括之省份	有报告之县数	负债农家占农家总数之百分数
西北区	察、绥、宁、甘、陕五省	84	68
北方区	晋、冀、鲁、豫四省	305	57
中部区	鄂、湘、赣三省	80	62
东部区	苏、浙、皖三省	107	66
西南区	川、云、贵三省	90	59
东南区	闽、粤二省	71	60
平均		737	62

知道农民中各个不同的阶层的负债关系，因为富农或是地主的负债，在某种场合，反而增强他们经营高利贷事业的机能。佃农以及半自耕农，固然贫困限制了他们的借贷信用，可是正惟他们才是高利贷真正的负债者。这仅以江苏北部一带，便可概见。据1935年10月16日《大晚报》所载《苏北农村鸟瞰》一文中说：“在分租制与谷租制中之田租租率，低者达30—40%，而高者往往超过70—80%，致佃农耕稼所得之报酬除付租外，所余无几，日常生活，须视借债为生涯。至半自耕农亦以租重，不能未雨绸缪，以事积蓄。偶有意外，如补偿天灾诉讼及租税等等损失，或嫁娶死丧等之消费，亦非向地主豪绅作短期之高利贷借款不可”。换句话说，中农尤其是贫农等阶层，实是农村高利贷的固定的基础。

从借款利率上，我们能测定高利贷榨取的程度。中央农业实验所最近发表了全国22省871县借款利率的报告调查，农村借款利率年利2分至3分的占36.2%，3分至4分的也占30.3%；4分至5分的占11.2%，而5分以上反占12.9%，2分以下1分以上的仅占9.4%。全年平均利率2分至4分的合起来要占66.5%。其中宁夏省5分以上年利的，占57.3%，陕西占51.0%，中部的河南也占16%，东部的安徽也有17.3%。平均数显然会使高利贷

显得较为温和。同时据原报告所称，上述利率的百分率，系仅就调查表中普通利率项下的数字计算而得，实际上农民所能贷得的借贷利率，并不受普通利率的限制，而这种为社会所公认的普通利率，其高度已是如此，反而正足以说明高利贷在农村是如何普遍罢了。

上述全国一般的利率，实际上只是代表现金借款的利率。能够借得现金的，多半尚是较能获得信用的农民，愈是贫苦的农民，他们愈不得不满足于短期的小额粮食借贷。这种借贷主要是富农或商人的拿手好戏，它的利率的高度，又远过于现金借款。这种差异如表二所列，正表示高利贷的特色。而农民又是这种差异的主要牺牲者。

表二 中国六区二十二省农村两种主要借贷利率表*

区域	报告县数	现金借贷		粮食借贷	
		借债家数	年利	借债家数	月利
西北区	96	60.5%	3.9%	48.0%	9.1%
北方区	325	49.7	3.6	38.0	5.0
中部区	86	52.0	2.9	50.7	8.6
东部区	124	64.0	3.2	51.3	7.2
西南区	106	49.0	3.6	47.3	6.8
东南区	313	55.0	2.7	53.0	7.1
平均	850	56.0	3.4	48.0	7.1

* 根据1934年4月1日农情报告，原表加以并缩；平均数从原表。各区包括省份同前表，西北区加青海省，东南区加广西省。

表中各区的数字，已经经过了一度的平均。譬如粮食借贷，在陕西省竟达月利14.9%。宁夏省达11.7%，广西省达10.9%，而安徽省也有10%。这种惊人的月利率，简直到处农村都存在。就是从全国的平均数看来，现金借贷年利已达3.4%，粮食借贷月利竟至7.1%，其相差成倍以上。农民的极度贫困，决定粮食

借贷利率的渐趋飞涨，而青黄两季粮食价格的差度愈大，使高利贷者更有利于采用这种借贷形式。1934年8月23日湖北《荆沙日报》载称，荆沙高利贷者不愿放贷每元月利1角的现金借款，而尽量采取“拿谷钱”的形式。这种农村破产中高利贷愈走向更野蛮的剥削形态的趋势，并非一地的现象。

借贷利率的奇高，和农民负债的普及，这就全面地显现出农村中高利贷的雄姿。我们已经简略地指出高利贷存在的社会根据，是农村中封建生产关系的统治，决不是人的问题。同时这种关系又决定农村中高利贷骄子的社会阶层。农民银行，合作社的贷款，在内容上和旧的高利贷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比重上又少得可怜，这从表三便可知道：

表三 中国六区二十二省农村借款来源表*

区域	报告 县数	银行	合作社	典当	钱庄	商店	私人		
							地主	富农	商人
西北区	89	1.1%	1.5%	3.9%	3.1%	2.8%	20.0%	18.8%	31.0%
北方区	226	4.0	4.1	3.4	11.5	11.1	18.0	17.3	22.1
中部区	88	1.5	3.2	7.4	3.1	13.9	31.2	22.2	19.9
东部区	126	3.2	6.2	13.9	5.6	19.8	25.3	15.6	18.4
西南区	122	1.7	.5	10.3	3.3	6.4	30.9	19.8	25.9
东南区	120	2.6	.1	11.8	1.5	10.8	26.2	16.2	23.8
平均	—	2.4	2.6	8.8	5.5	13.1	24.2	18.4	25.0

* 1934年11月1日农情报告，加以并缩，平均数从原表，各区包括省份同前表。

从上表看来，商人地主富农乃是农村中的高利贷的经营者。商人经营的比重尤多，这里可见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合。粮食赊贷或是预买制等，都是这两种资本所采取的交互剥削的形态。这在农产物比较高度商品化，技术作物较为占优势的区域，尤为盛行。通过高利贷形式而造成商业资本不等价交换的超额利

得，实际上是双重的腐蚀。在多种场合，地主和商人是不能分离的一体，但一般说来，商业资本较为发达的区域，地主对于高利贷的作用较少，反之，则地主每每借高利贷而逐渐造成土地面积的增大。至于富农，它的经济地位自然不及上述两者，在目前农村破产中又有特别的动摇和不安，可是他们在农民间优越的经济地位，正无妨借出耕畜或粮食以高利榨取中农和贫农大众。在江苏北部一带，如赣榆县盛行放谷制，以杂粮贷给贫农，农忙时以做工抵还；无锡昆山一带盛行“活买田面”“过耕作息”等典押制度，都是富农经营高利贷的拿手好戏。富农在农村高利借贷中的比重，在宁夏省甚至占28.6%，仅次于商人；在湖南占22.7%，江西占22.4%，湖北占21.6%仅次于地主，浙江则与商人同占15.8%。富农在高利贷事业中的作用，实不可忽视。

高利借贷除了利率奇高之外，借款时期的短促和借贷手续的苛刻，两者同是必然的现象。中国农村中借款时期，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材料，6个月至1年者占64.7%，6个月以下占12.6%，不定期占11.3%，1年至3年者仅9.3%，3年以上只有2.1%。以丹麦农业合作社借贷时间如45—60年相比，特别显出中国农村借款的短期性。中国农村借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生活的急需。据实业部中央农业仓库在南京市郊殷巷、汤山两办事处对农民贷款用途的统计，殷巷有50%之农户是为了还债和纳粮，名义上购买农具的仅33%，婚丧和原因不明者占17%；汤山有43%是还债纳粮，19%才算购买农具。可是农民借贷的这种需要，只是一定经济环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以农业资本周转迂缓说，一年以下的贷款，显然限制他们将借款转化为农业资本。也惟有借款主要是短期性的，才能使农户愈无偿付能力，而经常辗转于高利借贷的掌握之中。至于借款手段即信用方法，有46.3%是抵押信用，33.9%是保证信用，19.8%是个人信用。个人信用实际并非以最

需贷款的贫苦农民为对象，保证信用，也是以有一定财产能充作保证为前提，而抵押借款中农民便会借此失去一切。“至地主豪绅高利贷之最终目的，往往在不动产之抵押，可以复利计算方式，使农民初则无力还本，继则无力偿息，三则不能不拱手送抵押品于债主。故农民在初，虽只借得二三十元，而二、三年后，则失却值价二三百元之田”（1934年10月17日《大晚报》）。这是通行在苏北一带的情形，也是全国农村中高利贷重重支配下，农民普遍的归宿。

高利贷的存在，是封建生产关系榨取下的农民所必需的，同时也由商人地主和富农来满足这个必需，这在实践意义上，不是二个问题，而是由一点出发交互促进的二种成果。目下农村加速度破产中，一方面高利贷利率更惊人提高，其榨取愈形露骨；但另一方面农村金融的停滞，农民偿付能力的低下，土地价格的狂跌，使农村中借贷信用紧缩，形成农民高利无处可贷的矛盾现象。于是群相诟病，旧的高利贷者是促进农村破产的主力，希望银行资本用较为温和形式来解救农民；纵然这个过程能胜利地完成，但较低的利息，依然不能改变高利贷的超经济剥削的本质。

（原载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

第2集。生活书店1935年12月初版）

东北农村经济的特质

一、绪 言

最近四十年来，东北垦殖区域完成了飞跃的发展。随着这个垦殖过程的发展，大土地迅速地集中，地价暴腾与地租狂涨，高利贷者抓住农业生产者的穷困，在农村异常猖獗，农业经营愈趋零细化：这等都表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同样也成为东北农业经济的特质。这种特质更提供了东北农产物在国际原料市场作不等价交换的根据；同时这又使东北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愈趋强化。

东北从半殖民地沦为名实相符的殖民地，并不曾引起上述关系丝毫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者迅速地代替了当地旧军阀而变成大地主；银行资本开始在农村中构筑阵地；苛重的赋税，战胜者掠夺式的军事徭役，以及世界经济恐慌的袭击，都使窒息在旧的生产关系下的东北农村，更陷绝境。没落期的资本主义，决定了日本不但不敢稍微触动东北的土地问题，反而维持乃至由它自身代替旧的农村剥削阶层的机能，继续宰割东北的农民大众。

二、东北的土地关系

东北是一个广袤的平原地带，土地的生产能力，虽不能和华南、华中水田区相比，可是也不在华北黄土区之下。在这丰腴的自

然条件下，随着垦殖的进展，迅速地孳生着种种寄生的阶层。据天野元之助在其所著《满洲经济底发达》中所说，东北人口，从1907年的1 777.9万人，增加到1930年的2 957.5万人；农村人口百分率从94%，降低到89.8%。这里面还包括着一小部分非农业生产者；实际农民所占比例大概只在80%左右。不过这已证明农业生产在东北实是一个主要的生产部门。对于农业生产主要的生产手段——土地，在纯粹自然的意义说来，如表一所示，东北约拥有3 000万公顷（每公顷约合16亩）以上的可耕地。

表一 东北耕地统计
(1930年，单位千公顷)

土地种别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三省合计
总面积		18 506	26 765	50 217	1 034 979
可耕地	已耕地	4 710	4 045	3 851	13 508
	未耕地	1 638	5 921	8 982	16 592
	合计	6 399	10 866	12 834	30 100
不可耕地		12 107	15 828	45 382	73 378
对总面积的百分比	可耕地	34.6%	40.9%	22.0%	29.1%
	不可耕地	65.4	59.1	78.0	70.9
对可耕地的百分比	已耕地	73.6%	45.5%	30.0%	44.9%
	未耕地	26.4	54.5	70.0	55.1

可是，这样广大的土地对于东北农民实际只是抽象的存在罢了。虽然象南部开发较早、交通较发达的省份，已耕地的比例较高，如辽宁省为73.6%，而北部的黑龙江省仅为30.0%。另一方面，无论南部北部，都有大批可耕地让它荒废，这在三省合计中未耕地对可耕地的比例为55.1%便可知道。而且正象中国本部农田迅速地由水田变为旱田，最后完全荒废一样；东北的垦殖速度也已由缓慢而趋于停滞。虽然农民们愈感土地饥饿，小农的土地经

营愈是狭小，可是他们却不能从事于55.1%的未耕地底开垦；因为东北无论那方土地都已物各有主，不能随便插足了。

前清皇室没落以后，接着军阀便公然起来从事土地掠夺。在这种场合，大军阀往往便是大地主。至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不下于他们，东亚劝业会社等等便是披上资本主义外衣的大土地所有者。在这样前提下，东北的农业生产者，便不得不和生产手段的土地分离：乡村中充满着一无所有的农民，或只有一小方不足谋生的土地，束缚着他们过着爱尔兰小农那样的黑暗日子。表二告诉我们土地集中的大概情形：

表二 南满所有土地各级农户分类百分比较表①

县	村名	村之贫富	全户数	500 以上亩	500— 200亩	300— 200亩	200— 100亩	100— 50亩	50 亩以下	无所 所有者
辽阳县	榆树屯	中	51户	--	--	2.0%	4.0%	11.7%	39%	43.1%
	大双树子	上	48户	6.3%	6.3%	2.0	10.4	16.7	27.1	31.2
	小阔屯	上	77户	1.2	10.3	6.7	9.1	6.8	29.1	60.9②
	天河泡	中	55户	0.9	1.7	7.0	5.2	5.2	19.1	60.9
沈阳市	王土屯	下	115户	--	--	1.8	3.7	5.5	14.5	74.5
	白塔堡	中	460户	0.7	1.3	2.2	4.4	4.4	15.2	71.8
合计	户数	--	806户	8	19	26	42	48	156	507
	百分率	--	100.0户	1.0	2.4	3.2	5.2	5.9	19.4	62.9

① 引自山下肇：《南满农村底研究》。

② 数字有误——笔者。

从上引表中我们能明白看出，在这许多南满农村之中，约有62.9%的农户是毫无土地的赤贫者。有19.4%的农户占有的一点土地，只使他们成为半饥饿的贫农。我们虽然不能知道占村户3.4%的300亩以上的大土地所有者究竟占有几多耕地，但凭上表估计，约达40%左右。这种地权集中的倾向，在北满也无不同，详见表三。

因为北满垦殖较迟，以及商业和交通的开发较南满为落后，

表三 北满土地所有者类别表（1925年）*

面积别	所有地总面积	百分率	家数	百分率
150垧以上	1.0百万垧	8.7%	5 000	0.5%
75—150垧	2.0百万垧	17.3	20 000	2.0
30—75 垧	3.0百万垧	26.0	75 000	7.5
10—35 垧	4.5百万垧	39.0	300 000	30.0
1—10 垧	1.0百万垧	8.7	250 000	25.0
1垧以下	0.03 ○	0.3	50 000	5.0
无土地者	—	—	300 000	30.0
平均或合计	11.53	100.0	1 000 000	100.0

* 引自雅西诺夫：《北满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垧二町6步=10亩。

仅就户数上说来，赤贫的无土地者只占30%，不象南满那样多。但是平均占有40垧到200垧土地的，户数仅占8%，占有土地总面积为600万垧，却占54%（按：数字有误）；而平均占有4垧以下土地的贫农，户数占60%，占有土地总面积为10.3万垧，仅占总面积9%；土地集中的倾向，其严重也不下于南满。

这种土地集中，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便促使以家族廉价

表四 东北农民使用耕地分组统计表*

耕地面积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户数	百分数	户数	百分数	户数	百分数
不满六反	345 896	19.6	137 093	17.1	19 518	5.8
6反—1.8町以下	371 038	20.4	122 425	15.2	32 740	9.8
1.8町—3町以下	412 744	22.9	194 295	24.3	54 653	16.3
3町—6町以下	348 367	20.0	171 246	21.4	76 968	22.9
6町—12町以下	94 524	7.0	63 492	7.9	55 492	16.3
12町—18町以下	95 553	7.1	64 682	8.1	50 038	16.6
18町—30町以下	21 692	3.4	32 171	4.3	27 901	8.9
30町以上	20 659	1.6	13 987	1.7	12 135	3.9

* 根据农商部1919年统计。6町以上各级之分别，依照该统计6町以上之合计数字，参照1925年满铁农务课在沈阳、沈海两县调查对于6町以上之各级比率，计算而成，引自1934年9月日本《经济评论》创刊号，第31页。

劳力为基础的小农零细经营的发展。这种经营，转而提供过度的封建的剥削之可能，并诱起农业生产力停滞乃至衰退。东北垦殖区的农业正是在这种经营方式支配之下，试观表四。

据表可知全部东北使用土地形式主要是耕作六町以下的零细经营，辽宁省占82.9%，吉林省占78%，黑龙江省占54.8%。这种递降的次序，由于两种原因：（一）是和上述土地集中的程度有关；（二）是北满方面土地生产力较低，不得不从事于粗放耕作，譬如黑龙江省使用6町以上到18町以下的占32.9%，这并不是表示黑龙江省农民经济地位的优越，反而是说明该省使用6町以下的广大农民陷在更苦境地。

一般说来，东北农民有40%是耕种1.8町以下土地的饥饿线下的贫农，40%是耕种1.8町以上6町以下土地的小农，他们难于维持日常生活。就东北农业生产率说，每町土地的收入，用货币表现是40元。耕作6町以下土地，其总收入在240元以下。在这里需要支付经营费用，以及维持平均一家七口的生计（垦殖区粗放经营，需要劳力较多，所以家族人口较大）。有14%是耕种6町到18町土地差可生活的中农，只有5%才是耕种18町以上土地的经营地主或富农。这种土地经营的零细化，必然发生下列结果：（一）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和停滞；（二）劳动力的浪费；（三）高度的榨取。封建的土地所有在这里充分发挥其桎梏生产的机能；东北农民血汗所垦熟的土地。现在丝毫无补于他们的饥饿和贫困了。

三、东北的租佃制度

土地集中促使东北零细经营的发展，同样也促使封建的租佃制度的形成。这尤其因为东北是个纯粹殖民性的垦殖区，一无所

有的移民大众，特别有利于这种剥削关系的成立。张心一氏在《中国农佃问题的一点材料》中对于东北半佃农及佃农数量上统计如表五：

表五 东三省自耕及租佃农户之百分比*

省 别	报告县数	报告村数	自 耕 农	半自耕农	佃 农
辽 宁	21	71	50%	19%	31%
吉 林	11	43	46	17	37
黑 龙 江	5	21	54	18	28
加权平均			49	18	33

* 节引自1930年6月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月报》2卷6期，张心一：《中国农佃问题的一点材料》第一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曾赴东北农村从事实地调查，最近发表了一部分整理后的材料，下引吉黑两省931户农家分类统计，颇可指明垦殖区中封建的租佃关系之比重，见表六：

表六 吉林省十六县二十村田主与自耕农及租种农民数比较表*

农 民 类 别	百 分 比
田主与自耕农	28.83
半 自 耕 农	25.57
佃 农	46.60
合 计	100.00

*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调查报告，载1934年10月《政治经济学季报》。十六县指永吉，德惠，农安，长春，伊通，五常，延寿，扶余，珠河，苇河，敦化，宾县，汪清，穆稜，密山，宁安。

因为吉林省在黑龙江和辽宁两省之间，其经济发达程度，北似黑龙江省，南似辽宁，所以颇足代表东北一般的情形。这种村中阶级的分化，自然也就体现着一定的剥削关系。占46.6%的佃农不要说，25.57%的半佃农，事实上也归附在这种剥削关系之中。

东北的租佃制度，具体的说明这种关系。就形式说，最多是现物地租；分益地租次之，货币地租比较最少。地租率，据张心一氏上引文中所述，平均现物地租在上等水田计占总产额之38.7%，中等水田占37.6%，下等水田占37.5%，上等旱田占39.1%，中等旱田占38.0%，下等旱田占37.6%。这同南开大学调查吉林省苇河宁安等十五县的平均数35.7%也相近似。自然，还有几种额外负担并未计算在内。

在分益地租这种租佃制度支配之下的佃户，因条件不同，又分为辨里青、辨外青两种。前者由地主借与土地耕畜住屋种子等等，佃农服从地主指挥而从事耕作，其收获物分配比例，普通是七三分，地主得七成，佃户得三成；吉林省的五常县有达八二分的。从佃户所分得的三成或二成中，尚须扣除地主以高利形式贷给他们的日用品等代价，实际上佃农所得是更少了。至于辨外青仅由地主处贷得土地和住屋，所以分配生产物的条件稍好。

货币地租据南开大学的调查，平均租率约占总产值之26.58%（菜圃）。货币地租租率较低，主要是因货币地租主要都是交“上打租”的缘故。在上述地租之外，若使再加上押租的利息（这等押租多以高利借来），那末佃农的负担，实更可惊人。

这等地租因移民的增多，农民需要土地的增加，更因为经营方式愈趋分散化，所以数量上便有增加的趋势。表七虽是关于货币地租的，自然也能代表一般的倾向。

地租率及其增加的速度，必然迅速地在土地价格的变动上反映出来。因之，前者也可由后者加以测定，试观表八。

表七 货币田租额逐年变动表*

(单位:元)

年 次	辽阳县大双树子			辽阳县小闻屯			沈阳县五里台子		
	上地	中地	下地	上地	中地	下地	上地	中地	下地
1916年	45	30	25	45	35	25	15	10	7
1921年	30	25	17	65	55	30	25	20	15
1925年	75	60	40	85	75	50	30	25	20

* 引自山下肇:《满洲农村研究》。

表八 土地价格变迁表*

(单位:元)

年 份	辽 阳 县						沈 阳 县		
	大双树子村			天河泡村			五里台子村		
	上地	中地	下地	上地	中地	下地	上地	中地	下地
1916年	400	300	250	700	500	200	250	250	200
1921年	700	600	400	1000	700	400	350	300	250
1925年	1300	900	500	2000	1500	800	600	500	400

* 引自山下肇:《满洲农村经济研究》。

辽阳沈阳两县位于南满,所以地价变动比较其它各县来得激烈些。十年之间,地价竟能增涨三倍。这里我们自然不得不将这一时期货币价值的跌落考虑在内;但是安全而丰富的地租之获得,仍不失为地价增涨之主要原因。

四、各类经营中雇佣劳动的比重

接着我们当略一提及满洲大量的农业雇佣劳动者的存在。从表九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雇佣劳动在东北农业生产中比重

的巨大：

表九 东北自家劳动力与雇农劳动力对比表*

经营面积	平均户数	自家劳动者数	雇佣劳动者数	劳动力合计	雇佣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之百分比	每家族一人所有雇佣劳动者数
50垧以上	8户	6.43人	8.20人	14.63人	56.0%	0.533人
50—30垧以上	5户	6.08人	2.87人	8.95人	32.1%	0.167人
30—20垧以上	5户	4.02人	2.58人	6.60人	39.1%	0.230人
20—10垧以上	4户	4.75人	1.05人	5.80人	18.1%	0.105人
10垧以下	8户	3.25人	0.38人	3.63人	10.5%	0.053人
平均	30户	4.90人	3.31人	8.21人	40.3%	0.274人

* 参见满铁调查课编：《满洲农家底生产与消费》。

上表算是对于全部东北的统计，但实际上是以南满为主。表十是比较新颖的调查统计，更足以代表南满的情形。

表十 普兰店管内雇佣劳动者人数表*

1930年

经营面积	平均经营面积	每户平均雇佣劳动者数	每百町步平均雇佣劳动者数
20町步以上	25.93町步	4.80人	18.51人
10町步以上	13.97町步	1.27人	9.05人
4町步以上	6.61町步	0.53人	8.06人
4町步以下	1.92町步	0.15人	7.95人
平均	10.95町步	1.30人	11.90人

* 引自关东州普兰店民政署调查报告书：《管内华人农家经济》。

因为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北满的雇佣劳动与南满又有差异，有如表十一。

表十一 北满自家劳动力与雇佣劳动力数量表*

经营面积	自家劳动力数	长工劳动者数	其他雇佣劳动者数	雇佣劳动者合计	雇佣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之百分比	每家族一人所有雇佣劳动者数
15垧以下	2.08人	0.69人	97日工	1.34人	39.2%	0.161人
15—30垧	3.21人	1.58人	143日工	2.53人	44.1%	0.172人
30—75垧	3.32人	3.68人	332日工	5.89人	64.0%	0.373人
75垧以上	5.45人	6.12人	552日工	9.98人	64.7%	0.316人
平均	3.39人	2.80人	258日工	4.53人	57.1	0.279人

* 引自雅西诺夫著：《北满国农民经济》。劳动者合计，以150日工换算为一年工。

从上引三表中，我们可以知道：第一，无论南北满，雇佣劳动在生产上都非常重要，甚至耕作4町以下的南满贫农，每户也平均使用0.15人；在北满则数量更大；第二，使用耕地愈大的富农群，所雇佣的劳动者数量便愈多，在这里与贫农群使用时的经济意义完全不同。前者具有剥削的意义，而后者多半是因季节农忙之故；第三，北满使用数量较大于南满，这主要由于农耕较南

表十二 每级农户由出雇所得工资收入*

经营规模	调查户数	平均每户所得工资	平均每垧出雇者数
30垧以上	13户	—	—
20—30垧以上	5户	45.00元	0.75人
10—20垧以上	4户	65.00元	1.08人
10垧以上	8户	90.19元	1.50人
平均	30户	40.22元	0.97人

* 引自《东望》1934年第9期。

满粗放，需要劳动力较多之故，这情形正可与华北和华中相较而益明。最后，为欲明了这等大量的农业雇佣劳动的来源和它们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的意义，试看表十二。

30垧以上的富农，他们绝不需要出卖劳动力，反之经营过于狭小的贫农小农甚至是中农，他们不能把全部劳动力消纳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逼得只好出卖；而从前述三表中，又可知道大量雇用之以生利的只是富农或是地主经营者群。10垧以下的贫农，从这种出卖中要得到的90.10元，以抵补土地生产收入的不足。东北大量的农业雇佣劳动者的来源，主要便是他们。这样的雇佣劳动者自然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工人还是相差很远，实际上同帝俄农奴解放后所行的农役制度具有一样的内容。

土地所有的集中，土地经营的分散，租佃制度的封建性，以及雇佣劳动的农奴性，这一系列东北农业生产中主要的关系，都表示封建经济的暗影还笼罩着东北3 000万农民。

五、东北农产物的商品化

最后，我们希望指出东北农业的另一特征，就是农产物商品化的倾向，较我国本部一般都要强得多。这就是说，东北农业充当了原料供给者的角色，而被编织在国际市场支配网之中。表十三可以看出这个倾向。

大豆主要以对外输出为目的，而小麦生产则主要供给当地面粉工业之用。这种商品作物的生产，南满比较低下，但也占31.9%；这个比例在北满竟高到50.3%，这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打在半殖民农业上的火焰，更加强烈地印在这开发较迟的垦殖区农民身上。但是将作物分成这样两类，用来测量东北农业生产物商品化的程度，只有相对的意义。因为市场作物固然主要地以出卖为原

表十三

南北满作物种植比率表*

地方别	市场作物			自然经济作物			
	大豆	小麦	合计	高粱	粟	玉蜀黍	合计
南满平均	29.1%	2.8%	31.9%	27.9%	17.0%	9.3%	54.2%
北满平均	31.0%	18.7%	50.3%	11.0%	18.4%	0.4%	36.4%
全满平均	30.4%	11.2%	41.4%	19.3%	17.8%	7.8%	44.9%

* 节引自《东亚》1934年第5期。

则，可是，自然经济作物却也不完全是农民自己消费的。我们更有参看表十四来补充自己理解的必要。

表十四

南北满农产物出运市场比率表*

(1930年第三次估计)

地方别	大豆	杂粮	谷类合计
南满平均	83.3%	19.4%	32.1%
北满平均	81.3	7.8	34.5
全满平均	82.1	13.4	33.2

* 节引自《东亚》1934年第5期。

假使我们再考虑到，上表中所表现的农产物出运到市场的比率，并不能完全表示出谷物被贩卖的数量（尤以杂粮为然），那末就更可知东北农产物商品化已经发展至相当高度。这种高度的商品化，对于东北农业的影响是：

第一，东北农民对于市场——特别是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关系非常强烈。这一方面充分表现了农业的半殖民地化，而经常受不等价交换的剥削；另一方面是世界经济恐慌的深化，引起了对半殖民地原料需求的减退，因之促使东北更尖锐地陷于农业恐慌

之中。大豆输出在1933年降低为85，豆粕为76，豆油为68（均以1929年为100）。这过程的另一面是农产物价格的狂跌，大连农产物的批发价，大豆在1924年为324；1933年为113；高粱由1924年的202，降低至1933年的62，粟在同时期中也从262降到66（均以1910年为100）。这种市价跌落，输出减少，随着世界慢性农业恐慌的继续深化，一时未能回复。

第二，农产物高度商品化，使农民对于货币的需要愈大，即经常的货币支出量愈多。这使农民蒙受因农业恐慌而物价下跌的影响特别严重，农民不能维持经常的经营（尤以东北需多量的雇用劳动为甚），因之更经常的提供高利贷活动的可能。

第三，半封建关系下的东北农民，为了补偿不等价交换的损失，便愈益加强其家族劳动的强度，使小农生产愈被人为的维护起来。这又成为地租增高，经营分散等的原因。

六、结 论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由半殖民地的形态，迅速地转变为纯粹单一的殖民地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势力的加强，使东北农业进入彻底殖民地化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主要的表现是：

第一，土地掠夺的强化：朝鲜移民及日本武装移民团的强占土地；日本农业公司强制贱价收买土地，欺骗和掠取土地；使大批东北农民，成为一无所有者。

第二，以日本工业及军备的原料需求为目标，使东北农民彻底成为日本的原料供给者；如棉花增植计划，大豆垄断买卖；绵羊畜殖等都是。

第三，在东北工业上或农产物贩卖上日本的独占组织特别增大，增强，而加重其不等价交换的剥削程度。

第四，农村中旧的剥削关系之继续维持，旧的剥削阶级日益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东北的助手。

第五，逼近没落期的日本帝国主义，不能采取朝鲜式的榨取方法，农业恐慌之缓和，成为不可能的幻想。

最后，东北农民获取土地的斗争，必然而且也正在和反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

（原载《中国农村》第1卷第3期。1934年12月1日）

中国关税的二重性

中国经济及政治上的半殖民地特质，在关税问题上表现得异常明显。帝国主义（尤以英国站在历史上主动的地位）全部垄断及主宰下的中国关税，一方面永久保证了商品输入优越的可能，资本输入最大的自由；这就是说，在纯经济的作用上，将中国停滞在半封建的饥饿线上，阻碍它向资本主义道路转化。另一方面，关税不仅是偿付外债（多半是助长内战的政治借款）的最有力的担保品，同时还通过关税而造成对于地方政权的扶植或帮助。这两种作用自然互为因果，但前者又较后者更为主要，更为露骨。

自从1842年江宁条约规定了进口值百抽五的单一税制以后，进口税则的修改，到如今已有九次，但是始终改变不了中国关税的上述本质。1858年的修改，是为了当时物价跌落，外商所纳关税，超过了值百抽五的规定。1902年的修改，因为物价上涨，实际所抽者远不及值百抽五，因而使关税不足摊还赔款本息，但修改结果，仍不过值百抽四。1918年第三次的修改，更以随从英日两国参加欧战为交换条件。至于1922年的第四次修改，那就是为了实现华府会议协议办法的第一步。其后由于1923年广州国民政府强硬实行二五附税，而渐次由北京政府推广行之，这可以说是第四次修改的继续，即以华府会议协议精神为根据。上述五次修改在根本上都是以承认帝国主义继续控制中国关税的特权为前

提，只不过恳请帝国主义履行其自己的允诺。这也同是中国修改关税税则的一贯特征。同时，在这个时期，因为太平洋均势的维持，各帝国主义对于操纵及决定中国关税的特权，也是相当地一致的。

这里，由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所施行的强压方法富于弹性，近年来在不根本危及其在华利益的前提下，中国关税进口税则便有几次较大的修改。这种修改在多种企图底下，便被装饰成为关税业已完全“自主”的样子。1928年南京政府首先和美国订立整理两国关税关系条约，而获得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这种条约上的自主，接着也得到了英、法、德、意等七国的承认，可是这种“关税完全自主”的承认，在实践上是有条件的。即中国在修改关税条约中又得允准“各国人民完纳关税及其他各种税款，应为无区别待遇”。这个规定，在一方面是重新确立了帝国主义操纵中国关税的特权，另一方面招徕了一种重大的变化，就是因为税率上得有些微的增加，愈益增大了中国政府对于关税收入的依赖，而更发挥了财政关税的性能。这种性能也就限制了中国关税成为保护民族经济的武器。根据这种条约，在同年12月7日国民政府便宣布七级税率，将海关进口税率改为七级征收，最低征7.5%，最高征27.5%，其实这还是以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英、美、日专门委员会所提七级税率为主要基础的。

关税税率的能否相当增减，并非决定一国关税是否发挥其半殖民地机能的主要条件。问题的核心是在于关税增减是适应了怎样的要求，即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自从世界经济恐慌长期继续以来，自由贸易便被彻底排除，帝国主义国家愈益增强了关税壁垒，这就是说，垄断资本将关税转化为维护个别阶级没落命运的重要工具之一，而造成了增进对外输出及调节对外输入的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国家，在中国，由于各国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化，

一致对抗阵营的破裂，使中国关税表面上虽已自主，可是关税税率的变更，仍不得不充分反映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消长。即关税的增减，是以适应特定帝国主义国家的要求为标准的。这是自从上述1928年第六次修改为七级税后，最近四次修改进口税率的主要特点之一。至于1930年12月29日所颁布的国定税则，将税则分十二级征税，其中最低税率为5%，最高增至50%。这种税率的相当提高，其高度远不及帝国主义为限制进口而施行的高率关税；而且就是这次税则的改定，也以签订1930年中日两国互惠协定为交换条件，才能获得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修改税率的同意。因而和互惠协定有关的30余种日本进口货，便不能按照这次国定税则课税。所谓互惠，只是片面协定的别名罢了。

已被承认为自主了的中国关税，其税率增减主要以适应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消长和要求为准则，这种精神，在最近两次的税率修改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更为复杂。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英美在进出口贸易上，突飞猛进，英美资本在华的比重也骤见增大，同时在中国方面，仰仗英美以减轻日本威胁这种企图也特别迫切。所以当1933年5月16日中日互惠协定满期后，在同月22日便宣布新税则（这是第八次修改的），这次税率的变动增减，非常剧烈。增税方面是纸、煤、棉货、人造丝及其制品、鱼介海产、烟、酒等项，主要是日本输入的，减税方面是机器、珠宝、汽油、木材、车辆等项，主要是英美两国输入的。而且从增减两者比较起来，增税货物还占着主要部份，因之日本进口货物，受到特别重大的打击。从这种增减货物上看来，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变动之决定影响，是很为明显的。这种关税的变更，新近因为日本在东北新殖民地势力的巩固，对于华北华南武装威胁的增大，以及美国在当前世界掠夺战争准备未完成前态度的软弱，都需要重新变换。1934年7月颁布的第九次修改进口税

则，便是适应这种要求的产物。据中国银行统计，主要减税物品贸易额，日本占13.11，英国占12.85，美国占0.54；主要增税物品贸易额，美国占60.00，英国占47.29，日本占46.28。这里，日本和美国，显然恰巧立在利害相反的地位。到了最近，中政会应在华日商棉纺厂主人的要求，允准将此次新颁税则所增加的棉花税，在输出棉纱时可以将新增部分退回，而助长了在华日本纱厂的活动，实际是将“关税自主”的真实内容，更露骨地暴露了。实际上，这种修改税率的“精神”，一定会愈加露骨地充实起来，不看见“满洲国”关税吗？

中国关税始终不能自主，这只是特征之一，其另一方面是：中国关税以财政收入为最主要目标。而在实践的意义上，这两者是互相作用而不能分离的。因为不能自主，所以使财政作用特别加强；因为以财政为关税目的，所以也犯不着要求真正的自主，用来保护民族经济。上面已经指出，财政关税的作用，自从1928年七级税率时代起，便特别加强起来。不用说，以财政收入为关税增减的标准，它同时又须以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为前提。也正因为关税的增减，主要是以财政收入为目的，所以不至危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继续增涨，所以才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允准。关税收入占中央财政总收入的百分比，在1916年是16.76%，1928年增至41.23%，1931年竟达到54.11%。其后因东北失陷，关税每年损失4000万元，比重稍低，但1932年仍达51.75%，1933年再增至52.12%（根据1934年《申报年鉴》）。这里，在中央总收入中已经加入了用公债等来弥补不足这种收入，否则，关税所占的比重当更大。1934年关税收入共计国币33460万元，对于总收入的比例虽尚未知，但是和1933年关税收入为33950万元相去无几，它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一定也不至十分低下。关税收入在中国财政上占了这样重大的比重，不仅构成了半殖民地国家财政的特征，同

时又使关税政策愈益离开了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而完全转化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对象。由于这种作用的日益增强，必然造成了这几种重要现象：第一，税率的增减，完全以能否增加税收为目的，不但不以保护民族工业为动机，反而为增加税收而采取有害民族工业的税率。就1934年7月的新进口税而论，增税货物大半是必需品，并不能因之而减少输入，减税货物却因之能大量入口，而威胁民族工业的市场；可是两者都使关税收入有增加的可能。不仅关税如此，国内统税不合理的税级，主要原因也在此。第二，中国对外贸易经常的入超，使进口税占关税收入的最主要的部分，1933年进口正附税为148 932 000金单位，而出口正附税仅有25 743 000元；1934年进口正附税为145 900 000金单位，而出口正附税仅2 710万元。在财政收入主要仰仗于关税时，一方面使关税不能发挥挽回入超，平衡国际收支的主要功能；一方面由于企图增加输入额以增加关税收入的意念，反而因财政危机而特别强化。第三，这对于助长土产输出也同样是一个障碍。譬如1934年6月21日所颁布的出口新税则，其免税或减轻税率的部分，都是并非主要出口商品，至于烟叶等甚至反而增税；这种税则的改订，站在保护意义上，远不若站在增进税收上的意义为大。第四，关税的财政性，每每不得不以接受帝国主义者的要求为交换条件。1934年9月间盛传财部将在九龙甚至在香港设关，其主要动机便在避免地方政府垄断关税收入，而增加中央税收。11月10日上海《每日新闻》报导，英国以中国答应广九、粤汉两路接轨为九龙或香港设关的主要交换条件，这不过是透露了真象的一面罢了。

总结起来说，中国关税的主要特征，是半殖民地性和财政性。前者不会因为表面上的自主而引起本质上的变化；尤其是最近，列强在华日趋尖锐的斗争，在关税税率的变动上充分反映出来。

后者的倾向，近来特别加强，而以掩护及有利于前者为其存在的真实前提。1934年新税则是上述两者统一的产物。这种特征，必然随着国民经济愈形崩溃，外资统治愈形加强，而更加明显起来。至于在日本武装势力直接威胁之下，华北平津一带，华南福、厦诸埠，偷税漏私无顾忌的盛行，关务人员惨被杀害，只不过是中國关务沦落到纯粹殖民地化的前奏曲！显然，关税问题不是已经消除，而是现阶段整个中国经济问题中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原载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
第2集。生活书店1935年12月初版）

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

一、中国的工业化

1840年以后，特别是1900年以后，在“野蛮”而且“落后”的中国沿海的草原上，开始出现了汽船和火车；开始转动了探矿机和采掘机；开始矗立了高出云表的烟囱。欧洲大战期间及战后的恐慌时代，中国的买办，官僚，商人和地主，更倾囊地运用他们那些血腥气的原始蓄积，来增进工业投资的利润蕃殖；他们虽然都在这个稀有的黄金时代塞满了一己的荷包，可是他们从未想到如何利用这个良机来积极确立民族资本的根基。在世界经济大恐慌爆发之后，即在1928年至1931年之间，因为金贵银贱的结果，物价奇涨，造成假态的繁荣。富商大贾把欧美名贵的商品和卖淫的舞蹈都大批介绍到通商巨埠，列强的财阀把滥贱如泥的白银，当作资本狂潮般地输入中国，来建立工厂，来大发“洋财”！所以中国这种由“野蛮”过渡到“文明”的行程，依旧像龟兔竞走似的迂进着，虽然，它的客观的意义是万分可怜。到了最近，内地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水荡旱暴，几千几万人的淹死饿死缢死和卖男鬻女地挣扎而死，就更衬显出口岸都市的繁盛富丽，兴隆太平。因此指出中国已在工业化或是已经工业化，或者指出中国已经能够工业建国的人们就颇不寥寥了。他们之间更有人将中国每年每人对于煤铁，电力纺织品的消费量，去和英、美、德、法、日诸

国作等量的比较，提出了专家或是权威的意见，主张中国工业化的程序应该“自轻工业入手，而渐及于重工业”，（请看看中国经济学的权威，南开大学教授某先生在交易所周报上面的妙文大著！）但是谁有权利可以将中国的工业化当作一个民族的统一的范畴来观察？试问中国的工业化是由谁来强制促动，更是向怎样一个被决定的目标前进？事实最为雄辩，它告诉我们的是：中国的工业，特别是一切工业之基础的重工业的存在和开发，并不是代表中国工业化的指标，而只是测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半殖民地性，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了怎样的深度的指标。

第一，中国的工业乃至所谓工业化，主要的只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成果，是为了建立他们统治并榨取中国的经济基础。中国的铁工业，其储藏量的2/3，已被日帝国主义所武装掠夺；铁矿开采权，有82%是握在它的铁掌之中。每年百万吨的以新式方法生产出来的铁矿砂，有90%以上是和日本资本有关；40万吨的生铁中，和日资有关的铁厂占95%以上。煤矿业每年2600—2800万吨的产量中，英国资本占25%，日本资本占40%（东北沦陷以后，日英之间的这种比重在名义上自然起了变化）。新兴动力工业——电力工业，外资产量占年产量60%以上。中国最大的发电组织——上海电力公司，便是在美国资本独占之下。外资在这些重工业部门中君临一切，便说明了中国工业化的最主要的本质。而且就是在轻工业之中，譬如棉纺织业，英日资本也占全国纱锭总量42.23%，布机总量51.15%；纱锭总量67.53%（1934年底止）。在卷烟工业中，英国资本和中国资本成20与1之比；在火柴水泥方面，日英资本也有同样的牢不可拔的势力。这样，中国的工业化，在世界资本的体系中很明显地只是代表着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第二，在发展过程中，外国资本的速度也远胜过中国土著的

工业资本。因此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乃是外资统制力累积地加强增大。中国煤产总额中外资所占比重，由1918年的47.6%增加到1928年的56.2%。其中日资的比重，据李紫翔先生的材料，1918年不过20%，而1928年则已达33%，1932年更增至40%。外资所占百分数的增加，反面自然就是华资的降低。这在轻工业方面也无不同。1916年到1924年的黄金时代，棉纱业中华资锭数增加了四倍，在华日资却增加了七倍。从1924年到1934年这十年中间，华厂纱锭增加了1/3，日厂却增加了2/3。又如同期布机台数，华厂只增加了1/2以上，而日厂的增加率则超过二倍。外资这种发展不但是凭藉着金融独占资本的庞大势力，而且还透过列强在华的政治势力，（如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和1897年中德胶州诸条约），和国内半封建性的政治经济机构来达到目的。譬如早已收回自主的井陘矿务局在1922年被迫再与德国合办；1931年南京政府因“某种关系”令河南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合办，使归英资统制，滦州矿务局迄今也仍未收回，虽然所订条约的有效期间已经终止等等，不过是几个显而易见的实例而已！目下因为在华外资的增强，结果扫荡了农村中的手工业，开拓了国内市场，并造成列强控制下的独立的输出（最好的例子莫过于铁矿砂和生铁的强制输入）。这乃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二个现象。

第三，中国民族资本不曾争取得重工业的霸权，来确立整个工业的基础，这就已经决定它只能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充当外资附庸的角色。在轻工业中，一方面因为国外市场的缺如，现行关税制度下列强商品的得以自由倾销，另一方面因为庞大而有力的外资工厂的竞争，没有统一完整的国内市场，以及半封建性的捐税负担，就绝对不能摆脱抱残守缺的地位。而且这种不幸的命运必将随着帝国主义愈益逼近着没落期而愈益被确定，列强分割中国的运动，已在着着实施，目前恐慌的狂风暴雨正笼罩着全世

界，列强拚命在那儿将祸患转嫁，中国民族资本的辗转衰微，就愈益显出列强资本宝座下的中国工业化的命运，是怎样一幅凄惨的图景。

所有这些都规定了中国工业或工业化的特质，惟有了解这种特质，我们才能把握住中国工业的应有前途，不然我们就会被这些有意或无意的呓语所迷惑！

二、战慄在恐慌中的民族工业

恐慌是促进资本集中的有力杠杆，每经恐慌一次，所谓“两极化”过程就推进一次。目前的中国正在恐慌之下呻吟，劳苦大众和一般小有产者都相继破产、死亡，民族工业亦同样没落，不过外资的势力却更加累积了：中国经济是更进一步地踏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

一般说来，中国经济恐慌并不和世界经济恐慌同步调。1928年起，物价以世界的规模开始迅捷下跌，1932年为最低点，到1933年开始作部分的畸形的好转。在中国则颇有不同：天津、上海等地物价指数，在1928年到1932年间，反是逐步上涨，而尤以洋货上涨奇速；到1932年底起，列强各国物价跌势稍止，而中国从这个年头起反陷入物价狂跌大潮中，一直继续到现在，日益加深。因有这一差别，中国一大批的买办式的经济专家就认为1928—1932年是中国的繁荣期，造成这个奇迹的宝贝是中国的银本位货币。殊不知金贵银贱所促成的假态的繁荣，只是帝国主义者白银倾销所造成的南柯一梦，而劳苦大众们却被高物价绞尽他们的血汗。但反之，1932年起，帝国主义全面厉行通货膨胀，造成金贱银贵的尴尬局面，却又是中国从“假态繁荣”，到“现实恐慌”的主要契机。英、日、美三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转

嫁恐慌，此后一定要强化其通货膨胀政策，务使半殖民中国曲尽为帝国主义景气好转而牺牲的义务。所有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命运便被这种基本要求所决定，因之也同是决定中国工业恐慌前途如何的一个最主要的前提。

将这种转嫁作用特别加强推进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所掀起的掠夺战争。东北煤矿产量占全国产量40%以上。东北的铁矿，仅辽宁一省，即占全国储藏量的75%。全国主要煤铁产区被人掠夺，愈益摇动了中国工业的基础。同时东北又是棉纺、面粉、卷烟、火柴、水泥以及橡胶等全部民族轻工业的最丰富的市场；东北市场被独占乃至被封锁，就更迫使民族工业濒临绝境。可是再分割殖民地战争只是帝国主义转嫁恐慌苦难的另一种形态；而东北陷落又只是转嫁祸患的战争之开始。这就是规定了在当前恐慌中民族工业的前途之第二个前提。

在这样的特征和条件之下，中国工业恐慌乃至经济恐慌在1932年下半年起便暗云低迷，山雨欲来；1933年就大规模的展开；1934年更作立体的深化，而特别添加了新的因素。

重工业中民族资本底微弱的地位，在恐慌中采取着破产，倒闭，最主要的还是被外资吞并的形式。安徽烈山煤矿1934年秋积欠工资半年，矿内水深三尺；水东煤矿积欠工资半年。河南小寺湾煤矿1 000余工人被迫停工；焦作中福公司亏蚀300余万元。晋北矿务局休止工作达75%，保晋公司煤窑五座，已停其三；萍乡煤矿，衰败已极，产量自100余万吨减至40—50万吨。湖南醴陵煤矿积欠工资多月，1935年春发生索欠工潮，这些只是极零星的消息。中国自办的煤矿便逐渐受到外资控制：河北省临城的怡立、正丰、长城等公司，和日资发生暧昧关系；柳江公司产销上实受开滦的控制；浙江长兴煤矿有受英资福公司200万借款的消息。至于铁工业自东北被占后，简直已无足述。1935年海关报告上生铁

及铁砂输出之增大，并非此基本工业的好转，只是证明了对日债务关系压榨下不得不提供此半制原料品，以补充日本军需品的不足。这正象钨、锑等输出突飞地增加，只起了增强宗主国武装势力的作用。在恐慌中重工业基础特别危殆的当儿，实业部年来所筹划的机器、钢铁诸厂除掉吸引外资或是聊资高调以外，就更少其他意义了。

回头再看轻工业：民族资本有完整地盘的缫丝业，在世界经济恐慌下，在日本独霸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已经完全停滞，完全压碎了。1934年生丝输出只值1929年的15%；上海丝厂开工者在7月为33家，不旋踵就减至12月的13家，仅及往昔盛时1/10。面粉业营业额指数如以1930年为100，则1931年为120，1932年为85，1933年为50。1934年因灾荒景气的促动，面粉市价曾一度腾涨，但11月起又跌落到2.2元左右，据日本商务参赞署估计，该部门的生产力在转动的仅25%。骄气横溢的火柴业，自从1933年11月增加统税以后，便存货山积，减工倒闭层出不穷。1934年春青岛火柴厂均相率停业，失业工人万余，嗣后因工人要求而复工的厂家仅3家，山东其他各地火柴厂亦有6家停业。天津英昌公司裁工4/10，停业者1家。北平丹华公司也裁员减工。镇江大中华分厂在去年秋后亦实行紧缩。浙江最大的火柴厂杭州光华公司去年起即缩减工作2/10，1935年预备再减工2/10。具有托拉斯规模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去年的景况也不见好。统计全国火柴工业生产力使用者仅50%。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火柴漏私空前地增加，在华日厂又积极扩大，卷烟业随着统税税制自七级改为新二级，上海华资烟厂也由一百五六十家减至五六十家。1934年年底昆仑等小厂相继倒闭，烟业巨擘南洋公司也纠纷叠出，奄奄无生气。水泥工业虽因提高关税而稍获喘息，但因市场日狭（如广东限制外省水泥入口，横加苛税负担），货价仍跌，生产力废弃者至少有

30%。至于新兴的橡胶工业，自东北沦陷沪战爆发以后，衰颓得特别凄惨，以上海一埠而论，原有橡胶40余家，1934年仅存十三四家。

民族工业的宠儿——棉纺业，在当前恐慌中特别值得注意。外资特别是日本在华纱厂的庞大势力，是恐慌中华资纱厂陷于绝境的最大原因之一，它一方面垄断高级纱的生产，垄断高级原棉（日本更控制了最大的棉产区——华北），封锁东北市场，一方面竭力压低纱价，来侵占海外及国内市场，来打击资本薄弱的华厂。以1935年1月中旬为例，市上42支日纱水月牌较华纱金城牌抑价32元；20支丰年较人钟低3.25元；16支日光较同级人钟纱亦低3.25元，后者的销路就全为前者所侵占。再加上国内人民购买力的大大减少，销路更无，市价就狂跌不已。华纱销路日蹙，以上海交易所内各帮现纱成交额计算起来，1930年为690384包，1933年仅有237,191包，跌落了2/3；1934年稍稍回复到319923包，尚不及1930年销数1/2。其中尤以华北销路减退得最为凄凉，1933年销数仅及1930年的1/5，1934年亦不到1/3，日本透过政治势力增强对华北市场的控制，对东北市场的全部吞没，自然是主要的原因。同时纱价也大大跌落，42支纱1931年最高市价544.75元，1934年仅287.50元；20支纱1931年价高达265.75元，1934年仅188.50元；10支纱1931年最高价220.62元，1934年仅163.00元（均为一年中最高价之比较），大都跌落了1/3甚至1/2。

销路减少和纱价跌落，便将这门民族工业打落到恐慌的深渊。1933年4月22日起华商纱厂决议全国减工23%，一个月期满后继续减工，减工之不足，便纷纷停业；天津恒源，武昌民生自该年5月起停工六个月；天津恒丰和郑州豫丰先后在八九月间停工。总计当年上半年全国停工锭数共达2696022锭之空前高额，下半年亦达1119334锭之多。到了1934年，情势依然一样，

上半期停工锭数又增至 1 224 267 锭，总锭数停工周数竟超过以前三个半年的数字，计达 3.89 周之多！自 6 月 1 日起，全国华商纱厂又决定减工。7 月间，恐慌竟至摇动华商纱厂的首座——申新纱厂，它被迫改组，并向美日银行吁求援助。到了年底，上海溥益，天津元裕诸厂又先后被迫停工，假使人们根据纱厂老板的统计数字，将死挺在厂中的新旧锭数，和日厂飞滚着从不停歇的纱锭线锤，乃至布机，都一视同仁，以为三年来华商锭数增加了 277 450 锭，在全国总数比例中由 56.65% 跃进到 57.97%，以为是一个可惊的胜利，那才是一个深刻的自我讽刺！

恐慌中民族工业停滞乃至雪崩一般地解体，实是在华外厂保持着稳固地位和加速扩大的前提。民族工业无论相对上或绝对上愈趋式微，因而更减低了控制整个市场的能力；或是采取更简单的形式：被并合，被控制，以及投奔外资而充作附庸。这种畸形的累积或膨胀过程，只是朝着唯一目的走：即外国资本逐渐全面的控制中国工业生产的能力，而成为彻底半殖民地化或殖民地化之桥梁。

三、走向殖民地化的几个主要因素

我们假使看落了现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所展开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乃至战争及革命危机对于半殖民地经济所发生的影响，而将它们当作各别的截然不同的体制，那末我们就无从了解，半殖民地国家为什么必将沦入经济恐慌的牺牲品的那种悲惨命运。经济，政治，乃至战争等等危机，在现阶段只是资本主义没落期的一切内在矛盾的爆发。在这里只是他们运用不同的形式来达到转嫁极度恐慌中的祸患，而中国的工业恐慌或是民族工业的殖民地化，便在这种契机之上，必然地开展：

第一，列强在华经济利益的冲突，经济压力的增强，在1934年都有新的展开。国联技术合作和日本“四·一七”声明书的对立；欧美资本之建设银公司和日本要求恢复中华汇业银行之间的对立，就是反映前一过程。广东以电力公司等向英美抵押借款；四川以开发全川富源要求英国投资等等，就是表示民族资本如何不能自谋挣扎，而外资则如何可以自由地扩大它们在华的经济垄断权。

第二，帝国主义的货币政策愈益极度推行。譬如美国之于白银政策，他一方面为了增进对华倾销力，使中国成为他的过剩商品的牺牲对象，一方面想吸尽中国的本位货币，使中国在币制上完全变为它的附庸。中国的金融界因为美国这样厉行白银政策，以致市面现银日缺，信用更趋收缩，对于工业投资就更审慎不前，而且贷款利息增高，使工业的成本愈重，因而就促使它们愈陷于恐慌的深渊。

第三，远东反苏联战争愈迫切，日本占取中国的决心愈明朗，这是中国民族工业沦落到殖民地化的前途之最主要的促进力。中国工业产品已经彻底从东北市场上被排挤出来，日货在华北市场的控制力也显著的提高。更不幸的是作为中国工业之资源，生产大量铁砂、石油和棉花等原料的华北，现在正继东北之后而逼近再度的掠夺战争之前，使中国更将丧失建立自立的工业之可能。“四·一七”声明和“一·二九”中日南京会商暗示给中国工业的前途实在不是和平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工业或将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主要工具。

中国工业的前途，便在这样国内外的实践条件之下被决定。中国工业的险状，已经不是用数字和图表所能全部表示的了。忽视中国工业现实的社会关系，而计划在原有基础之上建设工业，是对于事实的逃避或掩饰。中国工业危机的解救，它将和中国政

治经济问题一起，被大众当作一个总问题来处理。

(原载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
第2集。生活书店1935年12月初版)

英美共管中国货币吗？

一、“卖身投靠”和“依人作嫁”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就是让我们人民不能再相信政府的任何一句话了！银本位在1934年10月实施银输出税及平衡税之后，实际上就已经废止了，可是财政部到1934年11月颁行法币之后，还一口咬定仍不放弃银本位。可是这种谎话倒还情有可原，因为说谎的动机，只不过用来安定人心，以便法币可以顺利地换得老百姓手里的白银罢了。可是另一事件的意义，却又大大不同。政府到现在还坚决否认中国货币权已经出卖给英国，中国货币已经隶属于英镑控制之下。财政部到现在还大嚷“自力更生”，这是不可饶恕的。因为货币权是一国的主权，中国人民有保护国家主权的义务和权利，决不让国家主权轻轻出卖，更不允许出卖之后再来自欺欺人。

政府目下所日夜忧虑的，是新货币制度本身如何完成？如何用货币制度来弥补财政上浩大的支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自然而然地都归结到如何稳定法币外汇市价上来。于是大英帝国的银行，玩尽好把戏，就把法币对外汇价用每元十四便士又二分之一的比例稳定起来。“自力更生”变成一场好梦。中华民国的货币权，就变成英镑怀里的“阿斗”了。

自力更生和卖身投靠，它们的动机既然不同，它们的结果更

截然各异。法币对外汇价虽然由英镑维持而安定起来了，但是如何出卖白银来获得外国货币呢？更如何能借到一大笔款子来平衡国际收支（也就是用来安定外汇），来弥补财政支出呢？财政部自然很明白，在入超无法阻止的情况下（在日本军队武装保护下，私货输入曾达3亿元之巨。今年开首数月出超的景气，是在这样滑稽的前提下造成的），法币外汇市价，仅靠大英银行消极的维持，是不够的。救急的办法是出卖向民间收集来的白银，最好是借到外债。这是卖身投靠的卖身条件。但英国却都不易应承。伦敦虽然是世界的银市场，但英国只是白银卖买的中间人。有没有人购买白银，更有没有人愿意高价购进，主动权全在顾主，英国是无法帮忙的。借款，英国是做得到的，也并非不愿意做，可是却不能做。它不敢用借款来巩固已经获得的货币权，原因是恐怕挑起日本军阀的杀气。货币权是要的，可是又不愿意冒一笔放款的危险，这是英国吃亏的地方，也是等着出卖田地的破落户，暗自叫苦的所以然。

自从去年底，美国在伦敦停购白银，银价大跌以后，中国在美国这新的反攻之下，只得重加考虑其货币权的主人了。这是卖身投靠的又一必然的结果，原因是出卖白银是新货币制度下必然的事，假使能够高价出卖，虽然牺牲主权，也是愿意干的，然而现在银价竟至大跌，而且白银竟无买主，这在中国自然是惶恐不知所措手足了。

于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白银的谈判便在人不知鬼不觉中暗底进行了。1935年2月13日，美国财政部长才公开宣称：此次向中国购买白银计有5000万盎司，每盎司价值美金6角5分，计得美金3250万元。每盎司6角5分的代价，的确是高于当时伦敦市价的，但美国所获得的报偿也不少。第一，购银代价中有2250万美金是存在纽约各银行，这就等于存放一大笔中美汇兑平准基金在

纽约，中美汇价就此可以稳定下来，中国对外的汇价，实际上就要通过美金的市价来维持。单在这一点上，美国至少可以和英国平分秋色。中国货币也就暂时有了两个主子了。第二，购银代价中有1000万美元是购买黄金运回中国的，这是美国要使中国实行金银复本位制的一路伏军。

实际上，后者的意义比前者更大。美国希图建立金银复本位制的货币集团，而以它为领袖。它在墨西哥等国作购银谈判时，就多半希望在美国弱小国家建立起这种货币的门罗主义。在远东就主要的向中国作这样的活动。让中国有相当数量的黄金，来做实施复本位制的物质基础，这或许就是当时美财长大言壮语说：“美国决将与中国合作以助其解决货币问题”（1935年2月13日国民电）的缘由罢？这里，我们或许还想得起，最近曾有黄金归国有的——一番谣传罢！

二、日本人说“无节操的中国经济外交”

这两个月来，中国法币的对外汇价就是通过美金的市价来平准的；而英国的银行，就维持着消极的“善意”态度。中国货币权和这样两个主子都有关系，很明显，买卖双方都觉得怪不方便的。这样，陈光甫等就有渡美之行。

政府事前竭力否认陈氏之行负有与一国主权（货币权）有关的重要使命。南京电报再三说“纯系私人考察”，然而这对于蒙蔽事实真相并无多大帮助。北平《晨报》3月15日上海专电曾经说出陈光甫赴美的重大使命是：（一）商讨维持白银价格问题；（二）进行金银复本位制。是南京的话在说谎，还是报纸在造谣呢？这自然得有待于事实来证明了。

陈氏的使命，严重地关联到中国货币主权的谁属，这早由美

国财长的几次声明：“以便交换中美两国关于货币政策之意见，拟商定两国间关于财政问题之更密切的办法，”所完全地证实了。而问题解决的开端，似乎首先就集中到美国是否愿意继续购买白银上来。存在美国银行里的2250万美金，是经不起买几批军火飞机，或平准几次外汇用的。继续出卖白银，是跟中美汇兑更巩固的安定下来，以及金银复本位制的是否能够实行，相混在一块的。这里，首先值得注意者是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在谈判声中正式成立。这在完成中美货币的联系上，安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中国银行的纽约分行，此后可以经常的代政府出卖白银；或是用出卖白银得来的美元，来购买中国的外汇。这样，中美在通货本位上就有联系了，怪不得美国参院银派领袖毕德门就对人大称“陈光甫不虚此行了”。所以《纽约商报》也论及中国政府复有大批白银以超过世界行市之价，售与美国，足使华币巩固信用。中国银行今既在纽约设立分行这点就更易完成起来。中国代表陈光甫等人，现在与财长摩根索进行谈判，此事若成，则“中国将为美元集团之第一国”。

白银卖买是否能成功，这次中美谈判的主要内容，华盛顿方面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谈判的唯一内容：“中国希望在实际上获得的援助，至多不过美国允购中国之巨额现银而已。”这已注意到由白银卖买所必然产生的两国货币的联系。上海的日文报《日日新闻》以为中国方面将以国有白银为担保，向美国获得借款。（4月17日）中国方面想获取借款的念头，容或有之，至于以国有白银为担保，则不免猜测之词。在目下将各方面的消息总汇起来，中国再度出卖大批白银，恐怕是一定有的。4月20日国民社华盛顿电说：“此间益觉美国有允购华银之可能，以减除中国方面所称中国所受美国购银政策之痛苦”。同日路透社的电讯也说：“关于……货币之谈判，可产生美国允收买中国白银之结果……中国有现金

存于国外，则中国汇兑地位，可较国内存银更为人所信任。”

1935年2月间50万盎司白银买卖成功时，所可能产生的一切结果，此后一定更加适用。大批白银调换成美金，固然“可较国内存银更为人所信任，”可是，这种信用完全是透过美金来完成的。那末“中国将是美元集团的第一国家，”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断语。

所以，即使美国不完成中国复本位制，至少在这点上说，美元对中国君临一切的情势，事实上是已经形成了。4月2日上海日文报《每日新闻》的社论上，认为“中国通货的依据地因此愈将自伦敦移到纽约”；认为这是“无节操的中国经济外交”；最后更严词警告：“设此后依然继续如此娼妓式的行动，中国自身益将沉沦于苦境。”这话到底有几多意义？

三、英美共管中国货币吗？

假使不能获得借款来充作外汇平准基金，来解决财政的困难，那末只有另寻主顾来出卖白银。虽然这同样要以出卖货币权为条件，虽然将会受到“无节操”的恶评，但在财政部看来，除了继续申辩陈氏一行“纯为私人考察”之外，毕竟只好笑骂由人了。

然而事情竟有大谬不然的，4月18日哈瓦斯社从巴黎传来消息。以为陈氏在美进行谈话结果，中、美、英三国业已成立一种三方协定，规定由英、美两国曾同援助中国，维护中国币制，襄助中国解决复杂问题。至于详细办法是，美国继续向中国购买白银，较国际市场价格为高；而英国则拟以款项贷予中国，俾中国银行得以增加外币准备。这个消息，甚至曾很快地使人联想到外交问题上，英、美是否曾因之发展到共同对日？

假使上面消息的确属实，那末中国货币制度的确有暂时继续

和英镑美元都发生联系的可能。但首先得知道，这完全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在卖身投靠者看来，能够一条身子两处卖，自然是更好不过的事。不过问题倒不决定在卖者。假使英国的确能够放弃和日本妥协，共同瓜分中国的痴想，那末借款给中国来稳定“自力更生”的法币制度，也许早已实行，更容不得美国来插足。然而财政部的确对此绝望了，所以又向美国要求出卖白银来“自力更生”，现在传出这个消息，或许是对英、美刺探一下吧！

就美国说，它已经有和英国共同享受中国货币权的必要，它从2月份5000万盎司白银买卖交代后，事实上已经抓住中国货币权。现在的问题只是，在美元、法币之间维持双方的联系呢？还是大家来实行金银复本位制？（这里白银议员汤麦斯，以美、加、墨、华四国将成为用银集团，中国将回复到银本位上去，这是“一厢情愿”的念头。美国决不会创设纯粹的银集团，中国更不会恢复银本位的）英镑和美元的斗争胜利究竟谁属，一方面决定于金本位集团崩坏后，究竟跑到谁的手里去？一方面就看谁能握得中国货币权了。英镑、美元共同妥协来共管中国货币权，这似乎是难于想象的。

但是，另一种的三方妥协是可能的。这就是美国照现状继续巩固对中国货币权的控制，同时援助英国借款给中国（撑英国的腰），使英国取得别的权利，例如全国铁道等的权益；而英国的报答是对于中国对外货币联系上，不取积极的攻击。假使是这样，中国货币权的主人总只有一个，这已经不是三方货币协定的问题，更不是什么英美共管中国的货币权了。

中美谈判发展到如何程度，两国的财政部是心里明白的。对于三国协定的传说，中国否认，伦敦沉默，华盛顿混沌。目下所频传的消息只是中美双方，如何谈判白银买卖问题罢了。

有人问美国财长说：“是否宁愿中国国币长与美元结合，而不愿其如今日之与英镑及美元结合？”财长答称：“对此问题不愿置答”。这是对的，大家看力量吧。但是在南京却说：“并无加入英镑或美元集团之必要”！

贾德干再三称赞中国币制改革的业绩，他的想头是明白的，保持现状罢！但现在只看美国对于中国货币权的态度了！

（原载《时代论坛》第1卷第3号。1935年5月1日）

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华以后

美国远东经济考察团于1935年3月下旬自旧金山起程，4月初旬抵达日本，勾留半月，19日离横滨，于4月22日抵沪，同行共11人。指导者团长福勃斯，大资本家，曾任菲律宾总督（1909——1913年），菲岛问题调查员（1921年），海地调查团主席（1931年），及驻日大使（1931——1932年）等职。据说他前后曾来华四次，久旅斯土。在履历上已经给人一种印象，——他是美国远东殖民地舞台上活跃的代表人物。福勃斯自己宣称，考察团内并无政府代表，当局亦无财政上的资助，全体团员均属美国银行业，食品业，烟草业，纺织业，航空与轮船交通业等各界之最有关系者。但是这并不能掩饰该团对金元帝国所负的任务。福勃斯自信“美国商业界对此大国（即中国呀——笔者），作最周密之考察者，从未有如此之组织”；这一点倒切实而不过火。现在，考察团正在这个“大国”作“周密之考察”，南达广州，北循青岛，天津、北平而达绥远；中部由汉口入重庆、成都；然后将折返上海，作总的研究和报告，大约于6月中旬离华赴菲律宾。这一群金圆资本的勇士足迹所到的地方，皆有就地的官长，大商人，大实业家以及学者名人在迎送趋承。并有专家分组在向他们提供咨询和意见；可是谁也不曾站在中国国民大众立场上，来探询一下：这些仆仆于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上的贵客们，他们究竟为的是什么？

固然，说是说过的，美国人和高等华人！他们还并不是“申辩和蒙蔽”呢，只是希望人家不要误解！红了眼的日本人曾“误解地”这样说：“此次美国考察团之来华，实因日华接近空气之抬头，英国为挽回颓势，力图全面的活动，致美国大感狼狈，遽然派遣此次之使节团来华”（《每日新闻》4月24日）。这种话自然使美国人不安，他们哪里会和日本英国排在一起呢？谁都明白中日接近或中日经济提携的意义，不过是进一步攘夺中国经济权益的手段；英国呢，他蹂躏和榨取中国大众已经几十年了，10年前的现在（5月30日），曾经把中国人的鲜血脑浆涂满在上海的南京路上。至于美国哪里会这样呢？福勃斯不是说过这类“和善可亲”的话吗？“本团此次来华，未负有行政使命，仅从事考察经济状况，将报告于美国政府，俾中美两国之商务关系，日益增进。”美国人说他们自己只要做买卖，只要中国多多购买美货；然而这种动机是冠冕堂皇的，它同样散发着血腥气！半殖民地的中国，本来是列强虎视眈眈亟待再分割的最大市场。各国都用自足经济，关税壁垒，货币集团等等手段，把贸易的大门关闭起来，只有中国是大度地和任何人做买卖；她会让外国制品自由倾销以征服本国工业，她会每年进贡4亿元以上的入超来维持各国的繁荣。美国因为蓝鹰运动解救不了她本身的存货山积，比较有效的药方还是使穷透了的中国人拿出最后一文钱来销清存货，因而考察团远道而来了！这是和平的，冠冕的，因而也是大可公开宣布的。美国人这样区别着自己！

中国的大商人最明白不过此中奥妙，他们也真愿中国做外国货的消纳市场！上海招待处的主席张公权在这次的欢送席上，曾经这样说过：

“一旦匪患肃清，灾害减少，中国人之购买力必顿见增加。今日10亿元之进口，增加一倍或数倍，岂是难事？尔时中国或可为世界消纳货

物之一大市场”（《中华日报》4月27日）。

你看，他们不是以中国将成“世界消纳货物之一大市场”而自夸自耀吗！所幸中国正是帝国主义者所欲定的和互相争夺之一大市场！目前“匪患”之所以要“肃清”，据张公权所说，也是为了使这样的市场再大“一倍或数倍”，中国人真勇敢，真会替自己门第增光！

有了这种勇敢的热忱，欢迎“和平的”主人，自是不可或缺的序幕。半殖民地的贫困，造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繁荣；然而人们却在告诉我们说，这是中国大众的义务！请看罢，当考察团到南京那一天，中国中央政府的报纸在《欢迎美国经济考察团》的标题下，说了这样的话：

“欧战以后，美国对各国的贸易，厄于关税壁垒，国内生产过剩，失业增加，虽以罗斯福之复兴运动，曾无补于经济之衰落。其惟一之法，则为另觅广大而持久之市场，而尤属目于盖藏未启之中国，此世人周知之事实，吾国亦乐于为助，以尽协力繁荣之义务也”。（4月24日《中央日报》社论）

然而中国大众是否“乐于为助”，以及有否能力来尽这种“义务”，这却是一个大大的疑问。不过美国考察团至少有一点是业已成功了，就是夹道的欢迎，证实中国确有一部分人愿意曲尽“协助其繁荣”的义务！

谁都知道，“九·一八”以后，美国代替日本的地位，取得列强对华贸易的首位。可是，中国本身购买力的衰颓，进出口贸易都萎缩了，这使“和平的”美国，不得不更努力跟日英来竞争中国市场。这种列强利益的互相竞争，对于中国无疑地是一种祸患，然而却有人和衷共济地在劝说美国对于竞争不要心灰意冷：

“不幸中国之力不足以自保，故远东问题每劳美国忧虑。然此乃一时现象，中国既不因是而自馁，美国亦不可因是而失望。美国之繁荣，

中国存在为一大要素。中国之自立，美国援助亦为一大动力”（北平《晨报》4月25日社评）。

然而所谓美国的援助实际上又是一些什么呢！是不是和中国协助其繁荣那样的货真价实呢？世人的确有不少吃了巴掌而不叫痛，反说这是一阵六月凉风的人们，不过他们也有失言的时候。譬如此次天津《益世报》也抱怨起美国的援助——白银政策来。该报一方面竭力表达出中国是肯牺牲的，“若二次棉麦借款，虽非普通贸易，实与美国经济甚有关系。美所出借之棉麦，乃国内过剩之货物，苦无大用，弃之可惜，我国慨然为之承受，直接救济（！！）本国之棉粉业，亦无异救济美国之农业”以后，另一面便向调查团申诉：

“……始作俑者，非罗氏之白银政策乎？……为美国计，应另谋两全之道，一面固须繁荣本国，一面又须顾全中国；促进中国之荣繁，以期推广美货之市场”（5月6日天津《益世报》社评，题为《欢迎美国经济考察团到津》）。

说棉麦借款是“直接救济本国棉粉业”的人，怎么又会非难白银政策不是“两全之道”呢！其实，在承认半殖民地和宗主国间的隶属关系之下，本来是谈不到两全的呀！用收买白银，来压低中美汇价，以便增进美国货物对华的输出，自然只是“为美国计”的，他实无停止之必要，卖弄风骚式的诉怨有什么用！和平的美国人很明白自己不必来跟中国人讨论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各界的座谈会里，对于中国专家之“考察团可否于回国后，建议政府改善”的提议，就避开政治方面发挥意见。而且他们更进一步反问：“（一）美国商人对华投资，华方有无切实保障办法？（二）美国对华贸易，由1933年以后，跌落原因何在？”（见5月10日《申报》天津电）。“和平的”美国人在这儿所要探求的是贸易跌落的原因，和切实保障投资的办法呀！

增进输出和保障投资，是美国对华的唯一要求。为了达到这个要求，一时可以和主要的竞争者妥协，而最后则非和他们火并不可，至于中国的意见怎样，只有让中国人自己去津津有味地打算了。美国人是明白的，东北市场已经完全给封闭了，他更是迫切需要保持和扩大中国关内的市场了。日益扩大的日本的压力，成为他的障碍，他不能再怪中国本身不能尽“协助繁荣”的义务了，他顶明白的，解决问题得自己亲自出场的。不过却用不到中国人的劝说，美国人不曾“失望”（假使中国人可惜这种失望的话），而是在忍耐，在准备。白银政策就是完成准备的先行阶段，此次调查团来华，将使美国在争取市场的准备上，能够做得更周密一些罢了！

中国的各式各样的买办勇士，在闭着眼睛满口瞎说窝心话，可是，日本人为着他本身的利益，却是不甘缄默的，当调查团离日来华的那天，日本人便告诉我们说：

“考察团在日与政府通商机关及实业界代表迭次会谈，然各方最为注目之美国资本与货物输入中国市场问题，两方均未成立谅解，不得要领而终。考察团之使命，在于调查以美国资本建设中国航空铁路等事业，对华输出汽车，飞机，船舶，水汽机械，棉制品之可能性。美国此种计划，对于中日经济关系，不无影响。就从来以中国主要市场的日本棉制品贸易言，必大受打击，日本要求考察团考虑妥协办法；然考察团仅仅表示意见，力避日美商品之在中国市场竞争。日美经济在中国市场提携问题未能解决”（日联社4月18日东京电）。

在对华的利害关系上，美国和日本原也可以成立“谅解”的呀！

现在考察团尚在继续活动中，被考察的我们，委实无从知道他们活动的具体成果。但是，对调查团寄予一种天真的希望或要求，自然是欺人的笑话。从提高银价，汇兑战争，夺取货币权战

争，以至于太平洋上5月3日起，美国150艘战舰，4艘航空母舰，400架飞机的混合演习，都指示着夺取中国市场的一定发展阶段。考察团的一个团员向上海一位专家表示：“阿留申群岛的空军根据地已在迅速完成，美国对于决定远东市场的能力便当迅速增大”，在远东在中国，发展贸易和武装战争是这样严密地相结合了。

可是，在另外方面，考察团却备受中国人的热烈欢迎！

（原载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
第2集。生活书店1935年12月初版）

救济棉纺织业危机诸方案的检讨

一、救济声中棉纺织业的沉沦

自从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棉纺织业危机的救济方案以来，日子过得真快，又快半年了。方案的内容共计五项：（一）由政府联络金融界，使全国纱业互相提携，并实行低利贷款，以济其资本之不足；（二）于可能范围内，酌量提高入口关税，并减低对内税率；（三）由政府实行统制，为有组织之生产与推销；（四）全国纱厂设置地点，须分配适当。管理及生产方面，须实行科学化与合理化；（五）全国公务人员，党务工作人员，各学校教职员及学生，须一律服用国货。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看不见什么实际上的效果；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棉纺织业危机愈加展开，华商纱厂的挣扎，愈加显出世纪末的前景。1935年3月底中新七厂被汇丰银行强制拍卖，直到现在还没有正当的救济办法。天津硕果仅存的裕元纱厂，因为积欠中外债务500余万元，其中顶大债权人——日本资本，准备接管该厂，以求坐收债务，所以被迫清理了。现在经委会正在派人调查，准备标价拍卖，这是打开日本债权人合法地兼并民族工业之门罢了。事实上这还不是顶严重的，更紧要的是日本东洋拓殖公司在中日经济提携的热浪中，打算接办裕元，华新，北洋，恒源，宝成等五家华厂，假使真的成功了，华北的中国人，就要买不到中国工厂纺的纱布了。到了最近，停

工关厂的形势，又严重起来。上海民生纱厂继申新二、五各厂而停闭，南通大生，常熟利泰，湖北武昌第一诸纱厂都在最近被迫停歇。上海申新、永安、恒丰诸厂都或明或暗地实行减工，无锡最近通过减工30—50%。很显然的，在救济的声浪中，处于困境的华商纱厂丝毫不会得到实际的裨益。

在另一方面，棉纺织业危机愈深刻，新设计的救济方案也愈多，假使这种方案毫无实践性，而且即使部分的实行了，也丝毫没有根本的意义。显然，这种方案的提出，在客观上只能阻止大众了解棉纺织业危机的最基本的因素，阻止大众为了排除这种基本因素而努力奋斗罢了。

二、纱花价格剪刀差问题

纱花价格剪刀差这个问题，并不包括在上述政府的重要救济方案里面。但在华商纱厂方面，认为这显然是使自己陷于恐慌中的原因之一。

假使都以1932年为100，那末，1934年的纱价大约只有78而棉价却和1932年不相上下。表面上看来，纱价是跌落了，它的速度几乎是直线的，而棉价却几乎仍能维持原有水准，这自然使华商纱厂在成本上加重，而无利可图。可是，象华商纱厂所说，1934年全年营业额5亿元中，原棉价格占37500万元，所以得出一个结论，以为棉花价格不能跟棉纱价格同比例降落，因此所受的损失，乃是促成华商棉纺织业恐慌的基本原因，那就不免是一个方便的结论。

从这个方便的结论引开来，华商纱厂便以为只要能够压低花价，压低到除了原料成本之外，民族资本家唾手而可获得利润为止，这样便可以无所谓恐慌，民族工业万世基业便得确立。所以

在1935年1月间，上海28家华商纱厂便要求南京政府取缔当地纱布交易所关于棉花的投机，以为：“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则不然，花纱两种，同时开拍；棉花一项，专以国棉为标准，致令投机家得逞其垄断操纵之手法，花价愈抬愈高，纱价则蹙乎在后……是全国纱厂之生命，尽操诸此少数有组织投机家之手……”，补救办法是：“一面令飭华商纱布交易所，对于花纱两价之开拍，务须设法保持平衡，如以标准棉花市秤430斤换算20支标准纱价，其制造各项费用（统税在外），不足45元时，应即停止拍板”（均见6月13日《申报》）。假使问题的确是这样简单，纱厂生命，的确是操诸少数投机者之手，那末解决的办法，委实是不难的。可是，假使我们想到，同受棉贵压迫的日厂，它的营业在恐慌中却正相对地日趋发达，那末，问题就显然有些尴尬。无锡纱厂呈请取缔棉花投机一文中也说：“国产棉花，因此居奇；日商复故抬其价，百般操纵，在原料已属如此；外商更巨量抛卖棉纱，使国商纱厂，常受亏折”（1月9日《申报》）。这就是说，外纱抛卖，使纱价跌落；日商压迫，人为维持花价，这成为增大剪刀差严重性的重要力量。假使不能制止外货以及在华外厂产品的倾销，那末，纵使棉价日贱，日商用竟卖来压低纱价的能力也会愈大；剪刀差的消除还是无望的。很明白的，剪刀差存在固然苦了华商纱厂，剪刀差消除也是解救不了它。民族资本家想避免和帝国主义正面冲突，企图在投机市场上来解决基本矛盾，那是很少希望的。

近来因金融停滞，银行或大棉商把所垄断的大批棉花贬价抛卖，花价日低，使剪刀差有缩小的趋势，可是，这只是一大批植棉农民更无把握进行其再生产，少数投机棉商受了损失罢了，华商纱厂依旧不能大量购买廉价棉花。反之近来美棉跌落，日厂仅从原料市场上合算起来16支纱能盈余5元，20支8元，32支25元，

42支32——33元（3月23日《每日新闻》），纱支愈高，获利愈多；成本愈轻，竞争力愈大。1935年日纱内地市场愈形恢复，那是有目共见的。

最后，我们希望指出，半殖民地的民族工业，对于原料问题，更重要的倒是如何保持其能为自己利用。东京《朝日新闻》竭力鼓吹日本借款给中国，去栽培棉花，因为改良后廉价的“中国花”，不但能便宜地供给在华日厂，而且可以适应日本各厂的需要，保证其每年五六亿元棉花输入的安全。大家知道，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棉产，集中在华北；中国最优良的美种脱脂棉，几乎全部是华北各省所生产，而现在华北已和平地拱手让人家“开发”了。民族资本家为了保持这种原料产地的斗争，显然应该比空嚷着剪刀差来得重要了。

三、华厂迁移内地问题

五全会的救济方案第四项，要求把全国纱厂的设置地点，分配适当，就是针对着本问题的决议。最近，在济南所开的纺织学年会，也有同样的要求。此外，如1935年5月6日122期《申报·经济专刊》上有《棉业网之新设计》一文，把问题说得更详细；该文作者是申新二厂的主持人，很足以代表民族资本家在社会经济不景气中挣扎的目标。加之，年来内地筹设纱厂的消息，纷至沓来；于是，迁厂内地，好似一个重要的出路了。

迁厂论者固然承认“在华外厂之倾轧，外货之倾销”，是造成华商棉业困难（只是困难！）的原因，可是他们以为“受缚于国际不平等条约，欲解免而不可能”；他们是毫无勇气打破中国对帝国主义的隶属关系的。其次，他们也承认“农村购买力薄弱”之影响，可是他们以为“农村迭经灾侵匪患，难返繁荣旧观”；

他们却不愿思考到，帝国主义不等价交换，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使农村购买力萎缩的基本原因；假使不能铲除这种基本原因以恢复农村购买力，那末，迁厂内地，还是货售无地的。此外，解除华商纱厂技术组织机构的薄弱，也以为是“属于整个金融及教育问题，非急切所能改善”，他们是这样不愿意面对着这些非“急切所能改善”的社会原因。于是也就只好以为“锭数过于（？）集中，华商同业，不免自相排挤”是华商纱业“困难”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这是“欲解免之，可行之而有效的”，而办法便是迁厂内地。从问题提出的方式来看，可知道他们是如何规避危机的基本原因之解除，在客观上，正像陈翰笙先生所说：“这完全是被外国资本压倒而着着躲避的现象”（《交易所周报》1935年第10期）。

其次，迁厂的具体办法是：“黄河流域棉产，较长江流域多240余万担；而长江流域之纱锭，则较黄河流域多276余万枚，因之，黄河流域必运棉南下，长江流域必制纱北输，成反射供求，徒增运输之劳，耗无益之费，衡之经济原理，自有更张必要。其道在先迁集中机锭于疏落之产棉区，进而按全国衣被数量，就棉区添设新厂，以期纺织工业，能平均发展”（见同前《申报·经济专刊》）。这是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均衡性，当作是半殖民地民族工业危机的原因，希望从纯技术的见地来纠正这种倾向，以求民族工业得安渡危局。至于大家巴望政府来主持这个“平衡”，能够做到，固是实行了一种理想；可是以买办金融资本和地主为中心的政治机构，就是纯从技术上说，也已很难期望它有力量来“统制生产，使之平衡”的了。

迁厂内地的好处，是接近消费区，接近产区，因之市场有保证，成本可减轻。可是这只是簿记上的利益，而忽略了华商纱厂的没落，有其全国性和半殖民地性。无锡汉口广州天津南通等接

近产销区域的内地纱厂，他们大批倒闭的惨境，是不能忽视其基本原因的。而且，纵使在更僻远的内地，华商纱厂一时能保持小范围市场，怎能禁止外商纱厂同样迁厂来竞争？不见吗，青岛日厂纱锭，今年将达60万锭了！

迁厂只是华商纱厂从竞争激烈的通商口岸向内地退却，而客观的结果，只是替日本纱厂先肃清深入内地的道路罢了。

四、改良税则问题

改良税则，对外是关税，对内是统税。前者是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后者是减轻民族工业的负担。

就保护国内市场说，禁止外资在华开设纱厂，远较提高关税禁止外货倾销为更重要。假使两者不能同时并进，那末，即使关税能够允许提高，外国资本反能变本加厉地输入资本，扩大在华纱厂，以打击华商纱厂；1931年提高火柴关税后，日本资本大批地输入，开设火柴厂，是个明显的例子。可是，我们退一步说，假使能够提高关税，阻止外货倾销，于疲惫中的华商纱厂，自然大有帮助。可是，政府收入主要靠海关进口税，假使把洋纱洋货棉织品关税提高，便要影响关税收入。财政部答覆五中全会救济方案第2条说：“在兹进口纱布贸易已呈衰落之时，而遽将纱布进口税，再予提高，诚恐有引起纠纷之虞”（2月8日《中央日报》）。原来，财政部是害怕进口纱布贸易衰落的！其次，中国是没有自由提高关税权的。1934年7月1日财政部减轻纱布类的关税，大家一明白多少是受外力之压迫。最近华商纱厂请求减税的声浪又高起来，市上也有重订关税的传说，可是某国大使已在严重提出抗议了。我们的财部“诚恐有引起纠纷之虞”，站在国家立场上来改订关税还有希望吗？

最后，改订统税问题，据最近所开纱业救济会议传出消息，已交财部筹划。本来，不公平的统税制度，并不限于纱税，全部民族工业之征收统税的，都受不平等税则的毒害。其次，统税的增加，在年来工业破产中愈益迅速，统税收入对于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企求减低统税税率，是“危害民国”的，财部为五中全会救济纱业案呈复行政院的文章中说：“至现行棉纱统税税率，照现时纱价计算，平均仅及4%强，不得谓之过高”。在财部看来，自然不得谓之过高，但在民族工业者看来，或是在人民看来，自然又不低了！而且改变税级恐怕在华外厂反对，又会因之“有引起纠纷之虞”，不见得有实行可能的。

五、出路何处

我们本来还想讨论到低利贷款问题，统制生产问题等，可是为了篇幅，只能扼要地加以论述了。据华商纱厂联合会年会报告书中说：“十年以还，迄未稍苏；竭力支持，负债日多，每锭借款，多者几及百元，少亦30元左右。而利息高昂，尤感困苦，各厂债息高者，达12%，最低者亦在8-9%。全国纱厂，平均纺纱所负利息，10支每包约6元，16支约10元，20支约13元，32支达18元，几占制造成本总额1/3”。又据棉业统制会计算，华厂较日厂负担特重者为利息，华厂每包15元，日厂仅2元7角。我们试再以申新纱厂为例，1934年纱布生产较1932年减少，各项费用亦随着减少，可是利息支出，倒反增加40余万元。纱业亟需金融上的救济，而现在连高利也难借到款项。自然，华商银行不是慈善家，他有几千万元钱去买卖公债，借款给地方政府，却是不愿贷放205万元来反抗英帝国主义拍卖申新七厂的。华商银行资本的买办性，决不是厂家的呈文和政府的命令所能改变的。

至于统制生产，真是谈何容易。由什么样的政府来统制呢？它办的那些国营事业是个什么样？由它来接管纱业，难道不会看中福煤矿、招商局的样吗？棉业统制会的成绩，不是彰人耳目吗？半殖民国家要用统制工业生产来解救纱业，不会给在华日厂笑掉牙吗？

是的，我们赞成在根本办法没有以前，不妨暂就其次，可是我们更愿意指出，用头痛医头的办法，终究是不能代替对症疗法的功能的，何况就是治标的救急，也还是空谷足音，美人来迟呢！

（原载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
第2集。生活书店1935年12月初版）

中国工业问题

一、中国工业的发展过程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工业问题，是专指资本主义生产的近代工业而言；一切手工业或工场工业的没落过程，是略而不谈了。大家都知道，一国工业的发展程度，就是表示一国经济的发展程度，它跟整个国家的命运有重大关系。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开始于帝国主义列强之侵入。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为了自救，就在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兴起军事性工业的移植。在1862年到1881年之间，江南造船厂、招商局、马尾船政局都先后成立。但它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是绝少关系的；换句话说，这种军事性工业的移植，并不建筑在一般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准上。到了1884年中日战争之后，跟着军事的失败，就完全暴露军事工业移植的无能。而清朝政府逐渐由排外而媚外，军事工业移植也就遭受了严重打击。

中日之后清朝政府的屈服，使中国工业发展进入了另一阶段。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得在中国任何通商口岸上从事工业制造，各国跟着也相继获得这个十足半殖民地性的特权。接着1897年中德胶澳条约，规定德人有在铁路沿线采掘矿产之权。这种种特权之夺取，正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帝国主义的步调相一致，所以此后资本对华输出，就分外激烈。而且侵入到了中国

的各工业部门，由轻工业到重工业。在这个当儿，中国的官僚资本和地主资本，也稍稍开始向工业投资。这是中国工业化的开端，也就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完成半殖民地化的重要阶段。

1914年大战爆发以后，中国工业进入了新的阶段。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动：英、俄、法、德、意、奥等欧洲国家因为忙着欧洲方面的分赃战争，不得不在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上暂取退守政策。美日两国资本就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国大举进攻；而日本则因近水楼台的关系，这时期它在中国的投资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另一方面，战时的较好的市场景气，以及参战国资本之暂时的退守，竞争势力之相对的减轻，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造成了比较有利的条件。这时中国官僚的掠夺蓄积和地主的地租蓄积，也转向工业方面进出，便形成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

但是这“黄金时代”保持得并没有多久。大战一告结束，战时的好景气就接着消逝。各国资本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市场。从此幼稚的民族工业又走入了厄运。特别自从1932年以后，民族危机和工业危机完全并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战后的恐慌时期，正是列强资本侵入的新的时期，而1928年起白银狂潮下的资本流入，更是可惊。

从中国工业的发展阶段上，我们首先可以知道：整个工业部门是列强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对立矛盾体。这种对立的矛盾体之发展，是决定中国工业前途的趋向的。现在我们进而研究它们双方的形势。

二、列强资本的机能

列强资本向半殖民地国家的移植，一方面固然诱发了当地土

著工业的兴起，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作用，就是使当地的资本主义生产，不能有正常的发展。这里，我们首先观察它在整个工业中的雄健的势力。

在重工业部门中，列强资本占有极优越的势力。在煤矿总投资量中，日资占11.73%，日、英、德与中国合资者，占40.5%，纯粹华资仅占48.22%。就中国本部各大矿的产量而言（1933年），日资占29%，英资占23.5%，德资占1.1%，至于东北部分，日资煤矿产量占84.1%，名义上土著资本还占14.9%。假使连东北在内计算起来，全国煤矿业中，外资的势力更雄厚了。

在铁工业里，列强资本更是独占鳌头。中国每年新式开采的矿砂，约有200余万吨，其中有60%左右在东北，完全是日本资本，中国本部的90万吨左右的产量中，有90%左右是和日资有关，而完全受其控制的。每年新式制炼的40余万吨生铁，日本资本占95%以上。中国著名的炼铁工厂，汉冶萍公司的汉阳厂、大冶厂，都借有日资，受其控制。

动力工业的电气业中，1934年全国发电容量计496 140千瓦，外资占50%（244 645千瓦），中外合资占3%，纯粹华资仅占47%。在造船工业中，英资七家造船公司，密布于上海九龙、香港、天津，计资本1 100万两，350万元，80万镑。

在轻工业中，以纺纱工业为主，列强的势力，是不可摇撼的。以1936年为标准，日英资本，占纱锭总数46.8%，占线锭总数73.4%，占布机总数55.1%。此外如卷烟工业，外资产量（以箱为单位）占51%，销量占53%（1935年度数字），这里还没有把生产品的真正价值量考虑在内，假使把外资多产上中级烟，华资多产中下级烟计算起来，那么，外资的比重，一定更加大了。

从上面列强资本的喧宾夺主的情形看来，我们可以得出几个重要概念：第一，列强资本是中国工业发展的触媒体，而这个触

媒体现在倒是反客为主，成为民族工业的眼前死敌；第二，列强资本特别在重工业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它的目的既在阻碍中国工业的独立发展，同时它又实行自然资源的掠夺，它决不想在中国建立真正重工业，譬如铁矿业只把开采了的铁砂运回去，炼成生铁输进来，造好机器贩卖给你，生产手段的生产就被垄断了。第三，在轻工业方面，它也能共享低廉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福，再凭藉其雄厚的资本，和民族资本作死对头。日本纱和华纱的竞争，英国卷烟和中国卷烟的竞争，是使民族资本陷于困难境地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致命作用，还透过减低关税，商品倾销来完成。还要用垄断原料（如日本垄断华北的棉花，英国独占鲁、豫、皖的烟叶），非法剥削（如日本纱厂对于中国劳动者的殖民式的榨取），来增强力量。

所以，列强资本的工业发展，是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不利的，它以本国的资本利害为前提，势必阻碍和牺牲中国民族工业的前途。

三、残垒自守的民族工业

民族工业就是中国人自己所开办的工厂，这种工厂愈发展，那末民族的生产力便有畅通发展的前途，然而，为什么现在在中国列强资本愈益强大，而民族工业倒反愈趋式微呢。这是因为民族工业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

所谓先天不足，就是民族工业内部所存在的矛盾和症结。第一，民族工业的买办资本性。中国民族工业原由买办资本转化而来，它们一方面替列强做经济侵略的先锋（推销商品的买办），同时在不和列强资本发生利害冲突的条件之下，也从事获取产业利润的活动，所以说它是买办性的民族资本。这种买办性的民族

资本，随时要求托庇在列强资本之下，而牺牲自己（民族资本）的独立发展的前途。所以开平煤矿要依附在英资开滦之下，中原公司（“五卅”的抵制洋货运动所助长的）愿意归并于福公司（英资）；中国纱布交易所可以开拍日纱；而火柴业的民族工业，也可以和日本资本合作，办理全国火柴联营社。买办性的民族资本，是要牺牲民族资本的独立自主的发展前途，甘充列强资本的附庸的。第二，民族工业的半封建性。官僚资本和地主资本（两者都是封建的超经济剥削的原始蓄积）是民族资本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他们既不敢牺牲其封建剥削的经济利益，实行土地革命以扫荡一切封建残余势力，同时对那用不平等税制，减低关税，经济割据，苛捐杂税等桎梏来妨碍自己发展的政治组织，也不敢提出半句抗议，实行一点改革。第三，民族工业的借贷资本性。中国任何企业组织，都以获取非企业利润性的利息为最低目标。不管企业的盈亏如何，也得支付固定的高额官利；企业有盈余时，则以红利形式，几乎完全分光。所以，民族工业的企业精神是丧失了，资本积累不可能，生产能力改造不可能，企业内部机构的陈旧腐败，使它丧失和外资竞争的能力。转而造成向银行高利借贷，形成债务经营的饮鸩止渴的局面，如华商纱厂的利息负担几乎占到生产成本的1/3，而一般华资煤矿，逐年来都有产量减少，利息增支的情形。结果往往是借用外债，或者是受外商管辖兼并。汉冶萍的例子是太旧了，裕元、北洋、华新等纱厂的拍卖，倒是眼前的好例子呀！

虽然先天不足，假使后天比较有利，民族工业未始没有转好的前途。不幸它的外在矛盾又是这样严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在1890年以后，特别是在1914年以后。这个时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走上垄断帝国主义的时代。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对于民族工业的打击，已如上述；而殖民地的分割运动，更直接威胁

到它的存在。其次，国内一切半封建因素的桎梏，如像不断内战，市场割据，农村的封建剥削，苛捐杂税；交通缺乏和运费高昂等，都使稚弱的民族工业，处境分外困难。

这许多内外矛盾，造成民族工业半壁江山，气息奄奄的局面。我们在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在矿业中占第一位的是铁矿。中国每年用新法开采的铁砂200万吨左右，除了110余万吨是完全日本资本而在东北之外；民族资本年产80—90万吨，大冶约38万吨，象鼻山约7万余吨，繁昌约28万吨，当涂约20万吨。但他们所借的日债，差不多多过于资本，每年得强制输出全部铁砂给日本。第二是采煤。中国本部年产煤仅2100万吨，而有外资关系的各大矿竟占40%，华资各大矿仅占28%，小矿占33%，这更表示出华资煤业生产力的低下。中国本部每人每年煤消费量仅0.049吨，与英国的3.9吨相较，固有天渊之别，连跟意大利的0.2，日本的0.55，也相距十倍。至于石油采掘量，中国本部每年仅2000余桶，锰、钨、锌等军需原料的采掘，更是用原始的手工业生产了。

在冶金工业中，民族资本更衰颓得可怜。民族资本的龙烟公司、汉冶萍公司、宏豫公司、和兴钢铁厂，早已停止产铁，仅有谏家矾、六河沟公司年产1.7万吨（1934年）左右，保晋公司年产3600吨左右。至于有炼钢设备的汉冶萍公司、和兴厂等早已停产，仅山西商才钢厂及各兵工厂稍有出产，每年不过1000吨。所以中国每年要从外国输入60万吨的钢铁。换句话说，我国最重要的钢铁生产，完全是依赖外国的。此外锑砂产量占世界70%左右，钨砂产量占世界42%，但这些都是手工业生产，中国并没有一家有近代设备的炼钨、炼锑的工厂。这样看来中国民族工业，对于有色金属工业，几乎还在原始时代，然而“友邦”侵略中国的战争，已经进入机械化时代了。

和采矿业冶金业有密切关系的是机器工业，然而，直到现在为止，我国整个机械需要，都是仰赖外货的，以1935年计，输入机械共值约7 000万元。主要都是电力机、动力机、纺织机，包括列强资本的投资作用在内（如日本纱厂之扩充，庚款退还部分之工程建设），然而这些都不是“机械之机械”，和重工业建设没有多大关系。全国有机器厂560余家，然而资本数量不过600余万元；规模最大者不过50万元，普通都是数千元到二、三万元的，所以多以修理及制造零件为主。交通工业更是如此，一切机车车辆，都仰赖输入，各铁路机器厂只能修理和装配。造船业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但是它的前途依旧十分暗淡，除了江南造船厂和马尾船政局稍有政府生意之外，其他都只能造小汽船或修理机件。这是因为中国航业生命完全被控制在英日各国手里的缘故。化学工业还在萌芽时代，10万元以上资本的制盐厂，只有5家；制酸厂12家，仅有两家资本是在100万元以上的。酒精业虽则只有五、六年的历史，成绩倒比较可观。

半殖民地殖民地工业的一般特征，本来是生产手段生产部门的微弱不振，民族资本在轻工业方面，总比较占着一些优势。那末中国民族资本在轻工业方面的情形怎样呢？纺织业是民族资本的骄子，然而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日英资本在这里也有决定的势力。自1819年至1935年，日商纱锭增加七倍，而华商纱锭只增加了三倍，同时期华商布机只增加三倍强，而日商布机增加到二十倍强。近三、四年来，民族资本在这里已经危局难支；以1933年和1936年相较，华商纱锭从57.19%减到56.85%，线锭从33.25%减到32.53%，布机从48.23%减低到47.95%。1937年的情形更恶化，因为日本以天津、青岛为中心，大大地扩充了纺织业。

缫丝业更是不堪回首话当年。以上海为例，三十年前的1909年已有厂35家，丝车11 085部，到了1935年，厂数反减少到只有

33家，车数仅7 690部；距1930年最盛时厂数107家，车数25 395部，更减少得可怜。

火柴业曾盛极一时，但现在是托庇于日人势力，以求苟安。卷烟业中，民族资本的生产品价值，不能超过总生产品价值40%。精盐业受财政部严格限制，不能畅快发展，仅面粉业里，民族资本有比较完整的壁垒。

上面所说的是中国民族工业残破的阵营，这残破阵营，外受列强资本的侵略，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内半封建势力的摧残，内因本身矛盾的存在，究竟能维持到如何地步呢？

四、民族危机与民族工业

无疑的，民族工业假使不能克服其内外矛盾，争取其独立自主的发展，那末它的前途是暗淡的。

自从1932年中国的经济恐慌爆发后，整个民族工业的命运，本来已经危如累卵。列强资本一天天增大，民族工业到处没落碰壁。然而在目前，国土的沦陷，民族危机的迫切，使这残破阵营，更是危在旦夕。“友邦”的当前要求是“农业中国，工业日本”，那末民族工业何以自处呢？在中国，1932年起的经济危机，包含着这种特殊的性质，即民族危机是和民族工业的命运，完全关联在一起的。

第一，自然资源的丧失。东北的失陷，使民族资本丧失巨量的重工业的自然资源，计73%的铁藏量，48%的石油藏量，64%的矾石，100%的菱镁矿（均为全国计算）。在目下华北政权处于“半满洲国”式的当儿，我们的自然资源虽然名义上还没有直接丧失，但实际上已是“友邦”经济开发的对象。华北五省（绥察冀晋鲁）的自然富源，计有：全国煤藏量54.5%（为日本之十

六倍），铁藏量15%，棉花42%，小麦26%。自然资源的损失，特别是煤铁等重工业资源的丧失殆尽，一方面是增强敌人侵略和进攻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使民族资本丧失独立发展的前途，使生产手段生产的工业，无从发展。

第二，国民经济生产力的丧失。随着土地的沦亡，附着在这些土地上面的工业企业，也都被敌人所掠夺。在东北，民族资本所组织的企业，全部被没收被充公被封闭了，没有一家能幸免的。帝国主义者可以允许你做官僚做豪绅，却不答应你掌握工业生产经济命脉。这就是亡国之痛。就民族的立场说，这种生产力的丧失，在某种程度内比自然资源的丧失更为严重。东北的煤产量占全国30%，铁砂产量占46%，生铁占70%，石油占99%（以1932年为标准）。这里总生铁数（100）是连中国本部土法生产的也都包括在内的，否则东北所占的比重还要大。生产力的丧失，对于国力的损失是难于计算的。

第三，兼并收买和强占。这是目前民族工业没落的悲惨的景象。柳江煤矿被关东军（这是“友军”！）强占了去，裕元、华新、裕大等纱厂，被日本强迫收买，使天津的华商纱业，一扫而空；在“友邦”的资本和军力之大，华北正在奖励植棉，全国火柴业亦在被日本所劫持。外如走私对于民族工业的打击，日本资本在华中、华南的跋扈，在在都告诉我们，假使再不保卫华北的话，再不奋起抗战的话，昨日民族工业在东北的劫运，便是今日中国民族工业的归宿。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包罗万象的，是伟大的；但不如敌人所进行的“农业中国”来得有力，也不如“华北资源开发”来得实际。为了替中国工业留下一点点生路，为了民族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一切民族资本家应当起来抗争，一切同胞应该为收复及保障工业资源，为保护民族工业而战。

（原载《中国经济问题讲话》，新知书店1937年6月初版）

列强对华投资问题

——“利用外资”乎？“资本侵略”乎？

我国近十年来，特别是在签订塘沽协定，偏安局面粗定以后，列强对华投资问题，便充分热烈地讨论起来。英美要通过国联对华技术合作来对中国的半壁江山，进行资本的洗礼；日本却断然表示拒绝（《天羽声明》），而自己单刀直入地和中国“亲善”，于是乎有中日经济提携（1935年），华北经济开发（1938年），以至于有“经济外交”下的两项合作（1937年）等主张提了出来。人家对于我们，既然“寤寐求之”地这样热烈多情，在我们中国，便应该有许多热烈的反应才对。所以有人主张在“利用外资”的大纛下面，不论英、美、德、日，一概欢迎；另外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侵略”，统统关门拒绝。究竟应当怎样，这就需要我们来研究列强的对华投资问题了。

我们为了易于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有研究一下列强对华投资的本质和历史的必要。

一、列强对华投资简史

一般而论，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关系，是推销商品，独占原料和输出资本，列强之对于中国，当然也不外乎

此。自从鸦片战争（1842年）失败以后，我们闭关自守的大门被打破了，英法等国在我国沿海的贸易便迅速发展起来，租界逐渐推广到全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逐渐落到外人手里，洋行制度也深入内地而确立了输出入独占的基础。直到1895年为止，外国资本虽则在我国有小规模的零星的产业投资，不过他的主要活动的倾向，是在推销商品和购买原料；此外如建立租界，开发沿海及内地交通，和布置洋行制度等，目的也只在于促进对华贸易而已。但是，从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情形便大大不同了，列强在华开始了强烈的资本战，划分势力范围的运动，便极度猛烈起来，甚至要瓜分中国。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列强对于我国的关系，从输出商品的贸易关系，进到输出资本的统治关系了。为什么原因呢？这是在于（一）从1885年起，世界资本主义进化到帝国主义的阶段，竭力要输入资本到落后国家，来获取超额利润；为了保护投资所在地的资本的安全，需要在当地获取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权，划定资本活动的势力范围。（二）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以后，皇帝地主所领导的独立自主运动，既然失败，从军事工业的移植，转而进到一般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输入运动，也就完全绝望（在当时的统治阶层是如此看法的）。于是，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是更加便当了。2亿两战费的赔偿，使媚外的清政府完全倒在外资的怀里（当时借的法俄借款和两次英德借款中，有70%，约合英金185 300千元，是在伦敦偿付作日本的赔款）。因此，外资的侵入中国就往往运用政治借款和铁道借款等形式，换得了许多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奠定了外资统治中国的基础。（三）在中日战争以后，《马关条约》容许日本有在中国内地设厂的权利，此例一开，便马上给各国引用最惠国条约的规定，作为列强所共有的权利。这样，外资便可自由地侵入了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垄断重工业的部门，如煤铁），而得充

分地利用我国廉价的原料和剥削廉价的劳动力；这一面替中国树立了近代化的基础，却同时也替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前途，钉上了重重的镣铐。

到1931年为止，列强资本已经在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建筑起森严的吸血的宫殿，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都呻吟在它的巍然的宝座之下。中国20余年来之陷于内战，灾荒和贫困之中，主要也就是受了这个列强资本统治的恩赐。（中国的封建势力当然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是列强资本在我国各经济部门的投资数额和发展倾向*：

项 目	1914年		1931年	
	百万美元	%	百万美元	%
政治借款	630.3	20.5	127.7	13.2
运 输	531.1	33.0	346.3	26.1
邮电及公共事业	26.6	1.7	128.7	4.0
矿 业	59.1	3.7	2.9	4.0
工 业	110.6	6.9	376.3	11.6
金 融 业	6.3	0.4	214.7	6.6
地 产	105.5	6.5	339.2	10.5
输 出 入	142.6	8.8	483.7	14.9
杂 类	298.2	18.5	282.8	8.7

* 引自雷麦：《列强在华投资》

分别的说来，政治借款大多是赔款，其次是军政费，都是用来进行内战，消灭异己的（如像1913年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这些借款，不仅是非生产的，完全是在吸取中国人民的膏血，而且还因此而丧失了海关权和盐税管理权等权益，直接贻祸于独立自主国家的生存。政治借款的数额，虽则比例上是减少了，但绝对额竟增加了72%。至于以铁路交通等名目借入，而实际充作军政费用的，尚未计算在内。

投资中数额顶大的是运输事业，主要集中于航业和铁道，这不仅是列强藉此来开拓中国市场，而且是为的要靠它来确立势力范围，便于军事统治，这就是帝国主义初期经营殖民地的重要手段。其中属于航业的，几乎全部是直接投资，压迫得华商航业永远翻不转身来。属于铁道的，凡是外资直接建筑管理，和借有外资的路线，共计11 780.99公里几占全国铁路的90%以上。^①这种喧宾夺主的情形，岂不是一幅神情毕现的写照？

邮电公共事业的投资在二十年间，增加了一倍多，全国60%的电力，都被控制在外商手里。矿业方面，主要集中于煤铁两项：煤生产的60%左右，铁生产的95%，都由外人直接投资或借款经营。它们的目的只在掠夺重工业原料，竭力避免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重工业。在轻工业方面，则集中于纺织烟草诸业，使民族工业岌岌乎难保苟安的地位。

外资在金融业方面的发展最足惊人；以近二十年而论，外资增加了三十四倍以上，上海外滩一带，汇丰沙逊的巨厦雄姿，便是威临中国金融货币市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象征。至于地产投资也增加得很快，它和金融业有不可分的联系，它也是使中国通商口岸繁荣，使当地中国人民没有立足安身之地的原因。以上海中区的地价而论，每亩从1903年的13 549两飞涨到1933年的132 451两，约增加十倍，都成了外国地产商人荷包中的利润！

至于输出入方面的直接投资，据刘大钧先生1928年统计，美国在华的进出口商有129家，日本有100家，英法两国也不在少数。这许多输出入公司，凭藉着历史上的优势，成为推销商品吸收原料的大机关，垄断了中国的国际贸易。直到现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还要透过这些输出入公司的媒介才得发生。每年10亿元以上国际贸易的商业利润，固然是一笔极大数目，并且因之而垄断了我国国内外航业的运输费用，其数目也大足惊人。

上面历史的叙述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数十年来中国和外资所发生的关系，我们完全被“资本”所侵略了，就是“利用外资”来开发中国，恐怕谁也不会相信吧？

二、各国对华投资的阵容

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列强在华资本势力的发展，也同样是各有轩轻。大概说来，1914年以前，英国资本在中国占着“惟我独尊”的地位，奠下了在华经济势力之坚实的基础。1914年以后，特别是在大战期内，日本资本在中国发展的迅速，也实在是空前的，日本占领中国领土的野心，就此随着这一时期投资的发展而成熟了。大战以后美资在中国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日美资本在华的发展，在外表虽同样是采取跃进的方式，但前者是以东三省为投资的重心，采取露骨的经营殖民地的姿态，后者却没有特殊地带可资依附，只能单纯地偏重于利润的追求。至于德国资本在大战刚刚结束以后，几乎完全覆没了。根据雷麦氏的统计，到1931年为止，列强在华投资的消长趋向如下表。

现在我们就把在中国最重要的三个投资国家即英日美来逐一加以说明。

英国在华的资本势力，到现在，的确不能像20世纪初期那样，占着绝对支配的地位，可是它的力量，却还大有左右操纵的可能。它在金融方面的势力，实在高人一等，以汇丰银行为中心，还有麦加利、有利、大英三银行和中英银公司、福公司两个投资新迪加在环绕着。在过去，它曾用政治借款的方式，操纵了北京政府的生命，替英帝国获取不少的特权。1914年，中国有42%的政治借款是英国供给的。目下这许多英商银行还是中国官

单位：百万美金

国 别	1902		1914		1931	
	投资额	%	投资额	%	投资额	%
英	20.3	33.0	607.6	37.7	1189.2	36.7
日	1.0	0.1	219.5	13.6	1136.9	35.1
俄	246.5	31.3	29.3	16.7	273.2	8.4
美	19.7	2.5	49.3	3.1	196.8	6.1
法	91.1	11.6	171.4	10.7	192.4	5.9
德	164.3	20.9	263.6	16.4	87.0	2.7
意	—	—	—	—	46.4	1.4
其 他	5.0	0.6	29.5	1.8	120.6	3.7
总 计	87.9	100.00	1610.3	100.0	3242.5	100.0

僚“血腥钱”的避难所，它们拥有巨额的存款，足以控制中国的金融贸易等市场而有余。在交通方面，英国资本也是有特别巨大的势力。在已成铁路之中，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借有英国资本的，有平沈、平汉、津浦、京沪、沪杭甬、广九、粤汉等路线。总计在这方面未偿还的债款，还有144 958 959元（1935年底）。在海运方面，现在虽已有日本来作为它的劲敌，但是太古、怡和的力量，还足以维持而不堕。在产业方面，英国资本主要是集中在煤矿和卷烟工业。前者如河北的开滦、河南的中原，都是中国本部数一数二的大矿，后者如英美烟草公司，它有2.5亿元的资本，不但垄断了全国的烟叶原料，而且，它的产品竟占全中国产量40%左右。至于在纺织业方面，怡和纺织公司本来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大战以后，它与日商的飞跃突进相形之下，却未免过于“见绌”了。

除开英国，日本在华投资的质量，确已远过于其它列强，而它的跃进速度，更非老大的英国所可比拟。30年来，日本投资的

实数，增加了一千多倍。它在列强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增加了三百五十倍。日资在华的发展，如入无人之境的情形，这里就可看得非常明白。在列强对华的借款方面，除英国外，以日本所占数额为最大，共计46 300余万日元。日本屡次以清理债务来威胁我国政府，要求为这些旧债提供确实的担保，换成新债来作为新侵略的一笔大资本。它在中国的金融机关，有横滨正金、台湾、朝鲜、日本兴业、三井、三菱、住友、正隆等银行，还有专门在殖民地半殖民活动的银团，像东洋拓殖、东亚兴业、中日实业、南满会社等，更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在交通部门，铁路投资的实数，到后来已经超过英国，1935年止，未偿还额尚达264, 788, 616元，也比英国多些。至于航业，它虽只有30年的历史，而日清、大连诸汽船会社的势力，几已到了与太古、怡和并驾齐驱的地步。在产业部门，铁矿几乎完全在日资手里，连大冶、繁昌的铁矿，都由于日本的债权，束缚得不能动弹；它在煤业方面的投资数量也很大。在纺织业方面则更加不消说得，它有极大的势力，（1931年时，日厂纱锭已占我国总锭数41%，东北计算在内），此外甚至在水泥、卷烟、火柴、电气诸业，日资的活动也几乎无孔不入。日本对华的投资区域特别集中在东北。日俄战后，我国自动地替日本资本在东北开了一个方便之门，成为它的活动的乐园。此外如象青岛、天津、上海、厦门，乃是它在关内势力的重心。

美国对华的投资数额，30年间增加了10倍，这除日本以外，是没有一国可以比得上的。不过，因为它在历史上参加对华投资的时间比其他国家落在后面，所以美资的活动，偏重于贸易的经营，在借款上数量是很少的（1931年仅美金3 600余万元）。它在铁道航运方面可以说没有什么势力（远洋航行在外），但是近年来在新兴的航空事业和公路建筑方面的活动，它是十分有力的。

此外如电气事业（上海电力公司，电话公司），则摩尔根财团的势力，是不能忽视的。至于它在一切文化、教育、公益事业方面的投资，那是更值得我们的注意。

三、日本投资势力的跃进

从1931年之后到现在，列强对华投资的阵容，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动。这一种变动，足以使中国在某一国的资本控制下沦为殖民地，因之也可能改变了中国对于其他各国投资的关系和观念。当然在这里，这一次空前持久的世界经济恐慌有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确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强占东北和不断的侵略中国。

（一）五年以来，日本在华的资本势力，是无可比拟地急剧的增加了。1.在东北，一切经济部门，已经完全为日资所控制。五年之内，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增加了11.2亿余元，而俄、英、美、法诸国原有投资7亿元日金，现在只好陆续撤回，我国在东北的民族资本，则大多数已被没收。2.在关内，经过《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乃至《华北经济协定》的订立，日资势力也有突飞的增长，据不很可靠的估计，1931年以来，日本对华的新投资，在华北共达7.33亿元，华南共达3.93亿元（1935年3月31日天津《益世报》）。这个数目虽然不免稍嫌过大，却也可以想见日资激增的一般程度，例如在华北，仅仅棉纺织业一项，日本新投入资本已有1亿日金，其他如可以作为华北的满铁会社的——兴中公司，已于1936年初成立，天津电业、海河运输、耀华玻璃、惠通航空等公司都已陆续建立，而龙烟铁矿、津石铁路、塘沽筑港，以及化学、卷烟、面粉、毛织业等，也都已在日资的计划筹措之中。此外如开滦煤矿，启新水泥，久大制碱，华新纺纱等华

北大企业，也都已在日资势力范围之内；甚至像柳江煤矿，竟被关东军用武力强占去了，长城煤矿，也被榆关日本特务机关，强迫改为中日合办，加入东洋拓殖会社的资本，而劫去经营的实力。所以，日本资本的如此急剧地从东北而向华北跃进，大有囊括华北五省的雄图。3.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全中国民众抗日浪潮的高涨，日本资本向华中华南的扩张，确会受到相当的牵制，而未能像在华北那样顺利的进展，（这里，英资原有势力的强固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一方面因为我们对于日本的疯狂侵略，还没有给以积极的有效制止，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所提倡的中日经济提携，却曾发生了相当大的烟幕作用，所以日本资本的在华势力，整个说来，还是超过“九·一八”事变以前的。例如在中国本部的对外贸易中，日本所占的地位一天天的增长，日本在华航业的发展，大有压倒太古、怡和的趋势，日商纺织业已经占到我国纱锭总数45%，而且正在以上海、福建为中心，企图猛烈地向华中和华南伸展。所有这些，都已经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何况，自从儿玉等日本经济考察团来华以后，所谓金融合作和棉业合作等，还正在开始切实进行中呢！

（二）由于日本对华投资的这样突飞猛进，英美看了自然是不肯示弱的。不过直到现在为止，英国所显身手还没有超过纯粹的防御战。反之，全般的说，它的势力是继续地在衰颓中。它在列强对华贸易中所占的地位，是一年年地在低落，甚至于落到第四位，而被德国赶过了。它对华北的投资已经陷于一蹶不振的状态，而日资的势力却依然在积极南进，侵入长江流域。为了挽回它的颓势起见，英国曾经企图透过国联技术合作，透过建设银公司，联合美、法、比、意对中国来一次巨额的投资。可是这种企图却给日本武力恐吓住了。英国也曾经单独向日本求取妥协，共同对华投资，但是罗斯两次到东京劝诱都失败了。于是英国

一方面运用它绝对优越的金融势力，援助中国新货币制度的实施，把中国货币拉到英镑集团里去，以便巩固它在中国金融市场的霸权；另一方面倾全力于长江以南的铁道事业（透过退还庚款，建设银公司等方式），援助广东的经济建设（如自来水借款电气借款等）而积极从事开发海南岛，作为新加坡和香港的中间站。至于英国出口信用放款驻华代表柏克利特的来华，准备1 000万镑的对华信用贷款，更可以见得老大帝国的对华投资，正在如何积极地企图挽回它的颓势。

（三）“九·一八”事变以后，美国在华的资本势力有很大的进展。例如在列强的对华贸易中，它已升居第一位，在航空事业和公路方面，它的活动也极敏捷（尤以是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以后）。最可注意的是，1931年和1933年，美国曾经两次贷给中国政府约计9 000万元的借款，1936年白银协定上还有透支的规定。此外，美国在中国金融货币市场上的活动力量，也比过去大大地增加了。新货币制度就是在英美各保相当的均势底下维持着的。

（四）我们必须指出五年来德国在华的资本活动。到1931年为止，德国在华的投资数量，比起大战以前的水准，虽然还相去甚远（1914年共划26 360万美金，1931年仅8 700万美金），但从“九·一八”以来，它的对华投资却已呈现出非常活跃的姿态来。一方面它和日本携手合作，关于这，许柏氏（M.C.Shippe）在《论德日联盟与中国》的一文中，说得很详尽。根据1937年4月16日《华美晚报》所载汤钧先生的译文，我们可以知道：一方面，德国对华的贷款，第一次是建筑玉萍路的大借款，第二次是最近建筑湘黔路的4 000万马克大借款，这“都是德日合作联盟中所规定的。所以，德国在中国中部及西南部铁道建设上的投资，含有特别的政治作用”，是在“减弱英国抵抗日本的力

量”。同时另一方面，德国和日本的携手合作，不但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德日防共协定的订立，便是个标准的例证），即在经济上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德国与伪满所订立的《商务协定》，不但谁都不能否认它是德国变相地承认伪满的一种表现，而且在实际上它的确已经允许给与德国在伪满的特殊的通商权利了。此外在中国对外贸易上，德国所占地位已经超越了英国，特别是中国由德国输入的重工业品急速地增加，更给与英美重工业品在华的销路以很大的影响。所以，德国对华投资的活跃，无疑是会引起它和英美资本特别是英资的尖锐冲突的。

至于法国，自从大战以后，无论商业或投资的活动，都不很积极。苏联更是完全改变了帝俄时代的政策，尤其是从1934年中东铁路让渡以后，它在过去所投的资金大部分都已收回，资本力量已经小到不足言了。

四、结 论

总括说来，在华投资的各国现在已经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日德，另一边是英美。日本在华的投资目的，已经不仅是利润的追求而是领土的占领。投资的发展，每每特别集中在一个地域，这保证它有可能占领当地，而且有占领的需要。日本在华的投资部门，多少带着军事性，因此，日本对华投资的积极展开，实际就构成了军事侵略的第一步；它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对东北的投资，固然是如此，即在目前开发华北经济的目的，何尝不是如此？而且，日本所投资本，不仅直接与中国民族工业的利害相冲突，它的目的，确还在消灭这些民族工业；中国的铁工业和棉纺工业，便是非常好的例子。德国虽则条件不如日本，但是它对华的投资路线，目下是积极地和日本相提携，并且

企图促进中国和日本妥协来分一杯羹的。所以在日本没有把我们的失地交还以前，我们绝对不能存着“利用日资”的观念，否则我们就会被敌人束缚得紧紧的不能动弹，坐待宣判最后的死刑。

另一方面，英美对华的投资关系，目下主要还是在追求超额利润；为了确保它们在华的资本市场，势必和日本对立，因之英美有运用它们在华资本的力量，来阻止日本继续进攻中国的可能。当然，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决不会超过它们自己的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反之，在中国以最有效的手段从事自卫战的时候，它们是希望中日之间和平妥协的，这在英国表示得比较明显。但无论怎样，英美和日德资本在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对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所以，在目下，对于列强在华的投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学上的问题，不能抽象地予以一般的论断。我们一面要坚决反对列强资本所给予我们的束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得充分运用5年来列强对华投资的新的情势。换句话说，中国利用外资的问题，首先应当以投资国的目的是否有领土野心为标准。因之凡是有助于我们，有助于打击某一最有野心的投资国家，就不妨在某种限度内欢迎外资，而利用外资。这种欢迎的限度，自然以抗日为最高原则。超过这个原则所允许的限度，自然是不能许可的。

（原载《中国经济问题讲话》。新知书店1937年
6月初版）

① 关内铁路包括广九路（143.3公里），北宁路（465.8公里），京沪路（391.5公里），沪杭甬（286.7公里），道清（165.44公里），津浦（1103.0公里），平汉（1434.6公里），滇越（470.0公里），正太（278.2公里），胶济（453.3公里），粤汉（1241.4公里），陇海（1103.0公里），南浔（128.3公里），浙赣南玉段（665.0公里），同蒲（396.0公里）。关外只计算奉山（419.6公里），中东（1721.0公里），南满（814.8公里）三线，其他都略去了。

中国财政问题

一、什么是财政

在我们中国，大家对于财政问题是不大关心的，以为这只是“主共政”“在其位”者的问题。譬如在清代，做户部尚书的，只是替皇帝筹钱，以满足皇帝和皇室的挥霍奢侈。到了民国时代，做财政部长的，也只知道如何借外债，发公债，在银行里押得动款子，想得出加税的新花样，总之有办法来“开源”，供军阀们养兵内战，就算得上好部长，而且还可以“立致巨富”呢。至于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力求国家支出的合理，强固国家的财政基础，发展民族的经济力量，那是主管财政的人所很少想到的。这样处理财政，就是根本不曾明瞭财政的社会意义，这样的财政，必然会贻害国家和人民的。崔敬伯教授说得顶好：“从来言财政者，多认为是国家的财政学，而忘掉是人民的财政学；甚至仅认为是替统治者筹款管钱的技术问题，而忘掉是替大多数民众图谋幸福的主要工具。那样的财政，仅是聚敛的别名；那样的财政，仅是暴君的工具！”不过，说来也真可怜，崔教授所痛斥严正的财政观念，在中国一些人头脑里，倒反是“天经地义”，视为理所当然的呢！

自然，根本说来，在怎么样的社会，便有怎么样的财政。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既然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大众的工具，所谓

财政，也不过是资产阶级透过国家的机构，向人民搜刮了来维持统治人另的机关（国家）而已。就像英美那样，国家财政顶修明顶合理（就对资本主义各国家而言）的国家，其一小部分间接税的收入，固然是取之于人民大众，就是一大部分直接税的所得，名义上尽管是征收资产阶级的利润所得，要他们从荷包里挖出一点，但归根结蒂，还不是出之于作为剩余价值的劳工们的血汗？至于其他收入如像公债，政府还是要从赋税上面来偿还的，结果不仅是人民大众出钱，资产阶级在买卖公债时还可赚一大笔钱呢。可是这样收来的钱，只有极少一部分是用来办理社会公益事业，如像社会保险，失业津贴之类，最大多数倒用来维持庞大的军备，去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替资本家找商品的市场和资本的出路，乃至养着警察来镇压罢工，养着法官来保护自己。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顶顶开明的财政，实际也不过是把一国国民的财富收入，重新来分配一下，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工具罢了。

上面一段话，是说明现社会财政问题的主要本质和阶级性。不过在这里，并不是叫我们丢开许多具体的阶段，来高高在上地空谈财政本质的。就是在私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以资本主义为标准，财政的优良与否，合理与否，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大众的利益，还是有极大关系，需要极大改进的。譬如说，一国财政的收入，假使主要依靠于海关的进口税，那就会不敢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来阻遏洋货输入以保护本国工业，结果是使本国工业不能发展。又如只管增加工业税（统税之类），或是税制施行的不良（如像中国的二级税制），便会直接摧残民族工业的萌芽。至于偏重间接税而忽略直接税，那就会使本来穷困的人民负担更重，一般人民的购买力将愈益低落，而社会的不安也将更形严重。在支出方面，假使只在提供少数野心家的挥霍，招兵买

马，从事内战，而忽视了生产上教育上国防上的合理支出，那末结果是使国家内乱不息，生产永不发展，而亡国之祸，就会接踵而至了。自然，我们应该知道：一国的财政状况，是由当时该国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我们却更不应忽视：财政对于当时政治经济状况，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财政的改良和合理化，是有可能促进国民经济相对的发展，消除政治不安的因子，减轻人民大众的负担的（如易间接税为直接税）。而这种财政问题的解决，是可能在不变革现社会机构的范围之内完成的。它虽不能消除私有社会中财政问题的根本矛盾，却可能使矛盾的解决，向前接近一步。

上面是说明财政问题的本质意义，和相对的作用。了解了它的本质，我们就不致被许多巧妙的理论所欺骗；认清了它的相对的作用，我们才会毫不放过一切变革它的机会。

二、现在中国的财政是怎样的

说到中国的财政问题，本来应该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方面。在清代，一切收入都是皇帝的，所以也无所谓中央与地方之分。民国以来，到1936年为止，中央财政所编制的正式预算，不过几次。这种预算有几多效用，有多少人来尊重它，甚至到现在还是疑问。各省政府之编造预算的，亦不过十次，省份既不普遍，根据预算实行的当然更少。在1928年以前，军阀实行割据，截留税收，使中央和地方财政，混乱到了极点，根本无从分别。这种情形，部分的甚至到现在还继续着。不过，从大体上说来，中央财政是一国财政的主体，一国财政机能的特殊性和病态倾向，主要地可以在中央财政上反映出来；而地方财政的种种特殊情形，决不会和中央财政毫无关联的。所以我们在本文所要研究

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中央财政。

远的不去说它，我们就拿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的中央财政来说。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找到下列几个主要现象。

（一）中央财政的极度膨胀。我们假定把1927年的预算额作为100，那末1936年的预算便激增至656，即使以1928年的作为100，1936年的也还增至227了。中央财政膨胀率的这样巨大，是很少见到的。本来，一国的财政，应该是该国国民经济状况如实的反映，国民经济向前发展，一国财政便向前膨胀（同时也是改善）。我们从中国的国际贸易来观察，假定1927年的输出入总额为100，那末1936年即减为89，其中出口贸易甚至已从100减为77。假定从全国农产物总输出值来观察，以1930年为100，那末1936年为首十个月是72.04，（同时期财政指数从100增到138.93）；假定再就工业总生产而言（包括在华外厂的发展），1932年是99.5，到1936年前六个月是95.41，而同时期财政指数则从100增到147.47。所有这些统计可以具体地说明：中国近年来的国民经济是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正在一天天地趋于崩溃；因之也证明十年来的财政膨胀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是非生产的过大的膨胀。这种膨胀必然会反转来，给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极不良的影响。

（二）支出膨胀的破坏性。形成财政预算极度膨胀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能节流，换句话说，即由于支出的过度膨胀。而且岁出二倍以上的膨胀，（以1928年为100）其内容又是非生产的，破坏性的。例如1928年时，军务费共计21 000万，到1936年即增至32 700万元；但它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51%减至32.2%。就是以1936年表面的预算而论，占32.2%的军费支出，还是不能说少的。何况这里还有双重的欺骗：第一，预算上的军费数字，是很不可靠的，实际上该项支出，每年要超出预算非常之多；

1936年只是购械费一项，预算仅1 200万，决算时即增至6 220余万，（尚有几笔军火不计算在内），已经超出了五倍。第二，预算上的每一项目，并不能完全代表某项目的支出。例如实际上政务费一项就包括不少军务费的帐在内，又如1935年以后教育文化费中有一大笔是军事教育费，建设费中也有一部分纯粹是军事性的建设，抚恤费的增加，完全是内战中官兵死亡增加的表示，特别是异常庞大的补助费（1936年为10 519.5万元），最大部分便是把某一地方的国税收入，用补助费的名义半强迫地拨给当地军阀去扩充军备，因之完全是军费支出。所以把这二者都加起来计算，十年来的军费支出在岁出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至少是会维持着它原有地位的；而其绝对数额可怕的增长（远较预算上为大），乃是整个财政膨胀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耗尽国家脂膏的军务费用，除了极小部分用于国防的军事而外，其余主要部份是内战的资本！

说到支出膨胀的破坏性，债务费是忘不了的。债务费的支出实数，1928年是15 900万元，1936年预算增至23 900万元，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从38.5%，减至23.5%。无论从实支的增多来说，或从它所占的成数上来说，中国岁出中的债务费无疑是异常庞大的负担。然而实际的危机还不仅如此，1932年和1936年两次国内公债的大整理，都把公债还本日期延长了。例如单就统一公债的整理而言，财部债务费支出每年可省7 200万元；所以，中国实际所负的债务，应比预算上大得多，现在不过把一部分负担延迟到后几年去偿还罢了，将来还不是由国民出钱吗？

至于政务费方面，照预算上看来，十年中都有飞跃的增加，从6%增加到41.9%，计加七倍。不过上面已经说过，1935年以后，许多军费都转加到政务费里去，所以，政务费实际的增加决没有这么大，这是可以断言的。从政务费本身而言，教育文化

费、实业费、建设费的增加，当然是好的现象（虽然其中有许多是假的），不过像外交费那样，简直毫无增加，若以1933年到1936年比较起来，反而一直是减少的；弄得驻外使领枵腹从公，情报宣传，都无从做起，外交的阵线，可说是残弱不堪了。又像占政务费支出1/5的财务费，即以1933年和1936年相较，计增加13倍之多，其扶摇直上的姿态，大足“雄视同侪”。然而十年之间，财政税收，不过增加2倍有余，那末13倍财务费的支出当然有极大的浪费！这种浪费，像内务费等，都是不免有的现象。所以，即使政务费是实际增加了，假使这种增加大部分是由于浪费，那末也显然不是财政上的好现象。

（三）双重不合理的国税收入为了适应膨大的支出，收入也非膨大不可，其开源办法之一，便是增加税收。本来，一国税收的增加，要以国家经济的发展为前提，才是正常而合理的现象。但在我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是关、盐、统三税，1927年时共计3 200万元占总收入的21.1%，1936年预算79 000万元，占总收入的72.8%，十年来共计增加25倍。这三种税都是间接税，这三种税的实际负担，结果全部落到平民大众身上。间接税在国税收入上占着这样大的比例，是各国所没有的；间接税以这样大的速率增加起来，十年之间平民大众的负担增加25倍之多，更是任何国家所没有的。这是国税收入第一种不合理的现象。

其次就这三种税而论，1936年的关税收入占总预算的31.3%（最高是1931年度，占54.2%），其中进口税经常占着85—90%的地位，换句话说，中国财政的来源，主要是靠着洋货输入的。所以自从1928年关税税率改变之后，曾经三度的修订，这在表面上，似乎是关税已经自主了，其实却始终没有跳出财政关税的窠臼。因此，以保护国内工商业为原则的保护关税政策，也始终未能实现。这种不合理的实际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盐税是众所公认的恶税，因为它几乎完全是小民们的膏血。然而十年之间，盐税收入，竟增加了3倍，在盐税的五次整理和改订中，都是为了加税。1937年4月每担盐税普加建设捐1元，和新盐法中将纳税单位每公斤修改为市斤，法律上增加盐税一倍，还不算进在内。所以东北失陷后所损失的每年1000余万元的盐税，年来不但已由关内同胞来负担，而且大有超过之势了。盐税加征的结果，弄得华北各处人民争吃有毒的硝盐，曾经引起了几次大规模的死人惨剧。

至于统税的不良，更是直接摧残民族工业的一种力量。一是增加税率，二是改变税级，前者增加民族工业的负担，后者便于在华外厂的发展。十年之间，除1933年和1936年两年外，年年都有加税的新的花样。所以自从1930年创办统税起，七年之间，预算收入已经增加五倍。而这七年，却正是民族工业遭逢大恐慌的艰苦年头。这是国税收入第二种不合理的方面。

(四) 财政对于金融资本依赖性的增加。由于间接税的一再增加，依然不能弥补这样膨大的支出，所以十年来中国财政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财政赤字的形成，而终年借债度日。1927年度，短绌数为300万元，一直增加上去，到1936年度竟达22200万元，增加七十四倍有余。这些短绌数额，全靠借债来弥补。北京政府时代，全靠外债来挹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来，主要是依靠借内债（十年中共借外债9470余万元，不及同期内债1/20）。发内债，需要手续费，也需要折扣和利息，10元内债只能当作5元半花（据孙怀仁先生统计）。政府在这骇人的高利贷吸血之下，当然只能寅吃卯粮，债务越负越多。从1912年到1936年，共计发行过公债288800万余元，其中在1927年以后十年之中所发行的，占86%弱，约226800万余元，1912年到1927年的十五年间，倒反只占20%强，约62000万元。除开已偿还的，现

在财政部还负18亿元的债（此外还有几笔公债，以及铁交等部所发行的，不计算在内）。公债之外，尚有短期借款，银行透支暂垫，为数也不算少。十年之间发行公债和暂借的日益频繁，正表示出中国财政对于金融资本依赖性的增大。自然，在这十年之间，中国金融资本迅速地畸形地成长，乃是提供中国财政趋于这种依赖性的客观条件，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财政上的公债政策和借款政策，同时又是促成金融资本集中和成长的主要杠杆。上面说过，公债的发行差不多有一倍的利息，都装入了金融资本的腰包。因此十年来通过中国的财政机构，压榨了国民大众的收入（间接税），便由公债的方式，集中成为这样一个庞大的，但与生产远离的金融资本！

三、抗战时期的财政怎么办？

就上述四点来看，中国平时的财政，已经孕育着若干重大的危机。支出方面不合理，收入方面不公平；收支两相抵消，经常总存在着赤字状态。这样的财政，在国家没有甚大危险的当儿，已经是劳民伤财，借债过日，阻碍社会发展，而增加贫富对立的了。

但是不幸得很，中国现正处于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时期，目前成为全国生死存亡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抵抗侵略，保卫祖国。因之，中国财政当前的任务也就在于解决如何能够维持长期抗战的军需的问题，使得我们的战斗力能够维持不堕，而且极度发扬，以争取最后的胜利。很明显的，在这种时期，照原有的财政方针和财政机构，绝对不能应付这样重大的负担，因为，在支出方面，要有非常巨大的军费（军队维持费，作战消耗，动员费用等），而且时间还得非常长久；但在收入方面，因为重要海口既

有被封锁的可能，则作为财政上主要收入的海关进口税，便会大受打击；同时在沿海一带盐税区域和通商口岸，也有被扰乱的可能，盐税和统税的收入，也自然就会减少；此外更主要的，目前在财政上借以维持现状的公债发行和透支垫借，在那时候，必将大感困难。例如从走私猖獗，华北问题愈趋严重以来，财政危机也跟着日益严重起来，便是最好的一个证据。所以，旧的财政机构是非随着改变不可的。

首先要使国家支出完全适应新的要求而改变。当然抗战期中，最大的支出还是军费，不过那时候的军费，性质已经完全变化，不是过去维持军阀割据进行强盗内战的资本，而是争取民族生存的抗战要求了。同时，占岁出总额30%左右的债务费，也应当完全省去，因为外债本息，属于英美法诸友邦的，可能争取它们的同情而允予缓付，属于敌国的，自然可以完全取消；而内债本息，本着有钱出钱的原则，缓付也是不成问题的。其次占岁出总额40%左右的政务费，也可能大大的节省，一切骈枝机关，浪费，都可以减低到最少限度，（在民众救亡组织广泛开展之下，是可能减低的。）在抗战中不是必要的建设，也可以暂时停止。这样一来，平时种种不合理的支出可以大大省下来，用以挹注长期抗战的军费支出。

其次，关、盐、统三种税的收入虽然减少了，但正可以用新的办法来开源。1. 没收敌国在华的一切投资，和亲敌汉奸的一切财产，充作抗敌军费；2. 以有钱的出钱为原则，积极推行直接税和土地税。前者现在已经开始征收所得税，这是极为合理的财政收入，但是因为治外法权的关系，外商拒绝交付，成效尚未显著；后者则还在准备中。我们认为中国虽然贫穷，但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当儿，一切资本家和地主们，是有“毁家纾难”的必要和可能的。特别是上述两项税则的施行，更有使财政收入变成更合理

一些的作用存在。3. 在广大的爱国运动开展之下，可以募集爱国公债，爱国特别捐，华侨救国捐等；在帝国主义违反民意的侵略战争中，尚且能向民众募债，骗钱，何况我们为了救亡图存？4. 在普遍的爱国高潮中，的确有集中全国20亿盎司以上白银的可能，用来作为发行准备和外汇基金，使得抗战军需的要求，更有充分满足的可能。最后，5. 对日抗战是为着维护正义的战争，必能获得全世界人民大众的同情，因之，举借外债的可能性是增加了。总而言之，抗战爆发以后，虽则现有的财政收入会大受影响，可是更充分更合理的收入，是可能新的基础上完满地达到目的的。

（原载《中国经济问题讲话》，新知书店1937年
6月初版）

抗日战争和粮食准备

一、目前粮食问题的实质

近来学者们讨论到中国粮食问题的时候，都能提醒大家从国防上来注意这个问题，这实在是极好的现象。政府方面，也举行什么粮食会议，提倡什么积谷，虽其重心未必为了国防，其进行过程，“仍然是官样文章”（《粮食统制之必要》，《农村经济》1卷6期），但至少是表示政府也不愿意忽视这个问题。不过要具体的提出原则上的意见，或是切实的检查政府的工作，那又少所见闻，噤若寒蝉了。

粮食问题，是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讨论并进行粮食准备，在目前抗战形势下，尤其十分必要。中国粮食问题，不仅是粮食不足或如何求粮食自足的问题。当前中国粮食问题的重心应当是：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如何保证我国的粮食不成为敌人的军资？如何能供给大军需要而避免奸商和敌人捣乱市场及社会秩序？如何使大批壮丁荷戈卫国时能仍旧保持粮食产量？同时又如何使粮食准备适应未来的抗敌战争的要求？因此我们先从今年敌人收买我们的粮食说起。

二、敌人如何破坏我们的粮食准备？

抗战的必备条件之一，应该是“足兵足食”，但中国却是一个

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然而，敌人却不能因为我们不能自给而放松它的魔手，它必然要破坏中国的粮食准备。不过它的破坏，决不是像《三国演义》上周瑜叫诸葛亮去铁笼山烧粮那样，而是在公然的、合法的形式下进行的。

1936年6月起，日本在中国各城市各口岸收买粮食，亘四个月之久，造成市场上极度混乱，足以显示出我们的敌人在合法形态下破坏我国粮食准备的规模，也试出了6年来政府的粮食准备的成绩。

敌人以空前的规模搜购小麦，于6月间在芜湖开始，一直继续到现在，并没有受到什么不“友善”的阻碍，所以搜购的范围非常普遍。芜湖、蚌埠、汉口、济南、徐州、开封、天津、上海、无锡、九江，平汉路沿线，保定等处都是敌人搜购小麦的中心，并以上海为根据地收购长江流域的新米，甚至电传日政府拨款100万元要在沪筹设粮食运输会社。它怎样能进行这种收买工作呢？首先是以驻华的金融及贸易机关为根据地，譬如三井、三菱、吉田诸洋行都是。这些洋行再委托买办和大腹便便的粮食商人，半封建的帮口来出面收买。譬如上海的米业及杂粮业公会，便是买办的集团。他们竭力鼓吹运粮赴日的正当性，甚至还派代表到行政院去请愿不要禁粮出口；因为他们不要国家，只要日本人给他们的特别丰厚的佣金。在无锡，米价的飞涨，就是因为天津帮和通州帮粮商的收购。在芜湖，由青岛帮丰顺号的韩某出面收购，实际上则交日商田中运到上海出口。在河南则用天津面粉公司的名义购办小麦。至于所谓奸商在平汉沿线收购，那是其中小焉者。所以，买办、粮商、帮口、奸商，都混而为一，供日本驻华洋行的驱策，形成了一个破坏粮食准备的大集团。

有许多人都在说日本因为抵制澳麦才采购华麦，所以没有关系。有一些所谓金融专家，更恬然根据经济学原理从“贸易自

由，无分国界”的“先进”理论，来拥护贩粮给日本。但爱国的中国人当然更多，有的记者指出日本购粮的“原因未明”，有的直接指出是“大批奸商受某国人主使”，有的更老实指出在河北收购粮食，是“某方曾派人分头在各地购定大批粮米，以充军食”，更有的老实不客气的告诉读者说：“日方之用心，确在有意破坏中国之实业，及攫取中国之国防粮食”。（以上引文录自全国各报，从简故，不一一注明出处）。很明显的，日本收购粮食的作用是：（一）以中国廉价粮食，充实其本国军队的给养，转用来侵略中国；（二）直接的使中国粮食更不能自给，间接的因为抬高粮价，造成市场纷扰混乱景象，使粮食准备发生困难，使社会秩序陷于混乱；（三）在粮食的购买中，可以厚利（佣金）吸引并纠合广大的汉奸层，供其经常的驱策，来破坏粮食准备。敌人这种行为，只是捣乱政策的尝试，怪不得河南《民众日报》的社评极度愤慨地说：“我们正应当利用这丰收年头，准备作民族生存的最后决斗，国内的粮食，那容敌人的操纵和收买！我们只有以政府的力量，制定粮食价格，各地广设农业仓库，禁止粮食出口”。禁粮出口，原是应急的、极迫切的事，各地实业界商界都已请求政府查禁，不过后来听说财政部核议结果，反对禁止小麦出口或征收出口税，据说这是“违反政府维护农村经济本意”的。不过，如何来对抗敌人破坏粮食准备的阴谋却一点没有提起。

三、政府是怎样进行粮食准备的？

对于敌人有计划的普遍地搜购粮食，光是从“不致影响民食，妨碍粉业”（财政部说的话）来观察，是不够的。因为即使是单从国民经济的立场而论，一个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以廉价

输出本国粮食，将来再以高价购进外国米麦，也是件极不合算的事。何况我们是在“准备时期”，那末粮食之被敌人收买，决不能仅以平时为标准，来讨论是否“影响民众，妨碍粉业”。譬如准备抗敌的军队，难道它所储藏的子弹，足够平时打靶用就够吗？所以财政部的意见，是和政府向来所主张的“准备”理论背道而驰的。

为了抗战，粮食是绝对需要准备的。政府几年来早就注意到粮食问题，——当然并不是说为了抗敌。不过它的准备到底怎样来进行的呢？

远的变成具文废纸的不谈。在1934年，那时正是努力进行“安内”和“统一”时候，南昌行营曾召集一次全国粮食会议，这是现政府注意粮食问题的最初的具体工作表现，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以后财政部再承行政院之命，拟建全国粮食局，后来又设立七省粮食运销局筹备处于上海，由大粮食买办顾馨一氏总主其事。一时粮食统制之声，洋溢全国。终于因为各省省政府不肯解囊缴股，各粮食商人又因利害不同，帮口各异，相持不下，结果终于烟消云散。这是政府注意粮食问题，进行粮食准备的开始。

到后来，政府为了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和金融界取得最密切的合作，举办农业仓库，吸收农民的粮食的抵押；一方面在保甲制度的基础上，为了防荒而厉行积谷。实际上这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粮食准备，虽则其出发点不在此。最近，政府又成立农本局，吸收银行资本，专力于调剂农产品运销，流通农村资金，并建立全国的农业仓库网。此外如设立全国稻麦改进监理会及全国稻麦改进所，都可以暂时看作是政府的粮食准备。

所以，综合起来，说政府是为抗敌在进行“准备”，那末对于粮食准备的步骤，大概分为三方面：（一）是扩大粮食的流通

范围，即是筹办全国粮食运销总局；（二）是用金融的力量，调节农民的粮食买卖，吸收及集中一部分粮食，即是办理农业仓库；（三）是直接推行积谷或征收积谷款项。至于改良农业生产以提高产量的设施，在目前简直是毫无成效，可勿具论。

扩大粮食流通范围，无疑可以算做是粮食准备的一种办法，不过却要看它怎样进行。因为中国粮食生产的不均衡性异常严重，以米为例，沿海的通商口岸，广东、浙江、江苏、湖北、山东诸省，都缺少，但四川、湖南、江西、福建、广西诸省都有多，它们虽然毗为邻省，可是一方则米贵如珠，另一方则滥贱如泥，甚至据说在湖南武岗、东安一带，因为丰年谷贱，运米到省，水脚捐税的支出甚高，卖价尚不够抵补，因此就大批的把陈米焚弃。这是因为沿海各省能够得到廉价洋米的供给，而内地省份，倒反以交通不便，捐税苛重，而无法运粮出口。所以说，扩大粮食流通范围，也可以算作是粮食准备的一种。不过假使光求内地粮食能输送到通商口岸，光靠粮商们投资，组织全国粮食运销局来办理，那至多只能稍稍平衡国内粮食的供给，依旧不能达到粮食准备的目的。所以我说要看它是怎样进行的。因为第一，内地廉价粮食输送到通商口岸，敌人更便于透过这般粮商（粮食买办）的热心服务，而吸收大量粮食去充实军资。这决不是杞人之忧，而是铁一般的已成事实（譬如在从前，很少有人曾预料得到，华北金融家和实业家所组织的棉花协会，结果倒是替日人执行植棉计划的，可是到如今也已经成了铁一般的事实了）。第二，粮食运销局成立之后安南、暹罗等洋米还是可以源源倾销的。因为财政部很难放弃每年1亿元以上的洋米洋麦洋粉的收入税，而且粮商也正可吸收一大批洋粮，赚一大笔佣金。这些就通常的贸易立场上说，自然无可非议，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也扩大了粮食流通的范围，不过要说能完成粮食准备的目的就有些勉强。

了。所以，我非常同意为扩大粮食流通范围而筹办全国粮食运销局，但目的不是一般的运销农产，而应当是用以促进粮食准备。这里就应当注意到：1. 应当为全民族的利益而部分地牺牲粮商的利益（买办的利益）；2. 透过运销局以控制各地粮商的活动，使之不能抬价居奇，捣乱军需民食；3. 调节各地供求，以便大量地屯储；4. 减轻农民受粮食商人的盘剥以提高农民对粮食准备的兴趣。至于政府切实废除苛杂，切实改进有利于粮食运输的交通（据《国际贸易导报》载《中国食粮供求的新估计》中说到：“公路反足阻碍内地粮食的外运”，实在是非常有理的），那当然是必要的前提。

其次，是办理农产仓库对于粮食准备的关系。据说全国经济委员会和财政部，在长江各埠（上海、镇江、南通、南京下关、芜湖、九江、安庆、汉口、湘潭等）建筑仓库，快要竣工，预备收储粮食，为粮食统制之一种步骤；此外，农本局也在筹备建立全国农业仓库网。这些虽不就是粮食准备，但都跟粮食准备有关，自然是好的现象。但过去设置农业仓库网虽已很久，到现在成效还只见端倪，最终成败如何，现在我们还不愿遽下断语。同时关于农村金融的部份，我们也不必在此论述。我们站在粮食准备的立场，能贡献的几点意见是：1. 仓库应当尽可能不为帝国主义吸收农产物所利用；2. 应当利用仓库作为政府吸收和屯积粮食的基点；3. 仓库的分布地带，应当不仅是沿江的通商口岸，而是要适应着抗敌作战的任务，尽量使它普遍化；第四，收押的农产品，不应当只是充分商品化的米麦，而应包含一切的粮食。同时应当避免一切高利贷（如福建省办理农业仓库，需收月利1分2厘）及苛杂的措施。

最后说到积谷。积谷是无偿的直接的取之于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同时也可以说是顶接近于粮食准备的形式，所以也顶值

得我们注意。我们需要晓得，政府办理积谷的目标到底怎样？怎样来办理积谷？积谷的成绩到底怎样了？

1936年8月间，农业专家忻介六先生曾在《大公报》上批评中国现行积谷贮藏方法之腐败。他引用日本陆军省所储藏米谷，能延长十年以上，不致变质及降低营养价值的事实，进而论断我国积谷之不合国防原则。后来沈松林先生（他大概是浙江省办理积谷的负责人）也在同报为文答覆，认为积谷存仓的时间，在“积谷制度的作用上与国防的目的上是有差异的”，因而说到现行积谷制度的用途，是“按照现行积谷法令所规定的用途有三项，就是：散放，平糶及贷与”，“所以从积谷的法定用途上考察，各地积谷是不可久储，且不能久储的”（9月28日上海《大公报》）这些话说出了政府积谷的主要目的。当然为防荒而实行积谷，也是必要的，不过，目前是民族危机的最大关头，为抗战而实行粮食准备，当然更有必要。

积谷的来源，是取之于地主和农民，有许多用了勒派的形式，也有由田赋带征的；农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了抗战救亡，在救死不遑的苦境中，自然好像感到等于新加一笔变相的苛捐杂税。于是催缴积谷便成为县政府雷厉风行的德政了。关于此种德政，亲身在农村中住过的人，一定亲眼亲耳见闻得很多，此刻随手抄录一条新闻在下面：“怀远积谷经费，向由田赋项下附加，去岁县府奉层峰令饬提高储额，并改纳食粮，民众虽以负担过重，一再呼吁，但结果每亩地仍须缴纳小麦三升，惟开征以来，完纳者不甚踊跃，虽经派警催缴，迄今仍未收足……本县行政会议，亦议决限期催缴旧欠积谷”（上海《大公报》8月24日）。用这样的方法和手段，来办理积谷，当然是事倍功半，而且会引起农民反抗的。

至于勒派来的积谷，如何加以贮藏，也是大有关系的。据专

家忻介六先生说，赣省厉行积谷，但因仓库和管理法的不善，各县相继发生虫害，其被害谷物平均达40—50%，全省的损失，在1 000万元以上，这些都是农民的血汗和抗战的力量。随便毁弃，自然可惜。不幸的是：江、浙各县的仓库情形，也和赣省相类。据他说：“浙江最近落成之省会积谷仓库，虽耗费达2万余金，然仅得向南之洋房三栋，绝不合于仓库之用”（8月5日上海《大公报》）。积谷厉行最力的赣、浙、苏诸省情形尚且如此，其他诸省，也不得不更使我们担忧了。所以即使如沈松林先生所说，不必像日本陆军部那样要贮藏十年，但象这样把积谷大批损失掉（请想想，这还只是虫害一种），毕竟是应当避免的罢！

有仓库的地方情形如此，没有仓库地方，收来的积谷，不知如何处置？在江西，有许多地方积谷由积谷委员管理，让它用高利贷的形式再去盘剥农民。在浙江，每乡每镇所收的积谷或谷款，是颇少公布的，所以就会发生镇长区长侵吞谷款的事情（见10月下旬杭州《东南日报》社会服务版），象这种情形，自然会减少积谷的实际意义，破坏抗战的准备，使乡村人民对积谷发生恶感，可惜这些事实又是普遍存在于各地的。所以，把积谷变做仅仅是政府功令的事业，和一般人民大众的切身要求隔离开来，而付之于豪绅、土劣、地主富农之手，是每每会债事的。

积谷已经行之数年了，据最近南京某专家表示，去年全国积谷为800余万担，今年为1 100余万担，当然已有许多进步了。不过这个数目，和清代积谷最少一年（咸丰元年，即公元1851年）的27 111 502石比较起来，尚瞠乎其後。在目前敌人巧取豪夺之下，这样速度和这样办法，要来完成粮食准备，无疑会贻笑于蜗牛的。

四、几点原则上的意见

政府进行粮食准备的动机自然值得拥护，不过现有的成绩，却不能使人民加以恭维。我们当然不能脱离了抗战的前提来谈粮食准备，更不能无视敌人的新进攻，要机械的等粮食准备好了再来抗战。绥远现在正在激战中。从傅作义将军的来电里，知道最困难的是给养不足，前方将士在忍饥耐寒地抗敌。这正昭示我们过去的粮食准备，实在是说得多而做得少，而现在应当在抗战中积极进行准备了。

所以第一，我们要对于敌人破坏我们的粮食准备的一切行动，以全国全民的一致力量来对抗。我们不准敌人买一颗小麦去供应它的面粉厂，不准购一粒米去充侵略军队的军食，更不准它来捣乱粮食市场，扰乱社会人心。我们政府要立即会同银行家粮食商来组织成全国粮食准备局：政府要立即解除一切对于粮食流通的阻碍，银行家要提供极低廉的大批款项，粮商要牺牲其不正当的利润和佣金，对国家贡献其粮食组织的特别技能。尤其重要的，一切粮食业的店员和运输粮食的苦力工人，都要严密地自动地组织起来，来协同政府监督粮食的用途，促进粮食准备的工作，因为他们人数最多，而且最富于爱国心，此次海州工人自动罢工，拒绝搬运奸商私运出境的大批粮食（2月9日《益世报》徐州专电），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第二，政府不应当光在银行家粮食商人之间兜圈子，应当立即确立并立即执行全国性的以抗敌为中心的粮食准备计划，不要鸡零狗碎的，不能光靠大都市的几个仓库来点缀了事，要象敌人陆军省所准备的一样，立即屯储集中足资长期抗战的军用粮食于若干与抗战前线相联系的主要后方。以便战事起后，不至于临时

向市场搜购而扰乱人心，也不至于就地征发，给人民以不必要的负担。

第三，政府应立即充分保护华商面粉工业，减轻面粉统税，保证国内小麦的供给，收购过剩的面粉。同时立即对农民切实撤废一切粮食的苛杂，减轻农民的地租负担，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增加粮食生产，并切实奖励不种鸦片改种粮食的农民。

第四，积极在全国各地，推行抗敌的积谷，改善现在积谷的勒索性和不公平性（后一点，浙江省最近颁行的新积谷办法已经改善得多），诚恳地向人民说明积谷的政治意义（为了抗敌救亡），使人民不致像向来一样，以为是加重苛杂的负担，健全贮藏积谷的仓库和仓库管理法，推进人民的组织，以监督直接经手办理积谷的官吏（镇乡村长）。

第五，以村为单位，广大地发动全乡村人民，自动的民主的组织粮食委员会，调查及可能时管理全村人民所贮藏的粮食，讨论本村如何进行粮食准备，实行贮藏粮食的竞赛，并发动乡村人民捐助粮食给抗敌将士。这样可以提高人民对于粮食准备的自觉性，使粮食准备成为全国人民大众自己的事业，而且可以和抗敌的游击战术相配合起来。

绥远抗战已经爆发了，全国人民自动起来争取粮食准备以贡献于民族国家罢！

（原载《中国农村》第2卷第12期。1936年12月1日）

时 评 六 篇

一、征兵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法

1937年3月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兵役法，各省设立征兵机关积极进行征兵；除此之外，几年以来各省秉承中央指示，训练壮丁，也已经达到相当大的数量。照理，在抗战的初期、应该尽够满足前方补充的需要了。然而现在事实上要征兵抽丁，开赴前方补充时，就发生重大的困难，虽然还不曾使前方缺乏人力；但是至少已经弄得焦头烂额。这是平心静气的人都能承认的。

在征兵抽丁的时候，我们在极大多数省份里，普遍的看到这种现象：农民不愿意应征当兵。他们认为这对于自身利害毫无关系，而是等于强迫他们送死；大多数人完全勉强的被动的被征召去，很少看到有热烈应征，自动投军的现象。其次是逃避，很多村庄里，壮丁为了逃避兵役而不敢住在家里，躲到旁的地方去，甚至上山当土匪的也有。有许多地方，由于继续不断的强迫征丁，引起乡民强烈的反抗，而被征去的壮丁，中途逃脱的现象也很多。

我们是被侵略的国家，个人的命运已经和国家的存亡不能分离，照理应该人人踊跃应征，从城市到乡村，充满着欢送自己的儿子、丈夫、兄弟、朋友去从军杀敌的空气。为什么会恰巧相反，造成上面那些痛心的现象呢？是兵役法不善，还是农民没有

天良？我们肯定地回答：决不是的。这是由于执行机构不善，执行方法错误。

在六年的抗战准备期间中，政府为了避免外交上的麻烦，对于全国农民不曾广泛而深刻的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全国除广西而外，各省实施壮丁训练的，也不以宣扬抗日救国为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只是中央政府的权宜之计；这种政治训练上的大缺点，应该在抗战开始之后，极短时期内迅速加以补救。农民们在不曾充分了解国家存亡对于自身的利害关系以前，决不会愿意抛弃田地家庭舍身从军的。然而我们的执行机关却不曾了解这一点，也不愿意多化力气。当上峰命令如山，要解送多少壮丁夫役的时候，就只知道下命令去分别抽派；抽派而有困难，就干脆用武力捕捉，以便迅速报销公事。然而前方的补充是天天需要的，新部队的编练也非常迫切，于是就接二连三的捕捉。农民是越捉越怕，越怕越逃；官府方面，就越逃越捉。不论白天夜晚，田间街头，只要是无钱无势的壮丁，便一概捉去。用兵士监视着，一大串一大串的押解进城。这样，公事固然可以报销了；然而，农村却骚扰不堪，农民更是恐怖万分。谁还能有偌大勇气，来做这样“光荣”的民族英雄呢！

其次，很多执行征兵的机关，自己就在破坏兵役法的种种规定。如未届或已过兵役年龄的，单丁的，疾病的，负担家庭生活的等等，原不在征抽之列，然而现在因为强捕硬捉，法令都变成一纸具文了。城市乡村的绅土地主人家，保甲长的权力及不到，同时他们的势力和财力，也尽有方法来避免自己的子侄被征；把应出的人丁，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不知道法律，自然很容易欺骗，莫名其妙的去顶替人家。可是在这样不平等待遇的事实面前，他们就会相信“好男不当兵”确是真理！这使农民们更加不明白应征从军的意义，更加不信任法律的效力，因而也就增加抽丁征

兵的困难。

用这样方法抽丁征兵，势必造成农村的骚扰和农民心理的不安，转而就会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因为每个人都不知什么时候要被抽去或捉去，对于生产自然减少兴趣。希望农民能够自动起来捍卫村庄，保守田地，步步为营的来抵抗侵略进来的敌人，那自然更不可能了。退一步说，假使现在的征兵的办法，在数量上，的确能够迅速满足前方补充的需要，在士气和体质上，的确可以适合前方所需的标准，那末这样执行也未始不可当做不得已的权宜办法。然而，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持久的。战争越持久越扩大，所需要的补充和生力的队伍也越多；但后方的老百姓是越捉越害怕，能捉到的人也越捉越减少。何况单纯的政治武力，也会有不可能再运用的时候呢。其次，那些强迫来充数的壮丁，他们一方面不明白从军的意义，一方面忧愁着家里老少的冻饿衣食，心里存着怨恨愁虑的想头，当然就很难发挥热烈的爱国精神了。这样我们如何还能用血肉的长城，来抵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而在艰苦万状下持久战下去呢？

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我们应当承认这些已有的缺点，力求迅速改正。要解决现在征兵的种种困难，我们认为最低限度应该先完全办到下列各点：

（一）彻底停止捉捕壮丁。这种方法，在眼前固然足以勉强应急，报销上面公事；然而会贻下莫大的祸患于将来；因为抗战的胜利，不是三月半载的事。所以各省当局应该立下绝大的决心，严令县区政府立即彻底禁止捕捉壮丁。

（二）严厉禁止虐待已征壮丁。已征壮丁是未来的战士，我们现在即使没有力量来加以优待，至少也不应该加以虐待，使他们丧失为国争光的自信心。但是，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用绳子牵着一大批壮丁，由武装军人押解着过街。解到区署或县署以后，

就关在屋子里，没有人理他饿，没有人管他冻，他们冻着饿着一直到被编入营（有许多地方，在被征到入营之间的日子，要自己带粮），至于滥打乱敲，当然也要绝对禁止；这些不但使被征壮丁受那不应得的痛苦，也使社会上留下不良的印象，使民众以后更加畏惧应征入伍。

（三）公平执行兵役法，严禁舞弊营私。现在征兵之所以引起人民逃避害怕，就是征兵不按法令，没有一定标准，人人自危，这是上面已经说过的。我们现在必须执行征兵法令的规定，法令不准征的绝对不征；法令规定要征的绝对不得私放，不准买人顶替，更不准舞弊转嫁。贵贱不分，贫富一律，自然人人都能尊重兵役法应征了。

以上三点，是解决征兵困难的先决条件；但是仅仅如此，还谈不上人力动员，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困难。在做到这三点先决条件之后，我们同时要立即进行：

（一）从城市到乡村，实行普遍而且深入的政治动员，宣传抗敌救国的要旨，以及征兵从军的光荣。这种宣传工作，并不是敷衍门面的工作，一定要做到说服农民并且动员农民的地步。起初要使农民不害怕应征；最后使城乡人民自动的踊跃从军。

（二）在群众的监督并协助之下，彻底执行优待军人家属的法令，以及军委会颁布的救济应征士兵家属的命令，并且自官厅以至群众、自动的给应征士兵以最大光荣。不容讳言，现在的县区保甲，只把限缴的壮丁一层层的交出，就算了却公事，谁也不管他家里的饥寒死活。各省所颁布的优待从军家属条例，也视同具文，多不认真执行。至于社会上下人士，视被征的壮丁为倒霉，哪里还谈得到去尊敬他。最近军委会的救济应征士兵的命令，也就是重视这种现象的结果。现在应由各级政府和地方团体，十足执行上述诸法令；同时透过群众的自觉、主动的热情，来帮助

应征士兵家属的生活安全。

(三) 彻底改善现在纯军事性的不合农民要求的壮丁训练。应当以村为单位，按照农民救国认识的程度，生活的习惯，经济上的要求，来成立各种各样的农民自卫武装组织。在这种组织中，训练乡村壮丁的基本军事常识（不仅是立正稍息之类）作为应征入伍最好的准备。这种组织应当尽可能基于乡村居民自身的要求，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强迫性的组织。如果这种组织普遍和深入到城市乡村中，那末，现在一切征兵的困难，自然就完全不存在了！

最后要声明，前述三点先决条件和上述三点办法，决不是对立的，更不应当呆板的硬分先后。我们应当认识现在征兵所施行的一切强迫式的奴役式的办法，都是妨害人民大众（连农民在内）踊跃入伍的；惟一的纠正办法，就是启发人民的爱国天性，给人民以武装抗日的自由，使他们能够主动的来参加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

（原载《中国农村》第4卷《战时特刊》第5号。

1937年12月1日）

二、游击战的政治条件和我们的任务

四个月的抗战，在军事上，我们固然发扬了英勇奋斗的精神，但同时又暴露了许多缺点，获得了不少教训。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始终不曾动员民众，武装民众。使拙劣的阵地战改变为灵敏的运动战，使消极呆板的守势防御战转变成积极进功的游击战。这就使敌人能优裕自如地实行中央突破、部分地达到了强迫主力会战的目的。而我们呢？步步设防，捉襟见肘，主力相当消耗之后，优良的国防工事，也就难以死守了。

我们相信，最高统帅部对于抗战到底，的确已经具有决心。所以，现在所需要的是新的方法，战胜并歼灭敌人的方法。在军事上，我们现在不但需要编练新的正规军，而且需要运用新的战略，创造新的战争的基础。这就是武装全体民众（志愿的），极度发扬游击战的攻击精神，来巩固、扩大，并掩护主力的决战。

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一个单纯军事性的战争，而是一个政治性的战争。要求一个武装拙劣给养极端缺乏的游击队队员，能够始终不懈自主自动的打游击战，那末，他非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确定的斗争目标（现在是民族的利益）不可。尤其是非让游击队活动区域里的民众，有此种觉悟和确信不可。就关内和东北的实例说来，游击战争是民众斗争所采取的战术，而游击队则完全从民众尖锐的斗争中产生出来。所以，我们说游击战是大众化的战争，游击队是大众的军队，这在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更为切当。假使我们不能对民众实行深刻的政治动员（提高其抗日的爱国心），不能给予民众以政治上的权利和生活上的保障，那就无法使民众迅速地自动武装，进行游击战来配合主力作战。

凡是强征的或雇佣的军队或与其类似的武力，都不能进行游击战争。不但游击战术本身的要求，（每个游击队员都得艰苦而英勇地实行主动的单独的进攻），决不是强迫性的雇佣军队所能胜任，而且要强迫敌占区或前方战区里的民众起来打游击那更是事实上所不可能的了。强迫性的雇佣的军队，也常常企图打游击战，而这种企图往往不能收到相当效果，在大多数的场合是会失败的，这是由于把游击战庸俗化了。不给民众以政治上的抗日自由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就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就会完全孤立，而暴露在敌人之前。现在有一些人虽然也想发展游击战争，但害怕真正的武装民众，企图用官办的形式来武装民众，控制这些武装力量。我们不能不指出，这是很愚蠢的徒劳无功的办法，

不但不足以发展游击战来制敌于死命，反而使民众自发的武装抗战变成不可能。

游击队的产生，既然由于群众的政治觉悟和自动的斗争，游击队的存在，全靠着和当地群众彻底打成一片，并且完全瞭然周围的一切环境（地理形势，风土人情等），所以游击队任意的远距离的移动，要减少它作战的能力，而有害于抗日军事。官僚主义的办法，是任意的命令把民众已有组织的游击队集中，据守一条战线。当这些游击队尚未动员新地区的群众，没有明瞭当地一切环境之前，它的战斗力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的办法，不应当这样愚蠢，而要动员各到各处的民众，发展成千成万的游击队。

把游击战争理解作上山运动，也是从同一根源上所产生的错误。许多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失去信心，而又不愿意领导民众奋斗的人，便口口声声以上山打游击相号召，实则不过掩蔽自己的懦怯与无能。进行游击战争，山地的确有许多便利，但地理的方便，不是游击队存在并发展的惟一主要条件。惟有民众高扬着抗日热情，要求以武装力量驱逐敌人的地方，游击队才能存在并发展，山地才能给予有利的影响。只要群众工作能够开展，游击运动在广大的平原地带，也同样可以发展。平津同学和平郊及津浦线，冀南豫北的民众在平汉线一带，不是开展了挺有力的游击战吗？以脱离民众的上山来作为游击战的号召，这是有害的。关键还在民众，政府能彻底开放民众运动，青年能克服艰难来组织并训练民众，那末，不必上山，每条小河，每座村庄，都是有利于游击队活动的自然地形。

现在，随着战争形势的转变，游击战的运动，已经达到一个高潮。除了华北平原，晋绥山地，已经建成了一个坚固难摧的游击区，有效地阻止敌人前进之外；在东战场一带，却始终还没

有真正民众的游击队出现，一切都还停止在口头上。东战场上这个缺点的补救现在已经万分迫切。为了阻止敌人前进，挽救战争颓势，我们一定得动员5 000万民众，组织600万的游击队，分布于苏、浙、皖、赣、闽诸省，配合作为主力的正规军作战。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必须由政府与民众彻底合作，争取它的彻底完成。所以：

一、各该省政府应该立即明文公布，人民应自动的组织抗日义勇军，守乡义勇队等民众武力，以便保乡卫国；凡进行此等组织时，所可能发生的一切阻力，政府当以最大决心除去之！

二、各该省青年应当协助政府，深入乡村，了解农民生活，同情农民疾苦，展开乡村救亡运动，组织并训练农民，然后从农民的自觉中迅速发展民众的装武组织，这是开展游击运动最艰难而又最基本的办法。

三、各该省内旧有的民众武装组织，从最落后的红枪会（半迷信的）之类，到最前进的革命游击队为止，都应当彻底动员，加以调整，以适应急迫的军事需要。一切青年都应当参加这些组织或同它联络，以扬弃其落后性，发扬其民族精神。

我们完全知道，纯以民众武力或游击战争来最后的战胜日本，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坚决的相信，非武装民众，不能锻炼出新的主力军，不用民众武力发动游击战来掩护主力军，亦难以取得胜利。这是用三十万人鲜血换来的教训，我们再不能让它在官僚主义的应付中萎缩了。

中国是战败而亡国，还是战胜而自主，全看能否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而定！

（原载《中国农村》第4卷《战时特刊》第6号。

1937年12月16日）

三、赶快建立东战场的游击区

二个月来，东战场的敌人，孤军深入，攻陷首都。苏、浙、皖等全国精华之区，都沦为战区，饱受残酷的蹂躏。敌人现在正待攻陷徐州，与河南方面相呼应，同时自浙、皖攻掠江西以威胁武汉。所以，我们在东战场上坚决地阻止敌人的前进，并且作强烈的反攻，彻底扫清敌人，这已经是当前一个主要的任务。

怎样完成这个任务呢？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反问，东战场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惨败？为什么敌人在西战场上，当势如破竹的占领天镇、大同、代县、崞县之后，竟不能直下太原，反而主力被困于晋北山地；而东战场上敌人在金山卫一登陆，就能突破国防线，无阻碍的直下南京呢？为什么西战场上，敌人占领娘子关，攻陷太原之后，不能循同蒲路以下临汾；而东战场上敌人于攻陷首都之后，能够安然渡江北上，然后又回兵攻陷杭州一带呢？这里，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前者（西战场）有八路军深入敌人后方进行游击，山西豫北、冀南一带，农民已经自动武装起来，向敌人进行不间断的斗争，使敌人的后方被扰乱，敌人的运动被妨碍，敌人的兵力被分散了！但是，后者（东战场）就只有正规军作阵地战，民众的组织与武装，固然完全没有，游击战争的发动也完全忽视，所以我们的主力被击溃之后，敌人就可毫无顾虑，逞兵深入了！

这是付出了极大代价所得到的惨痛的教训，我们要不折不扣的接受这个教训。这就是：在苏、浙、皖、赣、闽五省，迅速广泛的展开民众的武装自卫斗争，造成一个攻打不破的游击区，把敌人的大部分兵力，封锁在浙西、皖南、苏南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不断的加以困扰和消耗。然后协同主力军来歼灭敌人。

敌人在东战场，固然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但是它要存在下去，并且继续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在当地，主要的交通线和交通工具都已被我破坏，中心城市已经变成焦土，而在占领地带敌人的暴行，也已经和当地同胞造成彻底的对立。所以，敌人的武力，既然绝不可能深入农村，就是在交通线上的城市站住脚，也十分困难。反之，我们在东战场上建立起强固的游击区，倒有优良的条件。

首先是地理上的有利。在五省境内，河汉港湾，星罗棋布，敌人机械化部队的活动，大受限制；山岭起伏，森林繁茂，尤其适宜于游击队的活动。如像苏、浙交界的天目山脉，茅山山脉，皖、浙、赣交界的黄山山脉，赣、浙、闽之间的仙霞山脉、武夷山脉、枫岭、大杉岭，以及皖北的皖山脉，浙东的四明、会稽、括苍、雁荡诸山，福建的鹭峰、戴云等山都是。这些自然条件，远胜于察、冀、鲁、豫诸省一片无掩蔽的大平原地带。

其次是社会条件优越。在这五省省区里，有大量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比较高，多曾受过政治斗争的教育。旧“苏区”一带，农民更有深刻的政治认识，尤其是有训练，有组织，富有经验，娴熟地理的游击战士，存留得非常之多，总在5万以上。这种社会条件，也远比华北为优越。

建立东战场上五省游击区的工作，已经是现阶段抗战军事上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了！我们再不能让苏、浙、皖诸省青年，大批的从战区流亡出来，再大批的往陕北往山西跑！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建立敌人攻不破的堡垒！

这个工作，不但需要政府的领导和扶助，而且需要成千成万的乡村工作者，作坚忍不拔的努力。为了急速完成此项任务起见，我们认为下列的步骤是十分必要的：一、苏浙皖（赣闽）战区的司令长官，应该明文通令战区内各地人民有组织自卫武装的权利，并且实行减租减息减税。这种自卫组织应以纯正的抗日为

中心，实行守乡保家，而由人民自己来管理，保证其绝对不被强制调征。一切土匪性、流氓性的冒名组织和土劣豪绅的垄断把持，都应严格取缔。二、当地旧有的游击战士及战斗农民，应该按照军委会的命令，打破阻碍，立即在省境开展活动。同时要大大地打开门来，欢迎一切抗日分子参加游击战争。三、五省中之已陷于敌手的区域，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尽可能不流亡出外，竭力隐蔽起来，组织民众，开始游击。要知道现在敌人的脚跟尚未站稳，敌人的烧杀抢掠，正在进行，这是组织游击战争最好的时间。浙江有一个县长，只有三个人，就能在三四天内集成1 000人以上的游击队，这是并不难的。至于未陷敌手的区域，青年们绝对不要流亡，赶快深入农村，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并把他们武装起来。五省青年应当具有和山西政府当局同样的决心，决不离开省境，与敌人拼到底。四、集中在武汉的文化人，应当起来号召：建立东战场的游击区。五省的文化人应回乡去工作。进步的文化人应当在五省的一个适宜地点（赣东最好）负责建立起一个抗日大学（如民族革命大学）号召东南各省青年到那边去加以训练，使他们回乡工作。

苏、浙、皖、赣、闽有1亿民众，在短时间内我们要武装500万人民，组织100万人的游击队，方能发生出决定的力量。我们要用游击战争的铜墙铁壁来封锁敌人！一切青年们，乡村工作者，快些负担起这个责任来！

（原载《中国农村》第4卷《战时特刊》第7号

1938年1月16日）

四、武装民众工作的若干严重缺陷

如何武装民众，并且运用这些民众的武装力量，这个问题的

迅速而且正确的解决，是直接决定抗战胜利的一个有力因素。它不仅关联到游击战争的能否开展，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新国防军的建立，军队的改造和加强。

但是我们现在到处都看到许多严重的现象，直接影响到武装民众工作的进行。

一、是用集中武装来消灭民众武装，就是正规军大量地收缴地方的武器。二十九军由平津往南退却，以及在大名、顺德一带作战时，随路收缴各城镇的警察、保卫团、民团的武器，他的口号是集中武器，以免被敌人利用。最近伏法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在战事爆发后，积极搜括地方枪枝，藏枪最多的鲁西，被骚扰得不堪。凡是纪律较坏，军阀性较深的队伍，收编枪枝（连人带枪）最厉害，其目的全在扩充自己势力。结果人民没有武装力量，不可能替自己替国家保卫一寸干净土，以避免敌人的蹂躏。这种办法，对于武装民众工作是直接的摧残。

二、收编草莽的武装来代替人民的武装，在战区的前方，或者离开战区较近的地方，政府当局也觉得有武装民众的必要，但是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真正被武装起来，而且也不很相信生产大众的力量，习惯使他们把地痞，流氓，土匪之类，误认为有作战能力的人民，于是花费国家巨额的金钱，来收买这类草莽英雄，改编成游击队义勇队等等，还认为这就是武装民众的工作。抗战时期中，收编土匪等，也是可以做的，但决不能依仗它当做民众武力的主力，尤其重要的是政治上应加以彻底的改造，否则对于抗日军事没有什么帮助，甚或反有害处。他们虽则换了招牌，然而内底子还是土匪，还是流氓地痞，他们不愿意游击也没有能力游击，因为他们脱离民众，和人民对立。到后来反而因为不奉约束，骚扰地方，而被缴械了事，于是武装又由地方之手，集中到政府方面去。这种例子，北战场发生得顶多。上了这种当，吃了这样

亏的人，则到处都有。结果，有些人便痛骂组织游击队，痛恨游击战争，其实是他们自己把武装的工作了解错并做错了的结果。

二、警察式的武装民众，这是最流行的办法。各县通过保甲的系统，集中有枪壮丁到中心乡镇或县城里，编成义勇壮丁队、守乡义勇队，由县府派人担任下级军官，县长自兼总队长。这样武装民众的方法，江西、浙江等地现在正在推行。我们看得很明白，这些义勇壮丁队之类，其内部教育，编制，生活，纪律，和普通军队没有什么差别，根本不具备民众武力的特征。他们的确来自民间，然而现在他们却和民众完全脱离关系，民众不同情他们，他们也不能发挥什么力量，每每是敌人一来，因为政治的控制力松了，就一哄而散，或则县长带着他们逃跑，造成武装逃难的笑话。这种武装民众的方法，骤看起来，一个县城里固然多了许多武装分子，可是一般人民还是两手空空，没有被各色各样的武器所武装起来。

四、土劣武装压倒民众武装。十年以来，乡村政治根本没有改变，豪绅地主依旧是化外的土皇帝，乡间比较新式的武器，差不多都集中在他们手里，乡村里原有的武装组织，如保卫团之类，多在他们控制中。在现在这样的局势下面，豪绅地主也深感武装的必要，因为它可以用来抵挡散兵游勇的骚扰，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趁着武装民众空气的高涨，他们利用自己在乡间的地位，利用自己熟悉地方情形，就很快的集合而组成新的武力，自己做它的领导者。这种情形是好还是不好的呢？至少，这是一种危险的情形。我们固然承认豪绅地主也可在抗日阵线之内，然而他们又特别易于动摇，特别容易和敌人妥协。假使乡村农民大众不能积极了解并参加抗日战线，作有力的监视的话。我们在晋北、豫北一带战区里，看到很多乡村的富豪，携带地方团队，去欢迎敌军光临，诱骗并压迫村民替敌人效劳的事实。

五、派系的武装超过人民大众的武装。现在在各省（尤以河南江西浙江湖南等省为最）进行所谓武装民众工作的，其系统之繁多，派别之复杂，的确大可惊人！都是一手拿着委任状，一手拿着法币，作为开展工作的不二法宝。于是或则收编土匪，或则收买会党，有的交通豪劣，有的利用局长县长的地位，各想控制一部分地方武装在自己手里。至于如何使民众自动普遍武装起来，自动起来抵抗敌人，反倒不加注意，因系统复杂而发生的各方面的人事磨擦，固然不必说了，而且正因为你抢我夺，把武装民众的工作，当做纠结一己势力的差事，结果倒反便宜了土匪流痞豪劣贪暴之流，使他们作了一笔好买卖。所谓游而不击的情形，便是在如此工作方式之下产生的。

像上面那样进行武装民众的工作，能够适合人民的要求吗？当然不能！这是用武装民众来消灭民众武装，用工作来取消工作。这种现象再存在下去，发展下去，各战场广泛而有力的人民游击战争，就决不能展开，配合正规军作战。

这些错误现象的造成，主要是由于对武装民众的工作缺乏政治的认识，以及缺乏对于工作意义的信仰。我们应当知道，武装民众工作的主人翁，是被武装的民众，主要是农民大众，决不是进行工作的官吏，所以一切的考虑，都得站在民众地位上设想。要使民众（主要是农民）武装起来抗日，那就非使民众本身明了武装的必要不可。这里就可以知道，武装民众工作决不是孤立的，和农村中其他抗敌救亡工作没有关系的。相反，倒是完全依托于农村中一般救亡工作的开展上。这就是，首先彻底在政治上动员民众，向民众进行深刻的宣传和鼓动，使他们被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所催醒，而赶紧组织成各种的救亡团体，参加各种救亡工作。通过了这样的民众组织活动，使民众了解武装自己的必要，他们便会利用各色各样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这里，由宣传

而组织而武装，其过程有长有短，但中心原则是不变的，即基于民众自己的觉悟，自己的要求，不是自外而内的强迫，自上而下的收编。这种武装民众的工作，必须有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以期收效宏大，切实迅速，但是却不要代替民众的自觉，尤其要使武装的民众和一般的民众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要民众自己来控制其武力，这样民众就会自动地爱护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力量，来打击侵犯他们利益的敌人。

武装民众是一种群众工作，一种政治工作，而不是官厅里面的一件公事。它以民众的觉悟、民众的利益为基础。为了满足抗战第二期的军事上迫切的需要，赶快把上面的错误做法抛弃掉吧！

（原载《中国农村》第4卷《战时特刊》第8号。

1938年2月1日）

五、最近抗战军事动态

自从南京失陷之后，敌人自南北两路侵入苏北、鲁南，其作战目的，在于打通津浦线，实现占领北部中部沿海各省的企图，然后循陇海、浦信两路，直趋河南，一方面截断平汉路，解决山西僵持局面，一方面则威胁武汉。这个打通津浦线的战事，北段自韩复榘军不战而弃滋宁（兖州），失济宁，南段自蚌埠失陷，淮河不守之后，一时确曾陷于极度紧张之中，然而徐州到现在还安如磐石，日本人的企图毕竟失败了，被迫更改其战争的布置。这个胜利的获得，是由于下列的原因：

（一）自然是战士作战的万分英勇的结果，川军在津浦北段坚撑苦支，东北军在淮河北岸的浴血杀敌，桂军的守纪律打硬仗，都使敌人进一寸一尺亦须支付重大代价，为中华民族创立了不朽

的战功。此外象作战军队之纪律渐趋整肃，和民众渐能溶成一片，协同攻守，也是胜利的重要原因。

(二)我军开始采用了新的战略战术，这就是充分发挥运动战和游击战来配合正面据守的阵地战，以牵制敌人，并消灭敌人。津浦北段之袭汶上、邹县，南段之克复凤阳，包围定远。都是运动战收效的例子。尤其是一改第一期抗战各自为谋的弊端，各战场都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协同作战，以疲惫并牵制敌人，乘势消灭之。

(三)是军纪的执行，汉奸韩复榘的伏法受诛，不力官长之分别惩戒，大足激发士气，刷新民气。尤其是提高战区司令长官的职权，予以独立作战的权力，付以固守战区的重任，使战区长官充分发挥自动性，提高牺牲精神，因而有助于我军战斗力抵抗力的增加。

敌人打通津浦线的企图，既然不能达成，于是只能采取更冒险的战略，用极大范围的迂回战实行大包抄，以便抵消我们小规模的运动战，敌人规知平汉北段主力移动，守军力量脆弱单薄，于是调集大军，右翼自涉县、林县侵晋东，攻长治、晋城，中路突破汤阴防线，沿铁道占领新乡，左翼则迂回攻取南乐、清丰、道口，占领延津、封邱，一部分向西面与中路合力，循道清路入侵晋南。

目下军事的重点，显已暂时移到晋南。敌人为了避开同蒲正面霍山山脉的险要，所以不惜自晋南晋东两路迂回，目的是会师风陵渡，一举而解决山西，完成占领华北的梦想。的确，晋南在危急中，我们要用千百倍的英雄精神，来打击敌人，巩固晋南，这实是保卫大武汉的重要步骤之一。可是，现在的山西已经不是太原失陷时的山西，庞大的山西民众已经有组织的起来斗争，敌人即使四面包围山西，山西还是不可克服的，看吧，三晋终究是谁的天下！

但是话得说回来，目下敌人侵略的军事中心，根本还在打通津浦线，威胁武汉。现在，黄河北岸尚在混战中，但敌人已经占领自封邱至孟县的数百里渡河要点，黄河天堑之险，我已与敌共之。敌人一天控制着绵亘数百里的河沿地带，那末它就决不会放弃乘隙渡河的野心，以威胁开封，威胁郑州，截断陇海，完成一个极大规模的迂回战，以求实现打通津浦线的企图。最近津浦北段左翼转紧，敌自济宁南下，目的是进袭归德碭山，掩护北路敌军的渡河。

同胞们注意！我中华民族繁衍地的中州河南，现在一部分已被敌人惨酷地蹂躏。最近的将来将是我们和敌人决死战的战场。我们要保卫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必须保卫武汉。要保卫武汉，必须保卫津浦，尤其是陇海！不许敌骑侵入河南一步，必须把敌人从豫北驱逐出去！

但是，我们不要被敌人小小的进占所吓倒，敌人这样大规模的迂回，是自杀的冒险的战争。我们如果能够上下一心，有决心有真诚来接受血的教训，进行彻底的斗争，我们必能战胜敌人。这就是：第一、编组精良的野战军，更大规模的彻底执行运动战和游击战，来粉碎敌人的冒险的大迂回。第二、速即改善正规军的质量，补充精良武器，提高政治水准，实行官兵一体，实行军民一体，整顿与建立统一指挥，统一教育，统一给养，统一装备的新国防军，使阵地战和运动战都能运用自如。第三、用全力建设国防工业，特别是在豫鄂皖赣浙诸省。彻底武装民众、发动群众、帮助政府来完成此项使命。

（原载《中国农村》第4卷《战时特刊》第10号。

1938年3月1日）

六、怎样动员乡村小学教师

抗战九个月的现在，农村的动员还是不够普遍，不够深入。它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动员工作的本身的缺点：1. 宣传工作已经有了一点，但是不普遍不持久，宣传队演剧团来了，民众便被感动而沸腾起来，去了之后，不久又归平静；缺乏一些久留在乡村，在本地方作救亡宣传，作抗敌教育（对全体民众的）的人。2. 民众接受宣传之后，不能够很快的组织起来，组织工作是比较费时间的，比较艰苦的，不是巡回流动性的宣传队演剧团所能担负的责任。然而对于没有组织的民众，宣传工作好比把水泼在沙里，马上就会被蒸发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一滴。不仅如此，没有组织的农民，是不能动员来抗日的。

改正上面的缺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政府或抗敌后援会派遣大量的宣传员组织员，分驻在各地乡村，从事宣传组织工作，不仅不可能，而且实际是一种浪费。因为乡村明明留着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他们固定在乡村里，熟悉本地的情形，既接近绅士或上流人士，又和农民并不隔膜。他们有智识，有文化，能担当得起宣传组织并动员农民的工作。他们比本地旅外学生、有许多地方更强，有许多条件更优越。可见动员乡村小学教师，实在是动员农民的一个重要步骤。

然而，乡村小学教师本身，到现在不曾被动员起来，这原因也很多，现在不必说它。我们要动员乡村小学教师，就先得知道，哪一种人在做小学教师；因而动员方法是有不同的。

第一种是私塾或改良私塾的中年人老头子之类。他们一般头脑陈旧，行动迟钝；到现在多还站在前清秀才的立场，顽固地不满意政府；不同情抗日。可是他们在乡村民众中的力量很大；

他们多半和土劣豪绅有些瓜葛，而且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近农民，对农民具有直接的影响。这种塾师一流人物，在湖北、湖南、浙江、安徽、山东、河南、陕西一带，实际上握着乡村教育的牛耳。

第二种是下级的小学教师，他们大半是未在中学或师范毕业的有的甚至仅仅高小毕业，就在小学里教书糊口。遍布江西全省的小学，大半是这些人在执教；甚至号称教育发达的江浙一带的乡村小学，也多半由这些人在开新式“子曰铺”。他们的学识不足，地位很低，生活很苦，精神不振。然而因为他们过着痛苦的生活，所以还比较容易理解现实。

第三种是正式的小学教师，大半是毕业于中学或师范学校，在小学界占着比较主要的地位。他们大多出身于小地主、富农或中农，他们在都市里住得久，也比较多受些近代教育。所以认识较高，能力较强，爱国心较强，而苦闷也较多。这些人之中，以初出学校者或在乡村师范毕业者为较纯洁而有热情。

自然，小学教师中还有不属于上述三类的人物，譬如像校长主任之类，每每是一种“学者”模样的绅士，身兼保长镇长乡长。这些人饱经世故，透悉人情。教育只是他们在乡中的一种政治地位的标志，他们要归到士绅一类中去讨论。

这几种人各自的缺点，已如上述；然而他们还有许多共同的缺点：1. 政治认识落后，爱国心不够热烈，抗日的信心不够坚强；2. 生活上个人主义的色彩很浓厚，缺乏自我牺牲的精神，缺乏集体行动的习惯；3. 因为被生活折磨，被现实折磨，甚至被本身教育折磨的结果，大多数人畏缩了，造成了一种怠惰的不肯奋进的心理。很明显，这些人先要被教育被改造过，然后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为抗日服务，为动员农村而努力。

这些乡村小学教师各有特点，动员的步骤方法自然也各异。切不能抱同样希望，更不能用一般的方法。

首先，对于各塾师，办训练班的方法是不行的。他们看不起别人，更看不起你毛头小伙子的训练。最好是由县政当局，或通过年高德劭公正知大体的绅士，最好是其中最公正最得人望的塾师来加以个别的说服；说服的题材，应该是文天祥、史可法之辈的英勇奋斗，宋太学生，明遗大夫一流的风节冰霜的例子。尊敬他们，说服他们，然后由他们再去说服其他的塾师。不要提出反对塾师或肃清私塾的口号；要在上述过程中，不知不觉的迅速完成改良私塾的目的。自然我们决不能过多的希望这些塾师有一天全成为农村抗战的主要领导者，但是，做到使他们不妨碍农村救国宣传，不反对农村抗敌组织，已经是很巨大的收获了。

对于第二类的人，我们要分区加以短期的训练，教给他们若干必要的政治常识，宣传技巧，以及改善小学课程的具体实例。要提高他们人生奋斗的希望，铲除他们根深蒂固的惰性。布置一些具体的农村救亡工作，如办农民识字班，农民抗日俱乐部，儿童抗日团等，他们是能胜任的。同时，部分改善他们的生活，实在非常的重要。

对于第三类的人（以及第二类的优秀分子），应该认为是小学教师中的中坚、动员农民的最有希望的干部。他们已有相当的工作能力，他们也有相当的政治认识，所以应该在工作中锻炼他们，在训练中改造他们。要让他们组织“小学教师抗敌后援会”之类的组织，吸收并领导全县广大的小学教师来参加，进行一般救亡工作，以及研究国防教育的实施。然后施以较长期较深入的政治训练，启发他们的认识，增加他们的能力，造成有用的干部，和农民大众的救亡工作打成一片；训练壮丁，组织村民等。

动员乡村小学教师，要有办法，也要有诚意。再把全国这许多乡村的“智囊”抛在旁边而不动员，真是一大罪恶！

（原载《中国农村》第4卷《战时特刊》第11号，1938年3月20日）

农村工作讨论会应当怎样进行

1937年9月国防参议会在南京曾经通过一个议案，决定召集全国农村工作专家讨论战时农村工作方案，筹备指导全国农村工作的中央机关。为着执行这个议案，政府有关当局和一部分农村工作专家曾在南京召开几次会议。然而因为当时领导机关，和各农村工作团体之间意见尚不能够完全一致，结果农村工作的原提方案经过几次三番的修改，成为毫无生气的具文；而全国农村工作者会议不久跟着国府迁都而烟消云散，我们到今天追想起来，实在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最近在第13期本刊上，读到陈传钢先生的文章，知道在汉口中华农学会等十二团体，梁漱溟、吴觉农等十多位先生，已经发起筹备召集全国农村工作讨论会，而且预定在5月里举行，这真是一个值得鼓舞庆祝的消息。

从会议的名称上看，我们一望而知它是继续着全国农村工作讨论会而来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者的会议。1930—1937年间风起云涌的农村建设运动，自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可是到今日，抗日战争全国规模地展开之后，它自然早已受到历史上应有的清算。当然它也必然有跟着时代前进的可能。这是因为这个乡村改良运动本身曾经带来若干进步的因素，如像：动员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为目前的乡村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刻苦耐劳的精神，重视实践重视客观教训的态度，更给此后的乡村工作

以重要的启示。当然，由乡村改良运动所结成的全国农村工作讨论会，从它三次大会的成绩而言，它也带来了应有的缺点和弱点：如像它在内容上是空虚的（很少切实效果）在形式上是散漫的非群众性的。

那末，现在的全国农村工作讨论会还应当全部继承着过去农村工作讨论会的基础和会议精神吗？自然不是。我们现在的大会，不应该仅仅继续过去农村工作讨论会的传统了。我们假使不充分地把握着这次讨论会的特点，就是忽略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实：抗战已经继续了十个月，农民已经广泛的被动员起来，经过五六年来的苦口婆心的努力早已超过改良运动的阶段了。

那末，当前的全国农村工作讨论会的客观任务，应该是什么呢？很明白的应该是：

（一）数年来乡村改良，乡村建设运动在抗战中的清算。这不是无意义的算旧帐，这是在伟大的抗战面前，来扬弃过去乡村运动的若干缺点和弱点，接受它的长处和优点，使乡村运动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扩大和加深这运动的意义。

（二）十个月来乡村动员工作的总结。这十个月来，中国的农村遭受空前的祸害（战区及沦陷区），也发生空前的变化（前方及后方）。农村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引起极大程度的变化。农村各界人民，对于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都有不同的认识 and 不同程度的实践。几万青年回到乡村去，为了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而艰苦奋斗。中国农村这样巨大的发动，和青年知识分子这样巨量的流入，一定促成我们对于农村工作的进一步的认识，创造出许多新鲜的作风，体会了不少的事实教训，以至于发现了许多过去所料想不到的困难。这十个月中极丰富的乡村工作经验，的确需要作一个总结，以便推进并启发第二期更广大更深入的农村动员工作。

(三)求工作的共同认识和一致行动。对日抗战把近年来的乡村改良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全面抗战也要求我们对于乡村工作有统一的步骤。我们根据这十个月来实际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必定能够求出一个对于战时乡村工作的共同认识;对于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问题,得出一个共同的意见。尤其是创造出乡村统一战线的新的工作方针。

(四)全国农村工作者的大团结:在过去,只有乡村工作领袖的少数人的团结,而没有全国乡村工作者的群众的大团结。这种大团结,是当时环境所不允许和若干的领袖所不愿意的。但现在,对日抗战把我们的工作目的溶化为一;为着增强工作的力量,和易于解决工作上的困难,我们确实有完成这个大团结的必要。而且,从上述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必然会使我们这个大团结获得客观上的可能性。

可是,我们应当用什么办法,怎样步骤,来完成上述任务呢?这应该是:第一、把这个讨论会的的确确变成全国任何乡村工作团体所能自由参加的会议;所以,筹备会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并作公开的普遍的号召。凡是从事乡村动员工作的一切团体,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永久的或临时的,机关性或群众性的,前方或后方,沦陷区或非沦陷区的,都有权利参加,而且应当设法使之参加。使这个会议的确能够负担起十个月战时乡村动员工作的总检阅的责任。第二、与这个号召并进,全国乡村工作的团体,应该立刻在自己工作人员中,讨论这次全国乡村工作会议的意义,检讨自己工作的各方面,工作路线,工作方式,工作成果,工作困难及克服困难的经过,工作教训及接受教训的程度等等,并且准备向大会提出在农村实际动员工作中所获得各项丰富的材料与提案。各团体在事前把这一部分的工作做得愈充分愈普遍,那末这次大会一定也愈多成就。第三、参加大会的任何团体,应该充分提高它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把它们丰富的经验和意见提供大会。所以，大会应该给予参加团体以发言讨论的充分时间。

最后，希望全国农村工作者团结起来，拥护这个讨论大会，使它能够如期举行。

（原载《中国农村》第4卷《战时特刊》第14号。
1938年5月5日）

论当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剪刀差的距离，到今天已经愈益严重，这大大地影响到本来已经千疮百孔的农村经济，影响到农民的经济负担和农业再生产正常的进行。我们大家都相信“抗战的胜利基础在于广大农村”这句名言，然而没有能够真正的理解到农村的力量不仅需要动员，而且也需要保护，更需要善于运用，善于培养。一切足以挫伤并残害农村经济和农民生计的现象，都应该及早加以消除和改正。

我们在战时缺乏一种全国性的十分正确的物价指数，足供我们用来研究当前农工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具体发展的形态。据经济部所搜集的重庆趸售物价指数，如以1937年6月为100，那末1939年平均总指数为244。然而物价的提高速度并不是一般的，有的飞涨，有的相对地反而降低。譬如十八种衣料类之指数是273.4，十八种染料类之指数是441.8，十一种金属电料类之指数是299.5，十二种杂类之指数是225，然而三十二种食料类之指数只有110.4。很明显，前四类物品都是工业产品，食料类的物价不但远低于燃料类和金属类的物价，而且低于总平均指数，这就是说，战时农产品价格已经比一般物品的价格，在相对上低了100%而有余。粗粗而言，过去农民用一石米可以买一匹布，现在非用二石七八斗不可，过去用一石米可以换一桶煤油的，现在非用四石四斗不可，过去用一石米可以换一柄犁，现在非用三石米不可

了。我们要知道，衣服，煤油，火柴，染料，铁器铁钉，盐等，在已经相当商品化的中国农村中，农民是非买不可的东西，中国农民无论如何可以节约，可以节省购用高价的工业产品，但时到如今，农村经济的自给自足已被破坏，节约只能是数量的减少，已经非用城市工业产品不可了！

然而工农物价的剪刀差，还不仅如此为止。要知道工业用品在城市中的趸售价格，远较农民所能实际买到的为低。这些工业用品经过辗转运输，几重捐税，几次中间商人的剥削，到了农民手里，价格不知又要高过几倍。这只要看看重庆以西内地城市中，工业品的价格远较重庆为高这点，已可明白证实，而农产品呢，却正相反，经过商人几重魔手翻弄过，在重庆大洋房子里出售的物价，已经不知道要比从农民家园子里挑出来卖去的农产品的价格，要高过多少倍！

农产品价格在战时不但赶不上工业品价格，而且事实上，不论后方前方，反而是价格惨跌！据《大公报》记者的记载称：

“川东的粮价随着丰收而暴跌了，去年米价，每市斗为3元，今年反为1元2角。”

在那洞庭湖畔的米产区域，情况也同样凄惨：

“而今新谷登场，经济枯窘的农民急求脱售，如汨罗（湘阴）每石只卖2.4元，而鹿角（岳阳）只卖2.2元……据记者访问若干农家的结果，每石谷要卖3元钱才不致亏本”。（1939年8月14日《正中日报》）

在后方比较安全区域的鄂西北一带，农产品价格也并没有什么好转。

“这里（指鄂西北一带）山岗连绵，交通极为不便，加之人民的贫乏，所以秋收后，谷价特别的低落，比起平时来，要少一倍多。”

（9月30日《新华日报》）

很明显，农产品价格的低贱，并不是由于其成本之低，实在是由于农村中缺乏资本主义的市场组织，而农民大众在半封建的经济关系的威逼掠夺之下，被逼着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这种情形在杂粮、商品作物上也是一样。

杂粮副产品在农村里还是滥贱如泥，连家畜的价格也便宜得厉害：

“豫西邓县一带，耕牛贱至每头18元，没有人拿出现钱来买；8分1斤的牛肉，和1角1斤的猪肉，直到军队到来才受刺激而涨价，鸡蛋1角钱买10个，农民若有1角钱，可买20斤红薯，也能维持一个人的五天生活。”（11月22日《东南日报》）

7月间外汇跌落，连浙江也大闹其日用品腾贵的当儿，那浙东大商埠的宁波，当地最主要的渔民的鱼产和农民的副产——白术却大大跌价：

“7月以来，宁波百物飞涨，惟力鱼每担价格，反自14元4角7分降低到11元3角2分，白术市价每百斤反自19元5角减至16元。”（同上）

此外，几种特殊的商品作物，专门用以出口换取外汇的，如象桐油、茶、丝、棉花（本国内），在战时似乎价格都有上升的趋势。不过，这里也有一些情形值得注意，（一）即使这些副产是涨价了，但在相对的意义还大大低于工业品物价的增涨。据9月10日重庆《新蜀报》载：鄂西安沙一带棉花产区，价格自1938年每担30余元涨至50余元，那末价格增涨亦不过80%，远不及棉布之涨价。（二）农民实际上享受不到涨价的利益，譬如象丝，若干丝产区域，似乎并不于农民有利：

“至小榄（广东中山县）产量，因格子环境，寄存甚多，成交则少，间有成交，每箱蚕茧之值仅毫券5角至6角，蚕农苦况，不言可喻。”（大陆通讯社稿，6月29日）

浙江是中国蚕丝的中心产区，为了和敌人争取外汇，双方就进行剧烈的经济战。据6月9、10日两天连载在《东南日报》上钱益祥君的一篇通讯《嘉兴今年的蚕业》，说到敌人在嘉兴，以80元一担的价格，用伪币收买鲜茧，而我们当地政府在所辖区城内收买鲜茧的办法是一律市秤，改良种批价每担55元，土种4⁵元，可是实际的市场上的价格呢：

“络绎于途的许多买茧人，经记者讯问过好几个，问他们用什么秤，他们的回答总是天平秤三个字。昨天又经过某处茧厂，听收茧的人正喊着：‘八十斤，念三元半’这样一算每斤连三角钱都没有了，假使用的是天平秤，那么不是更糟么！”

至于茶价，因为政府争取外汇，实行统制运销，讲究种种外运的方策，所以价格一般都看高，但对于农民而言，有许多情形，不一定完全享到实惠。浙江是战区，又是大产茶区，所以这方面的资料比较的多：

“因为我们规定的茶价低，农民受惠有限”。（6月7日于潜《浙西日报》）

在前一天的同报上，登载着一篇临安山户的呼声，题目叫做《价贱款欠与防止资敌》，署名者是临安县谷昌乡农民俞阿毛，现在摘引一部分于下：

“今春茶叶，由本省战区物产运销处来统制收买的，……当时规定了一个使茶农不亏本的标准茶价，——值此百物腾贵的年头，这个标准价是使农民亏损成本的，但小百姓没办法。在4月24日的一天，全县开始收买茶叶了，‘货色要好，价钱要巧，今年政府收买的，不比往年水客那样的可以随便’——这是茶行看货先生说的。茶收了不到一个礼拜，听说运销处主任召集茶行开会了，结果说是上面的款子没有到，议决了‘茶价要贱’‘货款要欠’两项要案，我们小百姓早已知道自己是苦命的娘胎里生下来的，这是该死的命苦！”（6月6日《浙西日报》）

6月8日的《民族日报》上，尚有一篇文章，从战区茶叶生产成本研究上，来看茶叶市价对于茶农的负担，其中说到：

“今年本省（浙江）收购扯价为23元7角，（根据贸易委员会订定）自属每况愈下。按永嘉在1933年间，绿茶每担价达80元，普通亦达35元至25元，茶农尚见亏蚀，于潜历年来茶价向高于他处，以其运输杭沪，出口特便故，以今衡之，茶农自必痛苦不堪！”

固然不错，上面所引的资料，是零碎的个别的，不具有统计性的权威，但至少告诉我们许多事实，让我们可以正眼看看农民的物价负担：农产品不但跌价，不但没有象工业品物价的日益猛涨，就是那些认为幸运儿的出口农产品，价格也并不一定有利于农业生产者。

有些地方的农产品价格是高涨的，譬如象临近海边，可以运粮出口的地方，敌人汉奸便肆意偷运出口，象粤桂边境南路一带便是。然而这不但在国防上有极大的损失，对于农民经济也是大损失，农民把一切眼前的剩余粮食都出售，就无法过那青黄不接的日子，这里有这样一段材料：

“目前博白至南路一带的谷米价格还不断地在飞涨，两个多月以前，每斤米1角2角便可以买到，现在则非3角不行了，以前每担谷只要8元多，大多数人的积谷都为了高价而卖光了。但将来怎么办呢？从2月到6月方收割，这一段长久的时间，农民们怎样去维持生计呢？这真不敢再想下去了。”（《救亡日报》）

在敌人占领的江南一带产米区，米价也涨到20元左右，这是因为敌人用军用票伪币滥行收购大量运出的结果，可是同时工业品价格更涨得迅速，我们很明白的可以断定，这对农民经济绝对没有好处。

对于这种日益严重日益扩大的农工物价剪刀差的情形，心怀忧虑，主张矫正的人是有的。可是，漠然置之的也不少。譬如10

月17日重庆各报竞相揭载的经济部对物价暴涨的谈话中说：“食料与衣料之物价，对于人民生活最有关系，其中食料一项，自抗战以后，其价格并未有显著之升涨，因近年来，各地丰收，粮食无缺，此实为我国一种幸运。因我国人民之收入，大部分消耗于食物上面……所以食物价格如未上涨，大多数人民生活即不致感到严重恐慌。”（中央社通讯稿）其实，各物昂贵，惟有农产品价格照旧，这并不一定是“幸运”，因为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却正好在入不敷出中饮泣吞声呀！此外，还有一种看法是纯粹的乐观主义，完全忽视这个农工物价剪刀差的作用，譬如象名记者曹聚仁先生在《外汇率与农村物价》（8月15日前后遍载各大报）一文中所企图证明的一样。但是要知道曹先生所举出来的例子是一个江南农村中，有自己独立住宅，有田（47亩）、地（19亩）、山（51亩），使用长短佣工，还开着店的富农！他们平衡战时收支的能力，远较贫农中农为强！他们只是农民中的少数！

一般说来，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剪刀式的差度愈大，对于农业经济会有巨大的影响，因之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也会有巨大的影响。（一）在这样的物价形势下，农村和城市进行着一种严重的不等价的交换。在平时，这种不等价交换因为半封建生产关系统治农村的缘故，已经严重地存在，成为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原因，而现在更加厉害了，农民的劳动力被无代价的剥削了。农民入不敷出，只好减低他自己的消费水准（这就是曹先生所称赞的“农民以减低消耗为消极抵制涨价的武器，造成普遍的节约”）把生活弄得更加恶化，而购买肥料、工具、修缮材料，改良种子及种植过程的能力大大地减低了，造成农业生产力的减退和农村经济的衰退。（二）这样会进而使城市与农村中交换纽带松懈，使农村减少甚至停止向城市作农工生产品的交换。农民在“节约”之下缩小自己的生产，城市里因为得不到农村中足够的农产品的供

给而造成恐慌，这种恐慌，会大大地影响到国民经济有力的发展，影响到抗战建国的力量。（三）尤其在敌我进行强烈的经济战的今天，农工物价剪刀差度愈大，使敌人的经济分离运动的阴谋也愈有活动的可能。

所以为了健全战时国民经济，培养农民经济能力，巩固农业生产起见，非对当前日益严重的农工物价剪刀差的问题，加以迅速补救不可。

补救的办法，并不是要使农产品价格也提高到工业品价格同样的飞涨水准来，这是违反经济法则的，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有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补救的意义是希望能做到农民在交换中损失减少，农工产品有适宜的供应，农村与城市间能进行顺畅的交换，农村不等价交换的比率减少，价格剪刀式差度缩小。这除了加强战时工业生产，优先供给农村所需日用品，切实压低工业品价格之外，同时还要在农业经济上改良其设施，大概是：

（一）资金应该更大量的流入农村，用低利供给农民（象浙西茶叶贷款，还要月息1分2厘！）把农民从高利贷手中解放出来，彻底改善并充实合作社，改善贷款手续和办法，驱逐土劣入社，使合作社变成真正农民的经济武装，同时取缔奸商，广设农业仓库，把农民从商业资本的手中解放出来。农民经济力一强，则农产品价格，便有经常发展的可能，价格提高的实惠，不会落在地主高利贷商人手中。

（二）改良农产物运销机构，便利交通工具，取缔各种农产物的苛杂，沟通前后方的农产物运销网。（6月21日浙江《正报》载：“淳安县年产茶叶桐油各约2万余担……由中央贸易委员会统制收买，现以该县县政府颁征茶桐捐税，计毛茶每百斤1元，箱茶1元4角，桐油1元5角，致惹起茶桐农商纷纷反对，大批箱茶篓茶均遭扣留”，其它同样消息极多）。

(三) 普遍的深入的在农村中推行工合运动，使农民能将商品作物在出售前经过简单的加工，一方面增加工业产品，减少运输消耗，一方面提高农产品价格，平衡剪刀差度。

(四) 厉行土地法令所规定各项办法，如执行耕地租用条例，减租减税等，把农民从中世纪的贫困中松过气来，使农民不必被迫于新谷登场时以低价出售农产品，再于青黄不接时高价购进，这比事后用几千万资金去维持粮价要好多，因为这时候已经不是维持农民的粮价，而是维持富农地主商人的粮价了。

这样从工农双方的生产过程的调整改善上来消除价格剪刀差的扩大，那才不是头疼医头毫无作为的物价评定委员会官样文章，而确实可以解救战时经济危机，健全农村经济的发展！

(原载《中国农村》第6卷第4期。1940年1月16日)

华中解放区的货币

在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有人民自己的货币，一般叫抗币，或叫边币。尽管敌伪用造假票子，用汇兑投机、伪币倾销等办法来破坏；尽管国民党反动派用“破坏币制统一”、“滥发无准备货币”等谰言来诬蔑和攻击；而我们的抗币却有最好的信用，抗币流通的数量和范围日益增加与扩大。

这里我们首先要答复国民党反动派的叫嚣谰言。他们说我们发行抗币目的是为解决财政困难，谁都知道这乃是他们夫子自道，而与解放区的事实完全不符。华中地区正式发行抗币，一般是在1942年夏季以后才开始的。当时敌伪停用法币，全面推进伪币，企图用强迫收兑的法币和天文数字的伪币来敌后根据地收买物资，从经济上破坏我们，这是何等毒辣的阴谋。而国民党反动派竟充耳不闻，毫不采取任何维护支持法币的办法。抗日民主政府如果不及时建立自己的货币，用以对抗伪币并主动的打击伪币，保护根据地人民的经济利益，那便将为人民犯不可宽恕的错误。就是这样，我们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也靠着抗币，我们才能肃清根据地内的伪币。其后国民党政府利用其法币发行权，配合伪币，还曾经大大的损害了我们解放区人民的利益。1943年到1944年，中央银行的票子原包原封的大批倾销到根据地，有的甚至还是原张纸而来不及切开的。于是根据地内物资西流，物价飞涨，弄得人心惶惶，终于靠了全体军民的同心同德，靠着贸易管

理和抗币流通区域的扩大，使国民党反动派的货币进攻失败了。敌人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都仇恨抗币，不惜用各种谰言及毒辣的手段来诬蔑它，进攻它，这是和他们的军事、政治完全配合一致的。

抗币的发行，我们是严格的符合于货币学原则的。今天全世界的货币，都已变成管理货币，和硬币没有直接联系，对外一定的汇兑靠对外贸易来维持，最后的差额用黄金来清算。所谓金本位，都只是一种汇兑清算本位。由此可见，货币在国内市场中主要是尽了流通工具或是交换工具的机能，只要它的发行的数量能按市场需要而适当调节，使货币的流通量符合市场的流通需要，那末这种货币就可以有一定的购买力，维持一定的币值。可是，如果破坏了这一法则，通货的增发超过了市场的需要，那末任你有黄金作准备，任你有美元作后盾，都是没有用的，必然的现象便是币值日落，物价日涨。而破坏这一法则的主要力量是财政赤字，收支不能平衡，造成财政发行，于是货币便走上膨胀和贬值的道路。不要说今天的伪币是如此，便是法币，由于财政发行的结果，何尝不是如此。尽管把发行额秘密起来，但是重庆、昆明、贵阳、西安等地的物价飞涨可作最好的证明。解放区的抗币也是一种管理货币，但和法币伪币不同，它的发行量，是受到严格的管理的，经常按照市场的需要来调剂头寸，绝对不准接受财政透支。而且由于新四军的艰苦作风，部队机关大小生产运动的开展，使我们的财政保持着良好的健全的状况，我们任何地区都是有节余的，既不需发行公债来弥补，更不需要财政发行来救急，所以抗币的发行可以严格按照货币学的正确原则，执行其发行政策的规定，而不受其他牵制。测验抗币的信用和购买力的最好指标是物价，如今各根据地的物价不但远低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对外方面，现在我们当然不需要黄金或外国货币来清算，

而且由于我们根据地有丰富的物资，我们对敌伪还是绝对出超的，我们对国民党地区也保持平衡或出超；由于管理贸易管理外汇的结果，这巨大的出超就保证了我们的抗币对伪币保有绝对的优势（政治上的优势我们在此暂不谈），我们可以不断地压低伪币的汇价，也就是压低进口货的抗币价格，使根据地人民增加了财富。今天抗币1元，有的地区已经可以换到伪币600元，最低的地区也可以换到180元。对于法币，根据地还是采取维持的方针，我们维持了1元抗币换到50元法币的比价。只有当国民党反动派光用不断膨胀的法币来吸收根据地物资，企图淹死解放区军民时，它的价格才受了货币法则支配而下降，而远远超过于我们维持的能力之外；要70到90元才能换到1元抗币。以上是说明抗币在根据地内和根据地外所以能有很高的购买力的科学根据。

那末，我们新发行的抗币，既不准作财政用途，究竟做什么用呢？伪币的发行权是由敌人控制，用来榨取敌伪区人民的财富和物资的。法币的发行权是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用以满足财政需要，和供给大资本家大官僚买办阶级做发国难财，实行统制专卖，从事黄金和外汇投机的资本用的。货币是发行的政府对全体人民欠的债务，今天敌伪也好，国民党反动派也好，就用这些取之于民的通货倒转来加紧剥削人民。我们的抗币怎么样呢？正象抗日民主政府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一样，抗币的发行就要用以增进根据地人民的经济利益，这也就明确的规定了我们的发行政策，应该是促进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提高生产，并繁荣市场。就是说，我们主要是推行各种各类的生产贷款，广大人民都能借到银行的款子来发展生产；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使根据地更富裕了，富裕的人民都是银行的债务者，这样抗币的基础自然更巩固了（根据地富裕了），而抗币的信用都由这些日益富裕的人民来支持。这就是抗币发行的最坚实的基础，我们的发行准备库就

安置在这样坚实的人民的手里。

因为根据地内主要的生产者农民，所以各地在抗币发行的第一年，差不多都有50%左右的发行额，用作农业贷款，包括耕牛、种子、水利、植棉、植麻等各种项目。甚至到1944年，淮北银号所发行的淮北抗币，其总额70%左右用作农贷，其中：光是贷出粮食一项，就在2,000万斤以上。借款的组织是借户小组，他们互相保证信用，直接向银行的区办事处申请借款，经审查合格的就可以取得贷款，手续是很简单而便捷的。贷款是有计划的分配到最需要这些借款以扩大生产的农户，而不是平均的贷出。原则是借钱还钱，借粮还粮，半年或一年结算一次，收还贷款，重新贷出。利息是年利5厘到1分，最高没有过1分半的。这样巨额的农贷，对根据地的落后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

随着抗币发行数额的逐渐增加，银行逐渐有力量和有必要用它来调节市场，控制主要物资，来和敌伪进行贸易斗争及外汇斗争。这就是收购发行。在目前阶段中，收购发行占我们总发行额比较重要的部分。根据地内主要的物资是粮食（食粮和油粮），其次是棉花、油、油饼、猪、酒、鱼产等等。这些物产在根据地说是过剩的，需要出口的，在敌伪说却是生活必需的，是求之不得的；但是敌伪利用其城市的优势，控制工业品压低农产品来剥削我们，特别当粮食新上场（其他农产品也是如此）的时候把粮价压得最厉害，我们的抗币发行这时就需要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我们一方面大规模发出抵押放款，农民可以粮食抵押，借到款子以满足其货币的需要，等到粮价上升季节，农民可以高价出卖粮食，付还银行借款，其粮价上涨的全部利益，都是为借款人所得的。淮北银号在这方面就办得很有成绩。另一方面我们提高价格收买粮食，敌区粮价压得越低，我们越要适当提价，这样使

急于要出卖粮食的农民，也能获得较高代价，使他们能保住一定的生产利润；而银行提价收买结果，可以刺激商人粮行等也提价收买，同时还可以刺激农民不急于抛出粮食，这样根据物资控制经过经济力量的组织，便愈益严密，而加强了对敌反封锁的力量，支持了贸易斗争。粮食之外，其他农产品，按其重要性和季节性，银行资金（抗币）也作必要的调剂。由于银行能够控制了主要的物资，大大地支持了对敌伪的贸易斗争，在有利条件下掌握到主动权。而贸易管理和斗争的胜利，就能拒绝伪币的流入，保障抗币的流通范围，缩小剪刀差，实际即提高了抗币的价值；掌握了伪币头寸，使抗币能掌握优势，和它作外汇斗争。银行还掌握了一小部分工业品，用以调剂市场的供应。因为根据地是农村环境，所以货币需要严格的受农业市场季节性的影响。一般说，从夏收到秋收前，从秋收后到阴历年关前，都是市场最需要通货的时候，抗币的发行在这时候最多，而当阴历年后，夏收以前，通货需要量便大大缩小。银行这时便需要通过贸易局公营商店公行等经济机关，适当的放出物资——农产品和工业品，以收回通货（当然还可以通过税收机关的收税等），使通货能恰当保持市场需要的数量。这种收购发行的一部分，同时也带有实物准备的性质；但就整个来说，它不是保存实物来作准备，而是运用实物来繁荣市场，控制实物来求对外贸易斗争的胜利；从这方面来巩固抗币信用，提高抗币币值。

但是由于战争形势有利于人民的发展，根据地对外贸易有不断减低的可能，敌区工业生产因敌人贪婪地搜刮和军事行动的结果，大有无货可供输入的可能。根据地对外进出口贸易可能趋于锐减或停顿。因之根据地今天便已开始自给自足的运动；我们的方针是发展手工业，建立示范的公营工业，用很大力量帮助私人企业，发展合作社，以求得工业品主要部分或大部的自给。所以我

们的抗币就必需作生产发行，由银行大批贷出，帮助这些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到现在为止，多的地区，工业性的生产贷款（工厂及生产合作社等）约占发行额的25%，少的地区也有10%左右。现在有些地区，纱和布，纸张和肥皂等已开始自给。从现在开始，抗币发行额中，用作工业投资和工业贷款的数量，必将大大的提高，将来可能占发行额中的主要部分。根据地的金融资本，才真正是帮助合作社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发展的。

此外，银行的发行额中，还有用之于中小业主贷款、私人商业贷款，以及春荒困难时期的救济贷款等等，这里不一一讨论了。

银行的贷款，不论公私企业、合作社或个体农民，最高的利息都不超过年息1分5厘，最低只要年息5厘，象盐阜银行的贷款，便一般的只有5厘。

那末银行发出大批抗币，实行低利贷款，银行是否会亏本，或者无利可图呢？一般人从私人银行观点或商业观点来发这一疑问，也可说是应该的。但我们的银行是抗日民主政府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每一个发钞（抗币）银行都具有国家银行的性质，它的任务就是扶植人民生产（农业和工业），发展经济，繁荣市场，这个目的达到了，抗币的信用更高，抗币的流通需要也更高，抗币的币值也就安置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而这些也就是银行和抗币的本身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国家银行和国民党的国家银行的不同所在，是我们的货币发行政策和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政策的不同所在。至于敌人玩之掌上之伪银行和伪币，那自然更不能相提并论了。

然则我们抗币的前途如何呢？伪币和法币的前途又如何呢？伪币，必然崩溃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崩溃成为不值分文的废纸，这样的日子也可以计算得出了。然而敌人在其最后的失败之前，

在被盟军和新四军从华中肃清出去以前，它还一定要继续伪币恶性膨胀来搜刮物资，剥削人民，以便“协力”战争的。所以敌占区人民的财富如果和伪币相联系，那就丝毫没有保障，必然从愈滚愈少，到最后化为乌有。希腊的伪币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而抗币呢？不仅可以随着伪币的膨胀指数来压低伪币的汇价，而且由于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程度的日益增加，新解放区面积的扩大，和城市的增多，我们需要敌伪区的物资一定会大大减低，而敌伪区对我们的农产品的依赖相反的倒会增加，这样伪币对抗币的汇价一定更会惊人的跌落下去。今天受我包围的敌伪据点及小城市，由于根据地的扩大和包围圈的缩小，有些据点里的人民拿了伪币已经有买不到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秘密地购储抗币，在这些据点里已是半公开的了。随着总反攻的到来，华中诸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在我军包围之中，一旦我军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并光复这些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之后，抗币的流通范围便更扩大，将成为整个华中主要通货。上海的资产阶级，鉴于盟军和希腊解放军所克服的地区，要以50万个旧希腊币（即被法西斯德国所膨胀发行的）来换1个新的希腊币因而惊相传告，觉得货币上的损失太大。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今天1元抗币已可换到600元伪币，到了敌伪全部垮台的时候，到底1元抗币将换到几车子的伪币，实在也很难说。这就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教训：人民的财富一定要和最可靠的最有信用的货币联接在一起，才能有保证，否则终有一天会使百万富翁抱着一堆废纸哭泣的。但到那时哭泣又有何用呢？

于是或者有人要问那末法币怎样呢？意思就是说盟军是否会支持法币在收复的大城市中部分复活呢？对，这种可能自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正象上海的投机家在二、三月间曾利用法币和美金券，大大的发过一笔横财一样。但要知道，（一）法币本身已

经是恶性膨胀的通货，它自己的命运必然被无情的货币法则所清算；（二）大城市被克服时，工业设备和生产力一定要遭敌人破坏，不但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柴米油盐等要靠根据地供给，而且着手恢复工业所需要的动力（煤）和原料，也要靠根据地供给，这样便非需要抗币不可；因为美国太远了，能用法币买到东西的地区也太远了（国民党远在云、贵、川、康），法币既然没有力量能够负起供给大城市的责任；大城市的居民即使有了法币也没有用处。今天对法币抱着幻想而还想储藏法币的，对此应加深省。

当然，抗币作为一个完整的本位通货来说，也还有若干不完备的地方。首先是抗币还和法币维持着固定的联系，法币的膨胀，也就影响到抗币的价格；其次，抗币发行在敌后，由于地区的被分割，所以抗币的发行也采取地方性的，由于一年来敌后解放区的扩大，分割环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根据地内的商业流通范围天天在扩大，便开始感觉到地方抗币的不够方便，需要有统一抗币的发行。的确，货币就其本身的机能来说，是需要单一本位制的；而且也需统一的流通范围的。当然，问题的发生，同时也就具备了解决问题的客观条件，我们相信，以上两个缺陷，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获得适当的解决。

（原载《新华论坛》第1卷第10期。1945年7月1日）

巩固地发展我国与欧洲各 人民民主国家间的贸易

解放以来，我国和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先后建立了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是基于平等互利和互助合作的原则的。相互之间的货物周转，以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数量，稳步地不断地发展着。双方经过对外贸易，实现了密切的经济合作，满足了双方人民的需要。这种人民友谊的实际表现，将年复一年地发展和增长起来。

1953年，我们国家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开始了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我国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更有了新的重大意义。经过友好和谐的谈判，我国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先后签订了1953年的贸易协定。我国与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货物周转数量，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增长起来；与1952年相比，今年贸易总额增长了37.42%。这标志着我国与各兄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更加密切与发展了；也说明在以苏联为首的新的民主世界市场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是日益繁荣和壮大着。相反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正在日益萎缩着，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日趋剧烈，美国独占资本家为争取最大利润，正在人为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因而严重地损害了英法各国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

改善；美国并且更卑鄙、更残酷地榨取着殖民地及附属国的资源，使那些国家的人民生活陷入极困苦的境地。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世界市场之间的根本区别，从1953年我国与欧洲六个人民民主国家贸易中也尖锐地体现出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性和优越性不是资本主义可比拟的。

在1953年，我国从欧洲六个人民民主国家进口的物资中间，就其商品的经济性质而言，生产资料占74.58%，生产原料占13.24%，生活消费资料占21.28%。生产资料所占比重，比1952年增加21%。其中机械，如工作母机、动力机、钻探机、起重机、拖拉机及建筑机械、车辆等等，约占总进口额52%以上，较1952年增加了将近三倍。这不仅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的规模与和平性质，以及各兄弟国家对我国经济建设的热情支援，并且雄辩地说明了各兄弟国家在苏联无私的、技术精湛的积极援助之下，工业建设已获得重大成就。就国别而言，波兰供应的钢铁、五金、机器较1952年增加一半以上。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的工作母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供应的各项机械、车辆都大大超过过去两年的供应量。匈牙利供应的物资中，生产资料与生产原料占绝大比重。罗马尼亚供应了钻探机和炼油设备。保加利亚供应了化学产品。我们从各兄弟国家那里获得这些重要的建设物资，感到同志般的光荣和骄傲。此外，技术援助与成套设备的订货，比1952年也有显著增加。这种供应势将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此大量的生产手段的周转，在资本主义市场里是很难想像的。

对于兄弟国家，我们供应了各种重要的矿产品：钨砂、钼砂、水银、石棉、锡、钴、生铁、铁砂等，使兄弟国家的冶金工业，获得了可贵的生产资源。我们供应匈牙利、波兰以农产品、油脂；供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以油脂、油料、肉类食品，使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生活得更幸福；供应波兰、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以各种麻类和棉花，使他们的纺织工业获得必要的原料。我们相互间是殷切地关怀着，都是尽各自之所能，满足对方生产上和生活上的需要，来共同发展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

不仅如此。我们还进行了相当数额的对1954年的预先订货贸易，这说明我们相互间发展贸易的真实需要和继续扩大贸易合作关系的美好远景。这将为我国与各兄弟国家之间建立长期贸易协定打下有利的基础，将使我国与各兄弟国家之间在生产计划上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我们之间的贸易，双方都信守着新的民主世界市场的作价原则——不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备战经济的投机因素和资本主义市场盲目波动所影响的稳定价格。这使我们之间的贸易成为一种经济上分工合作的物资周转的有组织的活动。个别商品价格因不符合作价原则而不合理者，都已自动地作了调整。即使已经签订了合同，或已经正式交货，如发现作价有不符合原则时，亦会自动修正。譬如匈牙利供应的钢卷尺、球类、锁类等，都自动按原价减低1—2%左右，捷克斯洛伐克的铁道专用统计机，已签订了合同，发现计算上有问题，自动提出修正，减少了60万卢布。民主德国的荧光板也自动降低价格36.69%。这样事情，都是在友好的情绪中进行的。我国和波兰确定转口棉花的作价原则以后，就自动地调低了供给罗马尼亚等国的棉花价格。我国供应匈牙利的肠衣，甚至货已出口了，仍自动调低价格25%。这种平等互利，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精神和作风，是基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而来的，这种合作是十分真诚与可贵的。资本主义市场上尔虞我诈，漫天讨价落地还价的恶劣作风，在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

根据贸易协定而签订的各项具体合同，1953年进行得比往年更要迅速和准确，因此相互之间的交货时间都提早了。这对双方

都是有利的。对于合同，双方都以信守不渝的精神，准确地履行着。双方都以严格执行合同的义务，视作政治上的光荣。现在，越过大洋，经过铁路，我国与各兄弟国家的劳动人民的高贵的生产品，正在进行紧张的交流；当1953年度协定清算时期到来以前，我们各自都会发现，已因确切完成对兄弟国家的合同义务，而感到愉快和高兴。

由此可见，我国与各兄弟国家之间贸易，是基于共同的真诚愿望的结果，对于我们双方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是有积极利益的，因而对于世界的和平事业，也是有重要意义的。由此更可证明，对于拥有8亿人口、掌握了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国家，所谓“禁运”、“封锁”，是根本吓唬不了我们的。新的世界民主市场发展，是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阻碍的。

人民民主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乃是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的，它的特点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它是循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进行的。对外贸易自然也就反映这种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特点，并服从这一基本经济法则。我国和兄弟国家的经济建设，在伟大苏联帮助之下，将日益巩固和发展，我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势必愈趋密切，因而我国与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间的贸易，一定要有计划地扩大和发展起来。在胜利的完成1953年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积极地准备着，为迎接1954年贸易的更大发展而努力。

（原载《人民日报》1953年8月13日）

调整我国人口再生产的关键性决策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物质资料的生产 and 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之间需要保持平衡关系。当这个平衡关系严重失调时，社会的物质生产就会趋于停滞和延缓发展，或则人类自身生产被迫停止增殖，甚至绝对地缩减人口。我国解放以来，在物质生产方面，虽则取得相当成就，但由于左倾思想作祟，几次大折腾，到1976年国民经济已闹到破产的边缘。在人口生产方面，由于客观原因再加上左倾思想的推波助澜，以致30年中全国净增人口4.2亿，相当于解放前一百零九年（1840--1949）中净增人口1.3亿的3倍多。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低于应有速度，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高于可以容忍的速度，两种生产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空前庞大的人口总数，还同土地、森林、矿产、植被、能源、水源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形成严重对立。所有这些矛盾，集中表现为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人民消费水平低下，待业和就业不足的劳动力数量很大，其结果使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远远落在世界发达国家之后。

当前摆在我国人民面前重大的任务，就是两种生产一齐抓。当然，首要的是对国家经济实行调整与改革。同时，也必须狠抓人口生产的调整，采取非常性措施，使当前正处于人口迅猛增长的新高潮能够尽量延缓、刹住和扭转过来，从而使人口增长速度继续逐步下降，使人口质量有可能逐步提高，努力争取在今后三

四十年内使人口增长率减低到零，达到第一步战略目标。在我看来，由于我国人口的特殊情况，在全国人口达到零度增长之前，要求在劳动生产率上和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上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将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我国人口增长的减速运动，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前途，确实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二步要继续向下调整人口总量，使之达到同物质资料生产、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之间处于最优化的比例状态。到了这时，人口自身生产对于物质资料生产将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当前调整人口这个关键性时刻，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争取本世纪末全国人口总数不超过12亿，正是非常英明的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非常性的决策措施。按我国人口调整的迫切性来说，如果现在全国就能做到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那末到20世纪末，人口总数稍稍超过10亿，这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了。但实际上还不可能办到。其所以提出争取20世纪末人口总数不超过12亿，就是照顾实际，留有余地。这是因为考虑到人口生产的惯性特别大，不象物质资料生产的调整见效快。著名科学家宋健同志曾精密计算过，我国从1964年到1978年净增2.5亿人口，从现在起，即使全面做到“只生一个孩子”，要想回到1964年的7亿人口的水平，就需要有75年的调整时间。按照现在中央调整人口的方案推算，要到2040年左右，才能达到零度增长，那时全国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当然，看来是缓慢些，但比较稳妥可靠，如果各方面配合得好，可能争取提前完成。但是，如果力量组织得不好，办法措施跟不上，那末中央提出的争取20世纪末不超过12亿的战略目标，就会落空。如果一对夫妻仍生二个孩子，到本世纪末人口会增加到12.2亿以上，要到2050年左右人口增加到15.3亿才能稳定下来；由此要想继续调整到最优化的理想人口总数，势必非拖到2100年以后的更长时间了。

所以，现在是关键时刻。要做到保证实现20世纪末不超过12亿的任务，就必须下大力量解决五个问题：

第一，还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坚定信心。“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中国人口的大革命，世界上也没有先例。我国人口基数太大，而底子又太薄，解放后人口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类型，已经形成生产资料不足以吸收劳动力供给的人口过剩的现象，而社会人口构成又很年轻，人口自然增长的势头尚猛，因此除采取只生一个孩子的非常决策之外，别无其他可行之途。当然眼前执行起来，困难确实较大，但是唯其因为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只要措置得宜，相信人民是通情达理的，最后一定办得通的。所以对于中央的决策，应当统一认识，坚定信心，不应摇摆。目前，在城镇，只生一个孩子，比较容易办到。在农村，由于农民的经济利益和落后思想的影响，困难确实存在，而8亿人口的农村，正是计划生育成败所系，关键所在，需要认真对待。

第二，“晚稀少”中的“晚”，还是不应放弃。晚婚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这本来已是明摆着的事实。一位人口学者说：“初婚年龄推迟五岁，每100年可少生一代人。以我国目前人口总数为基数进行推算，少生一代人大约可少生1.3亿人”。新《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这比近十年计划生育中实际控制的婚龄有所提早，它的后果现在也已成了现实。当然，提前一些法定婚龄，也许有其必要，并且尽管法定婚龄提早了，如果工作做得到家，仍然可以使育龄推迟到24至25岁左右，这就更加两全其美了。就发达国家而言，实际婚龄是日趋推迟的。例如日本，1965年至1974年，妇女平均初婚为24.2岁，1978年又推迟为25.1岁。据北京一位妇产科专家说：“一般女青年在23岁到28岁，其生育（分娩）过程，

母婴情况，都是比较好的，和难产不发生必然联系。”可见，晚育也是符合生理科学的。因此，新《婚姻法》规定：“晚婚晚育应予鼓励”，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必须颁布计划生育法。我以为对于“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为中心措施的计划生育，在提倡推行上，通过思想工作、宣传教育说服鼓励乃至党团员和各级干部的带头作用，确实是重要的，但也还须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合理措施包括立法措施在内。当然法律决不是万能的，但是关于计划生育这样事关亿万人民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确有充分必要制订计划生育法，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根据。有人认为，对于计划生育，只能奖励教育，不能强迫命令，因而不赞成制订计划生育法。法律是有强制性的，但强制性不等于强迫命令；正是为了杜绝在计划生育的具体工作中有些地方曾出现过的一些强迫命令现象，所以须要制订计划生育法，作为全国人民无分老幼共同遵行的法规。

第四，一定要妥善地考虑和解决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问题，不能再拖延了。我国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有些少数民族在解放前人口已经急剧减少，如象藏族；有些甚至已经濒临绝灭，如象赫哲族、鄂伦春族等。全国解放后，我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民主改革，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和卫生医疗事业，实行鼓励人口增殖政策。这些政策，应当肯定是正确的。三十年来，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十分迅速，1978年估计，已经发展到5 600万人，略低于意大利，而高于英、法或越南的一国总人口。而我国少数民族中也有“多数”民族，其中如壮族，1978年有1200万人，略少于伊拉克，略多于智利、加纳。尤其值得注意的，我国人口问题上所表现的矛盾，如人均耕地不断缩减，人均粮食占有量很少增加，农业劳动力就业不足，城镇待业人口增加，人均收

入很低等等，在少数民族地区远较全国平均水平更为尖锐严重。今后，国家除了继续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之外，已经到了必须解决人口增加过速所已经造成的或者将要造成的危害之时了。根据某些专家测算，目前少数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5%，即使考虑到今后将稍稍降低，根据中位测算，今后如以23%递增，则本世纪末将增加到9500万人，一百年后到2030年将达5亿人。这对全国人口调整上就成了背道而驰的因素了。时至今日，全国一盘棋，必须通盘地高瞻远瞩地考虑和解决我国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人口问题。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坚持与对汉族不同，必须坚持绝对不能一刀切，一定要区别对待，按各少数民族的人口结构、发展类型、人口数量、经济自然条件、聚居与杂居的不同条件等等，分别规定。有的应该控制，有的可以暂时听其自然，有的还应鼓励他们发展人口，等等。对于即使应当控制的，在措施上也要放宽尺度，放慢步调，要尽可能地通过宣传教育，在提高他们自觉性的基础上进行，尽量避免采取简单的行政性措施。

第五，必须切实注意人口投资，既要量力而行，也不能越俎不前。（一）是对于只生一个孩子的，应继续落实奖励及有关措施。（二）是要逐步解决年老无子女户的生养病死的社会保险，国家与集体要共同负责，一户一户落实到底。（三）是尽力解决计划生育中必须解决的医药卫生技术和安全措施，提高避孕、绝育的效率和一个孩子的成活率，并使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改善托儿所幼儿园的托养措施。（四）是普及从小学到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师资的教育水平，改善教师待遇，扩展职业中学，增加高中和大学的入学率，办好业余教育，普遍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和卫生健康水平。在调整人口数量的同时，务必在提高人口质量上狠下工夫。（五）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果、

发展工农生产的同时，一定要相应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口的发展固然受社会制度的制约，但归根到底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社会生产力则是通过经济生活水平作为中介来对人口再生产起到决定作用的。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降低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内部的根本的动力。培养内部动力，执行外部措施，表里结合，就能比较顺利地实现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决策。

（原载《光明日报》1981年8月29日）

评我国三十年来人口理论的研究

我国解放三十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成绩是显著的。但同时也犯有错误：在物质生产方面，有过两次大折腾，使国民经济损失几千亿元；在人口生产方面，进行了两次大批判，使人口猛增了4.2亿人，增加87%。两者互相影响，使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情况，到现在还得不到改变，使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至今列于世界各国的后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应有可能对三十年来我国人口理论的研究进行初步评介了。

一、解放前我国人口理论简述

近代我国人口的庞大基数，形成于18世纪。我国第一次突破1亿人的大关，大致在雍正（1723—1735年）年间。1741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14 341万人，到1770年增至21 301万人，三十年间增加了7 020万人，计增加49%（增加速率比解放后的三十年低得多，1790年突破3亿大关，为30 148万人，五十年间增加了15 807万人，^①约占当时世界人口1/3。当时我国还没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人口理论来预测人口这样迅速增长对社会发展可能引起的后果；也没有科学技术可以对生育进行有效控制，专制皇帝即使“天纵圣明”，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尽管如此，但是已

已经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关心。洪亮吉于1793年、汪士铎于1855年先后提出理论解释以及节制控制人口增长生育的具体办法。对此，至今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他们是受到马尔萨斯影响的。

20世纪20年代前后，董时进、顾孟余、陈长蘅、许仕廉、马寅初、费孝通、吴景超等陆续发表了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他们的论点带有马尔萨斯主义的色彩，某些政治性的意见，则是错误的。至于我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他们都反对用马尔萨斯的观点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但是“并不抹煞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对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主张，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使的。”^②总的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全国解放之前，由于中心任务的缘故，对我国人口问题，无暇作系统的探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我所知，也没有谁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主张我国人口越多越好。

二、五十年代的两次大批判

全国解放后，1949年末，我国人口是54 880万人，是世界上第一位人口大国。1953年6月，我国公布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人口总数已达60 193万人，自然增长率达20‰。1953年—1957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2.2%，远远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在原有庞大人口基础上，人口这样空前迅猛的增长，理所当然地引起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注，也引起一批爱国的人口学者的探索。于是对我国人口问题的讨论，逐渐展开。马寅初、吴景超、费孝通、陈达、孙本文等，在检查自己过去的理论上某些错误之后，本着人口科学的专业所长和对世界人口发展的丰富知识，对全国解放人口迅猛增长的趋势，表示忧虑，积极主张控制人口增长。

到了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一起，这些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人口学家，几乎全被打成右派，接着就展开了第一次对人口理论的大批判。^③上述这些学者当然无权答辩，唯有马寅初还坚持他的《新人口论》。于是继续对他进行批判，直到1960年马老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退出政治和学术舞台才渐趋平息。这两次大批判，扼杀了我国人口理论研究，对我国人口继续迅猛增长，影响极大。

有人说，这是一场人口理论的大辩论。看来不是。因为辩论应该是双方平等的，允许对方答辩。而当时是大批判，批判的对象已判定为敌人，哪许他们有答辩的权利。然而双方的论点，针锋相对，截然分明：被批判的一方，以马寅初新人口论为代表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批判的一方，主张“人越多越好”。下面分七个问题，对双方不同的论点，加以评介。

（一）在六亿人口基础上人口继续猛增，应采取什么态度？

被批判者认为：“在目前64 000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出生出1 300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

“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你们要人多，要人口增加到9亿、10亿，岂不拖住我们进入共产社会大门的后腿么？”^④“依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来看，我国不但没有必要再鼓励人口增加，而且目前应当适当地降低过高的人口增长率。”^⑤

批判者认为：“人愈多，就愈能加速建成社会主义，人愈多，就愈能提早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⑥

“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能愈快地促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愈快地促使国家的物产丰富、兴旺强盛，就能愈快地促使人民群众的生活优裕、文化提高，……。”^⑦“社会

主义国家决不惧怕人口的高速度增长，而是为人口高速度增长创设一切有利条件。”^⑧

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根本分歧之所在。

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而且人口生产必须适应物质生产，否则，社会经济发展，必将受到阻碍和抑制。旧中国的庞大人口，实质上起着马克思所说的“人口压迫生产力”的作用。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也就是技术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因而从总的趋势看，活劳动的需要对比着增长得很慢，甚至还要减少。我国当时拥有的举世无双的劳动资源，它不仅已能保证充分满足国民经济对劳动力的需要，而且在社会生产的技术改造过程中，还将腾出大量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如果每年再以1,200万人以上的速度迅猛增长，势必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负担，从而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那种以为人愈多，愈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正是手工业小生产者思想的反映，决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二）人口增加与积累及消费的关系

被批判者认为，“因人口大，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⑨“中国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不平衡的。我们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可以把目前存在的劳动力，加以最合理、最经济、最有效的利用。”“在一定的时期内，降低了消费，就增加了积累。反之，如果增加了消费，也就会降低了积累。正是在提高积累这一问题上，我们愿意指出，过高的人口出生率，是有

碍于积累的迅速增加的。”^⑩

批判者认为：“尽管人口多，增殖快，……但是归根到底，我国工业化资金能不能积累起来，取决于社会制度，而不是取决于人口多寡和增殖快慢。”“新人口论者把新出生的人口，看作是纯粹消费的因素，是妨碍积累的因素，这是马尔萨斯的仇视人的观点的翻版，是绝对不能容许的”。^⑪“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懂也不可能懂得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⑫“他（按即马老）只把人看成是消费者，而不是把人首先看成是生产者；只知道人有一张口，而不知道人更重要的是有一双万能的手。……是无穷无尽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⑬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总的来说，人所生产的超过于他们所消费的。但是如果认为在任何国家、任何条件下，人愈多愈好，则是片面的。

人首先是消费者，然后才能成为生产者。在他的一生中，作为生产者，大致只占一半稍多时间。但人作为消费者，他从生到死，没有一天能够停止。就全社会而言，生产劳动人口是少数。所以对于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我国，每年再以高速度增殖人口，必然要增加新的消费者，并追加一个相当大的消费基金，因而势必减少积累基金，如果要维持较高的积累率，则势必降低社会消费水平，从而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降低生产。而且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的国家，人作为生产者的作用愈小，作为消费者的作用愈大，一生劳动中所能积累的，相对地说必然要少些。

人虽生有双手，但必须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否则只是可能的生产者，现实的消费者。如果积累不足，社会的生产资料吸收不了社会所拥有的劳动力，那么，这部分的劳动力势将被迫成为纯

消费者。

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先进的技术装备基础之上，而不能在手工生产基础上巩固下来。因此，社会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必须努力增加积累。而积累在一定时期总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也要有一定限度，使两者保持最优比例，然后才能使社会适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在最优状态下发挥生产者的作用，为社会创造财富。离开生产资料谈人有双手，是生产者，这是不符合政治经济学原理的。

一二十年来，就业问题一直在苦扰着整个社会。至今城市每年尚有成百万的待业青年，农村有一亿多人就业不足，这是对于人越多越好论做出的实际结论。

（三）人口增长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及失业的关系

被批判者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论增加生产也好，或是增加积累也好，靠增加劳动量来达到这一目的，不如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后者是达到目的的更为迅速的途径。”^⑭“要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地积累资金，加强每个工人的技术装备，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如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能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例地提高，二者收入的差别愈来愈大，就影响着工农联盟，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⑮“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1000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一个人就可以做了，请问其余999人怎么办？”^⑯

批判者说：“社会主义社会永远不会产生失业现象，永远不会感到劳动力过剩。”^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机器的使用不会排斥工人，根本不产生人口过剩现象。”^⑱“谁都知道，‘机器排斥工人’，是作为马尔萨斯主义所以兴起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对抗性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成了机器的主人，这一个矛盾也就根本消灭了。”^⑲

批判者不反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在发展机械化自动化的同时，又力争人越多越好，这就陷入逻辑矛盾中。至于会不会因此发生失业现象，这不决定于主观愿望，而决定于社会劳动力供应量和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对劳动力需要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技术有机构成提高之后，一定要产生多余的劳动力，如果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不足以吸收这些多余的劳动力，就要形成失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是表现的形式可以有所不同：或者采取待业形式；或者采取就业不足形式，即3个人的饭5个人吃，3个人的事5个人做；或者发展手工业半手工业为主的小生产，来多吸收劳动就业。一句话，就是以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牺牲，来缓和实质的失业。马老主张一面控制人口，一面发展工农生产，齐头并进以解决或防止失业问题，现在证明是有远见的。

（四）人口与土地、粮食、轻工业的关系

被批判者认为：“我国地少人多。……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1953年的2亩8分降至1955年2亩7分”。“人口增殖，粮食必需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轻工业，间接影响重工业”。²⁰“应该指出，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因为耕地面积是有限度的，所以，如果以后人口继续增长，总数达到9亿、10亿，那末粮食供应分配情况，就不是这样乐观了。”²¹

批判者认为：“《新人口论》的基础是‘人地矛盾’”。“在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事实，也彻底粉碎了‘土地收获递减’的谬论。”“我们依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依靠6亿人口的伟大力量，喝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使土地交出更多的粮食来。”²²“即使我们的人口依照解放后的百分之二点几的自然增长率，在这十余年中会增殖1亿以上，每人每年仍能平均摊得1000余斤”。²³

一谈到人口与土地、粮食的矛盾，批判者更加觉得振振有词，可以用“马尔萨斯”骂倒对方了。其实，土地确是农业的特殊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只占世界7%的土地上要养活占世界23%左右的人口，确实给我国经济发展上造成特殊困难。在技术不变条件下，土地收获递减是客观存在的。所谓“喝令高山低头”，就是砍掉森林植被，“河水让路”，就是围湖填塘造田。眼前固然搞到了一点点粮食，但破坏了生态平衡将会祸贻子孙后代。恩格斯早已警告我们，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终将受到自然的惩罚。难道我国就能例外？这方面苦头吃的还少？我国粮食增产的速度是不慢的，单产的水平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但近20年（1955—1977年），由于人口迅速增长，以致人均粮食仍徘徊在600斤左右的低水平，基本上没有增加，不及世界先进国家1/4。建国至今30年了，尽管“以粮为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粮食仍不能自给，每年还必需进口，一个10亿人口大国，吃饭还要依靠外国，这决不是长治久安之道。至今轻工业原料还有70%要来自农业，出口产品有70%左右与农产品有关。经济作物与粮食种植争地，顾上吃就顾不上用。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增殖太快，新增加的人口把千辛万苦得来的粮食吃掉了。听信豪言壮语，陶醉于一时虚假现象，这样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怎能使人心服？

（五）人口与人口质量问题

被批判者认为：“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现在我们已进入了原子能时代，非把人口的质和量快快适当地统一起来，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的任务”。“人多固然是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保全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因为提高人口的

质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数量。”^②

批判者认为：“马寅初说：（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这不是对中国65 000万人的莫大污辱么？……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不断追击，直到彻底打垮为止。”^③“马寅初以知识和技术的水平作为人口的‘质’，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如果要谈‘质’，就不能离开社会制度和人的政治、道德以及思想状况，……马寅初……追随帝国主义‘种族优越论’的调子，……这是……对帝国主义的效勞。”^④

任何事物都有质的规定性，人口也不例外。所谓人口的“质”，就是指一定时期的社会人口总体的科学技术、文化素养和体质健康水平。这种人口的质，在人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是客观地存在的；各个国家的不同时代，人口总体在质的方面也存在着差别，并且是可比的。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进步，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总体的质必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总体的质，这是悖理的。我国现在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许多引进的先进设备缺乏适当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工人去管理、指挥、操纵、维修；我国还有上亿人是文盲半文盲；社会上还存在为数可观的先天遗传的痴呆病、精神病等等不能正常劳动的痼疾者。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不必讳疾忌医。优生学是科学，并不代表帝国主义。谈人口质量既不等于希特勒的种族论，更说不上对伟大中华民族的污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马老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方针，正是道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要害。

（六）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

被批判者方面，不侈谈人口规律。叶元龙和费孝通提出人口适中理论。费孝通说：“每个社会，每个时期，根据各种条件可以算出入口的适中数。人口增长率超过了这适中数，是会迟缓社

会发展的”。^②免不了受到了批判。^③

批判者们提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表述，作为人越多越好的理论根据。例如有人说：“‘人口不断迅速增加，人民物质文化福利很高，患病率和死亡率很低，同时有劳动能力的人得到充分而合理的使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正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④“……人口数量由迅速的增长逐步达到稳定的增长；……这就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⑤我国目前人口迅速增长，就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⑥；等等。

表述我国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必须是对我国历史的现实的人口现象进行大量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的结果。而以上这些表述，则是硬搬苏联的，或是主观杜撰的。试想，我国1956年才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而说1949年解放后出现的人口猛增，就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表现，这是很靠自圆其说的。实际上，解放后我国人口现象是属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发展模型，第三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都属于这一人口模型。这种发展模型和我国庞大人口基数相结合，如果误认为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表现，主张人愈多愈好，推波助澜，那就会使人口生产必须与物质生产相适应的基本规律遭到严重破坏，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长期的阻碍和危害。苏联地广人稀，耕地面积比我国多一二倍，而人口只有我国的1/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几千万人，又急于向外扩张，而它的人口发展模型与欧美发达国家相似，已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阶段，所以它们采取千方百计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谎称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这是十足的伪科学。我们有些同志不去结合我国人口实际，探讨合乎客观情况的人口规律，却盲目吹捧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表达的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完全适合于我们过渡时期的”这样的话，是不够严肃的。按照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人口规

律的表述，我国人口迅速增长并且永远稳定地增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加，岂不变成违反客观规律的愚蠢行为？实践证明，这些所谓的规律的表述，完全是主观臆造。

（七）人口政策

被批判者认为：“建议……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五年计划之内，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最好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他个人主张是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的要征税，四个孩子要征重税”。“大力宣传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而且这还不够，要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②“降低人口出生率，……降到17‰。”“除去死亡率，使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5‰。”^③“8亿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④“我希望少数民族出席大会的同志们，也对于有关计划生育的知识和方法进行研究。”^⑤

批判者认为：“允许生育子女过多者，有条件地实行节育，并……作一些启蒙性的节育宣传。”^⑥“至于我们所提倡的适当节制生育，决不是从‘人多是坏事’的观点出发的，而是为了保护妇女健康和更好的教养下一代。”^⑦“马寅初……把多子女当作是危害社会的罪恶行为；所以他认为必须要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生育。”^⑧“孙本文所谓把我国人口控制在8亿左右的说法是不正确的。”^⑨

对于计划生育，批判者方面，从“人越多越好”出发，不是表示反对，便是轻描淡写地把计划生育这样大事说成只是为了保护妇女健康等等。相反，被批判者方面，却严肃认真地提出了制订人口政策的科学根据以及一系列节制生育的方法。认为人口计

划纳入国家计划，国家有控制人口干预生育之权，少数民族当时也应学习计划生育知识。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愈益证明它的科学价值。如果当时受到认真对待，贯彻执行，那末今天我国人口现状就会大不一样，决不致如此严重地拖住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50年代前后两次持续五六年之久的人口理论大批判，扼杀了我国欣欣向荣的人口学研究，搅乱了人口理论的是非曲直，使左倾思潮毒害了人口理论领域，代表手工业小生产者思想的人乎论一手遮天。后果是严重的。痛定思痛，我有这些看法：

1. 这次大批判暴露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的人口理论的阐述并不深透，对马尔萨斯错误的人口学说，批判上也有片面性；对生产、阶级、社会制度等同人口问题的关系，也缺少研究。看来，有必要更加全面系统地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逐步发展和建立人口科学。

2. 大批判也暴露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缺乏对于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统计学、优生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对于资本主义世界300年来人口发展历史、第三世界人口发展现实以及对我国近200多年来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意义等，缺乏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于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一人口现实，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求实态度，对此，马老、陈长衡称之为教条主义^⑩，值得我们引以为戒。今天在人口理论、人口政策等研究上，有必要掌握丰富专业知识，更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端正研究的学风。

3. 在思想学术研究领域内，采取大批判这种方式，必然带来了根本性的弊害。本来真理越辩越明，大批判扼杀了辩论，也就扼杀了真理。也正是大批判这种方式，使康生之流的阴谋家才能操纵其间，仗势欺人，败坏了社会主义学术研究的良好风气。必须埋葬掉大批判这种方式，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发扬思想无禁区、

学术有自由的传统优良作风，把人口理论和社会科学推到新高峰。

三、人口理论研究开始活跃的三年

1960年马老被打倒之后，大批判渐趋平息，“人越多越好论”取得彻底胜利，人口理论成为思想禁区，从此无人敢于问津。三年困难时期一过，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增长的持续高潮，1966年到197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6‰，每年平均净增2000万人。人口持续迅猛增长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开始被人们意识到了。1971年中央决定了新的人口政策，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对于50年代人口理论大批判的是非曲直，未加澄清，以致人口理论界依然“抱残守阙”，不敢“妄动”。

打倒“四人帮”后，人口理论界开始有了生气。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进行，人们的思想逐渐得到解放。1978年和1979年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全国人口学者踊跃参加。尽管经过20多年的思想禁锢，但是提供给会议的论文质量较高，取得了可喜的收获。1977年到1980年第1季止，全国报刊上的人口理论文章也逐渐多起来。下面就这三年来^①最主要的人口理论问题，扼要予以评介。

（一）批判人口理论上的左倾思潮，为《新人口论》平反

左倾思潮在人口理论方面的流毒特别深远，对思想的禁锢特别严酷，但是，春天毕竟来了。1979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以显著地位，刊出陈立中同志《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平反》一文。文章最后说：“50年代对《新人口论》的批判，搅乱了许多是非，影响很不好。”“实践……宣告了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对‘人多是好事’的片面宣传是错误的，有害的。”这篇文章给人

口理论界以很大的鼓舞。接着《光明日报》及全国不少报刊、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表示响应支持。1979年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上田雪原的论文，再一次肯定50年代吴景超、陈达、费孝通等的人口理论文章，赞扬他们“作出很大努力”。^②这样，20年来人口理论的冤案得到昭雪，左倾思潮受到批判，这将在中国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史上记录下光辉的一页。

（二）关于人口规律问题

1. 人口现象与人口规律的性质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人口现象是社会现象，不是自然现象；人口规律是社会规律，不是自然规律。而在社会现象中经济起决定作用，因此有些学者径直了当地说：“人口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③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显然都在起作用，不过社会规律起支配作用，自然规律起制约作用，不研究这两者，恐怕很难对人口规律作出真正科学的论述。”^④“人口规律特别是人口增长规律不仅具有社会属性，而且具有自然属性”。^⑤我以为这些意见，值得重视。从经济学角度考察社会人口现象，建立人口经济学是有意义的。当然也得从地理、社会、心理、生态等角度建立部门人口学。人是社会的人和自然的人的统一，全面地有主次地考察人口现象，建立综合人口学，看来很有必要。

2. 是否存在不同社会形态都适用的一般人口规律

许多人口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主要的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这段话：“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资本论》第1卷第695页）张怀宇说：“我们决不能离开历史上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去研究所谓人类一般的、抽象的人口发展规律。”^⑥然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学

者主张存在着一般人口规律。曹明国说：“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人口发展规律，是人口规律中最一般、最本质的规律。”^④廖田平等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重要基础。”“人口生产必须和物质生产相适应，是一个在社会发展各个历史阶段都发生作用的客观经济规律。”^⑤我认为在人口规律的探讨上不应当拘泥于马克思在特殊条件下所强调的个别语句。许多人口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于一般人口规律的探讨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但有理论意义，对于我国尤其具有特殊意义。

3. 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表述

所有人口学者都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特殊人口规律。对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大体上有四种表述：

第一种，《人口理论》称：“人口有计划地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做到人口有计划地增加。”^⑥有些同志不同意这种表述。张纯元等说：“社会主义绝不意味着永远同人口增长相联系。”“从人类发展的要求来看，它只要求人口质量不断提高，却不要求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⑦

第二种，俞金顺说：“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相适应。”^⑧任峻垠对此表示异议说：“社会在今后时期对劳动力的需要量是如何确定的？又要什么样的劳动力？”^⑨

第三种，李树苻说：“这个规律主要表现为人口数量有计划波浪式发展，人口质量有计划地不断提高；人口发展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相适应；劳动力逐渐实现充分就业和劳动资源有计划合理使用。”^⑩张纯元等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就是在再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的基础上人口数量、质量有计划按比例地

同国民经济相适应的规律。”^⑤

以上三类表述中各有差异，其一致所在是都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划中都存在“有计划”这个特点。对此李南寿说：“有计划不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尽管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计划的，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内在规律是价值规律。”

第四种，李南寿的表述是：“社会主义的劳动人口在不断地生产出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和相适应的人类自身的同时，也不断地生产出日益提高人的消费水平和人自身素质水平的手段。”^⑥

从几十位学者的表述中，列出上面这些，肯定是挂一漏万的（篇幅不允许举例细分）。这些表述，比较50年代，已有极大进步，尽管有些表述还不能完全摆脱老框框。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1）在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的决定下，社会主义社会将经历不同发展阶段，人口再生产运动是否相应地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发展内容？（2）在物质生产中，有计划规律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才客观地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阶段，有计划规律还必须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而以按劳分配为条件、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人类自身再生产，又通过什么样的自身内在机制才客观地表现为“有计划”规律呢？（3）有些表述（本文未引）中包含又红又专、政治思想等意识形态的东西，它们怎样成为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客观规律了呢？等等。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还短，实行公有制国家的人口发展模型差别又很大，所以如何更加精确地表述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

（三）关于计划生育问题。

现在，人口理论工作者一致拥护计划生育。这里只简单介绍三个问题。

1. 计划生育的长期目标的理论根据。

我国从1971年起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成绩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始终认为人口是必须“增长”的，控制的只能是增长速度，这种理论给我国计划生育长期目标带来严重的局限性。譬如，1977年12月出版的《人口理论》还这样说：“我国有计划地逐步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决不是不发展人口，更不是减少人口，只是使人口增长速度放慢一些。新老马尔萨斯主义主张的，则是限制人口，减少人口”（第128页）。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周光复的论文中就说：“党和国家就大体可以根据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客观要求……制订恰当的人口政策，或者实行人口有计划地增长的政策，或者实行人口发展速度有计划地减慢的政策，或者实行人口增长率为零甚至负数的政策”。^⑤李竞能、纪明山的论文^⑥以及上引李树蔚说的“人口数量有计划波浪式的发展”的话，也有类似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四人帮”打倒后人口理论界的理论突破，从而为党和政府制定将人口控制到不增不减的战略目标，及时提供了理论根据。

2. 计划生育长期规划的理想人口数量？

周元良说：“可以逐步把我国人口降到五六亿的水平上稳定下来。”^⑦宋健说：“零自然增长率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目标。”^⑧以后，他和一些同志利用当前最新计算技术，经过非常周详严密的研究，提出一组尚未公布的研究报告中认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能养育的人口最高量不超过8亿，最好是少于7亿，稳定在6亿到7亿之间。当然这就必须通过计划生育，经过使人口增长减速，利用惯性使总数减少到上述最优化人口数量时，最后稳定在零自然增长率上。这一过程，从现在开始，得经过100年左右的时间。我认为，我国必须有100年的滚动式的人口规划，因此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便有特殊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欢迎今后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公布。

3. “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是必须采取的紧急措施。

经过十年的人口控制的努力，我国目前尚处于人口中速增长的过程中，尽快地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下来，降低到零，这是我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大力争取的基本条件之一。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正是为了扭转人口继续增长，较快地过渡到零自然增长率的唯一正确的紧急措施。对此，人口理论界是一致拥护的。对于因之而引起的一些顾虑如兵源问题、劳动力问题、扶养指数和人口老化问题等，经过一些同志精密的计算所作出的科学论证，^⑧这些疑虑也逐渐消解了。关于执行这一革命措施的步骤上，因为考虑到人口生产过程惯性特大的缘故，现在，政府采纳的是大力提倡，稳妥执行的方案：“根据我国人口现状及群众的认识水平，制定长期人口发展规划按平均生育率1.7较为现实。……在2000年把人口控制在12亿内。根据这个设想，除少数民族外，全国育龄妇女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要占到50%左右，城镇比例还要高些。”^⑨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妥当的。但是必须确保2000年人口绝对不突破12亿大关，为此必须尽速杜绝生三个孩子的多育现象；继续厉行晚婚；在宪法规定实行计划生育的基础上迅即颁布计划生育的单行法规；并解决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问题。尤其要抓好8亿农村人口的计划生育，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之后，对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十分复杂的情况，要及时采取有力的有效的措施，使计划生育能够排除万难，落实到底。20世纪最后20年，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也是扭转我国人口恶性增长、走向良性发展的紧要关头。时不我待，全国人口理论工作者将继续做出重大贡献。

此外人口理论界关于对马尔萨斯的评价问题，对于如何正确对待现代外国人口学说、资料、研究技术问题，关于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人口学问题，都有许多较新较好的意见。打倒“四人帮”

的短短三年多来，人口理论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为了篇幅限制，在此不予一一评介了。

-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
- ② 李世平：《旧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思想浅说》。《四川大学学报》《人口问题论丛》，1979年。
- ③ 《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4日。
- ④⑤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 ⑤ 余慰天：《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中国人口问题》。《大公报》1957年8月22日。
- ⑥ 《评马寅初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立场》。《经济研究》1958年第11期。
- ⑦ 《红旗》杂志。1958年第9期社论。
- ⑧ 《对近代中国的反动人口‘理论’的批判》。《新建设》1956年第12期。
-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 ⑩ 《〈新人口论〉批判》。《新建设》1957年第8期。
- ⑪ 《马尔萨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 ⑫ 《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北京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 ⑬ 《批判马寅初反动的〈新人口论〉》。《经济研究》1960年第4期。
- ⑭ 《评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新建设》1959年第12期。
- ⑮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人口质量论〉与马尔萨斯主义》。《武汉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 ⑯ 孙本文：《八亿是我国最适宜人口数量》。《文汇报》1957年5月11日。
- ⑰ 《批判马寅初反动的〈新人口论〉》。《经济研究》1960年第4期。
- ⑱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 ⑲ 《彻底打垮马寅初反动透顶的〈新学说〉》。《经济研究》第1960年第1期。
- ⑳ 《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光明日报》1959年12月17日。
- ㉑ 费孝通：《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新建设》1957年第4期。
- ㉒ 《资产阶级适中人口论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 ㉓ 《对近代中国的反动人口‘理论’的批判》。《新建设》1956年第12期。
- ㉔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中国人口问题》。《经济研究》1957年第4期。
- ㉕⑳ ⑳ 《现代我国的人口问题》。
- 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 ㉖ 孙本文：同名文章。《文汇报》1957年5月11日。

- ⑤ 邵力子：《对人工流产问题的看法》。《大公报》1957年3月19日。
- ⑥ 《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
- ⑦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人口问题，驳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新建设》1960年第4期。
- ⑧ 《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光明日报》1958年11月29日。
- ⑨ 除极个别的之外，所引用资料到1980年第1季截止。
- ⑩ 田雪原：《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回顾建国以来关于人口问题几次论战》。《四川大学学报》，《人口问题论丛》1979年12月。
- ⑪⑫⑬ 张纯元等：《社会主义人口问题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
- ⑭ 肖藏：《应当全面地研究社会物质生产条件》。《哲学研究》1980年第3期。
- ⑮ 刘银：《人口规律有自然属性一面》。《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
- ⑯ 张怀宇：《社会主义社会人口发展规律的初步探讨》。《第一届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论文集》。
- ⑰ 《社会主义人口发展规律问题》。《第一届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论文集》。
- ⑱ 《人口生产必须和物质生产相适应》。《广东人口》1979年第1期。
- ⑲ 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室：《人口理论》。商务印书馆1977年12月出版。
- ⑳ 《从经济学角度探讨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经济研究》1979年第3期。
- ㉑ 《试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的关系》。《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 ㉒ 《试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关系》。《人口》杂志1979年第2期。
- ㉓ 《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人口理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黑龙江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 ㉔ 《从人口再生产和劳动力使用的对立统一关系上认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第一届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论文集》。
- ㉕ 《试论社会主义社会人口规律》。《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 ㉖ 《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人口过剩吗？》。《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
- ㉗ 《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光明日报》1980年10月3日。
- ㉘ 田雪原：《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3月18日。
- ㉙ 钱信忠：《要控制人口数量》。《人民日报》1980年9月12日。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1期）

坚决贯彻农村人口政策

1980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由党员团员带头，积极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争取本世纪末我国人口不超过12亿。赵紫阳同志最近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重申这一决策，要求“全国上下为着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前途”，坚持不懈地予以贯彻。目前，控制人口的工作正处于关键时刻，紫阳同志这一宣告是十分必要的。

一、当前我国人口有失控危险

我国自1971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34%逐年下降到1979年的1.17%；但是到了1980年发生逆转，回升到1.20%。1981年还持续回升。为什么出现逆转？首先是人口增长率经过九年连续下降，又面临着第三次生育高潮，争取继续下降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其次，新《婚姻法》降低了实际控制的婚龄，提前了二个到四个年龄组，早婚必然早育，已为城乡各地调查报告所证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同时带来了对计划生育的冲击，尤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这种责任制带来的冲击最大。有些农民说什么“种自己的地，吃自己的粮，多生孩子自己养”，颇有生育自由化的味道。许多地方，领导上对计划生育放

松不管，计划生育工作大大削弱了。

10亿人口，8亿农民。农村人口出生率本来就大大高于城市，农村控制人口工作本来就远为困难，如果现在掀起的生育自由化的苗头不能及时制止，则全国人口控制计划必将归于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区同样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但由于党的领导强，态度坚定，办法对头，措施及时，结果就大不一样。如江苏如东县、太仓县、安徽滁县、河北武邑县、山东陵县，等等，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生产上去了，生育率下来了，形势真正大好。可见事在人为。

二、加深对现行人口政策的认识

50年代和60年代盲目发展人口的结果，我国今天的人口已严重过剩。预计今后十年，每年会有2000万人要求就业。我们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来装备如此庞大的新增劳动力。应该肯定，由于人口过多，已经严重地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今后十年，每年进入婚龄育龄的青年达1000万对，如不严格控制生育，进入21世纪时，今天因人口过多而阻碍经济发展的困难局面，还将继续拖延下去。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当多的农业人口逐步转化为工业人口，要求实现农业工业化。目前8亿人口搞农业，在人均1亩多土地上劳动，还有1/3左右的劳动力过剩，劳动生产率低得出奇，这是农村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基础的根本薄弱点。必须说服农民严格控制人口，使农村人口在数量上逐渐与农业经济发展相适应，在质量上逐渐与科学种田、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奠定基础。

一些专家根据我国今后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预

测，根据食物、营养、土地、水、矿藏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条件，通过现代化的计算工具，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我国适度人口或优化人口，应在6亿到8亿之间。从长远看，我国人口发展必须逐步进入零度增长，然后走向负增长，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达到优化人口的目标。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办法，但它是为了扭转我国人口恶性发展，逐渐走向优化人口的目标，在一个时期内唯一可行的非常办法。

在当前农村客观条件下，农民还不会自觉控制生育，计划生育工作还很艰难。在这样情况下，有些同志以为允许农民生两个孩子，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就可轻而易举地实行。其实，这是昧于实际的想法。他们还认为生两个孩子就是人口简单再生产，殊不知人的平均寿命在延长，允许农民生二胎，对全国人口而言，决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粗略计算，本世纪末，人口总数甚至可以增加到13亿，这决不是我国所能承受得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没有任何灵活性。本来，党和政府规定的政策是积极提倡生一个，适当限制（照顾）生二个，坚决杜绝生三个，在20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目前各地对于照顾生二胎，都有具体规定。可能有的地方掌握上偏紧了一些。许多人口学者主张，对生第二个孩子，可适当放宽照顾范围。我认为如果适当照顾生二胎，把生育率放宽到1.5人左右，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各种有效措施，绝大多数农民是可以接受的，农村计划生育就好做多了。在适当照顾生二胎的情况下，严格杜绝多胎是会取得群众拥护的。

人口政策既定之后，其他政策应适当配合，不要互相打架。如1980年颁行的《婚姻法》，不管大多数地方基本上已经做到男24（或25）岁、女22（或23）岁的晚婚婚龄，而把法定婚龄提早二

个到四个年龄组，使城乡出现早婚早育高潮，给计划生育工作造成不利局面。我以为在适当时机，对此还是可以考虑修正，以利晚婚晚育的推行。又如农村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本来是大好事；但有些地方，单纯按人头包田地，以致违反计划生育生多胎的人家得利，遵守计划生育少生子女的人家吃亏。如果在包产包干到户时的分地数量和包产产量上，适当鼓励服从计划生育的少生子女的户，对超计划生育的多子女户则给予应有的限制，那就不致冲击计划生育工作了。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三、坚决把农村人口生育降下来

现在亟须在农村进行一次人口政策不变的普遍宣传，把政策交给群众，使犹豫观望者清醒起来，赞助政府政策的人就会更加坚定。我们需要利用多种形式来经常对全国人民进行晚婚、晚育、少生、生好的通俗的和科学的宣传教育。现在这方面颇感冷冷清清。

中央和省的机构可以适当精减，但急需加强计划生育第一线的两个队伍：一是加强县、公社、生产队的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队伍；二是建立起一支过硬的节育技术干部队伍。目前，这方面的情况很难令人满意。

在新形势冲击下，有些县和公社对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能够做出优异成绩，大致是采取生产生育一齐抓、两个头一齐带的方法。前者是领导上一手抓生产责任制，一手抓生育责任制，两种指标一齐下，两种合同（生产、生育）一起包，评比奖惩，同时落实。后者是指县级机关带头落实计划生育，干部、党团员带头只生一个。身教胜于言教，从而推动下级和党外群众层层人人落实计划指标。

农村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实行后，计划生育的环境条件已远为复杂，非有中央颁行的成文的有关法律，不足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宪法既已确认计划生育的任务，据以制定单行法规，实是理所当然。

四、逐步增加人口投资

尽管我国财政困难，仍应高瞻远瞩，逐步增加人口投资。我们要善于汲取历史教训。50年代与60年代人口生育放任自流，表面上国家财政无直接负担，实质上每培育一个人到15岁，城乡平均国家须支出1000来元（不包括进大学费用）。粗算一下，我国至少多养了2亿人，国家为此就多支付2000来亿元。并且，多余的劳动力，在城市还要国家支付工资，通过铁饭碗硬性安排就业，大大影响技术进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劳动生产率极低，粮食等农产品商品率很低，农产品价值高，国家要在这方面予以大量补贴。国家如要使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能够适应实现四化的要求，如要在农业方面培养财源，都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此，现在就应当逐步增加人口投资，一以支持农村控制人口，一以支持农村推行普及基础教育。目前30岁以下男女青年中，有成亿人是文盲半文盲。如不普及农村基础教育，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自觉控制生育，乃至科学种田，等等，都会成为一句空话。

80年代是控制人口工作最困难也是成败所系的十年；这十年工作搞得不好，进入90年代就会容易多了。我们的人口政策和战略目标是合乎科学的，人民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方式方法对头，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原载《人民日报》1982年2月5日）

谈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生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是理所当然的。32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曾几次遭受重大挫折，每次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远远不能体现。这首先是国民经济总体计划在决策上的错误造成的。这种有计划的无计划所造成的灾难，每每不下于资本主义的一场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无政府的盲目生产，但一个企业、一个垄断集团的内部，则是建立在严格的计划之上的。例如日本五大钢铁公司内部实行科学管理，生产是有节奏地进行的，对国内、国际市场的情况，了如指掌，随时进行主动调节，使供产销密切配合，经济效果良好。而我们不少企业，内部缺乏科学管理，只是根据上级的计划生产，盲目追求产量、产值，不问是否适销对路。销售不了的产品由国家包下来储存在仓库，最后把大量的劳动产品化为废物；而市场则经常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中。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讲，无论宏观计划还是微观计划，都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相称的。

解放后有些年份财政有赤字，有些年份，表面上没有赤字，实际上可能是有赤字的，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积压产品，乃至下马报废工程，都计算产值和利润，财政上出现虚假收入。记得1950年美元和人民币比价是2.4元，这一比值，当时是合理的。现在美元本身按黄金价值计算，已经贬值到1950年的十几分之一，而我

国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比值反而降低了。这固然与对外贸易上不等价交换有关，但也足以说明我国货币币值还不是完全稳定的。

三中全会之后，经济理论界对计划经济、商品生产、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计划经济根据的客观经济规律，等等，作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尽管有个别提法不够妥当，但成绩是大的。而实际工作者对这方面缺乏兴趣，有些人对这些讨论有误解甚至有反感，认为是纸上谈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建议今天少争论这些理论问题，多谈些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理论探讨要抓住要领，不要泛泛而言。我认为，计划经济和商品生产决非互不相容、有此无彼的。目前情况是中央计划的威望降低，而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则仍然被捆得死死的。有中央的计划，有省、市、县的计划，都代表国家，都有权决定，互相干涉，非常分散。中央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了预算内投资，但预算外投资冒出来，压缩不下来；中央要合理控制奖金，但三四年来奖金年年自动增长，变成自动增加工资。另一方面单纯用行政办法冻结物价，可以合理调整的也不调整，严重影响生产。30年来火柴还是每小匣卖两分钱，而鸡蛋已经从3分一个涨到1角5分一个了。火柴各种成本都上涨了，火柴工厂要亏本，自然减少生产，于是市场脱销，有些地方黑市价上涨到每盒2角。直到轻工业部下命令生产，才有所缓和；经济上的损失，则由国家包下来。日用小商品成百万种，国家计划怎么能一一管到。用行政手段管制物价，是必要的，但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手段。现在衣食住行都由国家用固定价格供应，实行财政补贴，完全包下来。现在补贴已占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今后势必年年增加，这样，财政赤字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国家财政连年有赤字，就根本谈不上计划经济了。就住房而言，现在房租是象征性的，连修理费也不够，更谈不上折旧了；于是，谁占房多，谁就实际上增加了收入；手长的人甚至还为自己未成年的子女将来结婚占了房，手短的只好四世

同堂（房）。房租只有存款利息的几分之一，个人存款不会用于建房买房，建房全靠政府拨款，而国家财力有限，形成房屋的有限供给和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这就大大增加了解决住房问题的困难。有人说，这是计划经济，我说，这是误解。计划经济决不是自然经济，不是供给制的化身。但是现在有些做法，确实把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经济捆得死死的，缺乏灵活回旋余地。实行二级财政制，不但财力分散了，而且使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被分割为28块，部门所有制和地方所有制加强了，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此外，由于外币从南部沿海地区渗入内地，由于粮票成为货币在市场流通（它的购买力建筑在国家对粮价的补贴上），人民币的统一发行正在受到内外冲击。进出口走私活动空前猖獗，也要严肃对待。

为了准备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在现在，在“六五”期间，我认为必须强调集中统一。必须全力争取做到：（一）彻底消灭财政赤字，达到真正的财政平衡（不是赤字的弥补）。中央最好能考虑重新集中财权和财力，象陈云同志在1950年和1961年两次决策的那样。厉行开源节流，积聚起一笔财政资金，以便“七五”期间，实行全面工资改革和价格改革，把一切财政补贴纳入工资基金，把物价纳入价值规律的轨道，而职工的实际收入仍有某种程度的增长。

（二）中央必须把基本建设计划和技术改造计划管好管牢。（三）整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消灭浪费、贪污、盗窃。（四）恢复和保护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消灭市场割据，彻底禁绝走私。（五）对外贸易实行联合经营，统一对外，制定许可证制度，有效地运用关税杠杆和海关工具，以促进和保护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维护人民币的崇高威信。（六）毫不动摇地贯彻人口控制政策。当然完成这些任务是会有重重困难的，但是，我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认真整顿党风，密切联系群众，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原载《财贸经济》1982年第4期）

关于经济特区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作为扩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具体措施之一，1980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广东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经济特区，在广东汕头、福建厦门试办出口加工区。目的在于鼓励外来资本包括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到国内投资兴业，支持四化建设。这在我国是一个创举。最近我们在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进行了一些调查，现就特区经济建设方面的几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统一认识和统一步调问题

当前对试办经济特区的认识尚有一些分歧，步调也不尽一致。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尽快解决。

少数同志对试办经济特区持观望、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有的同志有两种担心：一是担心特区会租界化和殖民地化；二是担心特区会使经济犯罪活动泛滥。这些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不能把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瓜分旧中国的殖民政策的产物，是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的地方。而经济特区，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定一定的区域，对外实行更加开放、更加优惠的政策，以便集中地、更多地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加速边防城市的建设、加速祖国的建设服务。在特区，人民政府全面行使国家的主权，客商和外资企业必须服从我国的法令和特区的各种法规。只要我们头脑

清醒，坚决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办，就不会使特区租界化和殖民地化。

办经济特区与经济犯罪活动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经济犯罪活动是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但它并不是办经济特区的产物，相反，它的存在和发展，还干扰了试办经济特区政策的贯彻，阻碍了经济特区建设的顺利开展。事实上，它既发生在特区，也发生在非特区；既发生在对外经济联系比较多的部门和沿海地区，也发生在对外经济联系很少甚至没有的部门和内地。同是在经济特区工作的干部，大多数人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一尘不染；少数人则损公肥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可见，经济犯罪活动并不是由于办经济特区而引起的。当然，也要看到，外因在一定条件下起着重要作用。一些单位和个人经受不住特区的特殊条件的考验，走上了利用特区进行经济犯罪活动的邪路。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措施，发扬特区的积极因素，进一步限制乃至消除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总之，我们不要在泼洗澡水时把小孩一起泼掉。

二、注意发挥经济特区的“特”点

办好经济特区的关键在于，能否合理地引进外来资本和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为了把外资吸收到特区来，我国在国际上的信誉和政治局面的稳定固然是重要的前提，但还需要有一整套适应经济特区特点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只要有利，资本便会趋之若鹜，不招自至。因此，我们在政策上要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在税收、土地使用费、劳务费等方面为外资提供必要的优惠，使其能获得合理的利润。同时，资本是贪婪的，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

甚至不惜采取违法的冒险手段。因此，在政策上又必须对资本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对其不法行为进行适当的斗争，以免它扰乱特区的正常经济生活。

资本是最敏感的。一旦投资条件可能发生变化，投资利益可能受到影响，资本就会不驱自走，转移到更加有利的地区去。因此，政策切忌朝令夕改，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资本要求流动自由，它怕投入之后进退不得。因此，政策要允许资本及其收益在遵守有关法令及执行合同的基础上来去自由。

对外来资本的管理，应该依法办事。因此，特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的范围内，分别制定有关土地使用、工资、劳动保险、工会、金融、税收等法规条例，以便依法对资本进行管理，并使其正当的活动受到法律的保护。

三、特区的经济管理体制

经济特区建成后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正在探索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经济管理体制主要是由经济性质和经济结构决定的，特区的经济管理体制也应根据特区的经济性质和经济结构来确定。

特区将长期存在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及外商独资经营的企业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同时，特区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外向型的，供产销都同国际市场息息相关。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特区的经济管理体制需要有较大的灵活性，特区的企业需要有独立经营的自主权。由此，特区的经济管理体制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正确解决条条和块块的关系。特区是一个与内地有很

大差别的特殊经济地区。如果把内地现行的一套经济管理体制照搬到特区，各业务口都按条条向特区下达指令，势必难以照顾特区的特点，形成多头领导，使特区工作无所适从。看来，只有把高度集中的单一领导同相对独立的块块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根据特区经济的特点进行有效的管理。为此，将来对特区的领导权原则上以集中在国务院为宜，以单一领导代替多头领导；特区则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和特区的法规，独立自主地领导本地区的经济活动。与内地各部门各单位的经济协作关系应建立在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原则基础上。

第二，正确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全国而言，我们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特区的经济是我国整个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接受计划的指导。但是应该考虑到特区的具体情况。计划宜以块块为主，即以特区的计划为主。特区根据国家的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根据对世界市场和科技发展趋势的预测，编制特区的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报国务院审批，然后，再制订年度执行计划来指导特区的日常经济活动。至于国家规定限额以上的、影响全国综合平衡的重大项目，则需要报国务院批准，并列入国家计划。

第三，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特区，应该实行政企分家的管理制度。特区政府的计划对基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一般只起指导作用。特区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杠杆和经济立法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节。在特区，即使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应赋予它们以较内地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使它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求得发展壮大。

经济特区实行有效的灵活的经济管理体制，并不是让特区成为“独立王国”，而是为了使它能更好地完成国家赋予它的经济

和政治任务。

四、建设步骤等问题

两年来，经济特区的建设，进展十分迅速。昔日的荒山野岭，而今已是高楼栉比，厂店林立。可说局面已经打开。但是，特区对今后建设步骤的筹划，还需要充分估计到主客观的情况，诸如国际市场的不景气，特区财力人力（能胜任对外经济工作、善于经营和懂得技术的干部）的不足，等等。看来，弦不应绷得过紧，建设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在量力而行的原则指导下，特区建设可以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分小区开发，做到开发一块，投产一块，收益一块。这样稳扎稳打，能够较快地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这方面，我国驻港机构招商局开发蛇口工业区的经验值得重视。

在吸收外资方面，要争取多渠道、多元化，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避免有限的土地被少数客商长期冻结。

关于同客商签订合同，在签订前对合作项目要认真进行可行性研究，对客商的法人地位和资本信用情况要调查清楚；签订合同时条款要详细周密；签订后，执行合同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特区内精神文明的建设尚待进一步解决。要大力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要整顿党风，对干部要严格按照党纪国法行事，抓紧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对不适宜在特区工作的干部要及时调离。

总之，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崭新的人民事业，困难是明摆着的，发生某些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局面已经打开，一、二年后将要进入发展阶段。在此关键时刻，认真贯彻陈云同志关于特区

工作要总结经验的意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相信经济特区经过认真总结经验，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健康成长。

（本文系和中央党校毛蓉芳副教授、吴健教授
合著，载《人民日报》1982年9月13日）

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

小平同志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这篇谈话中，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战略步骤，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为全党一致接受通过。这就是：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为什么前十年要为后十年打好基础？这是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各种比例失调，必须进行调整、改革，使积累与消费平衡，使农轻重平衡，尤其必须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国力相适应，与财政、信贷、物资平衡。在这种前提条件下，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才有可能步步推行。这就为后十年打好基础。这是扎实稳步的前进。如果再犯一次“左”的错误，步子太快太急，造成比例失调，被迫再进行调整，就要浪费三、五年时间，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就有落空的危险。

1982年，在调整初见成效，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还很脆弱的时候，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再一次猛烈膨胀，而且今年上半年投资规模继续猛进，对此如不予以有力阻止，“左”的错误将会重现。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力求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恢复控制。

看来，固定资产投资总是力求摆脱国家计划，追求自由发展的恶性顽症。如何同它作有效的斗争，并且最后战胜它，使之不

再发作，这是有待于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除了不间断地同经济建设的“左”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之外，我建议试行下列措施，在实践中总结改进：

一、努力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中长期计划的科学性，从加减法中摆脱出来，力求从科学技术发展远景、技术经济效益评价等出发，加强宏观的综合平衡；竭力维护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严肃性，计划一经批准，要坚决顶住来自上面或下面的任何压力干预。最后，还应当集中或上收投资计划权到中央和省两级，大大提高投资计划宏观水平，最大限度地消除重复投资、盲目建设等现象。

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在年度执行时，应该实行按旬按月按季的深入实际的检查监督，充分利用现代通讯设备，搜集分析报表资料，以便发现计划外投资出现膨胀的苗头，就将它扑灭。现在统计信息的速度与驿递相仿佛，待到发现问题，木已成舟，损失也很难挽救了。

三、建议综合运用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使指令性投资计划能更加有效地落实。并要经常发布投资方面的信息，以便诱导地方的、企业的、民间的自筹资金，投向既能发挥当地自然的社会优势条件，而又符合国家宏观需要开发的项目上去。这里有许多文章可做，单纯的行政措施未必十分有效。

四、重大的投资项目在技术上经济上进行可行性论证时，应积极采取民主的科学的方法进行，而不是采取走过场、做摆设的手法敷衍了事。重大投资项目的上马，要慎之又慎，不要好大喜功。

五、积极推行固定资产投资责任制，谁提出、谁设计、谁批准、谁执行、谁负责、层层负责到底，有功受赏，有罪受罚，纪律严明，才能逐步消灭报废工程、胡子工程、大头工程等违反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现象。

最后，我再一次向经济理论工作者呼吁：请求大家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一再重复爆发的投资饥饿症的病理生理机制。只有在理论上弄清楚了这一病症，才有希望找到根治这一顽症的疗法。

（原载《经济日报》1983年7月13日）

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1年狠下决心调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一天比一天好，城乡出现了一片繁荣兴旺景象。在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如何合理使用财力，如何继续前进，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调整得差不多了，可以多搞点基本建设，通过扩大建设规模把速度搞上去；另一种认为还得把重心放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上，不能片面追求速度，特别是基建规模必须严加控制，使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市场供需保持基本平衡，财政信贷的资金不致过分紧张，留有一些回旋余地，以便腾出手来，着手进行物价改革和工资改革，从而推动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和八字方针的全面落实，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为今后加快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本文打算从后一种观点出发，阐述一些看法。

在我们经济工作中，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盲目扩大建设规模并把这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成为长期不能解决的老问题。近几年中央领导同志虽反复强调要量力而行，强调要有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但老思想、老做法并未真正解决。1981年下狠心砍基建，1982年经济形势一好，建设规模又大大突破国家计

划。它与历史上不同的特点是，国家预算内的投资规模基本上还能按计划进行，而预算外的投资和银行贷款猛烈增加，投资使用方向仍然偏于搞一般的加工工业，能源、交通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致加剧了比例的失调；在这同时，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例也猛烈增加。1983年国家安排固定资产投资747亿元，并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但由于中央重点建设项目要上，在财力分散状况下，地方和企业“自筹”的项目也挤着上，计划内的项目要上去，计划外的项目减不下来，据估计，1983年的投资总规模仍将突破计划。

目前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要实现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就得加快速度；要速度就得上项目，扩大生产能力。特别是一些地区、部门和行业，不管主客观条件如何，一律要求翻两番。积极性高本来是好事，问题在于目前经济效益不高，国力也有限。国民收入一年的增长额不过300亿元左右，如果积累率控制在25—30%范围内，积累基金每年增长额不过75亿元到90亿元。扣除流动资金积累的需要，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额大致也只有50~60亿元了。除去挖潜革新改造项目，预算内外的基本建设投资每年增长一般不宜超过50亿元左右，资金平衡才有回旋余地。应该看到目前财政平衡和信贷平衡的基础还很脆弱，如果建设规模控制不住，战线拉长，势必扩大财政赤字，增加货币投放，造成需求紧张，使渐趋正常的经济生活又趋紊乱。只有在正常的经济秩序下，只有财政、信贷、物资基本平衡，市场稳定，供需两旺条件下，才能使八字方针全面落实，特别是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才能逐步全面展开，否则，根本谈不上改革，也难以提高经济效益。

二

控制建设规模，控制消费早熟，实行经济稳步发展，还有一个目的，在于腾出部分财力，进行物价和工资改革，给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创造条件。理由是：

（一）在经济改革中，最棘手的是工资改革和物价改革。工资调高容易调低难，改革不合理的工资制度会引起工资基金总额增加。物价牵涉到千家万户，千厂万店，最为敏感。群众对物价的意见已经不小，而由于农产品、矿产品等基础价格上调，改革不合理价格引起物价上涨时，要给职工补偿，能否收支相抵，要看补偿办法是否合理。一般地说，改革时总要求在财政上有一定回旋余地，才便于控制局面。当前财政金融尚不巩固，流通中货币偏多，会不会因改革而引起经济生活混乱，确实使人担心。所以工资、物价改革议论了几年，因为财政尚有赤字，信贷尚有差额，总感到事情很不好办，从而顾虑重重，决心难下。

（二）物价和工资不改革行不行？不行。工业商业社会化程度高，横向联系多，很多问题应当通过经济手段，经济杠杆来调节，以促进社会经济活动合理化。现在经济改革步伐慢，宏观经济见效甚微，很多事情卡在价格问题上。评价经济效益的好坏缺少科学依据，推行经济责任制，同工资、物价的矛盾也很明显。奖金终究不是工资，属于超额劳动报酬，如果不改变工资制度中“一乱二死三平均”的状况，光靠奖金很难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群众积极性不可能充分调动起来。被经济利益刺激起来的一时的“热情”也不可能持久。由于价格不合理，使得经营责任制推行中，有的不费劲可以获得很大盈利，有的作了很大努力还是亏损，甚至增产越多亏损越大。造成企业之间和职工之间奖金福

利悬殊，苦乐不均。而且由于价格不合理，还使得长线产品因价高利大压不短，短线产品因价低利小拉不长，从而使某些商品大量积压，某些商品又紧缺脱销的状况很难扭转，产需难以衔接，盲目重复建设难以制止，使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阻碍重重。现在，能源、生产资料都出现双重价格或多重价格，名目繁多，对提高经济效益和调整经济结构很不利，跑冒滴漏堵不住，贪污盗窃、化公为私倒很方便。利改税的实行虽然初步调整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使得国家在新增利润中有可能得大头，可是因价格不合理造成的企业间苦乐不均，却成为突出矛盾。利改税第二步，原来设想通过产品税，以税挤利来代替调整物价，现在看来困难还比较多，因而也要影响财政体制改革的进行。所以工资、物价制度不合理，使经济杠杆锈住，不能灵活运用，倒转来形成“逆调节”，反而促使企业活动向不合理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既要以实物量更要以价值量来衡量，如果整个价格体系不能反映社会价值量，那么计划经济如何进行综合平衡，投资计划如何衡量经济效益？所以，物价拖着不改革实在不行。越拖下去，越被动，对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害就越大。

（三）工资和物价拖着不改革，同样要花钱，而且经济效益提不高，收入上不去，财政困难还是解决不了。这几年在增加职工收入上花的钱并不少。从1977年起，几年来连续调整工资，而由于没有和工资改革结合起来，对工资制度中工资标准混乱、平均主义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至于奖金发放数额年年增长，加上“福利产品”和各种津贴，明贴暗补，每年估计已在100亿元以上。

从物价来看，1982年建设规模扩大，搞得“三材”供应极其紧张，计划外项目挤了计划内项目，不得不进口一部分材料。仅

仅用于这些进口材料的价格补贴就有20多亿元，实际上等于财政通过价格渠道把收入让给部门、地方和企业，支持了扩大计划外基本建设。再因为价格不合理，高价进口羊毛低价卖给毛纺厂，织成呢绒后又低价卖出，进口亏本，出口也亏本，而地方则因为毛纺厂能赚钱，大搞新建扩建，实际上等于财政上通过价格渠道支持盲目重复建设。小炼油厂原油消耗高、收得率低，炼出油品品种少，从宏观经济看很不划算，虽然三令五申不让搞，不仅没有下来，还继续上去，就是因为原油价格太低，只要搞到原油，效率再低，浪费再大，也有钱可赚。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果把宏观经济效益差的帐汇集拢来看，肯定要大吃一惊。

1982年外贸赔了50亿元，1983年估计要赔得更多，主要是国内调拨价几十年不动，脱离实际，造成进口赔钱，最后又表现为财政赤字。

所以，决不能只看到搞工资改革和物价改革要花钱，不改革可以不花钱的表面现象，就认为这两项改革只能从缓进行。问题在于没有树立明确的改革目标，没有确定总体规划，过去几次调整工资、调整物价多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章法，以致钱是花了，但改革的任务还依然未动。我们认为，工资和物价改革固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进行，但每一步都要和总的目标、总的蓝图相适应，一步步去实现，才能做到“一钱不落虚空地”，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四）工资改革、物价改革如何改？改革的目标如何定？蓝图如何画？这些问题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具体方案。工资改革仍必须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决不能打乱宏观分配计划，工资改革要花的钱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物价方面过去积聚的问题太多，农产品、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价格已经调高或将要调高，物价改革将是上涨的趋势。对稳

定物价方针应理解为经过对不合理的价格调整，今后才能在新的基础上稳定下来。否则将束缚手脚，很难把价格摆布合理。

物价要改得合理，物价总水平势将上涨，而消费者又强烈要求稳定物价，两者矛盾不小。这里重要的一环是工资、物价改革（包括财政上物价补贴制度的改革）要结合起来研究，力争同步进行。并要研究编制一套能反映消费者生活费用价格变动实际状况的指数，研究工资与物价协调的具体办法。这样做后，即使物价有所上涨，人们可以在工资中得到补偿，只要实际工资水平不是下降而是略有上升，并做好宣传解释，群众是可以接受的。财政上则可以只拿一回钱，负担不会太大。如果工资改革和物价改革各搞各的，互不衔接，由于现在人们的既得利益观念很强，即使国家花了钱，也容易造成人心浮动，意见纷纷，增加不少改革的阻力。

（五）要看到工资和物价改革的结果，还有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的一面。目前，农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农业生产愈发展，农产品收购愈多，财政上补贴愈多，每年水涨船高。物价改革时可以考虑将大部补贴转入价格，从而转入工资，使农产品大部分购销平价，把财政这部分支出从补贴的无底洞中拉出来。更重要的是工资和物价是重要的经济杠杆，工资合理了，物价合理了，才能真正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做到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全面经济改革所必需，也是经济调整所必需的。改革初期虽然要增加点财政支出，理顺以后，将有利于把经济搞活，有利于使经济调整向纵深发展，使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逐步趋于合理，有利于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今年纺织品调价以后，改变了化纤和棉花、纱布价格倒挂的不合理状况，使棉纺织厂由亏转盈；扩大了化纤布的销售，有利于化纤行业的发展。调价时财政收入可能稍有减少，长远看，对国家财政是有利的。从发展观点看，工资

和物价改革将有利于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财政状况会一天天好起来，经过一段推移往复，便能有较雄厚的实力，实现新的经济振兴，所以目前腾出一些财力，用于工资和物价改革，从战略角度看是得大于失，很划得来。

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现在应当腾出一部分财力，支持工资、物价制度的改革，不能把财力都拿去扩大基建。

但这里又遇到一个问题，便是近年来基建规模扩大，主要是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突破计划，所以控制建设规模，减少投资，财政并不能多出钱来，腾不出财力来支持工资、物价改革。因为自筹的钱属于各个单位，并不能直接由财政安排。

财政困难是拦路虎。是否等财政状况好转，回旋余地大些，再来进行改革。财政赤字已经连续四年，不把经济搞活，效益提高，再过四年也未必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事情似乎难办。但如果把眼界打开，看到财政信贷统一平衡的新变化，还是能找到出路的。

我国银行属于国有，财政信贷必须统一平衡。过去财政上实行统收统支办法，银行信贷资金来源有限，不敷贷款增长需要，信贷平衡往往有差额。因而过去讲财政信贷统一平衡，往往是要财政支持银行，信贷差额由财政弥补。近几年来，由于财政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财政收入锐减，财力大大分散。这分散的财力，通过信贷渠道，大部分流归银行。四年来，各项存款，平均每年增加307亿元之多。银行现在有能力支持财政，而且确实对财政已经作了很大支持。能否再挤出一笔资金来支持财政，从而经过迂回道路，使财政有能力支持工资和物价改革？

银行的资金来源虽然增加，但都有贷款用途，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不切实做好工作，再拿出一笔钱来，必然会增加货币发行。所以我们认为，这件事一定要和控制建设规模结合起来做，而银行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第一，坚决压缩各种投资性贷款。1981年调整经济，重工业生产萎缩，机械工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在当时情况下由银行发行中短期设备贷款和措施贷款，起到了一定的启动作用，促进了轻纺工业和重工业生产的回升。现在情况变了，基建规模过大，“三材”紧张，银行再增发投资性贷款，便成了火上加油，使紧张更加紧张。信贷杠杆必须灵活运用，有弛有张，才有利于宏观调节和宏观控制。启动的含义乃是在经济运转迟滞时加一把力，运用过度便不成其为启动。当然设备贷款扶持的项目有的正在进行，不可能统统砍光。但只要下决心，一般不再发放新的贷款，并把贷款指标再压缩几十亿元，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从压缩投资性贷款中找到几十亿元左右资金。第二，坚决控制自筹资金基建项目。只要各级建设银行守住计划、把住口子，制止计划外基建，是会有一定效果的。据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基建规模汇报会反映，目前部分省市安排的基建规模已突破国家计划53亿元，这笔钱是不能再花的。省下的这笔钱虽不归国家财政调度，但只要不用于基建，不论其抵充流动资金使用还是存入银行，都能增大信贷资金的回旋余地。第三，坚决控制各种集资。地方兴办的700多家投资信托公司，说要取消，能否真正做到，还不清楚，而现在报章、刊物、广播里，又在鼓吹各种形式的“集资”。其实不论是投资信托公司还是集资，用的都是原来存在银行的钱，办的大部分是计划外的事。从局部看可能有利，从宏观看是对计划经济的冲击。银行要对这种情况及时反映制止，使原来在银行的存款不被转走用掉。有关部门也不要再提倡种种转嫁负担，挤财政收入的集资办法，估计也可以省下一笔

资金。综上所述，只要在控制建设规模上切实做好工作，在信贷方面挤出一笔资金，加上准备用于补贴价格等方面的钱，统盘筹划，解决工资改革、物价改革所需的资金。如果能够这样去做，那就有可能抓的比较紧一些，步子迈的比较大一些来实行物价、工资的改革，并力争同步进行，把经济运行的内部脉络理顺，各种经济杠杆恢复灵活调节机能，为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促使财经状况根本好转铺平道路。这样办，也许使建设反而可以快些。

现在看来，要等财政、信贷都较宽裕时再来实行物价与工资的改革是不现实的，越等越被动。只要在制订改革方案时，事先严格采取某些防范措施，诸如抽紧银根、调整利息、准备后备物资、保障储蓄存款原值、紧缩财政开支、以及政治教育工作的配合等等，把可能出现的冲击或困难估计充分，准备周密，分几步出台，打几次硬仗，同步配套进行，看来改革是可以进行的。

（本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戴园晨研究员合著，原载《计划经济研究》1983年第35期）

试论外贸出口的“假亏”问题

1953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大多数年份是盈利的，但是进出口合计，1959至1978年间，仍有八年是亏损的。1981年实行内部结算价格以后，连续两年出口有盈余，1983年则又发生较大的亏损。有人估计，今后一、二年出口还将发生亏损。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基础，是进口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全力扭转出口亏损的被动局面，争取达到外贸出口全面盈利的目标。

近年来，在研究出口亏损问题上，有些同志提出了出口“假亏”论，认为外贸企业出口加工产品的所得，只要够工厂生产成本（ $C+V$ ）就算不亏，不必计算加工产品的税和利（ m ），这部分虽然亏蚀掉了，也是属于“假亏”，并把这种计算方法称之为“算国家大帐”或“按照社会经济效益计算成本”。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如果计算工厂的税收和利润，就是只算小帐，不算大帐；只算企业经济效益，不算社会经济效益。对此，我们不能同意。

我国的出口商品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资源性原材料、农副土特产品以及工业加工产品三大类。石油、煤炭、钨砂等资源性原材料的出口是能够实现税利的，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多数也是能够实现税利的。这两类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只要政策对头，这两类商品中的部分亏损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加工工业产品则亏损的较多，亏损额也较大，问题比较复杂。其中一

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有些工业产品随着加工深度的提高，层层加税加利，或有的税利超过正常水平，使工业加工品的出口亏损可能出现一定的虚假性。譬如上海牌手表，工厂生产成本每只10元，外销价10美元，应当说出口是有利的。但由于高税利，外贸部门收购价每只高达50元，使外贸部门亏损严重，这当然属于假亏，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但是目前对绝大多数的加工品，国家只征收工商税或增值税，工厂也是按照资金利润率或成本利润率规定出厂价格，取得合理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外贸出口还要造成亏损，甚至是高额亏损，这就不是什么“假亏”问题了。“假亏”论者主张把国内生产企业的全部合理利润和合理税收去掉，来计算出口商品的盈亏，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发展出口事业上是有害的。

一、外贸的“假亏”和算国家大帐

对外贸易是国际间的商品交换，与国内的商品交换相比较，它的特殊性在于，交换的双方总有一方在国外，要经过两个市场，涉及两种价格体系，要完成至少两种货币的转换。这里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汇率。汇率不仅仅是与外币换算的依据，也是衡量外贸盈亏的准绳。从理论上讲，汇率应该反映两国的购买力平价，或者说是一国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的交换比率。但是，我国的价格结构有其特殊性，农副产品和服务行业、文化、卫生、住宅等方面的价格非常低廉；我们实行的是计划价格，不能迅速反映国内生产和销售条件的变化，也不能随着国际市场价格涨落来及时调整国内价格，这样便使国内的价格水平与国际价格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因而所确定的汇率往往脱离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的交换比率，不能准确地反映两种价值或两种货币的比例关系。例如：

198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均按外汇牌价结算，当时进口商品大部分是盈利的，出口商品大部分是亏损的；1981年改用内部结算价格结算，情况相反，进口商品大部分发生亏损，出口商品大部分表现为盈利。如果我们撇开其它影响外贸盈亏的因素，这种盈亏的变化主要是由汇率变化所引起的，是人为地把出口亏损向进口转移，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外贸盈亏的变化。我们认为，从总体来看，现行内部结算价格的水平还是合理的，可以以它为基础来经营对外贸易。如果再提高结算价格，即人民币再贬值，出口自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转亏为盈，但进口势必造成比现在更大的亏损，为国力所不能负担。因此，目前只能以内部结算价格作为出口计价的标准，并以此来研究出口盈亏问题。

所谓外贸出口的“假亏”，是以算大帐为基础，以真亏为前提的。“假亏”首先是某个部门、地区或企业所发生的真实亏损，否则就不会有什么“假亏”问题。真亏到“假亏”的转化，是以算国家大帐为基础的。所谓算大帐，就是从比发生亏损的更大范围乃至整个国家来统算盈亏。这种大帐一般要包括几个部门（如工业、农业和外贸），或社会再生产的几个领域（如生产和流通），或某一个领域的全过程（如外贸的进口和出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虽然也存在着造成外贸假亏的因素，但假亏问题一般不会发生。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无法算大帐，盈亏自负，却是真实的。我们能够在对外贸易方面算大帐，能够去做在局部看来是亏损，在更大范围或全局来看是盈利的事情，这无疑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优越性的一种体现。但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看到，有些同志把算大帐混同于吃“大锅饭”，或者混同于“以工代赈”，或者算大帐的方法不科学，在这“假亏”之下可能掩盖着真亏。

关于对外贸易为什么要算大帐，如何算大帐，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曾作过原则性论述。他指出，国际之间的商品交换，不是按商品的国别价值，而是按商品的国际价值——“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进行的^①。由于各国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同一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国际价值也有所不同。但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不发达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好处，“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②很显然，马克思在分析一国对外贸易的得失时，是把进口和出口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我们理解，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对外贸易的算大帐问题。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从总体来讲，在出口商品时由于国内价值高于国际价值，会损失一部分社会劳动；但在进口时，由于买进商品的国际价值低于国内价值，会节省一部分社会劳动。所以，要全面衡量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效果，必须进出口统一算大帐。此外，社会主义国家进出口必须统一算大帐，还有它的特殊原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口和出口可以是不同的私有者，完全可以独立核算，这并不影响盈亏的真实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则截然不同，国家同时经营进口和出口业务，单纯的进口或出口，都不能完成整个对外贸易的任务。同一个所有者，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进口和出口在经营上的统一性，进而又决定了进出口盈亏的一致性。如果我们将进口和出口的盈亏分割开来，那就无法全面反映整个对外贸易的经济效果。

生产决定流通，外贸是内贸的延伸，外贸算大帐还应把生产与流通加以通盘考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不是全部为产业资本家所攫取，而是按照平均利润率在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等之间进行瓜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在缴纳国家税金以后，也应该按国内平均利润率取得平均利润。如果对外贸易企业对于出口产品的合理税金和合理利

润不能在国际市场中得到实现，反而视之为“假亏”，那就使出口产品的生产者丧失积极性，外贸企业就得不到货源，出口贸易就要萎缩不振。反之，如果工业高利，国家高税，那就会出现外贸高亏的现象，这同样不利于出口贸易的兴旺发达。因此，必须把产业部门和外贸部门的盈亏联系起来，统一核算，才能反映出对外贸易的真实效果，才能制订出合理的有利于外贸发展的税收政策和利润分配政策。片面地提倡“假亏”论，是无补于事的。

二、不能以工业生产成本衡量出口盈亏

在特定条件下，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对一些出口商品减少甚至取消税金和利润，短期内也并非绝对不允许，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正常条件下、在长时期内，可以只用工业生产成本（ $C + V$ ）来衡量出口盈亏，也并不等于说，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亏本。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看一看马克思是怎样分析商品的价值构成的。他在分析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时指出，“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他又指出，“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东西和商品的生产本身所耗费的东西，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部分，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因为它耗费的只是工人的无酬劳动。”^③可见， $C + V$ 是商品生产中的资本耗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费用，实际的费用应该是商品生产中劳动的耗费，即 $C + V + m$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中的剩余劳动主要表现为税金和利润，这是工人劳动耗费的结果，必须在交换中得到实现。所谓工业生产

成本 (C + V) ，只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以C + V去交换就等于把工人劳动创造的一部分价值白白送掉了，这难道还不是真实的亏本吗？从劳动耗费角度来看，计算出口盈亏的基础只能是 C + V + m。实现平均水平的税金和利润，对于出口商品来说是天经地义的。

社会主义生产企业，是从事生产性活动、进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基本经济单位。它进行经济活动的结果，除了补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以外，还必须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增加积累、发展社会文化福利事业的源泉和基本保证。如果以 C + V 作为衡量出口盈亏的标准，就等于说，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仅仅可以以收抵支，可以不为社会做出贡献，可以依靠国家的支持来维持简单再生产，这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

我们再退一步讲，出口商品能够实现商品价值中的 C + V，是否就能补偿生产中耗费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呢？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实际上是补偿不了的。大家知道，我国实行的是以国家多种生活补贴为基础的低工资制度。1982年国家用于居民生活补贴达数百亿元。如果把国家用于居民吃、穿、住、用的巨额补贴计算在内，职工的货币工资至少要增加一倍以上。生产成本中的工资 (V) ，远远不能反映所耗费的活劳动的全部价值，这是其一。其二，我国在能源、交通和多种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中每年也有大量补贴。1982年仅用于进口粮食、棉花、化肥、钢材、木材的补贴就达几十亿元。生产成本中的原材料、燃料等费用(C)也不能完全反映所耗费的物化劳动的价值。比如：0.9毫米的高速工具钢1981年每吨进口价折合人民币19.55万元，但在国内以每吨1.9万元调拨给工具厂，反映到生产成本中的工具钢的费用只是实际费用的1/10。所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出口商品

仅仅实现了通常所说的工业成本（ $C+V$ ），那损失掉的就不仅是剩余劳动部分，其中甚至还包括了一部分耗费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可以说，出口加工产品必须实现合理的商品税和平均利润，必须有利可图。如果不能，那就是真亏，而不是假亏。在特殊情况下，如果为了取得进口所需的外汇，我们不得不损失掉合理的税利，暂时忍痛出口一部分商品，只要符合国家总体利益，是可以的。但是，这在外贸核算上仍然是真亏，决不是假亏。

有些同志主张，对进料加工和国内材料加工产品，都按来料加工办法处理，即免除进出口关税、工商税，仅仅以赚得工本费为满足。这是“假亏”论的又一种表现。以此来求出口贸易的发展，则出口愈多，国家愈穷，亏尽血本。仅就工商税而论，我国的工商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基础之上，对流转额征收的主要税种，它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财源之一，在各税种中占第一位，在全国税收收入总额中占3/4以上。如果全部出口产品免去工商税，那么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必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提高和稳定。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鼓励出口，一般减免的只是关税和物品税（类似我国的工商税），但是关税和物品税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已不再是主体税种，减免是无所谓的。在我国免去工商税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保护落后的作用。因为越是落后的地区或企业，其工商税占税利总额的比重越大。以1982年数字为例，上海只占28.7%，江西占52.2%，宁夏占58.3%。如果出口产品统统免去工商税，越是落后地区或企业，受益就越大，不利于鼓励先进、鞭策落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仅以工业成本（ $C+V$ ）作为衡量出口盈亏的标准，无论是算大帐还是算小帐，都是亏本的，是不惜血本搞对外贸易。这样做的结果，不但解决不了出口的“假亏”问题，反而减弱了企业的盈亏责任心，不利于促使工

业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不利于外贸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做生意的本领，同时也不利于工贸结合，齐心协力打开国际市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对外贸易的生产和销售不能取得正常的利润和税收，部门、地方、企业和工人也不会同意，是根本行不通的。为了使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能够获得相当于内销的税利，到头来还要由中央财政进行补贴。倘若真的这样搞出口，那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三、外贸出口应该而且能够盈利

任何社会形态的对外贸易都具有转换使用价值和节约社会劳动、实现价值增殖这样两种基本功能。虽然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有差异，但他们却能利用比较利益的原则，出口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取得盈利。我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物产，劳动力比较便宜，国内物价基本稳定，我国已经形成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具有相当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不仅可以出口传统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经过努力以后，也可以逐步增加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我国的外贸出口，无论是算大帐还是算小帐，多数产品都应该而且是能够盈利的。我们所说的对外贸易要盈利，绝不是仅指外贸部门的盈利，而把国内一切税收、利润统统去掉。我们认为，对外贸易的盈利，应该包括实现国内正常的税收和利润，这才是真正的盈利。当然层层加税，雁过拔毛或超过正常水平的高税高利的做法，都是不利于外贸出口的。这些问题在实行增值税和利改税的过程中，一定可以逐步加以解决。

这几年导致我国外贸出口由盈转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除了同室操戈，对内抬价抢购、对外削价竞销，不能做到三统一之外，有两点应该特别引起重视。

(一) 应该重视择优出口的问题。择优出口是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基础，舍此就谈不上什么发挥优势，也谈不到提高经济效益。为了做到择优出口，必须建立严格的出口盈亏责任制。目前比较实际可行的办法是：依据国内平均先进水平，按商品或大类商品核定全国统一的换汇成本，在国家对于亏损产品暂时给予定额补贴的基础上，自负盈亏。实行这一办法能够起到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作用。由于我们把低于国内平均价值的产品，即成本最低、劳动生产力最高的产品拿来出口，它就可能接近或低于国际价值，就能使我们少吃亏或者多盈利。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淘汰一些落后的企业，会带来职工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觉得，不能因为解决职工就业等社会问题，而维持低效益或严重亏损的外贸出口。

(二) 应该大力改进外贸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首先，目前外贸部门的费用水平过大过高。每年仅利息支出就达20亿元之巨。有些商品外贸费用惊人，有些商品本来是不亏损的，由于外贸费用率较高，变成出口亏损商品。如70 D/2色织尼龙游泳裤，按照工厂出厂价格计算换汇成本为2.35元，盈利率较高，但加上外贸费用之后，换汇成本为3.14元，变成亏损商品。总之，节约外贸管理费用，潜力极大。其次，外贸部门要千方百计加强工贸结合和技贸结合，帮助工厂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档次，降低生产成本。做好为工厂代理出口的一切服务工作，使工厂在出口上赚到更多利润；如果采取收购制，就要切实贯彻优质优价的原则，或者实行联合经营、利润返还等做法。工业是外贸的基础，只有工业发展了，生产出口产品有积极性，对外贸易才能真正发展。再次，外贸在国际市场上要卖好价钱。外贸部门经营思想和做生意的本领如何，对外贸的经济效益影响极大。我们不能要求外贸的每笔生意都能卖上好价钱，但从总体上来看，应

当要求我们卖出的价格符合正常的或平均水平的国际价格。我们必须熟悉国际市场的一切方面，如行情变化、供销趋势、市场容量等等。资本主义市场是买方市场，我们要善于推销，善于以进带出，决不能官商作风十足，等客上门。20年来，外币不断贬值，我们有些商品出口价格长期不动。如我国生产的白熊牌薄荷脑、薄荷油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但我出口价格始终维持在50年代水平，造成严重亏损，这是出口贸易上的大笑话。我们还要熟悉外汇行市变化趋向，趋利避害。两年来美元独秀，港币屡贬，我们缺乏全面部署，没有采取有效对策，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今年广交会国家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早作准备，领导有方，使全部成交商品售价率比春交会时提高约9%。营业员说，过去“卖了算（定了）”，现在“算了（成本利润）卖”，效果大不一样。所以出口扭亏增盈，外贸企业要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至于进口方面，有许多进口商品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是大买主，举足轻重，我们能否很好地运用进口这张王牌？国际市场上买卖机会稍纵即逝，我们是否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不失时机地抓住？如果我们确实学会做生意，在国际市场上买价低一点，卖价高一点，哪怕只相差5%，就会有几十亿美元的差额，就会大大影响外贸的盈亏，这里大有文章可作。列宁曾经要求共产党员要学会经商，这在当时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今天，国际市场情况更加复杂，买卖行情千变万化，手段光怪陆离，为了很好贯彻党的对外开放政策，我们更加有必要学会做买卖，不在“假亏”上作文章，而要下苦功夫，实现对外贸易出口真盈利的任务。

（本文系和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 孟宪刚副研究员合著，原载《财贸经济》1984年第2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综合平衡仍然是制订计划的总原则

经济计划要不要坚持综合平衡，这是能否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并有“后劲”的重大理论问题。最近，我们结合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情况，重新学习了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深感综合平衡仍然是制订经济计划应该遵守的总原则。



1956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工业提前一年完成了“一五”计划的总产值指标，农业粮、棉丰收，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面对着胜利，在指导思想上了“冒进”的错误，基本建设投资上得太猛，社会购买力增加得太快，因而出现了财政赤字，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也紧张起来。陈云同志当时指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按照合理的比例关系，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平衡。这个意见不仅是对“冒进”的一付清凉剂，也是我们制订经济计划的总原则。

对国民经济实行综合平衡，是指对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求和外贸本身各自的平衡，以及把财政、信贷、外贸综合起来与物资的平衡。我们要使社会再生产能正常进行，必须保证社会在一年内所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同把它们用于补偿、积累、消费的数量，保持一定的平衡。

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曾按所谓“积极平衡”的观点、方法安排计划，认为制订计划时留有“缺口”，可以推动“短线”部门迅速赶上“长线”部门，主张按长线搞平衡。陈云同志很不赞成这样搞。他在1957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为了制止“缺口”，他还特意提出了几条措施，比如：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平衡，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并略有节余，物资供求必须平衡，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原材料分配要先满足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部门的需要，其次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的需要，剩余部分再来搞基本建设；人民购买力的提高，要同消费资料可供量相适应；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等等。

积长期经验，“缺口”计划就是无计划，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白白浪费掉极端珍贵的建设时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二

陈云同志历来反对用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的办法来搞基本建设。他在同一次讲话中又说：“应该看到，基本建设搞多少，不决定于钞票有多少，而决定于原材料有多少。”“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他一再告诫我们安排国家经济建设一定要量力而行。进行综合平衡，就是要遵循按比例规律，搞好国民收入的分配，首先要确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然后以消费的需求来确定生产的结构和积累的规模及其分配，

经过反复平衡,使商品可供量稍大于社会购买力,保持市场稳定。

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对投资效果进行严格考核的经济责任制,在资金供给制下,“投资饥饿症”很难根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预算内的投资已有所控制,但预算外的投资依然不断膨胀,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仍时有偏多;而另一方面,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又使城乡居民的个人收入增长得快了一点,因而使社会总需求量超过总供给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还没有完全搞好,国家财政经济根本好转尚未实现。

目前,我们的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中央财政仍有困难。如果我们能合理地控制基建规模,有计划地安排消费增长速度,改革管理体制,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经济运动中的不平衡是可以逐步达到平衡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新形势下,生产资料已经逐步作为商品进入了流通,而且由于供不应求,议价范围逐步扩大,基建三材供应紧张,价格逐年上涨,基本建设工程的实际造价几乎普遍超过概算;至于消费品,尽管主要生活用品仍然是计划价格,但议价商品也在增多,群众多得的收入,部分被物价上涨所冲销。物价发展的这种趋势,再加上价格体系本身的不合理,会给国家财政带来不少新的问题,财政补贴负担加重。另外,在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分配的经济关系上也还没有完全理顺。因此,为了完成90年代经济振兴的任务,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和有“后劲”,我们决不能因为总的形势很好而掉以轻心,要注意继续理顺经济关系,把经济计划安排在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上。

三

利用信贷资金搞基本建设,一定要以财政与信贷的综合平衡

为前提。60年代初，当有的同志建议用信贷资金来搞基本建设时，陈云同志强调指出：“把必要的信贷资金和流动资金拿来搞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就要出现缺口，这是不行的，是有危险的。这个忠告，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在银行存款中有一定的数量是通过信用膨胀而形成的膨胀性存款，它不能作为真实的资金来源加以运用，搞基本建设，否则最终会助长通货膨胀。应当肯定，用银行贷款的方式代替财政拨款的方式来搞基本建设，对加强基本建设的经济核算，缩短建设周期和提高建设的经济效益，是有好处的。同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今后银行资金来源的潜力还会继续增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应该更加强调在财政信贷之间要有综合平衡，实行统一平衡计划。对财政收支要注意严格管理；对金融要搞活，适当发挥银行筹集社会资金的功能；对银行发放中、长期基本建设的信贷投资要管严，对以固定资产更新、技术改造为内容的三年内短期信贷投资要放活；对财政性通货发行要管死，对促进社会生产和流通并提高经济效益的资金融通要放活。

对外开放政策是新形势下我们坚决奉行的国策，我们要积极引进外资，以促进四化建设。引进的外资，自然带来了设备和材料，但它也要受到国内提供配套所需要的物资和资金能力的制约，受到国内管理人材、职工科学技术水平和消化外资能力的制约，而且也要受到偿付外资外债能力和外汇来源的制约。因此，我们要把外资的借、用、还统一起来，与国内经济计划实行综合平衡。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把外汇收支纳入综合平衡是十分重要的，不能认为外汇结余越多越好。外汇结余和储备，是国内资金或物资的转化形态，如果长期地保有过多的外汇储备，必将影响国内经济的运转，助长通货膨胀。

四

近年来，有的同志主张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缺口”计划、“赤字无害”、信贷膨胀，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一思想派生的。是坚持综合平衡的经济计划，还是搞点所谓“最佳通货膨胀”，这是宏观经济决策中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通货膨胀是由于通货的增加超过了客观需要（包括纸币发行量过多和信用膨胀），引起货币贬值，促成物价上涨的一种货币流通的失常现象。它的经济后果，首先是影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是加剧供求矛盾。我们的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本来就有“缺口”，通货增多，会使物资更加供不应求，同时诱使企业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从而使经济效益下降。再次，我国涉及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实行计划价格，在其他各种产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比价会更不合理，经济利益会更难摆平，国家计划难以制订，企业核算难以进行。此外，还要看到，通货膨胀不单单是个经济问题，它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决不应该把通货膨胀当作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而要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当然，我们所说的综合平衡，并不是指在短期内僵死的静态平衡。在一个短时期内，或在某个方面，允许有一定的不平衡。但是，重要的是应该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通过经济发展而去实现动态上的平衡，特别是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要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瞻前顾后，通过宏观的综合平衡，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五

搞国家经济建设，只有一条康庄大道，就是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为此，就要坚持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小平同志说：

“改变这种局面（指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引者）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14页）这些话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长期遵循的至理名言。

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是我们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对现行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来说，如果各方面经济关系绷得很紧，那么有益的改革也不一定得到好的社会效果。只有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有国民经济的真正高涨。我们要力争在搞好综合平衡的条件下，通过一系列的有条不紊的农村、城市改革，把经济搞活，把关系理顺，充分发挥企业、职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大大增加社会财富和社会剩余产品（M）。这样，就可以实现财政经济根本好转，为90年代国民经济的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曹天启 副研究员合著，原载《人民日报》1984年9月3日）

学习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

近几年来，全国各报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对孙冶方同志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做出了公正评价，高度赞扬他在“左”倾错误时期坚持批判自然经济论、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革、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功绩。但是，冶方在临终遗言中请求对他理论中的不足或不正确地方进行批评或澄清，这个问题至今似乎还未引起必要的注意，为此，我们特地写了这篇短文，通过探讨孙冶方经济理论中若干历史局限性来实现冶方的遗愿。不妥之处，希望得到经济学界的教正。

一、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 否认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货币关系

我们要首先肯定，冶方批评把全民所有制看成是自然经济的全套理论，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经济科学，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早在50年代末期，当“左”的错误在全国泛滥时，冶方就指出，我们经济学界受自然经济论和唯心论的毒害，“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内部关系）看作是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的实物经济”^①80年代初，他继续坚持批判自然经济论，并深入指出：小农个体生产者“是从封建庄园经济的角度来想象我们社会主义社

会的大生产的，而封建庄园经济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多年来的经济体制，……也反映着这种自然经济的观点。”^②我们从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中看到，自然经济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是相当普遍的，比如：没有经济效果观点，不计工本，不计盈亏，借口算政治帐掩盖经济建设中高消耗、低效率的弊病；没有产品（商品）二重性观点，只讲实物，不计价值，国家用指令性指标给企业敲任务，造成物质财富的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矛盾；没有流通观点，把全民所有制经济看成是个“大工厂”，实行实物配给制；没有等价交换观点，把价格看作是使用价值的计量单位，使社会劳动耗费的比较失去了依据；没有资金核算观点，实行资金无偿供给制；没有固定资产无形磨损和补偿更新观点，拉长折旧年限，迫使企业搞“古董复制”，冻结了技术进步，等等。实践证明，治方批判自然经济论的全套理论都是正确的。我们沿着他的思路再探索下去，那么经济理论和实际工作中自然经济论的表现还要广泛得多，比如：在所有制结构上排斥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主张“大一统”；在调节手段方面排斥市场机制，片面强调行政措施；在组织结构上条条林立，各管所属企业，地区分割，各霸一方，朝着“小而全、大而全”的方向发展；在物质利益方面搞平均主义，等等。事实说明：不批判经济理论中的自然经济观，就不能充分认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清经济体制中的自然经济影响，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赵紫阳总理指出：“在经济工作中，我们应该彻底抛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点。”^③因此，治方从全民所有制内部分析了价值规律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并以此对自然经济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历史功绩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

但是我们看到，治方的经济理论是在对自然经济论和商品经济论的两条战线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在激烈批判自然经

济论的同时，也反对把商品货币关系引入全民所有制。他在60年代初指出：“有一种我认为不正确的经济学思想，那就是把商品货币关系引进全民所有制内部关系中来，就是以市场竞争规律，以交换价值规律来解释和指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些就是所谓经济‘自由化’的理论基础。”^④ 80年代初，他针对一些同志把商品货币关系引进全民所有制内部的观点而批评说：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先是根本否认价值规律在全民所有制内部起着调节作用；现在承认了这种作用，却为了更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又把商品引进了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关系中来。”^⑤ 他认为，判断是否是商品交换的唯一标准甚至本质条件，是等价交换基础上的所有权转移。交换双方要互相承认对方是自己产品的所有者，没有等价物作为交换条件就不能占有对方的产品，否则，就成了无偿占有。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经济，他指出：各个“国营企业都属于一个所有者，属于全体人民，属于全社会，它们之间的交换并不引起所有权的转移问题，而只有核算的问题，”^⑥ 因而他否认全民所有制内部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当然，在治方研究的进程中，当他从存在不同所有制成分的社会主义社会来看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往来时，也不否认这仍然具有一定的商品性。但这种看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并不一致。我们所说的他的理论局限性集中地表现在否认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

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发展 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要不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70年代，曾经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只有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无产阶级政党在沙皇俄国取得胜利后，曾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设想作为社会主义的政策基础，以为无产阶级政党一旦取得政权，就可以立即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把指令性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并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会产生资本主义，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相混同。这种认识给社会主义涂上了一层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新经济政策”时期虽然把商品交换提到首位，但商品货币关系仍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要逐步消灭它。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步形成了由国家高度集权，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处于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国际环境中，对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又缺乏经验，客观上造成照抄照搬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做法在中国落脚后，似乎找到了更适合于自己生长的土壤，以更极端的面目把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相对立，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相混同，不仅排斥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货币关系，而且还限制商品生产和交换在全社会的发展，特别在“大跃进”和“十年动乱”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价值规律；批“资产阶级法权”，取消按劳分配，使国民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在国家高度集权、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实物化计划管理体制下，国家用指令性指标控制了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使生产和需要脱节，造成了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国家通过部门和地区管企业，限制了企业供产销活动的横向联系，妨碍了生产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国家各级领导机关管了许多管不了、管不好和不该管的日常供产销活动，使得国家机构臃肿、办事拖沓、公文旅行、互相推托，助长了官僚主义，许多不符合实际的指令常常以“党的领导”名义下

达给企业，企业成为多头婆婆任意摆布的“算盘子”，失去了相对独立的职能。而另一方面，财政上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或变相的统收统支，不尊重企业应有的财权和物质利益，使企业失去改善经营管理和改进技术设备的积极性，只好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职工则端企业的“铁饭碗”，影响了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商品经济是资产阶级“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⑦我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摆脱小生产影响，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尽快实现现代化，除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外，别无其它任何灵丹妙药。

三、利益差别性是商品货币关系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的经济缘由

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⑧所以，商品货币关系作为一种利益关系，要弄清它在全民所有制存在的原因，当然就应该分析利益在全民所有制中的特殊表现形式。

首先，利益的一致性。全民所有制经济由于废除了私有制，从而铲除了产生人剥削人的经济根源，劳动者成为社会化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他们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都以平等的身份互相对待和发生关系，国家代表人民利益行使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因此，国家、企业、劳动者以及社会各阶层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社会主义有可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经济根源。

其次，利益的差别性。目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基本细胞，它们相对独立地进行经济活动，也必然具有相对独立的

经济利益关系，否定它们的经济利益，就意味着冻结技术进步，取消经营管理的科学化，抑制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就千百万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内的劳动者来说，劳动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仍然是谋生的手段，提供劳动与劳动报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劳动者能力大小、贡献多少，必然会反映到报酬高低、生活好坏上来，从而客观上必须坚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否则就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劳动者集体即企业的经营好坏、生产多少、技术优劣，也必然反映到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以及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上来。总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客观上存在着国家、企业、个人三种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同时，企业之间也存在各自的物质利益。如果不承认这些不同的利益关系，不正确处理这些物质利益关系，就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这些利益关系只有在商品价值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解决，即必须承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它的产品是商品，以社会必要劳动（价值）来作为衡量劳动耗费的共同尺度。所以商品货币关系是正确处理物质利益关系的唯一有效手段。我们认为，计划经济同商品货币关系并不对立，计划形式能够顺应商品货币关系的客观规律，从全社会促进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肤浅地认为：治方经济理论历史局限性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只看到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利益的一致性，而没有看到全民所有制内部还客观上存在着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利益的差别性。50—60年代治方在不少文章、讲话中对自然经济论进行辛辣而尖刻的论战时，几乎都要顺便批评物质利益原则，他说：“既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所创造的利润是企业职工为社会扩大再生

产和社会公共需要所创造的财富，因此就必须全部上缴国家，而修正主义者则提倡以物质刺激原则为指导的利润分成制度和奖励制度。”^⑧对此，在打倒“四人帮”后，他曾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但他已不能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多年的非人磨难和不治之症，使这位勇于前进的老人已经力不从心了。

四、孙冶方经济理论否认利益差别性 原因的剖析

首先是历史环境。冶方经济理论是左倾错误时期形成的，当他的改革建议刚刚露头时，就被当作奇谈怪论而横遭围攻，这对他的理论形成是非常不利的。人作为环境的产物，在举国批判物质刺激的浪涛中，冶方也不能不受到某种影响。他曾经坦率地说过，“左”倾病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流行病，在我们这个原来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更不例外。在我们中间，患这种“左”倾病只有轻重程度之分，没有有无之分。^⑨因此，冶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正是这个理论形成的历史环境所留下的印记。

其次，方法论问题。冶方采用抽象法，即所谓“脱衣法”，以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对象，把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一些非本质的次要的现象舍弃掉，这在原则上当然是对的。但是，脱衣要脱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非本质的东西，这却是个问题。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本质问题，但在孙冶方的理论研究中，却当作非本质的问题而舍弃掉了，他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而把产品的自然属性抽象后，剩下的就代表生产关系；又把不同所有制、按劳分配等抽象掉，就是代表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生产关系。”^⑩这在理论上是很难站住脚的。舍弃了按劳分配，当然就没

有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没有利益差别上的矛盾了。

第三，理论问题。我们知道，治方的经济理论是以他的价值论为基础的，他依据恩格斯1844年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价值概念的论述，把价值以及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脱钩，提出产品价值和商品价值、产品价值规律和商品价值规律。我们如果按照他的思路，把产品价值理解为社会必要劳动自身，把产品价值规律理解为社会必要劳动规律，而且这个规律是在纯粹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中运动并发挥着调节作用，那确应是合乎逻辑并前后一贯的，似乎也符合马克思所预见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全民所有制不是万能的，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全部客观经济关系，它首先要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调整它的具体形式。全民所有制经济还有一个由不完全到完全的发展过程，纯粹的全民所有制或者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毕竟还是一种理想，特别是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非常低的起步过程中，人们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和差别性之间的矛盾还很复杂而尖锐。治方立足于计划性基础上形成的广义价值（即社会必要劳动）和产品价值规律，应该是和商品价值、商品价值规律相紧密联系而不能是脱钩的。我们认为，不仅不能脱钩，而且要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出发，一句话，从商品货币关系出发，持久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经过相当漫长的人类发展的历史时代，才能到达产品经济，从现实的此岸升华到“理想”的彼岸。但是，他却使二者脱了钩，从而在理论上陷入自身矛盾中。

我们不赞成那种武断地否定恩格斯对价值概念最早论述的观点。恩格斯在1844年曾指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②经过五十年后，恩格斯对此又做了肯定。应该说，这个论述简炼地概括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反杜林论》乃

至《资本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对价值概念的基本看法。冶方反复宣传这个论述，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认为，他对这个论述的应用范围似有扩大化的倾向，“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在存在利益矛盾的条件下，必然表现为交换价值，只是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才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自身^⑧。

冶方的流通理论，是他价值论的展开，由于研究对象已不仅限于全民所有制内部而是引入了不同的所有制成分，即以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对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流通论补足了价值论的不足，显得更有生气，更有现实性。比如：他的流通论强调了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交换的商品性，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一个整体，很难把一种生产关系同另一种完全割裂开来看。每一个国营企业不仅同其它国营企业发生往来，而且同时也同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往来。同一个国营企业的产品，一部分调拨给其它国营企业，另一部分出卖给人民公社，或供个人消费。……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营企业之间的往来难免带有一定程度的商品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仍旧需要采取商品交换的方式。”^⑨再如：他的流通论也强调利益关系，说，“流通过程应是各方面经济利益得以具体实现的场所。”^⑩这两点，是价值论中最不足的地方，流通论中却得到了比较正确的反映。

但是，应该指出，他的流通论仍然有不足的地方，比如：他从利益一致性出发，曾经否认流通中还会有实现问题，他在60年代认为，只要企业是按计划生产出的产品，就能按社会必要劳动在价值和实物形式上得到补偿，不存在什么实现问题。尽管80年代他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存在“卖得了”“卖不了”的问题，但还依然没有从资金运动的角度来把握流通，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几个提纲稿中，凡是亲自设计的流通篇章

节，资金运动问题都被取消了。再如：他的流通论中还不大赞成利益的再分配，只强调价格与价值一致（这在表述上不很科学，但其用意是可以理解的），但不重视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把这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我们作为治方同志多年的老友、学生，大胆地对他某些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比较集中地进行了分析，但是，我们要明确指出：1. 治方经济理论的某种历史局限性即否认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货币关系，这与那种把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对立，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相混同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2. 我们和治方经济理论的斗争对象是一致的：都在批判自然经济论，因而在实际主张和政策建议方面，也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比如：都主张要提高经济效益，用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要等价交换，使价格与价值（生产价格）大体上一致；要发展社会主义流通；要实行资金有偿使用；要以价值平衡为主对国民经济实行综合平衡，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等等。

治方的经济理论，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批判“左”的错误，倡导经济体制改革有过重大贡献的理论。我们无意在时过境迁的新时期去指责这也不对，那也不足，而是要通过对这个理论历史局限性的探讨，继续批判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加快推进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

（本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贾天启副研究员合著，原载《财贸经济》1984年第12期）

①④⑥⑧⑩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③⑤⑦⑨ 孙治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⑧ 《经济研究资料》1983年第8期。
-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⑩ 冒天启，《关于价值概念的几个问题》，《经济科学》1981年第3期。

发展商品经济，改造和振兴上海

一、上海的战役目标和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我对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提不出什么意见，只能以目前的上海为起点，探讨一下近期内能做些什么事情，达到什么战役目标。

（一）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研究上海经济地位之所以发生变化，上海经济发展中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看来都和发展或不发展商品经济这个问题相联系。当然，我们国家要发展的是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不是搞盲目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经济，但也应该看到，过去不重视或者不承认商品经济，排斥经济活动中的横向联系，束缚了经济活动中的活力。所谓给政策、所谓体制改革，都要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前提，使企业从条块分割和政企合一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打好振兴和改造上海这一仗。

（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高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因此，开放并不是单纯地引进外国技术，不是单纯地进口零配件组装，还必须把引进的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创造提高。在这方面，上海最具备条条、最有优势。上海要通过消化吸收，把先进技术扩散到全国各地，并且要不断提高自己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所以，上海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发展商品经济问题，而是要把视野打开，要想

到将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发展商品经济。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上海要把对外开放摆在重要位置上，面向世界，服务全国。如果不能通过对外开放，不能吸取世界之长，消化吸收创新提高，就不可能服务好全国，就不能起到上海应起的作用。

（三）上海的竞争对手的问题。我对于长期的，50年以后，百年以后的事情说不清楚，近期的则不能要求过急；再是和谁比，是和自己过去比，和兄弟省市比，还是和别的地方比。看来，着眼于祖国的统一，有必要和香港、台湾比。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战役目标，到2000年时，上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台湾相仿佛。按照1983年资料，上海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大约为1200美元，换算成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1600美元，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2500美元，上海地区的人口自然增殖率是8%，台湾是12%，要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或超过台湾，只要我们在增长速度上比台湾快2—3%，便能够实现。我们能不能在今后16年里赶上和消灭这段差距，我看要有这个决心和信心。

再是能不能考虑，上海以及上海经济区或者长江流域各省的对外贸易出口额，到2000年时和台湾的出口额相接近。实现这个战役目标可能有些困难，因为目前台湾省的出口额大体和我国大陆各省出口额不相上下，上海所占份额不到1/3。但我们要看到，要使我国外贸出口额翻一番半，靠农矿等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增长是很难实现的，必须改变出口商品结构，使加工工业品出口有较快增长。上海是重要的出口工业品生产基地，上海一定要有更快的增长才行。在这方面做好了，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对统一祖国的大业也能作出贡献。

（四）实现战役目标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1. 内销和外销的关系。要发展我国经济，特别是要发展上海经济，一定要对外开放，打开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但是外商来我国投资，他们的目标是我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如果不让出国内市场，单凭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便宜，是吸引不了多少外资的。因为办企业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有着协作关系、信息传递、能源供应等方面的条件，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条件并不优越，我们不可能采取出口加工区的办法。但又不能永远让出国内市场。从长远看要打到国外去。这从上海已经有了基础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企业来说也是如此，都有着内销和外销关系。

2. 传统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关系。新兴工业不可能一下子发展起来，不可能一步跳入知识密集型企业，这是物质生产达到一定高度以后的客观要求和综合表现，决不能因为强调新兴工业而否定传统工业。举个例子来说，中国没有8000万吨到1亿吨钢铁的年产量，就不能满足生产与建设的需要，连造房子的钢筋和H型钢也满足不了。我国到普遍应用新兴工业产品还有段时间，对传统工业决不能忽视。

3. 技术改造与新兴工业的关系。发展新兴工业的着手点，在于用新兴技术改造现有工业，在于和工业结构的改组结合起来。因此，技术改造最好是有重点的，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改造，并且与旧城市改造结合起来。上海已经不能再搞见缝插针，现在需要拔针，要搬一些企业出去，特别是一些污染严重和耗能高的要先搬。但搬出去不是搞污染转移，而是上海受场地限制搞不了污染处理设施，搬出去便于解决。上海冶金工业改造，一定要和宝钢的建设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上海提出的这许多新兴工业，确实有上海的优势和基础，应该上。但是应该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结合起来，用新兴工业成果改造传统工业，所以新兴工业要从最终产品搞起，先搞组装，然后逐步提高自给率。如果从先种

菜做起，等菜长出来再炒菜请客吃饭，那样时间太长了，现在只能买菜来炒。这样新兴工业发展就可以和传统工业改造结合起来，就有了市场，就知道最需要的是什麼。当然这样做，要注意和中央的宏观计划的衔接，避免力量的重复和浪费。

4. 引进和消化的关系。要改造现有老工业，目前主要靠引进，要先做好引进准备工作，做好可行性研究，多一些预备项目，然后才好对外谈判。外国人来投资是要来赚钱的，无利可图的事是不会干的，决不能因此而害“红眼病”，所以关键是我们自己对投资结果要心中有数，丈量一下我们能得到什麼好处。引进一定要和消化结合起来，不消化，便只能永远靠引进，命脉始终控制在人家手里。所以在引进时就要准备消化，要准备好消化的财力和人力，看来引进时的课题组最好是一包到底，包消化，然后才真正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二、需要解决的几个政策问题

要搞活上海经济，振兴上海、改造上海，紫阳同志指示是给政策。我认为紫阳同志这个指示精神，非常之对。上海人灵得很，只要有正确的政策，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政策的关键，是要解脱发展商品经济的束缚，使上海人的长袖能够舞起来。

那么要实行哪些政策，才能使上海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呢？

(一) 外贸政策问题。我以为，关键是对对外贸易的经营自主权的问题。从今年起对外贸易实行代理制，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它可以使工厂关心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提高技术，生产出能够适应国外市场的好产品来。从外贸部门自营转变为代理，不

是一个简单的转变，需要有一系列的工作才能适应新的要求，不能把它理解为亏损转移，从外贸亏损变为工业亏损。代理制实际上是使上海工厂从不问外销赚赔的生产者，变成为关心赚赔的经营者，是上海出口商品生产的新起点。现在全国各地抢购上海货的时代已经过去，上海的工业一定要打出去，否则没有前途。但是要打出去，而且是在实行代理制的条件下打出去，一定要扩大自主权，然后才能及时了解国外市场变化，采取相应的竞争对策，才能卖得好价钱。我们的外贸过去采取的是等客上门的做法，靠一年两次交易会中外商来订货，这样是竞争不过别人的。所以上海要发展外贸，搞活外贸，一要提高产品质量，适应市场变化，二要会做生意，会善价推销，这里经营自主权是关键。

上海发展对外贸易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使生产外销产品的工厂有利可图。现在国内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是两种不同的价格体系，差异很大。内销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外销，因此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缓解两种价格的矛盾，使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能得到好处，有利可图。在这方面可以做的是工业、外贸、财政统一算帐，对出口工业品退工商税、免税一定要兑现。香港工业品竞争能力强，因为他们的税轻，我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统一算帐，应该竞争得过香港。譬如说服装出口，我们的辅料和钮扣不行，要进口，进口有许多繁琐手续，要征关税，看来在这方面应该有些变通办法；我们发展出口要搞进料加工，对于进料加工的外汇留成、减免税收等要有个办法，使企业有利可图，然后才能够发展。当然进料加工的内销部分，一定要补税，否则就是偷税漏税，现在个别地方把变外销为内销作为生财之道，这实际是变相走私，我们一定要把这种现象和加强对外竞争能力区别开来。

在外贸政策方面，上海同志要求提高外汇留成比例，从调动

地方积极性和考虑地方实际需要，需要适当提高，合理留用；地方发展外贸需要有营运资金；再还有开展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把外贸做活，看来也要适当支持。

（二）金融政策问题。要使上海象历史上那样成为金融中心，我个人认为不现实。现在可以争取的，是使上海与周围城市之间，能起一定的资金灵活融通作用，这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指标管理的老框框，可否设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给上海分行以一定额度的资金调度权，进行调剂协调，允许横向运用，允许到江浙两省以及内联有关的省市去运用。如果完全是垂直的指标管理，那就把资金管死了。

再是贷款的使用，一定要遵循银行信贷资金的规律，有借有还。因此，用好信贷资金并不是说只能用于流动资金，不能用于固定资产，而是要看偿还能力，这就要做好可行性分析，看贷款的经济效果，政府不能强迫银行贷款。银行也要扩大自主权，自负盈亏。

（三）外汇政策问题。不少同志提出了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我看到2000年也达不到。因为只有使我国对外贸易在全世界的贸易中占到相当份额，本国货币能和外币自由兑换，再配合其他条件，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否则是不可能的。但这不否定上海在利用外资中可以起更大的作用。看来，适当扩大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权力，能够在吸引和利用外资中起较大作用，并保有较多的外汇资金自主运用，是可以考虑的。

（四）贸易中心问题。我以为这实际上是新旧两种流通体制的问题。如果继续对商品流通实行订货分配的旧体制，不论给上海紧俏产品留30%，或者只准留计划外产品，上海都不可能成为贸易中心。如果破层层分配的旧体制，立横向联系的新体制，再

吸收温州成为全国钮扣贸易中心的经验，上海以其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作好改善贸易条件的各项服务工作，将有可能逐渐提高其在发展国内贸易中的地位，才有可能设想将来成为贸易中心，从而对活跃国内商品流通和发展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五）财政税收政策问题。上海过去经济效益高，投入少、产出大，这一方面是发挥了上海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许多该办的事没有办、欠了帐，现在不论是居住、交通、给排水等都成为严重的爆炸性问题，需要解决。在这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外资，都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欠帐太大，而有的项目没有利润，收回时间长，完全不投资不可能。对于这点，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

上海基础设施的欠帐，是旧体制的必然产物。因为实行统收统支、抽肥补瘦的旧体制，必然是把肥的油水挤走，只要可以拖一拖的就不想给解决。但即使是旧体制，过去对上海我看主要是拿得多了一些，留得少了一些。当然也应该考虑全国的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上海改造基础设施，把还欠帐特别是解决上海人民的基础设施、污染、住房问题放到重要位置上。为此，统收统支的旧体制一定要打破，代之以能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新体制，既要在基数上多留一点，又要使新增长的收入给上海多分一些，并从广开财源、提高效益中寻找还欠帐的资金，所分得的收入应该作为上海还欠帐的专款，不要移作别用。

上海同志对第二步利改税中的调节税，提了不少意见，认为现在的办法是鞭打快牛，挫伤企业积极性，而且财政上交的包袱压得太重，也不利于技术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只能继续在利润大的老产品上拚下去。这些意见很值得同情和认真思考。第二步利改税的办法刚由人代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不宜作太大的变

动，但是具体征收办法授权给国务院，可否在这方面作些变通，在大体完成上海调节税任务的前提下，具体征收办法由上海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另定，尽可能避免打击先进、鞭打快牛。

最后，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前面讲的这些，都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都是为搞活上海经济创造条件，但是真正要使上海经济活起来，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海的活力，上海的潜力，在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挥动长袖舞起来。

这些年，我国一直在摸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最近中央召开的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希望上海能够加快改革的步伐。现在上海对企业管得很严，权力很集中，层次很多，工业是五级，即市、办、局、公司、企业，商业据说还要多两级。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活不起来。看来，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发展商品经济，变纵向联系为横向联系，是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在改革问题上，有些同志说上海地位重要，影响面大，稳一点好。我以为正由于上海地位重要，影响面大，更应该站在改革的前面，作出榜样，创造出经验，这对于全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将有重要意义。上海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所系，成功了，改造上海、振兴上海也就有了最根本的活力。

（原载《上海金融》1985年第1期）

从强化宏观控制入手 搞好综合经济改革

赵紫阳总理在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集中概括说：“总的看来，我们的国家生气勃勃，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兴旺，形势是好的。”这一总结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他紧接着又指出：“我们……也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前进中仍然存在不少困难，我们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和问题。”（均见1987年3月27日《人民日报》）这些话同样是实事求是的。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困难。

针对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在1987年1月全国省长会议上提出了“压缩空气”的果断决策，并制订了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经济工作方针。这一切决策措施，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下面我想就为什么要“压缩空气”，以及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的“双增双节”方针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自1979至1986年，这八年是建国以来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之一。1980和1981年经济大调整的完成，把“洋跃进”可能带来的一次社会经济大震动在无形中消弭。首战告捷，这是一次大胜利。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国务院提出了“十大建设”方针，为整个经济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自此，出现了1982至1983年经济比较协调、比较稳定发展的年头，农村改革效果十分显著，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城市改革陆

续出台，市场繁荣，经济效益和财政收入逐渐好转，国民经济开始向良性循环的轨道转移。

但是，在1984年开始，由于人们对国民经济转轨时期可能出现的困难估计不足，以及在诸如高消费、高速度、经济已面临“起飞”等等不切实际、不合国情舆论的影响下，经济工作中出现了过热空气。加上有些同志对实现现代化和改革的期望过高，脱离了现实基础。再由于在开放、搞活、放权的同时，我们相应的、必要的宏观控制、调节机能和措施方面又跟不上，结果造成了经济上某些失控。它表现在：

一、货币发行过量、信贷规模膨胀。这次经济产生不稳定的触发点是银行在1984年现金大投放开始。这一年中央银行现金投放达262亿元，比1950至1978年二十八年总发行量212亿元还要多50亿元，为1979至1983年前五年总增发货币313.7亿元的83.5%。当年提供的各项贷款年末余额共计4423.6亿元，比1983年增长28.9%。这样的信贷膨胀，必然造成经济恶果。国务院于1985年春，及时决定采取“软着陆”方针，指示银行适当紧缩信贷和现金发行。但由于货币的滞后效应，1985年经济仍然超高速增长，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物价同时猛涨，引起社会震动。同时，由于紧缩时采取“一刀切”方式，没有结合企业经营好坏和产业结构的轻点重点，分别提供信贷，所以1986年3月间，许多企业流动资金严重不足，不得不又放松头寸。而银行又过于放手，致使当年各项贷款年底余额较1985年增加29.2%，甚至比大投放的1984年还超过56.7%。当然，1986年经济形势优于1985年，两年平均，工业发展趋于平稳，情况有所好转。但是，1984、1985年膨胀造成的影响远没有消除，而且又新出现库存占资猛增，投资需求不减的情况。今年银行的长短期信贷盘子包括发行债券在内，还是继续高额。看来，货币供应量和现金发行仍还处

于半下滑之中。

二、国际收支逆差扩大。1985至1986年两年对外贸易连续大量入超，总额达268.9亿美元，尽管非贸易外汇收入增加，仍大量挖吃了1981至1983年通过改革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进出口货物许可管理的失控。进口货物，有相当部分是高级消费品、奢侈品；有相当部分打击了民族工业。至于重复引进、低技术引进等亦所在多有。而真正用在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国家确实急需的原材料上却并不占主要部分。大量入超迫使对外贸易不惜成本，不讲卖价，增加出口，把国家紧缺物资低价挤出口，有的甚至出口后再高价进口回来。进出口恶性循环中国家财政已到不胜负担的地步。同时造成人民币对外汇不断多重贬值，外汇黑市蔓延。另一个问题是举借外债。到1986年9月止，外债已达206亿美元，一年中增加30%以上，其增加速度，大大超过出口外汇和非贸易外汇增加的速度。而且外债结构恶化，高利短期的商业贷款增加。向外借债的口子多，除政府指定几个口子可以借债外，各地方各部门也在纷纷借债，国家缺乏统一管理和控制。确实有一些用外债建设的工程，经济效益很低，许多钱白花了谁也不负任何责任。即使按1986年截止外债总额计，不再增加，本利约六、七年翻一番，而我们出口外汇在可见的将来，每年增加是有限的。目前仍有要靠增借外债来解决困难的趋势。

三、财政连年赤字，并在继续扩大。1980年起由于中央财政对地方分级包干，对企业减税让利，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出现连年赤字，1982年以后一度收入增加，赤字有所减少。特别是1985年由于大量高级消费品进口和贸易入超，关税猛增，加上物价上涨，产品税等收入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很多，同时支出也迅速增加，收支相抵仅略有结余（21.6亿元），但是这种财政收入增

加，有很大部分是非正常性的，是在国际收支不平衡和物价上升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并不合理。而支出则是刚性的，很难压下来。致使1986年赤字增至70.8亿元，1987年预算仍要列赤字80.17亿元。而地方摊派名目繁多，各个机关、企业单位，普遍设小金库，这使财政经常收入不能经常增长，中央财政的赤字更为严重，似有不可抑制之势。

四、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失去控制。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于1982年开始回升，1983年继续增加，大体说来，投资规模的增长还是正常的，但已经到国力能承受的边缘了。从1984年开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猛增，其中全民所有制投资增长24.5%，1985年增长41.8%，国务院提出了原地踏步的要求，但仍没有压下来，1986年又增加15.3%。据统计，目前全民制基本建设和技改更新在建项目达16.3万个，在建大、中型项目就有960个，全部建成还需资金2000亿元。今后即使不上一个新项目，也要花四年多时间才能建成。上述固定资产投资国家预算内的基本控制住了，预算外的地方、企业所谓自筹资金投资，却控制不住。这样大规模的建设是国家的财力和物力难以承担的。而且投资的结构很不合理，经济效益有相当部分是很低的，甚至毫无效益，建成后就停产。其所造成的社会财富和国家财力的浪费和后果是难以估计的。

消费基金增加过快，表现在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1981~1985年，全民制和集体制职工平均工资，五年增长50.7%，大大超过同期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33.5%的速度。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增长69.6%，而全员劳动生产率仅增长25.8%。1986年消费基金继续膨胀，全国职工工资增长总额达20%，而国民收入只增长7.4%，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增长16%，实际工资增长8.4%，而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提高4%。

消费失控，坐吃老本，迅速造成平均主义重新抬头，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铁饭碗难以打破，为搞活企业的体制改革，设置了人为障碍。

所有上述几方面宏观失控，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而最后集中表现为全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造成经济全局经常处于相当紧张的失衡状态中。由于1985年提出的“软着陆”方针并没能完全实现，无论财政赤字、信贷膨胀、基本建设的盘子过大等问题，仍旧没有落实。因此，1987年提出“压缩空气”，这是正确的。如果立即采取强有力措施，经济形势就可能转向稳定健康发展，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毫不动摇地坚决贯彻中央方针。如果采取走着瞧，拖延下去，虽然大问题一时出不了，但中等麻烦就会不断地困扰着我们。如：（一）会有人逐渐怀疑有计划商品经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的正确性，或对改革发生动摇；（二）经济体制改革大业势将难以有条不紊地推向前进，或走走停停，互相抵消力量；（三）国民经济带病运转，产业结构的调整难以措手，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发生困难；（四）如果任其自然，矛盾不断激化，仍然有可能触发一场大震动。

那么，如何贯彻中央“压缩空气”的方针呢？我建议用二、三年时间，进行一场适当强化中央权力和强化宏观经济调节的手段和能力为核心的综合性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手段和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全面结合的综合性改革。大致的设想是：

（一）适当强化中央权力。扩大地方分权，鼓励地方积极性，是正确的，但没有相应地强化中央政府必须保有、地方政府必须遵行的权力，这对排除困难、推进改革是不利的。例如国务

院一再要求压缩过分庞大的基本建设总规模和在建项目，但有的市清理基建项目只是做做样子，决定停缓建项目只占总投资规模的0.13%；有些地方，在清理的项目中又上了新项目，如此等等。要知道，我国是全国统一的共和制国家，不是联邦制，中央政府的命令，下级政府必须贯彻执行，一切分散主义、地方主义都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当然，中央政府及其各部，也要从自身做起，保证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克服官僚主义，清除关系学，严格推行岗位责任制，对失职、渎职者务必追究政纪法纪责任，达到行政高效率 and 清明廉洁。

(二) 适当提高中央集中的财力。中央财政应坚定地实行“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和鼓励经济发展、科学进步的方针，不再搞赤字财政和竭泽而渔政策。财政预算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自1979年后下降太多，应该通过全面整顿财政纪律、税收管理以及消除各种摊派苛杂、中途截留等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将其比重适当提高。此外，逐步取消调节税、交通能源建设税，将所得税税率适当降低，以增加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取消税前还贷，以保证财政合理收入。在划清事权后，适当增加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成中中央的比重，并用分税制来保证其实施。在支出方面，要千方百计逐步丢掉或减轻三大包袱，即外贸亏损、企业亏损和物价补贴。要坚决压缩各种行政费用，适当增加科技文教经费。要建立科学的预算法，将内外债收入一律从正常收入中剔除，用以平衡赤字，使赤字透明化，让全国人民可以发挥监督作用。但外债只能用于国家重点建设；内债可由银行代发公债，有借有还，银行也不得用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并应尽快通过中央财政预算法，一切依法行事。国家投资体制亦应尽快改革。

(三) 加强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能力，并加速实行专业银行企业化。建议中央银行现金发行权和广义货币供应权（现金和除财

政外一切存款），须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中央银行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保证币值稳定，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央银行对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计算，应用科学的方法。例如，决不能用既定的连西方国家也认为不能接受的通货膨胀率来作为计算货币供应量的根据之一。中央银行应取消按行政区域对专业银行层层切块供应货币的办法，不使资金大锅饭变成许多小锅饭。各专业银行应实行企业化，自求资金平衡。中央银行通过对专业银行征收存款保证金的数量和再贴现的利率变动等，引导和迫使专业银行资金向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方向流动，以便有效控制企业（地方）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和流向，加上行政措施配合，使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得到控制。中央银行要迫使专业银行有头寸感，对于经营不善呆帐失控的专业银行独立核算的经营单位，要迫使进行整顿改组，甚至淘汰重建。

（四）大力改善国际收支。国际收支出现的严重问题，必须充分重视，迅速改善。对外贸易出口业务分权下放后，有利于促进地方、部门对于出口的积极性。但五花八门的外汇分成办法，并且分成比例愈来愈大，不利于国家把十分珍贵的外汇用于四化建设上。战后日本政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外汇收入一律集中由国家掌握，外汇审理由议会确定进口商品的种类和额度，严格控制外汇支出。此项管理制度行之十分有效。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建议在二三年内，中央银行最低应恢复保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原有的黄金储备不能消耗减低）。政府要下大决心，坚决逐步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将一切外汇集中于国家；国家全面管制进口商品种类和数量，以便保证贸易顺差，并严格核减非贸易外汇的不必要支出。最后达到二三年内恢复上述外汇储备的目标。外债，1986年增加速度太快，结构恶化太严重，建议将外债总额暂时冻结在1986年的数额上，花二三年的时间改善

外债结构，立即进行一次最严格地科学地全面审核外债投资工程，对重大失误的外债投资工程，应按法律追究责任，以警效尤。同时，对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良好的工程，应予以重大奖励。现在由国家批准的借外债口子还可减少，非法举借外债的地方、企业应严令禁止。应确立中央银行为全国外债的统计、监管和设计外债结构和外债总额的机关。总之，外债我们是要举借的，但必须保证每一个外债投资项目有足够的经济效益，和充分的偿还能力。要保证万无一失，决不能掉进外债泥坑，否则，社会主义祖国就私受制于人。

（五）建议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应控制在1986年的水平，两年内原地踏步。进行一次真正彻底的大清查，坚决压缩在建项目，将无效益的、可上可不上的项目坚决停下来。否则预算内的投资已经控制住了，但其中重点项目还有并非重点，也存在重点项目重点浪费现象。近年内预算外的投资大大膨胀，国务院虽三令五申，收效不大。建议对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审批权缩小或上收若干，并用一切办法堵死化整为零的漏洞。经过严格科学论证的中央地方联合投资电力等重点工程，还是可以进行的，但要堵死钓鱼工程。预算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三块：地方、企业、银行，其中银行贷款是主角。中央银行应当同时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用经济和行政办法，严格监管专业银行资金的流向，可以起到一定有效作用。中央政府对全民制企业大中工程的投资，如有严重浪费、缺乏效益的，如徐州水泥厂工程之类，一定要追究行政的、法律的责任。至于消费基金失控，小金库遍地，可以运用税务、审计、工商行政、银行等机构的几百万人的经常性监督检查，加上经济方面保持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2%内（1953至1978年，平均每年零售物价指数仅1.2%）的条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大中型企业

预算逐步硬化，保证实际工资年年在一定幅度内自动提高，并使工资奖金与劳动责任、劳动效益挂钩，克服平均主义，那么，消费基金失控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六）必须综合治理。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都要求与自己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保护和支持。在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上述几点宏观控制强化的建议，目的在于使经济体制改革能够继续排除困难，步步前进。为此在决策上要更加民主，科学，在步骤上要稳，不求“立竿见影”，在执行上要坚决，不动摇多变。一切改革如增产节约，增收节支，都要从中央政府各部委自身开始做起，要团结一致，协力以赴，要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关系网、工作效率低、敷衍塞责等等；要把握人民的脉搏，有困难要告诉人民，求得人民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对于严重浪费、盗窃国家财产，贪污、纳贿、渎职等等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政法部门要及时地毫不留情地公平地依法处理。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讲到做到，逐步改善社会精神道德、文化面貌，恢复并提高中华民族勤劳俭朴、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

只要全面综合治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相对平衡一定能做到，经济体制改革必将健步前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一定能实现。

（原载《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5月4日）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

首先，谈一下银行机构的设置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银行机构基本上是按照行政管理体制设置的，这是统收统支的产品经济模式的必然产物。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确定了我国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模式。适应新模式的要求，银行的地位、职能，以及实现职能的方法和手段都必须来个根本性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银行机构的设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983年9月确立中央银行体制以来，银行机构设置有了某些变化，但银行资金被分割成为无数或大或小的块块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因而也无法畅通无阻的流动，银行日常活动受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很大，下边喊、上面压，银行往往被迫供应资金，资金大锅饭、供给制难以破除。这样既不适应城市改革的要求，促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利于控制、调节、引导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项目的安排和社会资金的流动方向。目前对这个问题仍没有明确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我建议，银行机构设置必须贯彻执行政企分开的原则，坚决改革过去那种按层次逐级设置银行的局面。中央银行除总行必须设在首都外，其它各级分行均应按经济区划，分设分支机构。其一级分行应设在经济辐射力较强的，在客观上能起到一级经济区作用的七个特大的中心城市中，并择要在二级经济区的一些大城市中设置二级分行。无论如何不要按照行政区划逐级设置分支机构，更不能逐县

设点。应当充分利用这次改革时机，扭转局面，削弱并最终消除银行的行政色彩，实行银行一体化。样样都管，把专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捆得死死的，实质上是恢复旧的大一统局面。专业银行的设置同样也不能按行政层次逐级设置，而应按各自的业务特点，各有侧重地设在全国三百多个建制城市中，市以下商品经济不很发达的县，不要县县设行，总之，专业银行的基层行，也必须贯彻政企分开、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的原则，其开支自给。这样的机构设置有利于削弱各级政府的干预，保证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独立性，为专业银行发展制造一个较好的环境，促进专业银行的企业化。

其次，谈一下专业银行的企业化问题。

我认为，专业银行的企业化除要解决资金划分、独立核算外，在政企分开之后，关键是要处理好专业银行与财政的关系、专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关系。方案中有关企业化的观点我大多赞成，我想强调的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应该不断地补充银行的自有资金。目前银行系统的自有资金拥有水平是很低的，仅占银行资产的10.78%，不含建设银行仅为8%。据反映，工商银行自有资金的拥有水平更低，自有资金拥有水平这样低的银行在国外是不准开业经营的。这使专业银行无力发展业务，培训人员，改善设备等，也无力实现企业化经营，否则极易濒临破产而引起自身危机。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也是必须解决的。在制定银行企业化方案时应该具体规定出不同银行自有资金的起点水平，自有资金的补充积累的具体办法，否则很难责令专业银行自负亏损，专业银行皮包公司化，绝非是一个国家健全的财政金融体制的体现。

在专业银行企业化的过程中，应明确规定中央银行哪些应该管、管到什么程度，哪些不该管等，不能什么都管，处处都管，不允许一点“真空”存在。专业银行想搞个新业务都必须反复申请，这

样下去它怎么发展，其各级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任用都要求得中央银行同意，那末专业银行连人事权也没有了，它怎么独立自主、自负盈亏？中央银行应本着扶持、发展的宗旨、采取经济方法为主，对专业银行进行监督管理，促进我国银行业有一个大的发展。

在专业银行内部，要把三级（有的银行是二级）管理、一级经营的体制改成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下、实行分层独立经营。总行和分行都可建营业部从事经营活动，并通过这些经营活动在内部各级之间以及其它专业银行各级之间建立经济往来关系，形成资金纵横流动，运用灵活的格局。世界各国不少银行甚至其资金成千亿美元的超级银行，它的资金都是可以纵横并用的，其一切分支机构的资金，总行都可以按规定作必要的调节。我认为，发挥资金横向融通是重要的，但如果过分强调专业银行各级分支行对上下的关系只是存贷的关系，从而过份削弱其总行对其下属机构的资金调度机能，相对业务政策、经营方针等领导职能，也不利于银行业务的搞活。

再次，谈一下建立资金市场问题。

由于我国商品经济还不发达，人均收入的水平还不高，所以社会闲散资金的数量还很有限，加之工商企业的自有资金水平很低，也还未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所以，我国还不具备全面建立资金市场的主客观条件，目前，有领导地选择若干中心城市进行试点是可以的，但要在三、五年内建立起全面的资金市场似乎不很切实际。金融业内部搞拆借市场是可行的，将商业信用票据化确实应当努力去做的。但也要考虑到，票据贴现，再贴现等也是有风险的，也并不是轻易就能办得到的。原因是中国没有从事这些业务的传统。在旧中国，上海就有人提出来过，但终未实现。解放以后，我们连商业信用都取消了，更何况各种票据了。加上票据法、企业法和银行法等还未制定，经

济法庭也很不健全，推行这些业务就需要较长的时间，下苦功夫，才可以逐渐推开。至于搞证券市场则更不简单，建立起规范化的证券市场恐怕在“七五”期间还不是现实的东西。旧中国所谓证券交易所买卖的证券主要是国民党政府的公债。现在国外证券市场中主要买卖的也是政府债券。至于说到股票买卖，就更为复杂了。各国股票市场都有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世界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其上市股票也不过1000多家（占全国公司总数不到1%），日本则更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是由总统任命的，可见事情非同小可。现在我国要搞股票市场，上海有位专家估计，要有1000亿元上市股票才可维持市场开支，而我国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股票，更不用说如此大的数量了。总之，建立资金市场不能操之过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搞活银行，大力发挥间接金融的功能，这个问题不解决，搞别的形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结果只会冲击银行的传统业务，比如提取存款来买金融债券。所以我们要下大气力去搞活银行。国际上，发展中国家发展快的，并不是由于有了资金市场，而是有一个相对发达的银行体系。

至于设置多种类型的银行，看来并非1988、1989两年之急务，还是待到水到渠成为好。组建进出口银行一事，现成的有中国银行，它名曰外汇银行，实际上主要干的是进出口业务，不必另起炉灶。如有必要，更加周详地规定其任务范围就可以了。据报道，我国已经允许温州的私人钱庄挂牌营业，并在成都以集资入股方式筹集自有资金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城市合作银行。我认为，对此应持慎重态度，特别是在新旧体制过渡和通货物价还很不稳定的时期更要稳妥从事。国民党政府对于私人经营金融业的政策，前后很有变化，抗战前采取放任政策，抗战胜利后改为限制政策，迁到台湾后进一步采取消灭政策，严禁私人经营金融业，至今不变。

这中间，可能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我们在1988和1989两年，除了中央银行自身完善外，把中国、工商、农业、建设、交通等行（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企业化工作充分落实，改建机构、培训干部、大步提高业务水平、大量发展业务范围等等，做到了这些，做好了这些，那末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大贡献。

最后，建议在1988和1989两年加紧改革银行的结算制度，到1986年7月末，我国的汇兑在途资金已达到347.41亿元，比1986年同期增加1.23倍，比1985年同期增加4.66倍。这反映出我国银行体系的效率是极差的，造成的原因是结算方法繁琐、手段落后、制度不合理等。中央银行应该在1988和1989两年内将这个问题合理解决。这样可以节约几百亿元以上的资金，减轻企业负担，加速资金周转，社会得到莫大利益，银行也可以提高本身业务水平，真是利莫大矣！

至于目前广州、武汉等五城市的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建议中央银行随时注视动态，加强研究和引导。

（原载《金融研究》1987年第2期）

当前金融形势和银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确定性成功之后，1984年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却出乎人们意料的艰难，许多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问题之一，就是各方面已在广泛讨论的金融形势。对金融形势怎么看，不仅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外部环境，而且也对改革的方向提出了新的问题。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就金融形势提出观点，并由此进一步谈一下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问题。

一、金融形势决不容乐观

讲金融形势实际上就是讲货币量的变动和经济变动之间关系的状况怎样，以及货币量的变动对经济变动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文中，货币量采用广义的概念，即现金加上企事业单位的存款等（存款总额减去财政存款），我们将此定义为 M_2 （下同）。为了便于比较，经过换算，我们将货币量变成以1952年为100的指数，然后将其与1952年为100的可比价计算的国民收入指数进行比较，以说明两者之间的变化关系（详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 $B:M_2$ 从1952年的1:1，发展到1986年的1:7.38，特别是近几年二者比例持续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不断加快（从曲线的倾率可以看出）。而到了1986年二者之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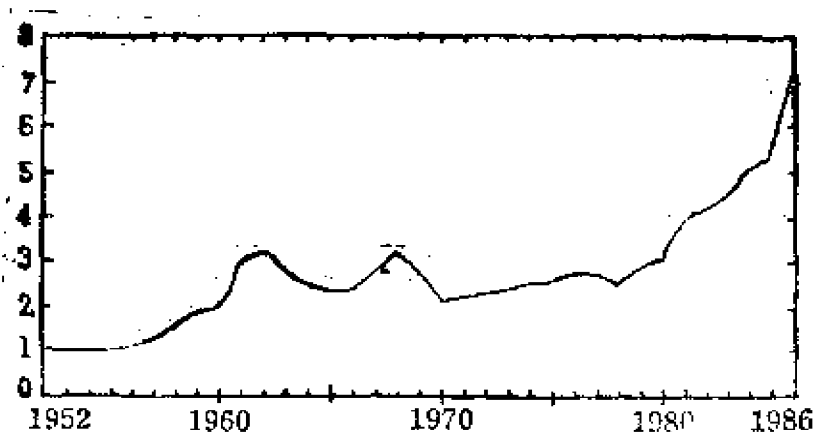


图1 1952=100 M₂/B = 货币量/可比价计算的国民收入 (均为指数)

• 数据来源:《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公报》(下同)

比例达到了1952年以来扩大幅度最大的一年(从1985年的1:5.27扩大到1986年的1:7.38,扩大了40.0%)。这表明,我们每一单位实际国民收入(代表总的供给量)所对应的货币量(代表年终的总需求量)越来越多。换句话说,近些年的货币量相对于国民收入来说增长的幅度很大。对货币量这样连续大幅度增长是否正常的问题,目前最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改革以来,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商品化、货币化的过程中,因此,货币量大幅度增长基本上是正常的。诚然,我国经济从改革以来的确经历了一个商品化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原来一些处于自给、半自给状况下的一些相对封闭的经济单位的不断开放。与之相对应,货币需要量不断增加。同时,我国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说明改革是正确的),全社会的商品交易量不断地扩大,货币需要量自然也要不断增加。这一切是人们都承认的事实。而现在的问题是,在伴随着经济的商品化和经济的发展的同时,货币供应量是否超过了经济需要量,即货币供应量是否与货币需要量平衡。要回答这个问题仅用文字难以办到,下面我们借助定量分析来给出回答。

首先，我们利用人们所熟知的(目前中央银行已经采用)货币供给公式，即货币供给量的变动率 = 实际经济的变动率 + 可承受的物价上涨率 - 流通速度的减缓率，来对历史数据进行一下推算，然后再用计算结果与实际的货币供给量的变动率相比较，看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式中的物价上涨率，我们利用国民收入平减指数的实际数代入，假定其为可承受的物价上涨率；货币流通速度用国民收入(当年价格计算)/ M_2 代入，假定其为由于经济商品化和经济发展引起的正常的减缓，即不存在强制性储蓄造成的隐蔽性通货膨胀。图2表示的是，计算结果与实际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之差，图中小于零的部分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大于计算结果，反之表示小于计算结果，等于零表示两者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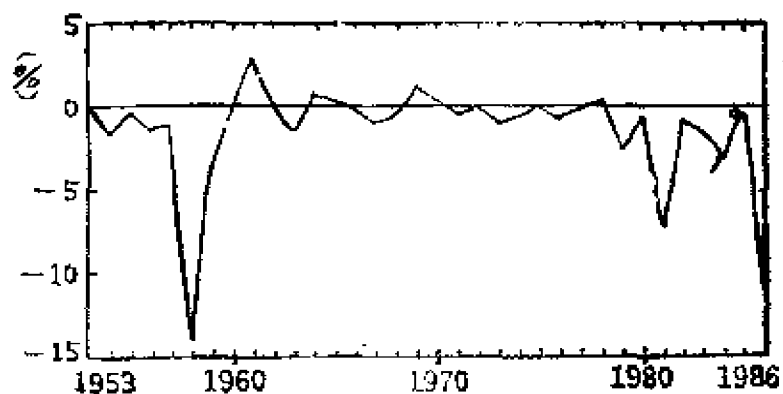


图 2

从图2可以看出，自改革以来，1979年、1981年、1984年和1986年这四个年份的货币供给量都较大幅度超过了利用货币供给公式所计算的货币需求量，特别是1986年，其超过的幅度是1953年以来的第二个严重年份。值得指出的是1985年，从图上看，1985年基本处于平衡状态，这是因为国家动用了大量的外汇进口商品来弥补国内资源的缺口，支撑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货

币,如果扣除这一因素,1984年开始,实际差额将是不断扩大。上述这种算法较为粗浅,还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经济的正常货币需求水平。特别是公式中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假定条件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反映真实的货币减缓速度。为了更精确地探讨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尝试地利用回归模型来确定经济实际需要的货币量,然后再来衡量近几年货币实际供给量是否超过了货币的实际需要量。

众所周知,货币需要量首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货币需要量就越多,二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M_0 = f(y) \dots\dots (1)$

(1)式中的 M_0 表示货币需要量, y 表示经济发展的水平,我们利用国民收入指标来表示。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等于实际产出与物价总水平的乘积,即: $y = f(P, Q) \dots\dots (2)$

(2)式中的 P 为物价总水平,我们利用国民收入平减指数来表示; Q 为实际产出量,我们利用可比价计算的国民收入指数表示。将(2)式代入(1)式得到: $M_0 = f(P, Q) \dots\dots (3)$

另外,我国经济活动不可能完全处于对外封闭的状况,因此,对外经济的变动对国内的经济活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货币需要量。这里我们利用进出口总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T)来表示对外经济活动,将 T 代入式(3)得到:

$$M_0 = f(P, Q, T) \dots\dots (4)$$

将(4)式展开,并两边同时取对数运算后,得到回归方程:

1952~1986年

$$M_0 = -19.88 + 3.90P + 1.32Q - 0.2T \dots\dots (4)'$$

$$(12.99) \quad (28.28) \quad (-3.38)$$

$$R^2 = 0.9896 \quad S.E. = 0.1131 \quad D.W. = 1.5936$$

运算结果表明,当实际国民收入增加1%时,货币需要量增加1.32%,即货币需求的国民收入弹性值为1.32。这说明,每一

obs	A	B	D
1953	18.48	10.09	8.39
1954	7.66	16.61	-8.95
1955	8.45	9.12	-0.67
1956	18.91	20.77	-2.16
1957	6.94	11.87	-5.93
1958	29.04	60.31	-31.27
1959	10.82	25.59	-14.77
1960	-1.85	3.52	-5.37
1961	-39.20	7.88	-47.08
1962	-8.58	-0.49	-8.09
1963	14.12	-9.11	23.23
1964	21.78	7.82	13.96
1965	22.44	1.33	8.05
1966	22.44	10.61	5.80
1967	-3.50	8.26	-17.76
1968	-2.58	1.94	-14.62
1969	25.48	2.62	22.86
1970	30.76	-2.02	32.78
1971	9.24	11.30	-2.06
1972	3.83	2.27	1.56
1973	10.96	15.82	-4.86
1974	1.45	7.56	-6.11
1975	10.96	7.41	3.55
1976	-3.56	7.88	-11.44
1977	10.30	2.38	7.92
1978	16.24	4.98	11.26
1979	9.24	23.87	-14.63
1980	8.45	12.36	-3.91
1981	6.47	34.43	-27.96
1982	10.96	14.73	-3.77
1983	12.94	18.32	-5.38
1984	17.82	29.74	-11.92
1985	16.24	16.18	0.06
1986	9.77	50.13	-40.36

单位的国民收入要对应1.32个单位的货币量，货币需要量中大于1的部分（0.32）就是人们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收入，即流通速度正常减缓的部分。我们利用弹性值（1.32）乘以每年的国民收入实际增长率就可以得到经济实际需要的货币量的增长率，在此将其定义为A。把A与实际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定义为B）相减，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关系（A与B的差额定义为D，D大于、小于或等于零的定义同上）。

从上页表中D项可以看出，我国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极不稳定，大起大落，而且大部分年份的货币供给量超过货币需求量，其中最严重的是1961年（-47.08%），其次是1986年（-40.36%）。

为了比较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变化对货币需求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仍用（4）式计算了1978~1986年的情况，得到下面的回归方程：

1978~1986年

$$M_D = -5.14 + 0.18P_r + 1.95Q + 0.27T \dots \dots (5)$$

$$(0.08) \quad (3.06) \quad (0.40)$$

$$R^2 = 0.9784 \quad S.E. = 0.1060 \quad D.W. = 2.0872$$

运算结果表明，货币需求的国民收入弹性值从1.32上升为1.95，上升了0.63个百分点。这说明了经济体制的变化即商品化和货币化对货币需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利用弹性值1.95，按上表方式计算出如下结果见下表。

从表中的D项可以看出，即使包含了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的影响，1978年以来的各年中，1979年、1981年、1984年和1986年的货币供给量仍然超过了实际货币需要量（1985年的情况如上述理由）。而且1986年仍然是1952年以来最严重的年份之一，严重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信贷失控的1984年——三种不同的算法都得到

obs	A	B	D
1978	23.99	4.98	19.01
1979	13.65	23.87	-10.22
1980	12.42	13.36	0.92
1981	9.56	34.43	-24.87
1982	16.19	11.73	4.46
1983	19.11	13.32	5.79
1984	26.33	23.74	-2.61
1985	23.99	49.18	-25.19
1986	14.43	59.13	-44.70

了这同一个结果。

通过上述这些定量分析之后，我们不难看出，简单地用经济商品化、货币化来解释近几年货币供给大幅度增加的合理性是站不住脚的。事实说明，近几年的货币供给量超过了货币需求量，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总需求膨胀（特别是1986年）。

总需求膨胀必然导致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即发生通货膨胀。图3反映了1952年以来我国物价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在此我们利用国民收入平减指数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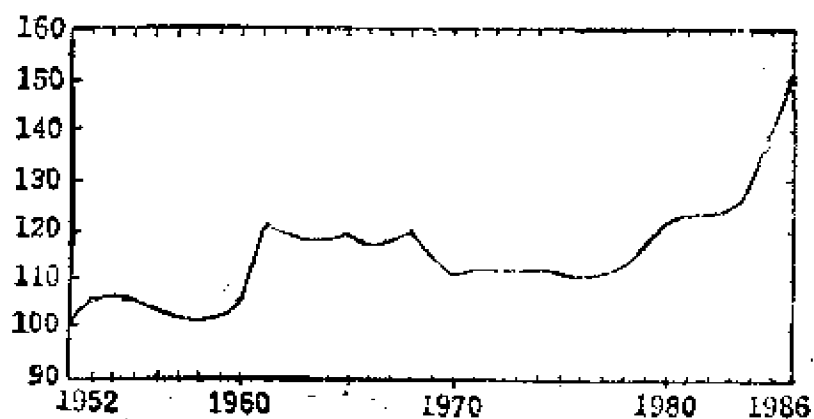


图3 1952=100

从图 3 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自1952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是1961年、1984年、1985年和1986年这四年。从通货膨胀的趋势上看,从1984年到1986年一直保持着相当强劲的势头,分别比1978年上升了15.93%、24.78%和32.74%。这说明,衡量金融形势不仅要看货币量增加了多少,还要看通货膨胀的程度。而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过程不会对物价总水平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可以再次证明,简单地用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来解释近几年货币量增加过大是正常的说法不免失之片面。

近几年我国通货膨胀持续上升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超过了货币需要量。将图 1 与图 3 加以比较,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很高的相关性 ($R = 0.9530$)。同时,1984年、1985年和1986年这三年货币供应量分别比上年增长增长了29.74%、16.18% (含外汇因素) 和50.13%; 通货膨胀率这三年分别比上年增长增长了4.87%、7.91%和6.52%。由于我国对物价长期采取十分严格的行政管制,这些年虽然有些松动,但是也还是很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货币量增加过多并不能直接反映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是表现在购买意愿无法实现,货币被强制性地沉淀下来,形成强制性储蓄,即所谓隐蔽性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就是供给的短缺程度加强)。如果将上述两方面综合起来加以考虑,通货膨胀的程度还要严重得多。下面我们利用前面的一些运算结果来进一步计算一下1984年、1985年和1986年这三年强制性储蓄的货币量。

根据(5)式运算的结果可以表明,1982年和1983年这两年的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基本是平衡的。因此,我们以1983年为基数,算出1984年、1985年和1986年这三年货币需要量与货币供给量的差额,然后再扣除同期物价上涨所吸收的货币量之后,得到了这三年累积的货币超正常发行所引起的沉淀数将近1600亿元。而1986年的实际流通速度为0.93次(根据实际货币供给额计算),正常的流通

速度应为1.37次（根据货币需要量计算），前者比1985年减缓了32.61%，后者基本相同。因此，可以看出，强制性储蓄所造成的货币流通速度减缓为0.44次（ $1.37 - 0.93$ ），并使其比上年减缓了32.61%。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我国金融形势是相当严峻的，积累到一定点上，就有可能出现大的震动，影响社会安定和改革的顺利进行，对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二、银行当前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在上节的分析中，我们用了相当篇幅，其目的在于论证继1984年货币供给量大失控后，1986年货币供应量再次失控，而且失控的程度比1984年更为严重。因此，在当前金融体制改革中，我们不能不着重地谈谈主管全国货币供应量以及进行全国金融管理的中央银行（人民银行总行，下同）的加强与完善，以及加速实行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问题。这些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一）我国国民经济自1957年以来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总需求水平相对于总供给水平来说往往过高，从而导致了经济运行不稳定，整个经济经常大起大落地波动，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生产率、技术水平等增长相当缓慢等等，最终也使得人民生活难以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得国民经济持续（不是大起大落）、稳定（消除通货膨胀即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地增长，做到投入少、产出多，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率不断提高，按人口平均的国力总体增长，人民不断提高物质和文化的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必须加强对总需求水平的控制和调节。

总需求水平过高指的是具有货币购买能力的需求过高，即货币供给量相对于在一定价格水平下的可供商品过多。因此，从中央银行角度来看，控制总需求水平就是控制货币供给量，使其不超过经济的总供给能力。要做到这点，中央银行必须具有坚强的地位。

众所周知，纸币是依靠国家权力强制进行流通的，这样国家也就有义务保证币值的稳定。中央银行正是代表国家掌握货币发行权力，承担保持币值稳定义务的机构。货币发行的权力与保持币值稳定的责任的统一，构成了中央银行的特殊地位。中央银行这才有可能排除干扰来进行宏观控制。世界上凡是金融体制较为健全的国家无一不是这样。对比看来，我国中央银行的地位是十分软弱的，其主要表现就是货币发行的权力与保持币值稳定的责任不统一。货币发行权名义上由中央银行掌握，实际上中央银行没有决定权。各级政府为了完成自己所确定的发展计划，总是迫使中央银行提供更多的资金。上面压、下面喊，中央银行就开口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保持币值稳定实行宏观调节的责任根本无法实现。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我们认为，要通过立法程序将货币发行权和保持币值稳定的责任明确地授权给中央银行，由其全权负责。同时，中央银行直接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通过立法程序确定每年的货币供给量。在此前提下，中央银行不直接参与经济计划的盘子，各级政府搞建设根据自身的收入、支出的能力。中央财政如有赤字，中央银行有权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决定如何帮助解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是目前当务之急，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方面的银行改革很难取得实效。

(二) 加强中央银行的地位仅仅是解决了中央银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外部条件。而要中央银行真正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还必须提高中央银行的自身能力。这内外两个环节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控货币量的充分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平心而论，

中央银行自身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如不下大气力改进，即使委以重任也难以承担。我们认为，中央银行提高自身能力起码要做到以下几点：

1. 中央银行在决定年度（或中期）货币供给量前要广泛收集数据资料，正确地估计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物价总水平的合理变动和货币流通速度的状况，然后确定货币供应总量。如果主观地去确定上述各因素的量，计算出来的货币供应量就是不科学的，就会背离正常的货币需要量（例如自己确定6%的通货膨胀率）。如此，欲求中央银行向人民负担稳定币值的职责，未免缘木求鱼了。因此，中央银行必须吸收多方面的经济专家进行研究工作，不管是在方向趋势上，还是在具体政策的操作上都需要大量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进行分析研究，以提供决策依据、经验是需要的，但是单单靠经验、拍脑袋是无济于事的。特别是在目前的改革阶段——新的形势、新旧体制的转换——更是如此，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有目的的实行紧缩或扩张政策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把握好政策的度，不是一放就一泻千里——登门求货，一紧就一刀切——统统卡死；也才有可能拿出充分的依据来说明自己的政策，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2. 中央银行应该从资金分配供给者转变为货币量的宏观调节者。这应该说是中央银行基本职能的转变。如果不进行这种转变，中央银行就必然会陷入繁琐的具体业务中去，为确定每项贷款指标而与专业银行讨价还价，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宏观调节。而且资金块块分配往往会由于块块的变动带来总量的膨胀，很难实现控制住总量，让贷款结构根据经济需要此长彼消地变动。

3. 中央银行应组织力量迅速建立能够真正客观反映实际情况的指标体系。如果没有一整套科学的指标，就会在实行宏观政策中产生很大的盲目性。同时，也无法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及时加以反

映，可能产生扩张或紧缩过度，人为地造成经济波动的加剧。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不仅要包括中长期指标，而且还要有短期指标，不仅有反映经济变动的超前指标，而且还要有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利用这些经济指标去观察经济运行状况和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以确保货币政策的目的性和灵活性，从而避免过几年就调整一次的困扰，使经济波动尽量减小。

（三）在经济体制转变时期，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必须相应转变。所谓的货币政策包括：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和政策手段这三个部分。货币政策的执行，简言之就是对货币量实施调节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以居民手持现金为中间目标，政策手段是通过行政方式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即所谓控制货币投放；利用物资供应和银行储蓄来调节货币量，即所谓回笼货币。也就是说，国家根据生活资料的供应状况来决定消费基金的增长幅度，即货币投放量。然后，通过物资调拨等手段将物资集中起来，供应给居民，完成货币回笼的任务。因此，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是通过行政的、实物的方式来控制和调节货币量。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已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企业已经成为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商品生产者。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裂成三个部分，一是居民、二是企业（包含个体经济等经营单位）、三是政府。货币对于企业已不再是记帐符号，企业已步入货币领域。但由于现金管理制度还没有取消，因此，企业所使用的转帐支票就变成了现金的替代物，来充当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货币量的实际范围扩大了。只有将现金和企业的转帐支票综合起来才能较正确地反映货币量的变动以及实际的需求水平。因此，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应该转移为较为广义的货币量（现金加存款）。在这样的前提下，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已经逐渐失灵，也必须转变。因为，1. 居民已经不是过去体制下的松散个体，而

是逐渐与资金相结合的单位集体（以企业为单位）。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包括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企业就可以根据经营状况来决定职工收入。通过控制消费基金显然无法控制现金投放量。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消费基金失控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加强银行的消费基金管理（通过现金管理）仅仅是治标而已。² 这种控制投放的手段仅仅是针对居民手持现金量，而无法包含企业的转帐支票。³ 国家现在无法再向企业进行无偿地调拨物资，以供给居民来回笼货币。凡此种种，从根本上说，由于市场结构的变化，现在大量的经济活动都发生在居民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货币在他们之间流转已经不再通过政府，这一循环过程是货币的不断易手，而不是货币完成职能退出流通领域。总之，传统的行政性、实物性的政策手段已无法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必须将其转变成为以信用方式的手段（篇幅所限在此就不详谈了）。

（四）建立中央银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改变传统体制下资金供给制的“大锅饭”，有效地发挥各专业银行筹集资金、运用资金的职能。然而，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中央银行仍然是资金块块分配者。通过这种资金分配的信贷计划，专业银行的资金来源统一由中央银行安排，资金运用统一由中央银行分配，专业银行经营活动仍然是围绕着中央银行下达的各项指标，自身不负资金平衡的责任。在这样一个纵向制约、存贷分割管理、专业银行自身不负平衡责任的体制下，专业银行既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又不负国家银行应起的正确引导资金流向，实现国家产业政策和优化企业结构的责任，而中央银行的宏观控制也失去了稳定的基础。⁴ 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人民银行总行正在试图不断扩大各省市分行资金分配的权力，通过所谓计划单列的方式直接与地方专业行的分行分配资金。加上中央银行自身组织机构层层按行政序列一直设置到县，使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大锅饭”

变成许多“小锅饭”而已,其后果将造成资金的地方化、分散化,进一步加剧条块的矛盾,使我国统一的资金流通更加难以形成,将势必削弱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使其难以及时从经济上(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对总需求膨胀进行控制。同时,资金的总体效益将下降,专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将进一步恶化,难以成为商品经济的中枢。因此,我们认为,打破资金“大锅饭”,有效发挥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各自的作用,就必须理顺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关系,实现专业银行的企业化经营,让其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原则去展开经营活动。为此,中央银行应下大气力帮助专业银行建立起正确的经营思想,去改善专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去帮助专业银行培训各方面的人才等等。同时,也要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比如,资金运用方向的动态、资产负债状况的申报、经营盈亏状况的申报等等,同时通过制定各专业银行的业务分工管理制度、利润分配制度等等,加强对专业银行的检查和管理。在目前情况下,应首先帮助专业银行政企分开,从政府的序列中划出来,由专业银行自主管理;其次,在专业银行建立起现金准备制度,真正树立起头寸的观念,让各专业银行自己负起平衡责任。在此基础上实行存贷挂钩,多存多贷。再次,各专业银行的利润除上缴税金外,原则上留给专业银行,在保证积累优先的条件下自行安排。鉴于目前专业银行自有资金的数量很少,中央银行应具体制订补充的办法,为专业银行自主经营、自求发展创造物质基础。最后,在银行法的规定范围内,专业银行有权经营任何业务,等等。总之,中央银行应尽量在短期内有效地帮助、推动、督促专业银行的企业化,形成一个较为健全的银行体系。这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五)目前中央银行正在各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其中的确进行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探索。我们希望中央银行对试点

工作要加强领导,及时总结经验,分析情况,对不适宜的要及时纠正,对成功的要及时推广提高。比如,银行同业拆借,无论同城还是异地都可以在无形的市场形式下随时进行,求其实效不必要大造声势,追求数量。银行信用票据化,贴现、再贴现等要先从大城市中实行,花几年时间大力推开。必须尽速解决汇兑清算,使逐年飞增的在途汇款(1986年12月底达到420亿元之多)要以最快速度压到最低限度,解除银行对企业的剥削,加速资金的有效利用。至于发行债券包括发行金融债券这确是一种筹集资金的好办法,但无论如何不要凭借地方政府的权力,实行层层摊派(见1987年2月21日《人民日报》),也不要过高地提高利息,以免造成钞票搬家。至于建立股票市场来筹集资金、进行股票的买卖则更需要慎之又慎。要制订管理条例严格进行管理。否则等到发现问题再去管就晚了,如广西南宁市的大鹏公司就是一例。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试点更须严格限制,不能人为提倡,不能刮风,否则到头来只会造成利益关系的混乱,甚至损公肥私。在这些方面是不能采取干了再说的。希望中央银行真正下大气力,组织好各地的试点工作,真正走出一条我国自己的金融市场的路来。

因篇幅关系,我们对中央银行必须负起国际收支平衡(外汇收支平衡、外债总量和结构等)职责问题,不加论述了。近些年来,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中央银行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改革,以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

当前,各方面都在对近几年来所走过的路进行反思,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希望通过反思,把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向前不断推进。

(本文系和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黄旭助理研究员合著,
原载《财贸经济》1987年第6期)

关于我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人口问题是我国特有的重大问题，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是最艰难的工作。最近，《人民日报》连续报道1986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回升，人口自然增长率加速，1987年并将继续发展下去。对此，引起社会人士广泛关注。6月12日报道的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分析，认为1986年比1985年多出生312万人口中，由于当前处于第二次生育高峰期的客观原因占1/3；由于婚龄提前，早婚早育、二胎和多胎增加等，即由于计划生育工作放松等主观原因造成的占2/3。如果不改进工作，1987年将出生2300万人，比1986年更多。但第三天，《人民日报》刊出某国家机关的谈话，却说1986年人口回升主要原因是育龄人数增加和结婚人数增加。显然，育龄妇女增加是客观原因，而结婚人数增加则是提倡晚婚、晚育以及反对早婚（不到法定年龄结婚）等工作放松的结果，两者是不能混同的。当前，关于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原因的争论，并不是一般性的对我国人口分析的不同看法问题。我认为，198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回升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而目前我国人口控制正处在紧急关头，所以不揣浅陋，将不成熟意见，提出讨论。

一、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控制人口的总目标和总政策

建国初，旧中国给我们留下了庞大的过剩人口的负担；革命

后，由于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特别是由于我们人口政策上的一度重大失误，出现了近二十年的人口持续猛烈增长。1972年国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成绩显著；与1971年相比，1979年人口出生率由30.74%下降到17.90%，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3.40%下降到11.70%。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过大，人口结构尚处于年青增长型，大致每七八年就要增长1亿人。这样人口数量迅猛增长同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总方针发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冲击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中叶国民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实现，并难于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将人口调整到合理的境地。为此，党中央经过多方面科学论证，综合研究，慎重决策，于1980年9月25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致全体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为达到此目标，制订了“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的政策。党中央此项非常坚定、非常明确的关于人口总目标和总政策，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提到新的历史高度。决定公布后，鼓舞了全国人心，得到了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广泛的支持。接着1980年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和1981年5月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所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等等，也都一再确认、反复肯定上述人口总目标总政策。应该认为，它已经具有法定性的效力，必须坚持和贯彻。此后的一个时期，我国计划生育部门，对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上述决定的态度是坚定的、严肃的。全国各省市县乡各级党政机关也是排除万难坚决执行的。尤其是成千上万的计划生育干部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多种努力，其自我牺牲精神，有些是可歌可泣的。诚然，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有些地方阻力很大，某些具体采用的手段和方法有不尽恰当之处，这些问题应予重视，有些问题一经发现，正在改进。总之，一切手段、

方法、措施，都在日趋完善中。所以，从1982年开始，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趋于下降，形势很好。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缺乏全面论证的情况下，从1985年起，有关部门采取了节节后退的方针。1985年2月1日《健康报》计划生育版发表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公开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改为“12亿左右”；1986年12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竟又正式确认“12亿左右”；1987年1月29日某负责人在联合国第二十四届人口委员会会议上又公然宣布：“如在今后十四年仍保持目前增长率，到2000年总人口将超过13亿”。

为什么要改变党代会、人代会确认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是不是要求过高了呢？不是。1980年党中央国务院确定20世纪人口总目标（12亿以内）人口总政策（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时，已经周密考虑到中国人口问题有许多复杂困难的情况，如：人口基数太大，因而每年绝对增加数大；人口生育的惯性作用、习惯势力特大；计划生育政策从1972年开始还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生育盲目性和生育自由化还颇有市场；对少数民族人口控制必须适当放宽；中国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很不平衡；加上1986—1995年人口生育第二次高峰等等；充分考虑了这些客观条件，所以决定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7（如果能够严格做到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则总和生育率为1）。到20世纪末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是非常科学并留有余地，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当时宋健等同志曾进行过长期预测：如果从1980年起妇女平均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为2，即两胎化，到20世纪末全国总人口也只有12.2亿；即使一直保持为2.3，即相当于1978年的实际生育水平，那末到20世纪末，全国人口将达到12.9亿人，而不是“超过13亿”。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急急忙忙改变既定的政策和目标呢？

问题在于某些同志把一个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困难看得过分严重，失去信心，从而把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所确定的人口控制总目标总方针的严重意义看得轻了，实行步步退却。名曰“完善政策”，“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小口子要继续开大，不要封顶”。这就势将形成蚁穴决堤，一泻千里了。

这几年陆续开的“小口子”主要内容是：

(一) 对已生过一个孩子的少数家庭新规定若干条件，扩大生第二胎的照顾面。各地方规定照顾范围大致在10—30%，这些规定是合理的，但需要公正对待，严格掌握。

(二) 对所谓独女户，允许生第二胎，照顾面一下子扩大50%。这在实践上根本否认计划生育的理论出发点，在意识形态上强化了重男轻女的封建生育观念，在执行上将难以有效控制，如果第二胎仍是女孩子，生育户将理直气壮地要求生第三胎乃至更多胎，直到生男孩为止。而头胎是男的，还可以千方百计地要求生第二胎，名之曰“男女平等”，或二个男孩才有保险系数；或有男有女才是中国的美满家庭，等等。所以这个“小口子”一开，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大口子”；

(三) 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4—6年)，普遍生二胎，照顾面达到100%。这就根本否定提倡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的总政策了。

上述这些“开小口子”政策，有些名曰试点，实际上推行面不断扩大，从局部失控正在面临全面失控的危机：1. 国家计划生育的总目标总政策在全国人民面前失去威信，人心动摇，中央主管机关每年向省市布置工作任务越来越困难，省市向市县亦然，工作越做越难，办法越来越少。从领导起，形成整个计划生育的被动、挨打、退却的恶性循环。2. 上面政策多变，开口子；下面做计划生育实际工作的第一线干部，对政策摸不到底，工作困

难得不到支持，越来越怕左右得罪人，既有畏难情绪，又有抱怨心理，对工作从不好管、到不敢管、发展到不愿管。工作放松了，计划生育大军不是日益精壮，而是日趋萎缩。3.自70年代初以来，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已经开始形成少生孩子光荣的社会风气，人们生育观念开始转变，城市已基本上实现一胎化，农村也有大量妇女表示不再生第二个孩子。但这两年在开“小口子”的政策下变了，过去十几年计划生育成绩难以巩固了。前几年领独生子女证的人数年均约为1000万人，现在急剧降为200万人左右。晚婚逐年下降，婚期提早，甚至法定婚龄（20岁）前结婚增多，早婚早育的直接后果是低年组生育人数增加，生育数量回升；二胎生育和多胎生育1986年比1985年分别上升了4.24个千分点和0.23个千分点。这就是1986年人口全面回升的主要原因。1987年预计出生人口将达到2 300万人，自然增长率将在1986年回升基础上再上升0.87千分点。如果不幡然改变，继续下去，那么“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超过13亿”的不幸预测，必然要实现。这对国家是祸是福，可说尽人皆知的了。

二、十三亿人口对实现四化和 社会长期发展的危害

“开小口子”的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放松，势将导致20世纪末人口不是控制在12亿以内，而是达到甚至超过13亿。至少多增加的1亿人口，将对我国四个现代化和整个社会长期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一）多增加1亿人口，从生育到18岁成丁就业，家庭、社会和国家，从少估算，将增加约12 000 亿元的负担（生活消费和就业投资），使国家最为稀缺的资金更为拮据，使人口数量过多

和人口质量过低的矛盾更为尖锐，使提高人口素质、提高教育、科学技术水平更为不易，使二元化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化的时间大大拖长，使社会剩余劳动力就业更为困难，大大增加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二）中央所确定的到20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人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将受到严重挑战。有可能连预期的小康水平的低限（800美元）也达不到。特别是人均耕地面积将进一步减少，人均粮食产量和消费量、人均的用地住房面积、人均的淡水资源等将较原来设想的要大为紧张，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方面比预期更为尖锐；

（三）如果现行“开小口子”政策保持不变，妇女总和生育率以现在水平一直保持下去（且不说进一步恶化），据推算，我国人口到2050年为18亿，远较原来设想的15亿多得多。紫阳同志提出的“我国发展目标……到21世纪中叶，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美好远景，势必落空。同时也使我国人口与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将全面处于爆炸性的关系中。1980年—1981年时，一批人口学家曾广泛讨论，主张用100年或稍长时间，根本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将总人口调整到7亿左右，进入零增长的稳定阶段，使人口与自然关系、社会经济关系，处于合理状态，即理想人口。这是基于系统工程学和借鉴发达国家二三百年来人口发展现实的考察的宏图远略，现将付之东流。整个21世纪我们仍将处于人口压迫的困扰中，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人民生活的差距将远比现在扩大，我国对世界人类的贡献要大大落后了。

三、几点迫切的建议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81年的14.55%，迅速下降到1984年的10.81%，接近实现1982年北京召开的亚洲议员人口会议所确定的2000年亚洲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的目标，全世界都赞扬我国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就，寄希望于占世界总人口22%的我们人口大国率先对世界人口控制做出榜样。目前我国处于第二次生育高峰，加之主观上某些工作失误，使人口出现第二次回升，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处于成败的转折关头。近几年来，国家统计局、国家科委、国家计生委、航天部710所以及人口研究学术机关，对我国未来人口进行了多方面调查预测，方法虽不相同，结论基本一致，认为大力提倡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政策，到本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是可能的。困难虽相当大，但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根本道理在于计划生育符合生育者家庭、社会、国家的近期、中期、远期利益；计划生育在2亿城市人口中已基本实现，而农村正在大步地转化为集镇，集镇转化为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使8亿农民改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面貌，所以只要政策坚定，方法对头，计划生育工作的前途会越来越光明。我们决不能回避矛盾，遇难而退，采取各种开小口子政策，迎合农村中落后农民的旧生育习惯；政府越是迁就落后，越是不能理直气壮地推进工作，照顾这照顾那，给不法分子以徇私舞弊的各种借口，使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名存实亡，计划生育工作越来越不好做，出现某种生育自由化倾向，这样下去，全部工作就有失败的危险。党中央、国务院1980年所确定的计划生育总目标总政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为此建议：

（一）建议重申十二大的决定：“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

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以及告全体党团员书上所确定的“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的政策不变，号召全体党员、团员和全国人民，坚决贯彻执行；

（二）建议国家计划生育部门对近几年内具体政策的制订、全面工作的部署和指导思想的变易等等进行一次全面的反思总结，重新估计生育形势，坚定信心，采取一切合理而有效的措施，并团结、充实、鼓励、选拔计划生育干部队伍，形成巨大的声势和力量，力争错开和削弱我国第二次生育高峰，巩固已有成绩，发展新的胜利，努力确保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

（三）建议各级政府层层落实计划生育任务，要把计划生育工作同改革、开放、搞活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各级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如卫生、医药、教育、文化宣传、科研、民政、司法等部门以及社会团体，大家都来支持协助计划生育工作；财政部门在财力上给予更大支持，宜将全国计划生育经费（包括基建费和事业费）从目前平均每一育龄妇女约为2.80元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据亚洲议员人口会议材料，每年用于计划生育的钱，每个育龄妇女1970年为0.80美元，1980年为3美元）。总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全力以赴，为贯彻实现到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而奋斗到底。

（1987年7月7日）

制止通货膨胀是当务之急

1987年我国物价全面高速上涨。以1986年同期为100%，1月至10月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为107.6%，许多大中城市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已超过两位数。

物价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价格连续上涨，失去控制。1980年第一次物价上涨6%，经过1981年的调整，次年迅即回落，并连续三年保持在2%以内。但1984年通货大发行以后，1985年物价又一次大高涨，达到8.8%，年底进行“软着陆”，1986年稍有下跌，但仍达到6%的水平；1987年又迅速回升，“软着陆”没有成功。政府在宏观上如果没有重大的决策和全面、综合、持久的措施，通货膨胀的势头将无法遏制。

我们决不能将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和推动力。否则，将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乃至政治局势带来严重的影响：

一、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与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总方针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总产值虽一时性推上去，但难以为继，势必被迫下降，一上一下，经济效益、经济实力损失严重。一方面，通货膨胀使市场供求总是处于高度紧缺状况，使生产者对市场的前景难以预测，使消费者人心惶惶，使整个经济形势无法稳定下来，更谈不上在稳定中求发展；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同时又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加

剧了供求紧张状况，使无法绕开的价格改革在一定的程度上又退回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一般的改革展不开，深化就更难。

二、通货膨胀推高了国内产品的价格水平，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既加重了中央财政的企业补贴负担，又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如果它的价格过高，影响销路；如果不提高价格，国家财政又必须拿出大量的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这又容易招致倾销的指责，不利于扩大产品出口。在发展中国家，进口需要总是超过出口可能。如果国内搞通货膨胀，就会扩大进口需要，扩大贸易逆差。我国进口依存度1983年为6.56%，1986年猛增到12.93%，而日本同年为9.1%。通货膨胀使国家不能稳定合理的外汇汇率，没有稳定的合理汇率，对外贸易乃至对外经济关系都难以开展，而如果出口跟不上，国家外汇收入不能迅速增加，既要影响国家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设备，又会日益影响我们的还债能力。如果外债不能及时还本付息，搞得不好，就会掉进债务泥坑。

三、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国家的财政赤字更难消灭。通货膨胀使财政收入的水分增多，而虚假的数字往往又容易诱发人们盲目追求产值，扩张投资规模，增加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使经济效益不能较快提高，财政的实际收入也就难以稳步增长。通货膨胀还使财政支出特别是经常经费支出难以压缩，国家财政赤字就很难消灭。

四、通货膨胀使市场难以发育和形成，企业不能在稳定的环境与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使企业与国家的利益分配关系不能规范化。产值、利润以现行价格计算，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承包的效果实际也难以考核，这影响了承包的效益。

五、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少数人利用市场供求的紧张状况，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而物价的大幅度上涨使更多的居民实际生

活水平下降，严重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使街谈巷议沸沸扬扬，这已经并正在成为影响政治安定的不利因素。

因此，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当前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内，要把反通货膨胀作为重要的大事来抓。首先，中央政府要有明确的、全面的经济调整政策，从现在起就进行经济调整，力争在三年左右基本上理顺经济关系，基本上消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控制在2%以内）。其次，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更好地将宏观政策与微观搞活统一起来，促使企业结构的不断改善。第三，在反通货膨胀的同时，审慎地研究和准备改革价格体系，融通市场，凡是违背统一市场的政策都不要采用。

（原载《财贸经济》1988年第3期）

通货膨胀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改革和发展是统一的，是彼此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现在改革同发展的思路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现在的主导的思路，即以承包为核心，以经济高速度发展为目标；另一种是以形成统一市场为核心，即以价格改革为核心，以稳定经济、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

第一种思路在不断地发展。承包本来是有确定的经济学含义的，是指企业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即发包的甲方和承包的乙方通过双方负担权利义务的平等的合同关系。我国是用来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后来发展到行业承包，再发展到地区承包，现在又发展到社会事业承包，如医疗、卫生，大、中、小学都同经营商店，同买卖联系起来。不但如此，政法部门也实行承包，同经济利益相联系。

的确，承包取得了效果：生产上去了，速度也增加了。既然承包能增加供给，我们当然赞成。问题是增加什么供给，是否真正合乎社会需要？

承包必然同生产高速度联系起来。从1984年银行突击放贷款给各企业开始的高速度，经过1985年、1986年、1987年，直到1988年一季度仍继续发展。速度曾经想到过要降低一些，即实行“软着陆”，结果现在是硬起飞。1988年一季度工业增长速度在16%以上，加上村办工业企业的增长速度可能要在20%以上，这是一个超高的速度。

同超高速发展观念相对应的是稳定经济的思路，即认为超高速是不能持久的，跌下来的可能性很大。如果继续再硬爬高，三四年后再跌下来，那就不是几年能调整得了的，势必造成大损失。因此，我认为，要稳定经济，讲经济效益，使经济逐步发展。

如今，高速度得到新的推动，这就是以面积的扩大即沿海甚至内地成十万里平方公里划为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为特征的（不是以产业政策为主导的）开放战略的新发展，这种战略得到地方普遍支持，例如贵州就公开提出要敢于做到“三不怕”：一是不怕别人说“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二是不怕说“姓资不姓社”；三是不要怕政策放得太宽了会影响全国。现在，人们希望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每年保持在14%左右。这样的高速度一定会引起投资、消费的不能控制，扩大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程度，引起经济波动，推动物价高涨。

高速度是靠通货膨胀支持的。人家即使搞通货膨胀也是偷偷摸摸的，到了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才承认。我们却有人公开提倡。1988年4月5日《经济日报》发表刘国光同志的文章，主张要控制投资，控制速度，不能放松稳定物价，认为从各国的经验看，通货膨胀没有好结果。可是，4月8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竟不谋而合地在同一天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程万泉同志写的《物价上涨的原因及平抑物价的对策》一文，提出“我们宏观政策的重点应是保增长，只把稳定物价作为宏观控制目标，并不是最好的选择……”；通过通货膨胀“为基础工业积累资金”；利用通货膨胀政策“实现国民收入的强制性储蓄”等观点，真是文不对题，引起人们的惊奇。

通货膨胀集中表现为物价上涨。尽管物价上涨原因很多，但主要是通货膨胀引起的。在西方不管是什么原因，凡是物价增长多少，就作为通货膨胀率增长多少。西方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通

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我国情况虽有不同，有结构性等原因，但是现在物价上涨主要是通货膨胀。有人认为，现在经济开放了资金来源还可以借外债。但外债是要偿还的。我国的外债已经很多了，增长很快，结构上不合理，长期的、低利的、政府的贷款只占50%左右，40%以上是商业性贷款。据国际上的经验，国家在困难的时候，对外汇都集中管理，随经济实力增强后，才逐步放宽，逐步借外债。可是，我们现在中央借，地方也借，到时如何还？90年代开始还债，1993年进入还债高峰，资金净流出，那时物价又将如何呢？当然，还可以讲再借高利、短期外债过日子，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偿还外债可能造成的危机，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值得我们警惕、借鉴。

外汇问题要研究。美元贬值，一年多来，贬值30%多，我们人民币对美元又贬了30—40%，出口收汇增加，是不是与实物形态流出成比例？是否存在“失血性出口”现象？就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而言，美国约为10%，日本约为15%，现在我国也已在10%左右。而我国人口多，国内市场紧张。有人提出出口贸易2000年时要达到1500亿美元，能不能达到？现在的主要产品的出口已经在挤国内市场，例如棉花国内工业生产需要6000万担，现在只有4000万担用于国内生产，其余的要保出口。这样换来的外汇，如果用来技术改造也好，但实际上许多极端珍贵的外汇被浪费了。国内市场商品紧张，物价怎么会不上涨？

另外，推行承包，地方还要扩权，地方财政要大包干。以特殊的政策支持的地方扩权和财政大包干（象广东省），以及以省为单位全面大包干，这就会削弱中央调控手段，以块块为中心搞下去，必然导致投资速度的加快，造成物价上涨，甚至导致地方坐大，就有如南斯拉夫同志说的那种变成联邦的危险。现在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担忧。

第二种思路与第一种思路不同，认为要通过价格改革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然后对外以统一的国内市场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对内中央适当收权，地方发挥与事权相适应的财政权力。总之，通过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使企业真正独立自主经营。这才能抑制饮鸩止渴的通货膨胀，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对于发展前景，有人预测1988年物价上涨率将达15%。1987年的物价上涨率是7.3%。到年底如果不幸而言中，则1988年是1987年的一倍，已经走到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了。那末1989年又将是如何呢？要知道通货膨胀一踏进恶性阶段，就将引起加速度，即通货增加一倍，物价可以上涨三倍五倍，甚至上涨到不够印钞成本，银行印钞机供应不上钞票出笼的程度。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通货膨胀规律。我们的货币政策、物价政策如果不迅速悬崖勒马，翻然变计，那末，今天的巴西、乌拉圭等拉美国家和南斯拉夫、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失误，再要走一条正确的、党中央作过决议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的、价格改革不能绕过的道路，虽非绝不可能，但必十分困难和支付浩大代价。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国内外历史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借鉴。就我国的经济而言，1958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是否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以某种程度再现，这应随时引起我们警惕。

我认为，端正改革和发展思路，调整货币政策和物价政策，现在还来得及。一定不要绕过价格改革、不要绕开统一市场的问题。要充分重视物价问题，不要抱侥幸心理，不要继续玩火，搞什么通货膨胀以积累资金、保产值增长之事。如果早一个月端正改革的思路和做法的话，将来就可能减少一年的损失。为了短期

利益，拖下去，眼前也许可以，但长期是拖不下去的。这不是危言耸听。

改革需要以下的配套措施：

一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现在的速度已经很高了，要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财政赤字，控制消费基金增长，同时要加强对宏观调节。宏观调节首先要能调节宏观，领导要真正下决心，十分坚定地排除万难，改革前进。

二是稳定物价。在两三年内采取一切措施把物价降下来，使其上涨率回降到3%左右，团结一致，勒紧裤带反对通货膨胀，提高人民币的币值。在这个基础上，价格改革及与之配套的各项改革就可以出台了。否则，缺乏这个外部条件，价格改革就不具备条件。现在情况下，如果进行全面价格改革，就是冒险。

三是提高经济效益。在近二三年中，并非无事可为，宏观上正可乘机落实合理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放手让企业通过开展竞争，让先进企业兼并、淘汰落后企业，逐步达到优化企业组织、企业结构，以改善供给，降低消耗，提高经济效益。这样做，可以真正发挥企业自主权，把企业从被行政捆住手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四是政治上要全党上下一心，整顿党风、政风和民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需要上层建筑的保护，上层建筑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见我们现在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是与发展生产力的总目标相违背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有两个：一是精神的力量，是党心、民心；一是物质的力量。两个力量都不能缺少。我们要采取配套措施，尽快治理。

（原载《改革》1988年第4期）

论经济效益与承包经营

承包制在中国的广泛推行，其利弊得失，国内外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在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广全面承包制之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对这一措施进行冷静反思是很有裨益的。

一、经济效益与体制改革

经济效益的提高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源泉。对美、日及西欧各发达国家近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分析说明，其增长率中一般都有50—70%是由于经济效益的提高而获得的。而按同样的方法测算，我国建国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中仅有不到20%（见附表）是由效益的改善而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名义速度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的实绩则相对较差的真正原因。因此，要加快我国经济增长的步伐，缩小我国和世界各国经济上的差距，最关键的就是要大力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可以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带着提高经济效益这一使命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不仅是改革的目标，而且，能否达到这一目标，也是判定各项改革措施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

众所周知，经济效益大体可分为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两种。前者主要是指企业的生产效益，亦即对社会有限资源的使用效

益。提高这种效益的主要途径是技术工艺的进步和劳动者生产经营积极性的改善，其结果表现为用同样多的社会资源生产出质量更好或数量更多的产品。后者则主要指社会生产各环节、各部门以及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协调程度，亦即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益或结构效益。提高这种效益的关键是改进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从而不仅保证社会生产各环节能够协调进行而不致发生生产能力的闲置浪费，而且能够保证社会资源首先流向社会最需要的且微观效益较好的生产单位。

效益不仅有宏观、微观之分，也有长期、短期之别。一般说来，改善微观效益的措施是比较容易在短期内见效的，而宏观结构效益的改善则需要做较长时间的努力。反之，宏观经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效益损失，也只有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才能明显地暴露出来。在现代经济中，宏观的、长期的效益既以微观的、短期的效益为基础，又在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中具有主导地位。因为如果资源配置失当的话，企业生产的效益就无从谈起，而如果在追求眼前效益的同时损害了长期效益，也是最终不能取得成功的。因此，要想求得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就必须将微观的、短期的效益与宏观的、长期的效益统一起来考虑。然而，这两种效益的统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项着力于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促进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改革措施，很可能在短期内难以见效，甚至有可能带来短期生产的暂时下降；而一项旨在提高微观（企业）效益的改革措施，也可能在促进生产短期内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却为长期效益的提高设下了障碍。因此，在分析任何一项改革政策时，必须瞻前顾后，权衡利弊。具体来说，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只要它同时有利于这两种效益的改善，或者，只要它在促使微观、短期效益改善的同时，不使宏观的、长期的效益受到影响，那就是成功的，否则是不成功的。

还需指出，要想针对提高我国经济效益这一主线，对今后的改革道路作出正确的选择，就必须不仅清楚地了解造成我国经济效益低下的真正原因，而且需要弄清每一项改革措施主要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症下药，不致偏离方向。

二、农业家庭承包经营效果显著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以来相对薄弱的环节，也是长期以来经济效益比较低下的部门。农业的长期落后，不仅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妨碍着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国经济改革首先选择了农业这个突破口，并通过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在短期内大幅度增长，并有力地支持了其他部门生产的增长。为什么承包制能够在农村取得显著效果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造成农业部门长期以来相对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

概括地讲，造成农业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在集中僵死的计划体制下，一方面，由于长官意志、瞎指挥普遍存在，适合种小米的地方非要种高粱，适合种花生的地方必须种玉米；另一方面，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从而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农民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发展农业生产的自主权，影响了农业结构的改善和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二）在以生产队为经营生产单位的“大锅饭”体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劳不能多得，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三）公购粮任务重，农产品价格又偏低，不仅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农业生产能力的改善。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取消了对农业的指令性计划，转为

指导性计划，在充分尊重生产者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鼓励农民注重增产粮食的同时，全面发展农牧渔副各业。同时，支持农民开办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农业资源配置效益得到改善。其次，通过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打破了过去的“大锅饭”体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再次，在大批进口粮食，减少对农民征购的同时，几次调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不仅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也使农业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加之有几十年积累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客观基础，因而促成了农业在短期内的大幅度增产。

由此可见，前几年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加，并非承包制单项突进的结果，而是各项措施共同作用所取得的。还需指出，承包制之所以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增加，还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相对比较独立的部门，其生产对其他部门的依赖相对较小；农业内部各生产单位之间在生产消费上相对独立分散，要求协作程度很低。因此，推行承包制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影响各生产单位、各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宏观资源配置状况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在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没有很好注意并及时改善这一措施发挥积极作用的其他条件，使得农业经济效益的长期改善受到影响。（一）在取消农业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同时，没有注意及时建立新的农业资源配置机制，特别是没有很好注意农副产品市场的组织和深化，致使农业生产受市场波动影响过大，既不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会影响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二）在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的同时，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民的消费结构和投资方向，致使农业生产性投资不足，农业生产的提高缺乏后劲。（三）未能有效控制总需求水平，致使其他物价水平不断上涨，因而使农副

产品价格相对来讲再次陷入价格盆底，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三、企业承包短期效益是明显的，但长期效益如何值得严肃认真探讨

我国企业普遍推行承包制，是在农村承包取得显著效果，城市全面配套改革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的背景下进行的。从短期来看，实行承包制确实在一定范围内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增长，保证了财政收入指标的完成。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这种制度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经济效益问题。

一方面，这种制度并没有真正使企业摆脱“纵向从属”于上级机关而转向“横向从属”于市场，从而处于激烈竞争的压力之下。这是由于企业经营效果的好坏和收入的多少，不仅取决于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上级机关对企业经营条件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反复的讨价还价就不可避免。这不仅强化了企业对上级机关的依赖关系，也降低了企业对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的积极性，从而使企业微观生产效益的提高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在旧体制中，尽管企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不高，技术水平落后，资源使用效益低、浪费严重是造成经济增长实际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从整个国民经济范围来看，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下，缺乏灵活而有效的宏观资源配置机制，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结构长期以来不能处于一个动态优化的过程之中，而只能在结构偏移过大，国民经济已无法正常运行时借助于政府的力量进行一次次的调整，而这每次偏移——调整过程都造成了社会资源和劳动的巨大浪费。经济改革以来，虽然通过各种放权措施的实施，集中计划的约束力已大大减

弱，但同时适应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有效而灵活的资源配置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且，在放权过程中所形成的“双轨制”价格体系，不仅无法引导经济结构趋于优化，还有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结构失衡，而且对社会风气的腐蚀作用也不可低估。因此，我国经济效益的长期改善，从根本上有赖于能够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机制的建立。

然而，承包制的实施不仅难以达到这个目标，而且可能会给向这个方向的努力带来新的障碍。这是因为，企业全面承包等于承认现有企业、行业等，包括经营不善和生产方向不当的企业的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固化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给结构调整和要素重组造成障碍。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通过市场竞争，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倒闭，同时有数量更多的、效益更高的企业新生。经济机体就是不断地通过这种优胜劣汰机制保持其活力。而在承包制之下，经济结构包括企业组织结构等都只能是死水一潭，从而中长期内经济效益的改善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另外，承包还固化了目前不合理的企业外部条件，增加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四、全面承包不利于宏观资源的 优化配置，需谨慎从事

（一）财政、信贷、外贸等实行地区切块承包弊多利少，后果值得深思

现代经济机体的有效运转从而达到宏观资源的优化配置，有赖于企业、市场和宏观调控系统的协调行动，缺一不可。财政、信贷是宏观调控系统实现其对经济协调作用的两个最主要手段。为了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和企业经营的良好外部环境，宏观调控系统需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灵活地采取对策。但在

实行承包制，承包条件一定几年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使这两种调控手段失去其应有的功能。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要求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紧密衔接，以及社会生产各环节、各部门之间的紧密配合，也要求各地在发展经济上分工协作，各自发挥其比较优势。而地区（省、市）财政包干并层层落实到市、县、乡的措施，必然会造成市场的层层分割。各地为了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必然相互封锁原料和销售市场，还会在此基础上大力兴建短期见效的加工工业，从而势必造成加工工业低水平的盲目重复建设。由此所造成的效益的损失和资源浪费实在不堪设想。

由于在确定承包基数和承包条件时缺乏合理的客观标准，因而以省为单位的财政大包干必然造成各省市对全国财政负担的不公平现象，不仅会人为造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对立，也会人为增加各地区（包括区区之间，县县之间甚至乡乡之间）的利益矛盾。

以省为单位的信贷大包干，一定三年或五年不变的办法，不仅会使中央对全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失去其主要手段，也会使金融对经济的资金融通作用受到妨碍。因为在信贷额度切块包干到省、县、乡的情况下，必然会阻碍省际和省内的资金流动，资金市场将受到破坏，资金的优化配置将无从谈起。在各地、县、乡都得到少量的信贷额度而又相互难以融通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小型项目星罗棋布，因而势必造成规模效益的巨大损失。同时，信贷的分省及省内层层包干，也势必强化行政机关对金融工作的干预，专业银行的企业化会受到阻碍。

外贸外汇的切块承包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全面承包以后，为取得外汇分成利益并完成外汇上缴的指令性任务，有的省

已经通过行政命令把外汇上缴任务层层分配到县甚至乡、镇、村；加上超额外汇出口可累进超额外汇留存，因而地方出口和超基数出口越多，分得的外汇留成也就越多，各地的利益明显突出。地方为扩大本地外贸出口，增加地方外汇收入，必然通过或明或暗的政策，在可能的范围内，严格控制本地可供出口产品的外流，形成相互封锁、切割市场的局面。同时，在承包条件不同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对内抬价抢购，对外压价竞销的现象。有一种意见认为通过制订出口最低限价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这就如同我们在国内采取的多种限价措施一样，虽然没有明涨，但暗涨了；也许标签上的价格未动，货架上则无货。总之，在利益动力的驱动下，要想有效防止压价竞销的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不能有效制止这一问题的情况下，不仅会使国家整体利益受损，也会损害我国的贸易形象，不利于长期出口贸易的增长。另外，外汇留成范围的扩大和外汇使用的进一步分散，必然会造成进口用汇的浪费，包括重复引进、消费品进口、公费出国旅游等现象越来越严重，使不惜成本换来的宝贵的外汇资源不能用在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上。纵观各经济起飞过程比较成功的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在经济起飞过程没有完成以前，外汇资源一般都是由国家集中掌握使用的。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宝贵外汇资源的浪费，保证其使用效益。

（二）特殊行业不可分省分片承包

铁路、民航、邮电等是全国性企业，其服务产品的生产过程只有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子单位的密切配合协作方能完成。对于这些行业，在一定时期内实行全行业承包是可以的，但不可实行内部层层承包或分省分片承包。因为这些行业对各环节间的协作配合要求异常严格，分省分片承包后必然形成各自独立的利害关系，增加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不利于分工协作。同时，有

些业务是难以分开的，勉强分开必然出现各种漏洞，不仅不利于效益的提高，也会影响安全生产。在西方国家，这些行业一般都由全国性大垄断公司经营。如果有几个垄断公司同时经营，其各自的经营范围也是从业务的角度来划分的。比如铁路主要按线路划分跨地区经营，而不是按邦、州、省为范围，割成数段经营的。

五、深化改革的两点思考

以上的分析说明，在宏观经济格局相对比较合理的情况下，承包制作为解决微观积极性的短期过渡性措施，是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由于它不仅不能解决造成我国经济效益低下的最根本矛盾，即缺乏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机制和宏观结构效益低下的问题，因此，我们就不能把经济改革的成功和经济效益长期稳定提高的希望寄托在承包制身上，而必须寻找别的措施。

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统一取决于经济体制各环节的协调配合从而经济机制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而要在改革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使经济体制丧失其整体功能，促使新体制的积极作用与效益提高达成良性循环，就必须对经济机制的主要环节，包括企业、市场和宏观调控体系进行大体同步配套改革。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理想化，事实上这种观点并没有经过实践的验证。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进行同步大环节配套改革风险大，政治上难以接受。是的，进行这种改革的短期风险和难度可能都要大于单纯推行承包制，但不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使长期风险更大，甚至会将改革引入进退两难的死胡同。

还有一种意见是将配套改革的设想与企业（或微观）体制改

附表：
各要素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所起作用的国际比较*

	中 国 1954—1984	美 国 1918—1969	日 本 1953—1971	联邦德国 1950—1962	法 国 1950—1962	英 国 1950—1962	意 大 利 1950—1962
国民收入增长率	11.90 (100.00)	4.00 (100.00)	8.81 (100.00)	6.27 (100.00)	4.79 (100.00)	2.38 (100.00)	5.00 (100.00)
总要素耗费	9.86 (82.86)	2.09 (52.25)	3.95 (44.85)	2.78 (44.34)	1.24 (26.38)	1.11 (46.64)	1.06 (29.64)
劳动	3.21 (26.97)	1.30 (32.50)	1.85 (21.00)	1.37 (21.85)	0.45 (9.57)	0.69 (25.21)	0.96 (17.14)
资本	6.65 (55.88)	0.79 (19.75)	2.10 (23.84)	1.41 (22.19)	0.79 (16.81)	0.51 (21.43)	0.70 (12.50)
土地	0.00	0.60	0.60	0.00	0.00	0.00	0.00
单位要素产出	2.04 (17.14)	1.91 (47.75)	4.86 (55.16)	3.49 (55.65)	3.48 (73.62)	1.27 (53.30)	3.91 (70.35)
资源配置	-0.24 (-2.01)	0.30 (7.50)	0.95 (10.78)	1.01 (16.11)	0.95 (20.21)	0.12 (5.04)	1.42 (25.30)
规模经济	1.56 (13.11)	0.42 (10.50)	1.94 (22.02)	1.61 (25.68)	1.03 (21.28)	0.56 (15.13)	1.22 (24.79)
其他	0.72 (6.05)	1.12 (21.75)	1.97 (22.58)	0.87 (13.88)	1.61 (32.13)	0.73 (33.19)	1.30 (23.21)

* 括号内的数字为各要素对国民收入所起作用率占国民收入总增长率的百分比，以此比较各要素贡献率的大小。
资料来源：外国的数据见丹尼森；《日本经济为什么增长那样快？》；中国的数字系笔者参照丹尼森的方法运用中国实际数据

进行测算的结果，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范围限于上述。

革对立起来，认为配套改革的设想忽视经济微观基础的再造。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配套改革从来都强调企业、市场和宏观调控体系间的配套。离开了独立自主的法人企业，新的体制框架是无法形成和运行的。所不同的是，配套改革的设想认为，虽然企业体制改革在新体制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只有把它做为大环节配套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把它与其他环节的改革相配合，它才能够真正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在配套改革的设想中，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将企业由过去的“纵向从属”于上级机关转变为“横向从属”于市场的、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法人企业，显然，要达到这一点，仅靠推行承包制是难以完成的。

（本文与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张军扩同志合著，原
载《财贸经济》1988年第6期）

价格全面改革分两步走为好

现在中央准备花五年左右时间，进行全面价格改革。这事关经济体制改革命运，我衷心拥护。

价格改革的目的是改变三十多年来形成的各种价格比价关系的不合理和价格管理制度的僵化状况。因为这种状况导致了价格信号扭曲，使全社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严重恶化，经济效益十分低下。改革的结果是使农工之间、农农之间、能源原材料交通与加工工业之间、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之间、生产部门与服务部门之间的产品的比价关系趋于合理，即符合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使各行各业能够在统一市场上，在一条平等线上起跑，进行公平竞争，从而促使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不但使商品经济在规模上迅速扩大，而且在国家宏观调节之下使市场对企业的生产方向，经营管理起到引导作用；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结构优化，大大提高经济效益。总之，完成了价格改革，基本理顺了市场关系，就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理论上说，只要社会总需求的总量是平衡的，价格改革只是各种价格的内部比价的调整，各种产品的售价经过调整，一定有涨有跌，而物价总水平是不变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情况是高价产品价格降不下来，低价的产品要调高，价格总水平会有所上升。在我国条件下物价将因比价结构变化上涨多少，还待科学测算。不过如果采取价（格）税（收）财（政）利（率）

的改革全面配套进行，估计上涨的总幅度不致过大，采取了适当措施以后，人民也是可以承受得了的。而且价格改革而引起的物价上涨，是一次性的，不致造成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所以这种物价改革在理论上说是安全的。我认为我国比起东欧某些国家物价改革的难度可能会小些，成功的把握要大些。当然，风险确实有，困难也确实大，但都是可以克服的，不会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去。

值得注意的是，价格总水平不仅会因比价结构变化而上涨，还会因货币超发而上涨。从这方面说，现在进行物价改革的客观条件是很不利的。价格改革的最好时间是1981—1984年上半年。那时经济比较稳定，农业正处在实行家庭承包制后，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工业生产速度比较正常；总需求与总供给比较平衡，物价基本稳定（同上期间，物价平均上涨率尚不及2%）；外汇储备比较丰实，外债总额比较低，债负结构较优，离偿还期尚远，在国际市场上债信亦较好。如果这个时候进行价格改革，阻力和风险会大大减少。但是从1984年第4季度起，持续至今，货币发行平均每年增加22.45%（1985—1987年），信贷供应量平均每年增长26.82%（同期），3年零售物价平均上涨7.2%。同期外汇储备一度几近枯竭，外债债信下跌，外币黑市横行。到1988年1—5月份平均物价上涨11%，几乎是逐月上涨的。储蓄增加数较往年减少，货币回笼小于去年同期。货币投放在4月份已经开始，这在我国历史上只有“大跃进”的1959、1960、1961年出现过。连年来经济过热，1988年1—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比1987年同期增长速度竟达17%，能源与原材料十分紧张，这种速度难以为继。如果这种经济形势听其自然发展，1988年物价上涨可能到15%或者更高，将步入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通货膨胀是加速发展的，到恶性阶段，印钞机将供应不上物价上涨对钞票的需要。

这时，经济改革就将步履维艰；“救火”尚且不及，遑论其它！

我以为在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首先治理环境，控制需求，而贸然进行全面物价改革，很可能是一种冒险行动。因为价格改革虽属结构性调整，也会使物价总水平上涨。与需求拉动的物价上涨互相激荡，互相促进，物价剧烈上涨，使物价改革的成功希望化为泡影。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一是供需矛盾不断尖锐化，物价改革无从下手，价格根本无法理顺。主观上要去理顺价格的各种措施，不是出不了台，即使勉强出台，也马上会被基础产品价格和加工产品价格轮番涨价所搅乱或更加扭曲；二是两位数字或更高的物价上涨，使广大人民失去承受能力，民心涣散，劳动纪律松弛，稳妥的工资改革方案也难以拟订和出台；三是企业经济核算无法进行，微观经济运动迷失方向，本来就不高的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将更加低落，生产流通难以组织，物物交换更趋盛行，城乡阻隔地方坐大的矛盾也将加剧；四是财政实际收入锐减（扣除通货膨胀），赤字扩大，发育中的金融市场出现混乱，国际债信下跌，外汇汇价下降，外汇黑市和外币炒卖盛行；五是贪污投机猖狂，吏治败坏，社会风气恶化，严重地摧残社会经济基础的巩固发展。这决非危言耸听，中外历史上都曾出现过这种情况，足以借鉴。

因此，在做出价格改革的决策之后，第一步必须下重大决心，采取斩钉截铁的措施，坚决把正在形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压制下去，坚持在两三年时间内，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内，然后推出价格改革及各种配套措施。这时改革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了。

花两三年时间治理和控制通货膨胀，必须综合地做好下面五项工作：

一、坚决贯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方针，毫不动摇地降低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把工业生产年增长率控制在10%左右，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控制在7.2%左右。这样就可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稳定就是效益。

二、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规定下，大力健全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发行和信贷供应总量的独立自主的责任和权力。货币供应量不得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应定为原则。在这个前提下，方可尽力开放金融各种市场，发展二级市场。对四大专业银行要实行企业化管理，并通过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引导它们符合中央银行的宏观方向发展自己的业务。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要牢牢控制住金融的调节手段，不受地方行政的干预。中央银行还要会同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把外债集中管理起来，管好用好，提高在国际上的债信，力求平稳地跨越1992年的偿债高峰。

三、增加财政收入，紧缩行政支出，力求经常性预算的平衡。财力决不应再分散。财政大包干不公平、不规范，要逐步向分税制过渡。税收政策中的流通税与所得税要并重；流通税逐步过渡到增值税，并开征各种特种税；乡镇企业减免税过滥，要大力整顿；所得税除重视企业法人税外，也要重视个人所得税，不能因为目前税源不大或征收困难而放松。凡国税征收应垂直管理，排除万难，整顿队伍，把该收的税分文不漏地收上来，保证有60%以上的利税集中到中央。支出方面，应把行政支出、企业亏损和补贴包括外贸企业补贴坚决压下来。保证科研和教育经费有适当增长（扣除通货膨胀）。消除经常性的财政赤字（透支）。

四、在实行上述三项措施时，一定要围绕国家的产业政策、企业组织结构政策、技术政策，实行区别对待，而不搞一刀切的紧缩。在生产建设中，新建一批，停建一批，推迟一批，改造一批，破产兼并一批，使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有不同程度优

化，从而改善供给，并使生产稳定发展，经济效益有所提高。

五、经济基础的发展或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加以保护和促进。现在以党内腐败问题为核心，各种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倒卖倒买等罪恶活动，使国家财富大量流失，两极化发展日益扩大，尤其是使民心涣散，信仰丧失。就政治条件而言，现在远不如60年代初纠正“大跃进”左倾路线所造成经济危机那么有利。必须不失时机地动真格地来整顿党风政纪。这项工作做得有成效，我们治理通货膨胀和进行物价改革就大有保障了。

综上所述，五年物价改革如果分两个阶段进行，即先用二、三年时间治理通货膨胀，争取经济稳定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益，这就大大改善了物价改革的环境和条件，以后再花二、三年时间进行配套的物价改革，那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这样看来似乎慢些，实际上成功反而会快些。

(原载《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7月11日)

关于治理整顿的几个问题和建议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尽管抓得晚了，但现在下决心去做还是来得及的。十年来，无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具体工作中，也出现不少的缺点和失误。由于这些失误未能得到及时的纠正，致使目前改革和建设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通货膨胀危害了改革和建设。少数经济学家不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不研究建国29年（1949—1978）来经济发展中几次大起大落的惨痛教训，提出“适度通货膨胀有益论”，企图用多发票子人为地加速经济高速发展。这种哗众取宠的学说很有市场，1984年就用信用膨胀和消耗大量外汇储备造成经济过热。当年由于虚收，财政出现收大于支，因而被认为是财政经济已经根本好转；其实徒具虚名而已。1985年曾为消除经济过热，提出三年进行小的调整，即“软着陆”，但只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1986—1987年继续大量增发货币，其速度大大超过每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使1986年第二季度以后经济持续加热。到1988年提出沿海经济开发的“大”字方针为契机，形成了全国性的重复引进、东中西部全面开发建设大热潮。于是，通货膨胀就呈日益明显之势，难以遏制。“七五”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大约是工业品供应量增长速度的两倍。1979—1984年，社会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年平均上涨2.8%，而1985年为8.8%，

1986年为6.0%，1987年为7.3%，1988年1—10月达16%，为1987年上涨指数2倍多。通货膨胀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了。

二、城市改革以“块块行政性分权”为主的模式（也有条条行政性分权的，如全行业大包干），既不利于搞活企业，也不利于宏观调控。通过改革适当放权，合理地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各自的积极性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因此而削弱中央的宏观调控力量，必须维护和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决不可使企业由原来从属于中央条条改变为从属于各级块块。现在，国家调控能力的大削弱主要是行政性分权造成的。就财政而言，改革中财政特别是中央的财力不断地削弱，对企业的不断地让利减税，对省市推行“分灶吃饭”，到1988年实行财政大包干。包干以实际完成数为基数，造成各省之间的极不公平，省、市得大头，中央财政得小头；包干一定3年5年不变，因经济增长而递增的收入全归地方，中央一无所得。现在中央财政收入每年增长数尚抵消不了物价的上涨，中央财力一再削弱。就金融而言，中央银行二级机构不是按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设置，而是按省、市行政区划设置，各专业银行更是按行政逐级设置，各级地方政府对金融都有巨大干预力，银行系统因地方化也变得支离破碎，不能按经济规律办事。信贷由各省市包干，金融分割也就固定化了。再则1988年又实行外贸出口收汇计划由各省、市包干，外汇留成、进口用汇也是如此。甚至把进出口许可证也下放到地方掌握，那末中央主管部门又如何行使职能？这样块块分割就初步完成。由于省市对地县也逐级实行各种分级包干，于是第二个层次的分割又实现了。结果：1. 中央宏观调控力量大大削弱，形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预算外、计划外的投资便势成燎原。2. 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促使各级地方政府

分地割据，各部门拥权自卫，于是菸草大战、蚕茧大战、苎麻大战、争夺晋煤与豫粮的大战烽烟迭起，互相封锁，以邻为壑；外贸则对内抬价收购，对外削价竞销；本来就发育不良的国内市场更加分割。

三、改革缺乏全面规划，政策决定上存在“短期行为”。开放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小溪和浅滩能够摸着石头走过去，想用试试碰碰，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办法过长江、黄河，却是断乎行不通的。想到一件，号召一番，没有衔接配套措施，就一哄而起；看见一物，大加表扬，上面多变，下面不知所从。战术上的失误，如果性质严重，时间拖长，也可以造成战役上的失败。采用近年来甚为流行的“撞击反射”改革办法，即使某个单项改革取得一时的成效，但因为不配套，发生“真空”、“错位”、“反差”，而难以巩固，甚至难以收拾。例如，消费资料价格开始放开，生产资料实行双轨制，但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市场组织、市场管理和必须的法规。这样，出现党政军民学、全民经商之怪现状，“倒爷”横行，腐败滋生，整个流通领域乃至全国上下搞得“乱哄哄”。再如在资源开发上；采取的“大放大开，有水快流”政策；在知识分子待遇上采取的“自我改善”政策等等，虽然取得了短期效益，但时不过半年，其负效应已有超过正效应之势。

四、缺乏系统有效的产业政策。旧体制下形成的不良经济结构，是提高经济效率和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1979—1981年的经济调整虽使经济结构在农轻重的关系等方面有所改善，但未能持之以恆地做下去。党的十二大确定以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科学技术为战略重点，是对产业政策的正确原则规定。但是，这一正确决定，一则没有进一步具体化，二则没有有效的机制与政策手段加以贯彻，因而实际上并未落实。1984年

以来，经济结构反而有恶化的趋势。首先，农业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农业改革——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和调整粮价结合起来，取得了重大的效果，连年粮、棉、油丰收，到1984年达到顶峰。有些人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于是减少农业物质投入，增加农民负担并实行减少农民收入的粮油合同征购，结果大大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其次，近几年来，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给国民经济带来了生气，并在农村资源和农村剩余劳动的开发利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当地政府的各种“优惠”措施，包括不当的税收减免、信贷“输血”，拔苗助长起来的。这造成了遍及各地的小丝厂、小纱厂、小烟厂、小酒厂等小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其产品大多质量低劣，成本高昂、技术落后、原料材料能源消耗过高，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等。由于缺乏系统的产业政策，又缺乏信息引导，致使它们不能得到正常健康发展。第三，对于技术引进，外资（独资、合资、合作经营）引进和外汇留成的优惠待遇，主要的是向某些地区倾斜，而不是以国家产业政策、技术结构政策等为依据，实行倾斜政策。引进不配套，引进多，消化创新少，硬件多，软件少，花了大量的财力和外汇，而对于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作用不大。重复引进，重复建设，使得产业趋同化严重，特别是那些与超前消费有关的严重消耗能源的家用电器普遍发展，加重了国家能源的紧张程度。最后，一般加工业发展过快，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发展滞后，使得全国能源、原材料以及交通运输越来越紧张，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不平衡不稳定因素。这种症结迫切需要国家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科学的产业政策以便结合中央其他调控力量来调整全社会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企业结构，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益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益。在当前的经济调整中也不要采取一刀切的办

法，使总量问题的解决同经济结构的改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改革10年，政治体制也有某些改革和进步，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发挥了某些权力机构作用，开始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开始向法治过渡，民主政治上也有了增强，报刊舆论也有某些开放，增加了透明度。但我国建国近4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机构设置愈来愈庞杂，冗员愈多，官僚主义愈膨胀，这成为不治之症。一度实行的人权下放办法，由于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监督制度和人才的流动与竞争机制，倒反给了任用私人、提拔亲信等不良行为的滋长以可乘之机。而冗员众多与官员待遇低下相互作用，使官员膨胀与官员贬值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显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中央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了开端，但是，还是不充分的。在“左”倾路线下“言者有罪”的作法虽已扭转，但“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情况仍然所在多有，对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妨碍极大。至于全民经商、倒爷横行，贪污受贿走私倒卖等都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有密切关系。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和任务，人民是拥护的，但也有所疑惧。因为治理、整顿带有经济调整、总量紧缩的性质，某些地区、部门、单位的局部利益、本位利益将会受到触动，某些享有特权的分子的利益也会受到触犯。而在一定条件下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将演变成为调整与反调整、紧缩与反紧缩的斗争，正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将遇到抵制和阻力。因此好决议还需要有坚忍不拔的贯彻到底的毅力，决不应遇到阻力就转弯，这样会导致矛盾在拖延不决中深化。这不是危言耸听，只须看到10月份不少地方还在对楼堂馆所抢工赶建，有的部门、地方还在上项目，货币紧不下来，就可见人民信心不足是不无道理的。因此建议：

一、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使治理、整顿成为全党自觉的行动。首先对于过去10年的经验教训要认真总结，成绩固然要讲够，问题也必须说透。只有查清病根，才有可能开出正确的处方，药到病除。中央决心要大，排除万难，清除积弊，严格遵循党的“十三”大决定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意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从中央到地方，真真放弃高速度、高消费的错误做法，坚决放弃通货膨胀政策，保证实现币值稳定。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明年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一些”，这是正确的，并且不应仅仅限于1989年一年，不要害怕人们说经济“萎缩”。经济稳定发展是长期战略方针，10年来国民经济三起三落，这既不利于改革，又不利于开放。

二、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领导上向人民保证1989年物价上涨要明显地低于1988年。实现这个任务必须付出十倍的努力。中央银行1988年1—8月货币大投放失控，这种势头至今还停不下来，这样多的货币发行，不但影响1988年物价，经过一定时滞，也将严重影响1989年的物价。1989年物价翘尾巴的因素也要有足够估计。所以，为控制通货膨胀，需要采取一系列过硬措施。首先1989年财政决不能再有透支性赤字。如果还留有透支性赤字，则必然带来货币超发行。这样，到1990年进入偿还内债的高峰时期，赤字就更大了，三中全会对于1989—1990两年的要求，就将完全落空。其次，1989年起，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包括现钞与存款）必须严格限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范围内，而不应该加上通货膨胀率，这样才能釜底抽薪。现在这种“货币发行增长率 = 经济增长率 + 通货膨胀率”的公式，是一个实行通货膨胀的公式。中央银行应该更好地运用利率政策，存款不仅要保值，而且要能增值，这样才能稳住和扩大定期储蓄存款。贷款利率，除

按照国家产业倾斜政策有不同档次的优待外，其他贷款利率应使之高于通货膨胀率和存款利率。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贴现利率应按经济情况随时调整，当前则应当适当提高。计划外投资则仍处于失控状态，其资金多数来自银行信贷。1989—1990两年必须有较大数额的下降。其三，出售公房一则缓不济急，二则房租未提高之前难以顺利进行。不如银行适当提高黄金收价，减少走私，然后拿库存金银制成首饰出售，回笼后不再发出。其四，对外贸易的出口亏损（包括进口亏损）补贴长期搞下去，财政力量是负担不了的。现在已经到了仔细核算我国对外贸易的绝对利益和比较利益的时候了。这个无底洞不堵，改善财政经济状况的不少努力会成为徒劳的。

三、整顿经济秩序要与治理经济环境互相推进，配套实施。目前整治的办法，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发布了一系列决定和规定。问题是要言出法随，敢于碰硬，不要走过场，搞形式主义。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所说，在倒爷等问题上，领导同志先要管好自己，二要管好子女，三要管好自己周围的工作人员。有些人希望硬性规定高干子弟不要经商，这当然不合乎一般西方国家人权平等的法律规定。但是现代中国权力可以资本化。作老子的为官清廉，作儿子的仍可藉权倒买倒卖。高级干部主动地把本人及其子女的财产收入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不失为杜绝谣言的正本清源之策。在公检法和监察机关的执法过程中，保护犯罪者和说情者应与贪赃与窝藏者同罪。在表面繁荣掩盖下的“乱”决不可轻视。治乱世用重典，所以，党必须从自身做起，严肃党纪，整治10年或更长时间，使中国成为法治国家。

四、全面深化改革。因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而放慢步调的只是物价改革和工资改革，其他改革凡是与治理和整顿无抵触的仍应进行。而且有几项还必须同时进行改革，不能回

避。例如财政信贷、外贸外汇的大包干制度，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制度等，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加以改革。否则，治理和整顿，就成为临时性“救火”措施了。我们要通过这些改革，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节力量，削弱部门、地方的分割市场、各自为政的分散倾向；加强“人大”这个权力机关对财力使用、货币稳定、外贸外汇等进行有效的及时的监督。现在一味突出按地区、按序次实行行政分权的办法，由于缺乏横向的制衡机构和机制，放了权，可以不负责，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必须坚决分步骤加以改进。中央的宏观调控也要接受社会监督，以进一步体现政治民主化和决策科学化。比如，物价指数，30年实行“一家之言”，这有其必要性，但可否开放一些，例如允许全国总工会或某著名大学也可公开发表数字，使人民增加对统计数字的信任。

最后，现行的五管齐下的治理、整顿措施，有一些办法作为治标救急，是可以的，但也要明确临时的与长期的，治标的与治本的区别。比如，为消除通货膨胀，用行政手段管制物价，只是应急措施，也是必要的，但根本办法，是釜底抽薪，消除财政的透支性赤字和端正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否则，是决不会成功的。粮食、棉花、蚕茧、化肥、某些品种钢材等实行专营，也只能是临时性的。因为烟草早已专卖，但内外勾结倒买倒卖名烟名酒，几乎层出不穷，化肥、农膜、农药改由供销社专营，但现在有的供销社就在倒买倒卖。钢材等生产资料，短期实行双轨制是可以的，但“长期”实行决不可以，因为这不仅与整顿经济秩序的要求相矛盾，而且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

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目前形势总的说也是可以的；但困难确实很大，问题确实很多，乱得确实够呛。一个多月过去

了，各地压缩投资的进度与决议的要求相去尚远；整顿公司严治倒爷，也有所突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今后5年是改革成败命运之所系，全党应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而继续努力。

（本文曾在《人民日报》1988年11月23日和《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9日分别摘要发表）

诗人徐雉同志的一生

《新文学史料》第5辑《来信摘登》栏上刊出了李澍同志的来信，题为《徐雉当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信中引用了鲁迅先生《伪自由书·后记》中提到的“惟有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人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的话，“证明徐雉系文学研究会会员无疑”。还说：“我至今藏有徐雉短篇创作集《不识面的情人》，此书1929年9月出版……其中《嫌疑》一篇，至今读来仍使人兴味盎然。这是篇进步小说，它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与黑暗，描绘了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五位领导人物的形象，为首第一人就是毛泽东同志。”信的最末说：“至于徐雉是何籍贯，还有其他哪些创作，就不得而知了。”读了李澍同志这封情辞恳切的信，使我久久不能自己，不得不力不从心地为这一位早已被人遗忘了的在戎马倥偬中病故于陕北而又不知埋骨何处的早期文学工作者徐雉同志，追写一些他的简单经历。

徐雉同志是我的姨堂叔父，生于1899年，籍贯是浙江省慈溪县河头市。河头名虽曰市，其实只是一个小山村。他于1921年毕业于宁波私立效实中学后，考上苏州东吴大学文科读书，就在求学期间，他的新诗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最早的是登在1922年4月出版的13卷第4期上，题为《一篮花》和《跛足的狗》；最晚的是1924年5月出版的第15卷第5期上，题为《三次的访问》（散文诗）。也还有诗发表在《文学周刊》、《诗》刊上。这一

时期的新诗，主题思想主要是自由恋爱，渴求摆脱古老农村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的悲惨命运，热情地讴歌那坚贞纯洁的爱情，这是“五四”以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封建主义不满的反抗。但是，不仅如此，他同时还把他的诗奉献给工人和农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国际劳动节，1922年5月1日，他在题名《曙光》的诗上，热情地歌唱：

曙光初透的时候，
夜之神已离开大地；
晓风把宛转的鸟语送将来，
笼里的鸡喔喔地长啼。

诗的结尾是：

看呀！农夫们都高兴地荷着锄到田里工作去了，
朝曦正射在他们的脸上；
听呀！工人们都开始唱着他们和平的劳动歌了，
晨鸟和他们一块儿歌唱。
现在死一般的世界又活动起来，
而且充满了新的生命；
便是那些还在睡梦中的人们，
也不愁他们不醒。

这样的诗，现在看来，当然是幼稚的，还只是抽象地歌颂劳工神圣罢了，但是和当时一些新诗比较起来，这诗已经孕育着一些可喜的幼芽。作者还能朦胧地感觉到，在中国，“五一”节不但是工人的，也是农民的。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洋大人君临一切，我国人民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徐雉选取了一个极为平凡的现实的题材，1923年2月11日，写了《路过上海某公园》的小诗：

公园四周围着铁链。

……

我终于急急跃跃地要进去了！

可是园丁拒绝了说：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惟有中国人和狗不能进去！”

于是我失望了，

胸间似乎窒息般地被压迫着，

含着泪的眼只是看着地面。

今天，我真是被侮辱了，

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的羞罢！

唉！我们的国家虽然还没有灭亡，

但我的确

已尝到了亡国后痛苦的滋味了！

徐雉这些诗作，当时不能在常常刊登他的作品的《小说月报》或《诗》刊上发表，大概是艺术技巧太差劲了罢！后来，一部分就收在他的诗集——《酸果》（1930年7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里。徐雉同志参加文学研究会，就是在东吴大学读书时期；但是他不曾告诉我具体是哪一年参加的。

1925年他在东吴大学毕业后，怎样谋生，求得一个吃饭地方，成了大问题。一个白话诗人，要到当时宁波人传统的就业圈子——商界里找事做，比登天还难。好不容易，他在宁波一个中学里，找到一个教职，有一点点糊口的收入。但是时代推动他前进，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推动诗人走上了革命的战场。1925年就是伟大的“五卅”运动爆发的年头，国共第一次合作，广州成了当时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地，省港罢工，沙基惨案，群众反帝斗争的巨浪，一浪高过一浪。徐雉决定投笔从戎，参加到那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1925年10月，他路过上海时来看我。我当时在党

领导下由国民党左派出面办的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初中读书。这位老叔比我大十好几岁，他虽生性沉默寡言，但这时情绪热烈，道出他对革命的向往。在深夜，我送他到十六铺招商局去广州的轮船上，在船底的统舱里，买到一领破席子的舱位，就动身去广州了。到广州后，他被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任科员。当时第六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是林祖涵（林伯渠）同志，他就在林老领导下工作。经常寄回家来他们出版的刊物和宣传品，还记得其中有他写的歌颂革命女兵的新诗，当然这些作品，现在都无法找到了。

当时第六军军长是程潜，这支部队不是蒋介石嫡系，蒋还不能完全控制。“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曾企图解决这支驻扎在浦口一带的异己部队；第六军绕道陇海线逃归武汉地区，但不久汪精卫又叛变革命，宁汉合流，第六军政治部被袭击遣散。徐雉丢掉了一切行李书物，穿了一身布军装，逃回宁波老家。李澍同志所赞赏的《嫌疑》小说中毛主席探望林祖涵同志的一节，就是他在第六军工作中根据生活实践所写成的。

老家不易居，为了找职业，徐雉于1927年秋到芜湖投奔他在宁波教书时认识的那时在海关当官的朋友，希望弄到个职业。后来收进他的《不识面的情人》这本短篇创作集中的《办事员莫邪》，描写一个知识分子谋求吃饭糊口的卑微和艰难，就是以这段生活为背景写成的。1928年他失去这个“办事员”的位置，挣扎着回到上海。在《商报》找到一个副刊编辑的职位，每月工资20元，既不能仰侍俯蓄，也养不活自己一人。他重新拿起笔来，写了不少新诗和短篇小说，当上了那时卖文为生的所谓“文丐”。也因为其中的作品闯了祸，被报馆老板辞退而失业。当时的作品，除了收在《酸果》（诗集）和《不识面的情人》（小说集，1929年上海新文化出版社出版）之外，现在能找到的暂时还只有

《禁烟》（《世界月刊》1929年3月）等。之后，他辗转找到原在东吴大学里的一位姓沈的老师，给沈当私人秘书，工作是给沈的翻译文章做文字润色和誊抄工作。

1932年经过那位沈老师的推荐，徐雉到《申报》担任《业余周刊》的编辑。这个副刊，每周出版，半版篇幅，对象是职员、店员，内容主要是职业知识，读书指导等，文章短小易懂，表现形式比较灵活，没有显明的口号标语式的东西，总的倾向是好的，至少是无害的，不致引起国民党正面的打击。一些进步作家也向这个刊物投稿，譬如叶籁士同志等，就因为经常投稿而和徐雉建立了友谊。徐雉这一时期基本不作文学创作活动，时时化名在这个刊物上写稿，今天也分不清那些文章是他写的了。他支持党所领导的上海世界语和新文字（拉丁化）运动。他似乎没有参加左翼文化的组织活动，但倾向是进步的。他有一位近亲是国民党的权势人物，与他同住一条弄堂，但他绝不往来，毫不敷衍，这也足以说明他的政治态度了。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我匆匆忙忙去到华北。1938年2月绕道赣湘到了武汉，在新知书店非常意外地碰到这位老叔。他告诉我，他决定到延安去，先到西安找林老（林祖涵同志）。徐雉高度近视，几乎一丈之外，不能辨物，身体又不好，这时已年近40了。所以我对他说，那里是非常艰苦的，你吃得消么？他表示，生死在所不顾。这时他的儿子亚男9岁，女儿亚女才6岁。我问他：你的孩子们怎样活下去呀？他说：这我也顾不上了，岳母总会接济一些的。总之，意志坚定。铁打一样，就是要到抗日前线去。他告诉新知书店负责人之一的华应申同志说：

“离开林老十年了，我没有什么长进，这次见到他准要挨他批评了。”说完，哈哈大笑，象孩子一样天真坦率。他每晚打开小小的被卷和书店的同志一同睡在楼板上，第二天早上再卷起来，靠

着墙，当凳子坐。一天三餐跟书店同志们步行到搭伙的地方吃饭，和20来岁的青年一样，过着清淡的生活。3月里的一天傍晚，我送他登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去西安的军车，帮他在铁篷车里找到个位子。汽笛声中，火车缓缓地离开站台；这位已经出版了几本诗集、短篇创作集，并非完全无名之辈的中年作家，西不去重庆、成都，在大学中谋求一个教席，南不到菲律宾、新加坡等地找一个编辑之类的工作，却以无比坚定的勇气，只身一人，走向革命圣地，走向抗战的前线。

他到延安后，分配在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担任语文部部长。当时延安和重庆等地通信不易，此后就没有得到他的消息。1940年秋在一个会议上我碰上重庆《新华日报》的记者陆诒同志，他告诉我刚从敌后采访回来，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的五台县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碰到徐雉同志，他嘱陆诒同志回重庆给我捎口信说，在边区政府任秘书云云。这以后再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因为皖南事变后我转移到上海，转移到敌后，再没有可能了解他的行踪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徐雉不见归来，音讯全无。这之前，我在平山西柏坡，从一位同志那里听说徐雉在抗日战争后随干部大队派往东北了。我托东北的同志探找，并两次托人在《辽宁日报》登报寻找，也是寂无下落。当然明知凶多吉少，也还不甘绝望。他的老伴和子女们非常克制自己，不愿惊动组织，查找下落。我当时很糊涂，加上忙，也就搁在一边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形势所逼，经过大量外调，在娄凝先、袁静、胡采、张季纯、戈壁舟等同志的仗义帮助下，才弄清楚：1939年组织上接受徐雉的请求，派他到晋察冀军区任秘书，后来转到边区政府任秘书，主编《边政导报》，工作之余，他还写诗。据娄凝先同志（他是边区政府秘书长，直接领导徐雉的工

作)说,他写了一些长篇的散文诗,热烈歌颂边区人民的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描述他们的乐观欢快的生活面貌和边区的各种施政建设,等等。可惜这些作品眼前还不曾收集到,假以时日,相信一定能找到的。到了1942年,敌后环境更加艰苦了,徐雉年老体弱,加之高度近视,十分不适应敌后战斗环境。组织上为了保存干部,把他和其余一些年老体弱的干部,先后送到陕北。1945年到1946年徐雉在边区文协创作组,当时患严重的肺病,无法治疗,但还经常写些政治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1947年初,胡匪进犯之前,文协疏散老弱病残,组织上对徐雉特殊照顾,给了他一个牲口,并配备了一个勤务员;疏散到绥德附近后,他们先后都参加了部队或地方工作去了;等到1948年延安光复后,回到延安,才知道徐雉在疏散中已经病故。至于确切的病故地点、时间和埋骨所在,已经无法查到了。

1946年10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出了徐雉同志的诗《希特勒的半身像》,这大概是他一生最后为革命、为人民写的诗句了吧?这首诗最后一节是这样写的:

但是人民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大,
新的希特勒也比旧的更孤立,
他得不到任何的支持,
全世界都在反对它!
他活得快也死得快,
他正在用扩张主义的铲子,
拚命地替自己挖掘新墓;
而从这一次死去以后,
他永远也不能再活。

徐雉同志的文学作品——诗和小说,凡是1937年抗战以前,无论单行本的、或发表在报刊上的,现在大体上可以找到;1938年

到1947年死前，到了延安之后，现在只能找到1945年至1946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七首政治诗（长诗），其余的都没有找到，特别在1942年自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到1944年的三足年中，曾否写了哪些作品，现在竟毫无线索和下落。死者不能复生，这些恐怕只能依靠专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心帮助了。

我这篇短文，只能为诗人徐雉的一生，提供一些粗线条的素材，而不是对他的一生作全面的历史的记述。1936年12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阿英同志编写的《作家小传》中，立有《徐雉小传》。比较起来，我这篇短文还是提供了丰富得多的史实。我只能保证，我所写的，内容是可靠的翔实的，尽管不够全面和详尽，但是没有想象，没有描写。当然，也是由于我的笔拙的缘故。但作为原始资料，或许还有点用处罢。

（原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附：诗人徐雉的革命生涯片断

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后记中所转引的材料里，谈到文学研究会的王统照、叶绍钧、徐雉。叶老先生年高德劭，著作等身，是一位大家所尊敬的前辈作家。王统照同志虽过世稍早，但解放后还担任过重要工作，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惟独徐雉同志，自抗战以后，特别是全国解放后三十年来，已经淹没无闻，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了。

徐雉同志是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一生献身于革命事业。1936

年12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里，阿英同志所编写的《作家小传》中，立有《徐雉小传》说：“诗人。所作诗，大都发表于《小说月报》。兼作小说。有《毁去的序文》与《酸果》行世。”尽管只有寥寥数十字，可见早在30年代那样艰苦的斗争年代里，徐雉同志的文学活动，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但小传的介绍，毕竟过于简略了。

徐雉，浙江慈溪县河头市人。1898年生。1921年到1925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文科肄业时，他的新诗陆续在《小说月报》、《文学周刊》、《诗》等刊物上发表，数量相当多。诗的主题是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反对买卖婚姻，也歌颂母爱，歌颂我党成立后第一个国际劳工节，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等等。1924年出版了《雉的心》，有叶圣陶先生序，这是他的第一个新诗集。1925年离开东吴大学后，他抛弃了职业，到广州去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大革命，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当时，林祖涵（林伯渠）同志任该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就在林伯渠领导下做宣传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跟着叛变革命，武装袭击了第六军政治部。徐雉同志脱险潜逃到上海，重新拿起笔来，运用文艺武器和敌人斗争。《嫌疑》、《禁娼》、《办事员莫邪》等短篇小说，都是这时写成的。

1932年后，到1937年“八·一三”抗战止，他在《申报》编辑《业余》周刊。这个周刊是以公司、企业、商店的中下级职员、店员为阅读对象的。徐雉几乎因此停止了文学创作活动。他化名写了不少文章，用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宣传革命道理和抗日救国的主张。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和一些世界语者并肩战斗。1937年“八·一三”战争时，日本的世界语者绿川英子夫妇因无力支付房租，被房东逼着搬家，在马路上

徘徊了一天，找不到住处。后在世界语者协会碰到徐雉，他慨然应允让绿川夫妇住到他家里去。此事在绿川著作《在战斗的中国》中曾经提到，她说让房给她的人叫Venk（胜利），而Venk就是徐雉当时用过的笔名。

全面抗战爆发后，徐雉当时虽只是年近40，但体弱多病，又是高度近视，行动很不灵便。他抱着对党的无限崇敬，对保卫祖国神圣事业的无限热情，毅然别妻离子，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春，辗转经武汉，去西安，由林伯渠、叶籁士同志介绍，到了延安，被分配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延安分会工作，担任语文部部长。但是他坚持要求上前线，1939年终于到了敌后的晋察冀边区，先在晋察冀军区任秘书，后来转到边区政府任秘书，主编《边政导报》。边区创建人之一、边区政府秘书长娄凝先同志，曾两次书面证明他“工作认真细致，兢兢业业，有显著成绩”。但是当时敌后斗争异常艰苦，剧烈，徐雉体弱，又是高度近视，难以长期坚持，组织上为了照顾他，1941年到1942年间，将他和其他一些年老体弱的同志送到延安。党分配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作组工作。1945年到1946年两年中，徐雉有七首长诗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尽管这时他已经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这在当时敌后极端艰苦条件下，是不治的绝症，但他还是拿起笔来坚持战斗。

1947年3月胡宗南匪军进攻延安之前，边区文协向外疏散，组织上对徐雉特加照顾，给他配备了牲口和勤务人员。先是转移到安塞，最后到达绥德一带，同行的一些年轻力壮的干部，如胡采、戈璧舟、张季纯、曹惠群等同志，先后参加部队或支前工作去了，徐雉和一些老弱留在群众中打埋伏。1948年延安光复，胡采等同志陆续回来了，但是徐雉终于没有能再回来，只听说已经病故了。当时军事倥偬，乘胜南进，大家也没有可能去查清楚徐

雉到底死在何月何日，葬在何乡何村。其实，这也无关紧要，徐雉，一个“五四”时代的诗人，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保卫祖国，他死在岗位上，葬在战场边，求仁得仁，他是死得光荣、死而无憾的。

徐雉同志去陕北之前的文学著作，目前所能查到的，初步开列如下：

1. 《雉的心》，诗集，1924年天津新中国印书馆出版。
2. 《毁去的序文》，短篇小说集，1924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
3. 《酸果》，诗集，1927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
4. 《不识面的情人》，短篇小说集，1929年上海光华书店出版。
5. 《卖淫妇》，短篇小说集，1933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此外，1926年泰东书局出版的由丁丁、赵雪松编的《恋歌》中，有徐雉的诗三首：《失恋后》、《怆情歌》、《失恋后赠情敌》。《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朱自清编选的《诗集》，收有徐雉诗一首：《失恋》。散见于当时杂志中的，有短篇小说《禁娼》，载《世界月刊》3卷3期，1930年3月上海出版。这样的作品想来还有，但由于缺乏完备的索引，我个人用业余时间，一时尚难收集齐全。至于徐雉在主编《申报·业余》周刊时所写的许多化名文章，现在更是无从查找。此外，尚有《中国学校课程沿革史》（1929年上海太平洋书局出版）等非文学性专著或论文等，姑置勿录。

自1920年到1937年抗战为止，这时期的作品，虽说还不齐全，但相信大体上已如上述。问题在于1938年去延安之后，直到1947年去世之前，长长九年工夫，现在只查到九首诗：《延安世界语者协会成立大会宣言》、《元旦献词》、《布达佩斯的解放》、

《和平》、《离开那只手》、《造灾》、《“独立”和独立》、《打猎》、《希特勒的半身像》。其中第一首发表在1938年的延安《新中华报》。该报是油印的，当时延安还没有铅印报，是他刚到延安时写的。《元旦献词》发表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出版的《边政导报》上（1940年1月1日），这也是十六开本的大型油印杂志。其余几首都发表在1945年至1946年的延安《解放日报》上。我想，徐维同志决不会懒散到这般地步。他写下的诗文，白纸黑字，应该是查得到的，但笔者个人的接触面毕竟有限。为此，特吁请有关部门和热心的读者，能向笔者提供有关线索，以便继续搜集徐维同志遗著。存歿两者，感谢不忘。

（1980年5月20日）

怀念出版战线的老战友——华应申

应申同志逝世已经两个月了，但是他纯朴、坦率而真挚的音容笑貌，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不能忘怀。

“维古昔以怀人兮，心徘徊以踌躇。”由近谈起罢！

那还是关在牛棚的时节，一批批从广西来的人向我调查应中的历史。调查，当然并无不好，但在那个时期，它是另有含义的；我断定，对于这位象金子那样纯净的人，也正经历着烈火的“锻炼”。以后，远道辗转传来有关他的遭遇，尽管广西的秩序恢复较早，“四人帮”在那里不能为所欲为，但听到的种种，也够令人毛骨悚然，啼笑皆非。1977年底，他调回北京工作，过年后，他和储继同志一起来看望我们，我和他有24年不见了，感到他清癯瘦弱，音容憔悴。他对我问长问短，关怀备至，也谈到十年中被整死的老同事，就是不谈他自己的遭遇。问他，也顾左右而言他，完全没有从个人出发的怨愤。多宽敞的胸怀啊！

但是，精神创伤可以痊愈，体质损害却不能不有所遗留。不久，医生宣告他已患有后期肺癌。对于这一不治之症，他沉着镇定，无所畏惧。他承受了放疗、化疗的煎熬。1980年，从上海回来，毛发秃尽，食欲全无，我去探望他时，他用低不可闻的完全硬挤出来的声音，反复地询问我关于国家的经济形势、调整方针的落实等等，而不屑多谈自己的事。每次一见到我，必定问我，孙治方同志的病情，当我告诉他治方神奇般的治疗效果时，他展

出发自心底的笑容，好象他自己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我问过他，你的儿子在广西百色，两个女儿留在南宁做工，你打算怎样？他回答我说，我们前后两次在广西工作，近20年；让他（她）们留下来吧，报答边疆人民对我们的恩情。

我问过他，你1934年入党，因组织破坏失去关系，以后一直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干革命，1937年又入党，事迹昭然，应否申请恢复党龄？他回答我说，党的组织部门会关心党员的政治生命，我不应为自己提出申请。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 * *

这是四十六年前的往事了。1934年秋，他因南京党组织被破坏，流亡到上海，参加我们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研究、学习和政治活动。我们知道他在1932年被捕过，经王昆仑同志营救出狱的。他沉默寡言，但政治态度积极，中英文都不差，还会些美术、书法，懂会计。1935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去他家串门，他同孙克定同志合住一个亭子间，当时他被迫离开生活书店，正从事译书工作。桌上放着一本绒面精装、庄严肃穆的书——《海上述林》，封面下方印有“诸夏怀霜社出版”字样，他看到我有些不解的样子，就如数家珍般地告诉我，鲁迅先生如何为秋白同志编印文集的内幕。当时我就想，他真是一块搞编辑出版工作的好料子。夏天，组织委托我和他筹办新知书店。如果没有应申，看来我是不会有信心接受这个任务的。我们这一群人，都是两手空空，勉勉强强靠卖文为生的人。为了有一个自己可以绝对控制的出版机构，我们决定办一个革命书店。

靠五元、十元地筹募资金，靠卖文所得的稿费，终于凑起六、七百元，就挂出牌子，出书了。他对当时出版事业颇有所见，知道不但政治风险很大，而且经济上也要冒收不回书款、吃

倒帐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一方面力争公开合法，一方面尽量节省日常开支，降低成本，多出好书。我们租了一个10来平米的厢房，应申是唯一的专职干部，每月拿18元生活费，住在这个办公室兼货栈的小房子里，还得贴回公家（我们当时对书店的称呼）几元房租。一本书定稿后，有关版面设计、买纸、跑印刷厂、核算成本、确定售价，以及书店设计帐册、记帐、开票等等工作，主要都是他承担的。新知书店的方针，是出版严肃的社会科学书籍，探讨中国经济问题。除了出版已经颇具声誉的《中国农村》月刊外，从1935年10月起，开始出书。当时国民党实行卖国的法币政策，我们出版了《中国货币制度往何处去？》一书，加以揭露。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我们马上出版了两本支持阿比西尼亚人民的书，还出版了应申翻译的苏联科普作家M·伊林的《人类征服自然》和应申、克定合译的《苏联的发明故事》等书。在短短3个月里，我们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书店就站住脚了，应申日日夜夜的辛劳得到了结果。以后，我因另有任务，由姜君辰兼任经理，出面负责，应申主持实际业务。在他的精心筹划下，1936年至抗战前，新知业务有了飞速发展，相继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包括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文章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基本知识》、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等书，以及吴大琨翻译的《大众政治经济学》、吴清友译、孙冶方校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增订本）》和巴比塞著、徐懋庸译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传》）等名著，除了《中国农村》月刊外，还出版了姜君辰编的《新世纪》月刊、叶籁士编的《语文》月刊等刊物。

我们既获得了读者广泛的好评，也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记得出版《斯大林传》之前，应申曾和我商量，估计国民党可能因

此对书店下手，但考虑到这本书在当时的政治意义，决定还是要出版，但新知书店只署名为经销者（这是钻国民党出版法的空子），并将纸型、存书单独租房放置，以减轻受突然袭击时的损失，受袭击后还可以继续秘密发行。我听了他的周密考虑，自然同意他的决定。这时店里的工作人员也逐渐扩充到五、六人，多是决心献身革命文化事业的青年，有王益、朱希、徐律（“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身故）；还有个刚刚刑满出狱的，1922年入党的老革命吴渊（原名吴亚鲁，1939年平江惨案七烈士之一）。这些人，多是应申吸引、物色来的，他们团结成为一个战斗的集体。新知太穷了，但对于每一本书的出版，力求政治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决不马虎，决不损害党和读者的利益。记得1936年春，苏联版画展览在南京、上海展出，我建议应申请人选编一集子。后来选编就绪，版子（包括彩色版）都已制好，付印前又由钱俊瑞同志（他是新知书店理事长）请史沫特莱转请鲁迅先生审阅。鲁迅先生审阅后说，编得不行，不能用。应申就决定停印，不惜资金遭受损失。应申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终身不变。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书店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应申在内，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1940年周恩来同志还赞许地说过，比根据地的供给制还要艰苦。

1937年7月，组织上决定我重返新知工作，没几天，“八·一三”抗战爆发了，新知这时除了存书和帐款外，现金极少，工作人员大都去摆地摊卖书，一面筹款将存书运往内地。我因组织上另有任务，离沪北上。这副重担又完全压在应申身上了。

1938年我从华北前方绕道返抵武汉，当时应申历尽千辛万苦，已把书店搬到武汉，开始筹备出书了。群众的抗战热潮促使新知出版物销路激增，资金周转加速，我们的工作干部逐渐增加到十来人，沈静芷、岳中俊、张朝同、曾霞初、陈敏之、周德炎、

储继都是这时陆续进店的。也是应申出的主意，我们把湖北省委创办的扬子江出版社和长江局正在筹办的中国出版社都同新知书店合并了，党对书店的领导加强了（归凯丰同志领导），得以充分发挥新知已有的成套机构、熟练干部、带有全国性的发行网，为党更好地完成出版发行的任务，使党可以免去另组干部、另筹资金的种种困难。总计在武汉六、七个月，我们出版了新书几十种，开设了包括香港办事处在内的十几个分店。我的组织关系不在店内，店内党的工作由应申负责，由他把同志们的政治思想情况随时告诉我，以后一直成为一种制度，以适应国民党地区的特殊环境，而我们互相配合，融洽无间，从来不曾僭事。这多半由于他的高度原则性和作风正派造成的。

8月，武汉紧张了，我们共同商定，总店迁桂林，应申前去筹备，将来由他坐镇；派钱歧同志押运纸张书籍随同《新华日报》先去重庆；随后得知钱歧在中途遇炸殉难，又派徐律前去筹设重庆分店，我将有较多时间在重庆，以便接受南方局的领导，办理中国出版社业务。9月底我们撤离武汉，10月间我绕道到桂林时，应申已经把一切都妥善地布置好了，还开设了门市部，并且已经出书了，足见他的工作效率之高！

应申在桂林待了两年多，充分利用当地较好的条件，在姜君辰、邵荃麟等同志帮助下，几乎每月都有新书出版，这为当地进步文化界生色不少。也用按月预支稿费的办法约一些同志写稿，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稿子落空，书店固然受到损失，但应申注意照顾大局，每每不加计较，帮助了一些同志解决实际困难。1939年书店开始受到摧残，金华、丽水、衡阳、湘西等地分店先后被封闭，货物被没收，经理被逮捕；因封店撤到桂林的干部要安顿；被捕的同志要营救，应申紧紧地依靠八路军驻桂林通讯处党的领导，妥善地加以处理。党还先后给我们输送一些撤退到桂

林的党员来新知工作，应申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常说：“一个革命者，在任何困难面前，没有消极悲观的理由”。因而越困难，越能把同志们团结在一起，做好工作，并在工作中不断审慎地发展党员，使支部真正起了巩固的堡垒作用。尽管环境险恶，生活艰难，但全店士气旺盛，精神面貌很好；我每年从重庆到桂林时，可以一目了然地感觉到店里每月要开一、二次时事会，有时还请夏衍、范长江等同志来做报告。每周有读书会，一个时间学习《联共党史》，还逐章书面测验，应申同大家一起受测验，做答题，所以大家学习情绪很高。书店虽是做生意的，但又是革命的学校。这个小小的队伍，党员大体占一半以上，非党员也多半是有理想的革命青年；所以队伍虽小，战斗力颇强，一个人顶几个用，而他们的头头就是应申。

1940年冬天，我到桂林，各自根据党的指示，共同预筹应变之策，并且成夜地打包，转移存书。这时，分店只剩下桂林、重庆、昆明、贵阳四处了。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爆发，广西当局也放下面纱，真相渐露了。昆明、贵阳先遭到封闭，桂林迫在眉睫。当时知道，应申已被列入黑名单，随时有被捕可能。我们商定：他尽速离桂，打前站去上海，准备必要时转移到苏北敌后，我留下料理后事。当月，应申抛下他的爱人储继和1岁的孩子走了，是循着一条最辛苦但最省钱的路线走的。他对花公家的钱，一文如命。4月间我到上海时，他已经支起了泰风公司，作为和大后方及香港联系的公开机构；同时出《苏联文学丛书》，短短几个月，就出版了五六种200余万字，梅益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丛书之一。这些书，在当时租界的特殊环境里还是可以出版的。当我们共同商量用什么书店名义出版时，最后定为“远方书店”；我们身在“孤岛”，而瞻望着远方——圣地延安。

我住在新知书店办事处，这里一向是秘密的，主要印刷中国

出版社的书，甚至《中国共产党党章》，也前前后后成万本印刷，秘密地出卖。当时，汤季宏同志负责秘密地给苏中、苏北、胶东根据地供应书报，采办和偷运敌人禁运物资。我不让应申他们到我们这里来，也禁止季宏等到应申那里去，以免牵累他们。但这些同志迫于工作需要，有时利用泰风公司，应申也乐于帮助他们。由于单方面交通，应申常常有急事找不到我。我这种决定对应申而言是不恰当的，但他从未抱怨过，至今想来，我还感到惭愧和不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租界后，我们不能再干出版工作了。经商定，撤销公开机构，应申先去苏北根据地，我留下，组织存书秘密转运去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地区的店，交沈静芷负责。次年2月，他同恰巧从苏北来上海采购物资的王益先走了。从此，他离开了新知书店。

次年夏天，我辗转飘海到了苏北新四军军部；那时应申在中共盐阜区党委宣传部任出版科科长，兼《盐阜报》编辑部主任，尽管出版工作的物质条件确实困难，但政治条件大好，更加能够发挥他的长处，他的精力饱满，神态奕奕。我根据组织决定，1943年也到了苏皖边区，在华中局工作，从此改行做财经工作了。而应申呢，此后创办了华中新华书店，领导了山东新华书店、北京人民出版社，直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结束为止，他一直从事党的出版工作。他从1935年创办新知书店起，前后20年之久，全心全意地为了党的出版事业，贡献了他的智慧、忠诚和力量。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我们不然。无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苏皖边区政府的淮阴，还是在解放战争中在山东益都，我们都谋求见面的机会。全国解放后，他在北京，我在上海，每次来京出差，公毕一定到东总布胡同同他畅叙别情，那怕半小时也行。我

总渴望见到他那纯朴的、才不外露而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力量的形象。1952年秋，我也调到北京工作，还是常去看他：“安得促席，说彼平生”。一种内在的力，吸引我去看他。

然而1978年再见后，他不久即陷入肺癌这不治之症。他象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同痼疾勇敢地斗争，并留下了深深启发我的遗嘱（诗）：

效法杨老（杨东莼），
改革丧事套套。
什么向遗体告别——
千万别搞。
死了赶紧烧掉，
骨灰不留——作肥料。
也不要到八宝山追悼，
本单位开个小型座谈，
工作检讨，生活检讨，
缺点错误也不饶，
不是光说好。

4月14日我出差去成都，行前告别，他神志清醒，精神尚好，我以为回京一定可以再见。5月3日返京，谁知他早一天去世了。如果有上帝的话，我真愿向上帝祈求，让应申能活到7月1日，听一听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听一听胡耀邦同志在党的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应申就有福了。在两年多的痼疾煎熬中，他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一直十分苦恼地反复地驱使已经不太听话的脑神经思索问题。现在，历史的功过和经验教训已经分明，航道更加准确地拨正，10亿人民正在光明大道上稳步前进。应申，你安息吧！

（原载《读书》1981年第10期）

回忆潘汉年同志二三事

潘汉年同志逝世已经六年，比他年轻的他的爱人董慧同志逝世也四年了。他们都是在不正常的条件下离开人世的，但他们有幸在活着的时候，亲眼看到林彪、江青、康生之流，被全国人民所唾弃，被置于历史的审判台下。汉年很有政治远见，遥想他那时已经深信自己的冤狱一定会得到平反。可是二十多年牢房里冷酷、阴暗的折磨，严重地摧残了他们的身体，以致过早地离开他们所热爱的人间生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终于在1982年8月23日正式为汉年同志彻底平反，并对他的革命的一生作了恰如其分的高度评价。我相信汉年若地下有知，也会得到安慰，受到鼓舞。

对汉年，我是心折已久的，但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才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他通过王昆仑同志，要求沈钧儒先生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我曾长期在全救会工作，所以党派我去执行这个任务。临行前，汉年约我在钱俊瑞同志家里谈话，教导我在工作上应当注意哪些方面。我问到如何同组织保持联系时，他分析了蒋冯之间的关系，说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对冯有此任命，无非想利用盘踞山东的韩复榘是他的旧部，便于解决韩复榘对抗战的暧昧态度。汉年估计冯很难达到目的，难安于位，所以

他决定我的关系还是保存在俊瑞那里。并说，只要冯能站住了脚，组织一定派人来同我联系。这次谈话就这样简短明确地解决了。果然，我匆匆忙忙赶到河北省桑园镇冯的司令长官部后，正和李紫翔同志等打算筹组政治部，不久就撤到济南，又辗转到平汉路待命，接着冯玉祥就被明令撤回南京。我回到南京后，根据钱俊瑞的通知，又去另行执行党分配的任务。这时，我才体会到，汉年对蒋介石及其内部矛盾百出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决定问题这么恰当。

在这以后，我和汉年一直没有什么联系。直到1943年我到位于苏皖边区盱眙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时，才重新遇见他。原来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们撤退到苏皖边区的淮南根据地。军部、华中局迁来后，刘晓、刘长胜和潘汉年分别担任过城市工作部、联络部部长。一天，汉年突然把我找去，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已有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华中局已经决定把我分配到联络部工作。我聆听之下，大出意外，因为我从来不曾接触过这类工作，自知绝少随机应变的本领。他看我态度犹豫，就给我做思想工作。当时，党内的风气，对党的工作分配是不讲什么价钱的，我也就同意了。

从1943年到1944年冬他奉命去延安参加“七大”为止，在这一年多期间，汉年不曾离开过根据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关系，并同他在上海领导的单位的几位负责同志接洽工作。大约每20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我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报中央的或通报所属各师的电文，由他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对于这些，他一般都是认可的。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犯了某

些错误的同志所采取的公正态度。

当时有位同志奉命作汪伪政府中东北军人的工作。这时（约1944年夏）汉年在上海领导的单位发现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时举止失措，对党交给的任务执行不力，担心他会被敌人所欺骗，要求汉年及时作出决定。汉年对我说，这位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培养教育出来的，过去工作不差，决不致投敌叛变，但如果组织上不及时给予帮助，也许会被敌人欺骗而上当。汉年要我趁巡视上海单位之便，设法把这位同志动员进根据地，以解除上海组织的后顾之忧。我知道这个任务是相当重要的，但相信汉年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有办法说服他服从组织决定，所以就一口同意了。到了上海处理完了组织内部事务后，我便单枪匹马找到了他，看到他确实憔悴落拓，精神不振。我告诉他，汉年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关心他，希望他进根据地学习。我的话并不多，但态度直率，完全信任他。这位关东大汉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别妻离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交给了汉年，他跟这位同志细细谈了两天，便送他去整风班学习了。汉年告诉我，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后这位同志继续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汉年能够亲自调查处理干部问题，耐心帮助干部提高思想认识，把他们和党的关系重新端正，这就鼓励了干部或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奋发图强和为党工作的信心。汉年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干部，驰骋在敌人的心脏里，为党作出重大贡献，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诚地对待同志。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全部机构，因汪伪特务混入而被彻底破坏。被捕人员中有一位和汉年的工作系统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汉年的爱人董慧同志（汉年进根据地，她仍在汉年所领导的上海组织内工作）。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有关组织，

必须迅速处理。除了有必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之外，还要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推动一个大的文化汉奸出面营救。汉年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奸的变幻的经历告诉了我，并教导我如何去同这个汉奸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并要我直认不讳地说明自己是新四军来的，这样他反而会卖帐，愿意出面营救。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了董慧。她安详地对我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这就使我放心了。然后由那个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奸在他家中见面。果然不出汉年所料，当我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是从新四军来的之后，马上引起他肃然起敬。等到我根据汉年的教导，入情入理地劝他出面营救被捕人员，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时，这位汉奸觉得话说到他心眼里，表示一定负责出面营救。其后这个案子较快地结案，全部人员获释，虽则原因很多，但也不能说这个汉奸没有出了一把力。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央电令汉年出席“七大”，行前他告诉我，由刘长胜同志临时兼代联络部部长，要我多出点力，帮助管好部里工作。因为我本来早已在华中局政策研究小组里兼任研究根据地财经工作，组长是冯定同志，这部分工作归曾山同志领导，所以我忙了一些。接着，汉年跟着华中局交通员往西北方向出发，准备在津浦路管店站上车，直奔北京（北平），转入晋察冀根据地去延安。去了快二十来天，我们都以为他早就到了目的地了。一天，华中局一位领导突然找我去，说中央来电，晋察冀派出的交通员，到北京的旅馆找不到潘，已经离开了。想来潘一定去了上海，要我马上去上海，催促汉年快跟新派交通员走，直接到晋察冀。言下之意，有些怪汉年留恋上海。我到上海，在一个豪华的公寓住宅里，找到了汉年。我向他说明来意，并说，你好大胆，不怕怪你“自由行动？”汉年微笑着说：讲定十天内

晋察冀派交通员来接我，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在北平举目无亲，十分陌生，得不到地方党帮助，也没有社会关系掩护，老住在旅馆里，岂不暴露在敌人眼下，所以只好南旋上海，在这里，我是如鱼得水，最安全不过了。我相信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把带来的交通员约定的地点向他交代后，便回根据地，把经过情况向华中局那位领导人作了汇报，他才没有话说。这次，汉年顺利到达了延安，参加了“七大”。

不久，1945年夏初，华东财委成立，我调到财委工作。尽管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全国解放后，无论在香港，还是在上海，和汉年同志往来较多，但是，1943年至1944年我和汉年同志在华中局领导下工作的一年半这段时间，仍旧值得时时怀念。汉年同志在对敌隐蔽斗争这一特殊领域里，机智勇敢，才华横溢，善于掌握出奇制胜的斗争艺术；他对干部的了解、信任，并善于发挥干部积极性、主动性的领导方法；以及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入污泥而不染，对党无限忠诚，坚贞不渝。这些美德永远值得我学习。

汉年同志，安息吧！

(1982年11月9日)

学习孙冶方同志的崇高的 情操和品德

冶方同志逝世已将一月，万千思潮，不知从何说起。居则坐立不安，行则忽忽如有所失。是的，已经永远见不到他了，但有时觉得他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他在经济学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将有学术讨论会来讨论评定；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操品德和战斗生活所形成的崇高形象，永远矗立在我的面前。

我认识冶方，是在1934年，当时全国正处于革命低潮，留苏回国学生的大分化看来已经结束。冶方同志在留苏期间被王明虚构的“江浙同乡会”案受到无情打击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930年遣送回国，由于王明的排斥打击失去组织联系。此后，他一次次地找党，而且对党的事业作出有凭有据的贡献，但是一次次都被拒绝了，被关在党的大门外。不管白色恐怖疯狂地镇压着上海革命人民，真是处于出生入死的境地，但冶方对党忠诚不贰，坚贞不渝，效死不去。他在陈翰笙先生的帮助下决定拿起笔来，为宣传党的革命路线、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斗争。他隐姓埋名，过着秘密工作者危险而又清苦的生活。这种崇高的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赢得我由衷的钦佩，从而建立了50年来的友谊。当时冶方和钱俊瑞、薛暮桥等同志结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了《中国农村》月刊；在一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给中国托派的错误理论以歼灭性的打击。在这场理论斗争中，由于冶方同

志的理论基础最为深厚，他的贡献特大，这是同志们的一致评价。

“皇天不负苦心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冶方同志终于被上海地下党组织恢复党的关系。一件冤案终于水落石出；他以赤子之心，终于回到母亲怀抱。

1940年秋，他从上海绕道香港到了重庆。一天，他突然来看我，并告诉我说，奉调去延安。当时正处于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夜，重庆到延安的交通障碍重重，冶方寄居哥哥家中，深居简出。不久，我出差在桂林。1941年二三月间，他突然来到桂林，住在我处。原来皖南事变后形势更加紧张，周恩来同志决定他终止北行，折返上海，转入新四军工作。看来他对这一决定很为满意。我们一同到了上海，他就去了新四军，做党的教育工作，受到少奇同志的重视。当时冶方给少奇同志提出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提倡经验主义，贬低理论学习的问题，尽管少奇同志肯定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写了著名的《答宋亮同志》，但对于冶方同志，究竟是祸是福，还很难说。“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帽子，挨尽了批斗侮辱之后，终于锒铛入狱。1975年他释放出狱后便来看我，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对他诬陷入罪的内幕，但是他只认为是康生之流的播弄，而对于党豪无怨艾情绪。冶方就是这么一个人，开除出党也好，怀疑审查也好，逮捕坐牢也好，他对党从不动摇，从不失望，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永远为党的利益进行战斗。这种高尚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典范。

对名利恬淡处之。这是冶方同志美好品德的另一个方面。即使“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他还是默默无闻，写了文章，没有地方敢于接受发表。直到1978年，是胡乔木同志把冶方发掘出来的。一次次找他谈话，给他鼓励和支持。他告诉我，乔木多次要他回

经济研究所工作或者去世界经济所工作（当时还没有所长），但是他都谢绝了。他说，自知没有行政才能；但他爱经济研究所，愿意在经济研究所当个顾问，好在研究与写作上多花些工夫。但他这个顾问，并不是闲官，凡有事，奉命必到，到又知无不言，言必尽意。治方是个学者，但十分关心政治，热爱人民事业。有关重要的政治活动，他都积极参加，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常常对我说，牢也坐过了，我又无子无女，还有什么可怕的，也没有乌纱帽可丢，该说的话，我一定得说，决不应畏首畏尾。这是共产党员应尽的天职。同时，他对于学术界的晚辈、年青人登门求见，无论识与不识，无不竭诚接待，听取意见，尽管花费许多精力，但他乐此不疲。他提倡学术民主，真心诚意欢迎别人反驳他的文章观点。对于青年人所写文章，主张只要有三分新意，便要尽量给以发表机会，不要求全责备，一棍子打死。他还常常对我说，我们这些所谓经济学家，实在是“次品”，一不懂自然科学，二不懂数学，盛名之下，实在惭愧，我们都要从头学起。我所说这些有关治方同志的作风情操，表面看来平淡无奇，但是象治方那样，不是放在口头上而是毫无矫饰地成为自己天然的性格，这也算得是难能可贵了。

遗憾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论》没有完稿，他就逝世了。严格说，1979年9月他在首都医院动了手术，医生断定他已患了不治之症，象奇迹般恢复过来之后，这本书，才加紧动笔的。半病半起地经过二年，到1982年春《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的初稿大部分已经起草成，大致20万字。他动手修改，然而进度很慢。他告诉我说，自己口述，别人执笔写成的东西，总是不惬意；文章，必须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的；看来这有些手工业作风，然而生性已经改不过来了；这本书，已成的稿子，要推倒重写。他对现实生活的兴趣是那么浓厚，总是被吸引去写一些

“杂文”；白天接待宾客之余，要到晚上才能写这本书。他已经70多岁了，癌细胞的繁殖每时每刻在折磨着他的生命，他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支撑得住来写这本书啊！到去年，我不忍心再劝他集中精力写完这本书了。他对党的事业，具有无比的责任心，让他在可以屈指计算的有限的日子里，写他所想写的文章吧。是的，他在临终前三个月，靠输液、输血维持生命的时间里，写成了最后一篇著作《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我们也不至于责怪他终于不曾写完《社会主义经济论》，这是不得已，而不是由于他放松了自己。这一未完的作品，只能期待生前协助他的几位亲密助手根据他的遗稿、提纲等经过赓续和整理来完成了。这是何等令人痛心！

（原载《经济研究》1983年第4期）

缅怀于毅夫同志

1936年11月，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七君子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悍然逮捕之后，我们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当干事的同志如胡子婴、何伟、吴大琨等人，正忙于组织营救工作。一天，突然得到通知，要我代表全救会去接待从北平（北京）来的东北救亡总会代表于毅夫同志。我在八仙桥青年会宿舍找见了。他热情地告诉我，华北各界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营救沈钧儒等七君子的情况；说到东北救亡总会高崇民、阎宝航等先生包括毅夫同志本人如何在东北军将领中积极开展爱国救亡活动；说到张学良将军积极响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赞助全国各界救国会全部爱国救亡的政治主张，并已在努力营救沈钧儒七君子等等情况。毅夫同志的一席话，确实给当时因为领导人被捕、工作处于困难境地的我们，以有力的激励和鼓舞。是的，从表面上看，当时蒋介石正以数十万大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磨刀霍霍，妄图一举歼灭陕北中央红军，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逮捕了人民爱国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黑云压城，其势汹汹；然而全国人民的爱国救亡高潮，正在汹涌澎湃，任何与之对抗的反动力量，都将被粉碎。果然，震惊中外的“双十二”爱国事件不久就爆发了。在我党中央正确政策的启导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爱国行动，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救国方针，从

而为全国“七·七”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张、杨两将军对祖国和人民作出了自己的伟大贡献，这期间，毅夫同志也尽了个人的努力。

抗日战争的头四年，无论在武汉，在重庆，我和毅夫同志过从较多，他始终在东北救亡总会工作，和救国会的同志们并肩斗争。他靠写文章维持艰苦的生活，而将主要精力花在组织爱国抗日统一战线方面，团结朋友们、同志们，和国民党中反共投降顽固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善于团结人，是他工作作风的一大特色。

皖南事变后，毅夫同志也撤到了香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我一时不知道他的下落。1943年春，我到了新四军淮南路东军部，那时他刚到不久，他被分配在新华社华中分社工作。我们比邻而居，日夕过从。这时我才知道，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他辗转到了上海。他说：“在日本侵略军刺刀下的上海生活，我受不了，我渴望着解放区的自由大地，梦想着和劳动人民一起为争取祖国自由解放而战斗。党终于接受了我的请求，批准我到了这里。现在我感到多么愉快，多么幸福啊！”说到这里，这位身材魁伟、厚道持重的如我兄长般的同志，象个孩子似地憨笑了。

延安提倡合作社运动了。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要我和毅夫同志一起去淮南路东地区最大市镇之一的半塔镇合作社及其附近农村作调查。我们背上背包，步行前去。毅夫的背包显得没有我的轻便利索，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的腰有病，所以一直带上一块狗皮褥子，这次也只能带上，否则，睡在草堆上，恐怕又犯病了。我要和他换背包背，他坚决不肯。步行五、六十里，到了半塔镇，住在合作社里。这个合作社有油坊、粉坊、门市部，它的事业颇具规模，几乎占了半个镇。社主任王德同志（这个名字记不准了），给我们详细介绍合作社的历史、经营管理和社员群众的血肉关系。这位手工业工人出身的经济工作基层

干部的精明干练，谙熟业务，赢得毅夫和我的赞叹。两三天后，我们到附近的一个乡进行分户调查，住在贫农家里，晚上睡在泥土地上，这时毅夫的狗皮褥子就大显“神通”了。当时淮南路东正逢春荒，政府大力救济，我们在贫农家中吃派饭，吃的就是豆饼煮芥苳菜（一种野菜，有毛，但无毒）。无论开调查会还是作家庭访问，毅夫同志三言两语就取得农民的信任，得到第一手材料。我是自叹不如的。十多天后，我们“满载”而归了。

当时，我们的机关是高度精简的。但包括军政治部连同勤杂人员，也有100来人（警卫连在外）。公余之暇，潘汉年、刘晓、刘长胜、范长江、李亚农和我们这些人，常常玩“打傻瓜”消遣，毅夫同志是不参加的。日子一久，我忽然发现，毅夫不但和青年干部厮熟，连炊事员、饲养员大多数人都能提名道姓，相当亲热。驻地周围三五里内的农民家庭，他穿门入户，叙谈家常，像自己的亲友一样。夏季，天日长，晚饭后我和他一起去拾粪，路上碰到老乡，老的少的，大多能叫声他“老子”，有时还指点我们那个方向有粪。记得有一天，两个中年农民，邻居失和，竟跑到毅夫处请“老子”为他们评评理，毅夫七说八说，两个人就和好好地一块回去了。毅夫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令人感佩。

毅夫当时按团以上干部待遇，分到一匹马，但却是一匹名副其实的“老马”，鞭子对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大家劝他换一匹，他不肯，说有“情况”（指与敌人发生战斗），要出差，它能帮着驮些行李就行了，走路还得靠自己的双脚。他的爱人杜贵绂同志，在离我们驻地10来里外的一个农村小学里教书，生活比我们还要清苦得多。他们俩由同乡而结婚，一直形影不离，患难与共，这时毅夫也严格按规定只在星期六下午或者星期日，才步行前去探望她。

1943年到1945年春，我和毅夫同志在一个整风小组学习。他

对自己的出身、经历、思想根源的剖析是严正的，对别人的错误、缺点，进行诚恳的帮助，发言中肯，从不夸大打击。我个人尤其感谢他的帮助和教育。言教不如身教。毅夫出身于黑龙江的一个世家望族，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教育下和革命生活的锻炼中，他完全变成劳动人民的一分子，成为严格执行党的政治思想路线、恪守组织纪律的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了。

为了同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毅夫同志被选为华中的代表之一。但不久，抗日形势有了重大发展，延安之行推迟了。紧接着日本投降，新四军为解放敌伪侵占下的大小城市而浴血奋战。在新解放不久的淮阴城里，一天，毅夫来向我告别说，党中央调他回东北，去参加建立东北解放区的工作。我一面和他恋恋惜别，一面深庆党中央知人善任。要知道，东北解放区的发展壮大，将对全国革命胜利起战略性的伟大作用；毅夫回东北，无疑比在华中更能作出较多的贡献。我高高兴兴地送他们一家上道北行。

以后，他在嫩江省省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任内，我们仍有往来。特别在北京时，他在业余之暇，还对农业有很大兴趣。他常到通县双桥国营农场去，有个星期天还带我去参观过。以后，我就多年失去和他交往的机会，只能在报纸上知道他调到吉林省工作。直到1978年他借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之便，在贵绂同志帮助下，扶病来找我，前后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我住的小胡同。我偏巧又不在家，我多么感谢他对我的深情厚意啊！

以后，他从从化养病回来，住在北京医院时我才有机会见到他。这时，我们已有二十四五个年头不见了，尽管他只字不谈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但他的耳朵已经非常背了。我

又是一口宁波土话，靠笔、靠贵族的翻译，我们才能交谈。他对我说：我对党已经不能贡献什么了，但开会我还是一定要来的，在表决时我举起手，表示我对党中央三中全会后的正确路线的拥护，也算尽了我的一份心吧！后来，萨空了同志告诉我，毅夫来参加会议，那怕身体很不好，那怕是小组会，也非扶着去赴会不可，真是认真啊！他就是这么一个认真的人。

毅夫同志逝世已经快半年多了，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毅夫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负责，这种崇高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衡老把一生献给伟大的祖国

——关于衡老领导救国会活动的片断回忆

1983年是沈钧儒（衡山）先生逝世20周年，后年1月2日是先生诞辰110周年。先生把他的一生90年的漫长岁月，献给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社会的进步、民主和人权的维护事业上。先生从清朝进士，到立宪运动、到推翻皇帝、到参加政学会和主张联省自治，然后形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大飞跃，信奉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中的坚定的左派，同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斗争，同蒋介石法西斯卖国政策斗争，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野心斗争。从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先生终于信奉了社会主义，相信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1935年全国人民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先生投袂奋起，破釜沉舟，推动和促进这一群众革命运动，团结了广大的社会人士、爱国群众，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救国联合会，在蒋介石统治区形成了一个拥有广泛群众的革命团体，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并积极参与了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先生一生走的是一条曲折崎岖的道路，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建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以惊人的无比毅力，身体力行，探求摸索，孜孜以求，唯善是崇。一经找到了真理，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则数十年如一日。通缉也罢，坐牢也

罢，高龄体衰也罢（1936年先生为了救国会而被捕时已是62岁，一天也不断地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生死斗争，直到全国解放时已达75岁高龄），贫窘困顿也罢，决不动摇，决不消沉，愈战愈勇，愈斗愈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全国解放到1963年89周岁逝世为止，没有一天以功臣自居，养尊处优，而是保持书生本色，严格要求自己，为人民效力，为祖国尽忠，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定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的道德品质，毫无名利思想，他的谦虚克己，平等待人，真诚地表里如一地团结一切同志和朋友的非凡作风，使得曾经同他接触过、共事过的人，永远怀念在心，树为楷模。衡老是我心中最为尊敬、最为崇拜的一位革命长者。

我生也晚，很少知道先生早期的政治活动。50年代中期起，因我个人的遭遇，同先生又睽别数十年，这一时期的情况，也所知不多。在这篇短文中，我只回忆和叙述一二件小事情，通过它，也许足以反映一个伟大人物精神面貌的一鳞半爪。

1926年冬天，浙江杭州工业专科学校学生，因为反对校长的专制高压、不学无术而引起学潮，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镇压学生。由于先生曾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省议会议员，同情青年学生，慕其盛名，工专学生宋侃夫同志（其时为共青团员）同我一起去谒见先生，我冒充杭州学联代表。我俩当时都才10几岁，先生平等相待，热情延见，表示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至今事隔几将60年，我们都已70多岁了，1983年春在杭州党史座谈会上，侃夫同志还专门给我谈到这件事，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当时（1926年秋冬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在我党领导下工作，主要负责人有宣中华、潘枫涂、郑采臣等同志，衡老和他当时的密友褚辅成（慧僧）先生是国民党左派，中华同志同他们建

立了经常的联系，以反对北洋军阀孙传芳，为北伐军进克杭州作了准备。1927年1月7日在宁波鄞县召开了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及省政务委员会成立会。2月17日北伐军东路军进抵杭州，省城光复。2月20日衡老等抵杭，又开会推选政府委员，最初褚辅成先生曾兼代理主席，此时宣中华、衡老与褚辅成先生都被选为省政府委员，衡老兼秘书长。宣中华同志代表党经常同衡老等交换意见，商讨大事，共同对付当时以蒋介石为后台的国民党右派张静江及西山会议派的各种破坏反动活动。“四·一一”杭州反革命政变前夕，宣中华同志还同衡老他们商量时局问题和应变对策，真是亲密无间，荣辱与共。可以明确地肯定，衡老当时同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互相信任和共同战斗的革命友谊。杭州“四·一一”反革命政变后，浙江省政府临时委员会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均受到蒋介石反动派的武装袭击，被强制接管，宣中华同志旋即被捕牺牲，先生亦在杭州被扣押7天，面临枪决危险，后押解去南京，经人营救，始得释放。此后大致有10年之久，我同先生没有任何往来。

1935年12月27日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会上，我远远地看到先生，但也没有去求见。到四五月间，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联合职业界、妇女界等救国会决定出版《救亡情报》不定期刊，作为自己的机关报，组织上派我去主持这个半公开的半合法的报纸，有恽逸群、陆诒、刘群三位同志共同工作。当时王造时先生是文化界救国会的宣传部长，我们每期稿子编好后，由我亲自送给造时先生审阅，有关报纸的经费筹措等等，则常常请示衡老，得到他的帮助。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礼堂举行，我奉命去作大会的记录。会上先生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先生留我在组织部当干事，这样，同先生接触的机会便多起来了。

救国会的领袖们有公开的办公地址，住所也是公开的，他们又是社会著名人士，这就大大加强了救国会的公开性和合法性。但我们也很小心，同时还租赁一二处房子作为秘密办公机关，以防敌人突然袭击。全救会组织部当时在成都路威海卫路口一个里弄里租了一间前楼，华南代表洪懿、石不烂，武汉代表何伟以及先生等也常来，我们向他报告各地救国组织的来信，交换各地救国活动的情报，先生总是抱着极大兴趣倾听我们的汇报，作出必要的指导。当时与各方面上层关系的联络工作，多半由先生等亲自主持，我们这些人多做群众性联络工作。先生听到各地爱国群众惨遭反动派压迫逮捕，常常义愤填膺，一再抨击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我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极表赞同。有一次，他对我一个人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要知道当时长征方停，疲兵饥卒，不及万人，踟处陕北一隅不毛之地，所谓“有识”之士，已在纷纷预料红军必将消灭无疑。蒋介石也是自信“剿共”已经必胜了。衡老的话，是多么有远见，多么洞识国情啊！他把挽救祖国的一切希望，放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显然，以沈衡山先生为首的救国会，在其成立时及其全部活动中，都是完全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或配合党的活动而工作的。这是它同左舜生、李璜、张君勱等等有本质区别之处。

1936年是“九·一八”五周年纪念。由于国民党的“安内攘外”反动政策，这时冀东“自治”卖国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半卖国政权也已先后成立，日本正驱使伪军李守信部在绥东侵犯，以策应德王在内蒙古搞独立，整个华北危如累卵，日寇全面发动军事侵略我国的形势，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而国民党正大举向西北集中部队，醉心于一举消灭我长征后抵达陕北的红军。这是一个正在走向历史的转折关头的前夕。于是以衡老领导的各救国会决定筹备盛大纪念“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以发动群

众，推动时局进展。1936年9月13日的《救亡情报》上，刊出了衡老署名亲笔写作的文章《怎样纪念“九·一八”？》。文中提出六点，号召各学校停课，各工厂停工，各商店停业，各教育机关、各公私团体联合组织所在地方，各自召开纪念“九·一八”大会；各文化机关，用各样各式方法，无论文字、图画、播音、演讲作种种有力的宣传，并请每一个人在那天默念“我是中国人！”“我怎么救中国？”

按照救国会的部署，联合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记者公会、律师公会等20余团体于9月18日当天下午3时，到沪西漕河泾地方，举行“九·一八”五周年纪念碑奠基典礼，由衡老等出面联络杜月笙、钱新之、黄炎培等与上海市当局接洽同意，各情并已在上海见报。但在前一天上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突然通知，禁止举行是项奠基典礼。衡老得悉之下，曾到我家来通知我，他决定亲自再一次去看杜月笙，争取继续举行典礼，约定下午2时我在大世界附近一家饭店里听候他的回音，我则向组织报告情况。下午2时在饭店里，衡老匆匆前来，告诉我，杜月笙不敢违抗市政府的决定，拒绝参加。救国会怎么办呢？衡老决定当晚举行紧急会议。

9月17日晚7时左右，会议是在愚园路衡老的长子沈谦医生家中举行的，到有救国会代表30余人，就“九·一八”纪念典礼是否抗拒上海市政府的禁令，由救国会单独举行，展开剧烈的讨论，衡老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到午夜，终于得到一致意见，决定单独照常举行。于次日（9月18日）下午2时，群众集中到十六铺码头，等衡老车到，取下宣传品，立即编队向漕河泾前进。并指定胡子婴（妇救）、我（文教）、姚士彦（职教）三人于次日上午先踏看自十六铺到漕河泾的游行路线。

9月18日上午，子婴同我们一起坐了章乃器先生的汽车去绕

旧城踏看了线路后，向衡老作了汇报。下午2时，参加的群众纷纷集中十六铺码头一带，眼看衡老的小汽车来了，衡老下车了，我与其他几位同志准备靠拢汽车，取下宣传品，突然，四周埋伏的警察，包围了汽车，把所有的宣传品都没收了。这时群众簇拥着衡老、史良等领导人西向漕河泾前进，形成了一列几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是年已62岁的衡老，美髯飘飘，庄严肃穆，显得正义凛然，体现了中国人民是不可欺的勇伟气概。

队伍是在法租界的巡捕行列和中国军警队伍夹击中间前进的。当走到老西门附近时，埋伏在四周的国民党军警，挡住了去路，肆意殴打冲击爱国群众。妇女界救国会的女同胞受打击最重。史良先生为救护其他女青年，也被击受伤。为了避免造成更加惨重的血案，在群众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声中，有秩序地分路地将游行群众解散了。

事后，发现姚士彦是国民党派来混入救国会中的特务分子。

9月19日下午，救国会招待新闻界及各刊物记者开会，由衡老亲自沉痛地报告9月18日惨案的经过，前后历1小时余。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为上海市民纪念“九·一八”发生惨案告同胞书》，要求彻底调查血案真相，严惩负责官吏，立即释放被捕爱国群众，赔偿此次受伤人民损失，要求爱国自由，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告同胞书》中特别揭露了国民党当局蓄意制造此次惨案，其目的在于“借口解散各救国团体”。这是一针见血的话。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之侵略行动越加紧，国民党投降卖国扑灭群众爱国运动就愈加不择手段，不识羞耻。果不其然，仅仅过了两个月，11月23日清晨，国民党反动派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将衡老与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七先生逮捕，罪名是“抗日救国”。

但是压迫愈烈，反抗愈强。全国各界纷纷组织后援会，宋庆

龄先生千余人先后到苏州高等法院，投状表示，如果救国有罪，则自愿与救国会七君子等一起入狱坐牢。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爱国将军在西安举行兵谏，囚禁了蒋介石，其所提出条件之一，就是立即释放爱国领袖沈钧儒等七先生。

衡老等七君子被捕后，我们救国会的工作确实增加了困难，但工作继续在扩大，在发展。1937年的五六月间，全国救国联合会总干事会推举我去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探望衡老等七君子。我的母亲陪同我前去，由于我母亲也姓沈，所以我就冒充是衡老的外甥。我见到衡老及韬奋、乃器等先生后，向他们汇报了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工作，和张、杨“双十二”事变后国内救国形势的发展和延安方面的消息等等。衡老平静、和谏而又严肃地对我说，要我转告同志们，不要耽心他们的安危，他们一定坚持斗争下去。要我们在外面的人，加倍努力，扩大力量；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危机已迫在眉睫，监狱内和监狱外的朋友们很快会汇合在一起，走上抗日的最前线。事隔至今几将55年，当时衡老坚定的语气和乐观的态度，犹在我的耳边眼前。

果然，接着就发生“七·七”事变、“八·一三”全面抗战。国民党被迫释放衡老等七君子。一出狱，衡老就投入抗日斗争了，投入同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的极其复杂的工作中，直到抗日胜利，全国解放。

伟大的革命老人，永无止境地为祖国和人民事业奋斗终生的沈衡山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头。

(1983年11月13日)

韬奋同志对中国出版事业的 伟大贡献

1984年是韬奋同志逝世40周年。缅怀往事，不禁心潮汹涌，不能自己。

韬奋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政论家、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一位现代中国史中最伟大的出版家。他的热情奔腾迸发出生命火花的如椽巨笔，和他领导创办的遍及后方与前线、国内和国外的生活书店出版事业相结合，才能使他在30年代、40年代前后10余年间，成为全国爱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形成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宣传堡垒，在抗战前后时期，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成长发展。

韬奋经营出版事业，有正确的方向和指导方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民族解放前途、对大众解放前途，尽一部分的贡献”。他自觉地把他的出版事业，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革命，所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爱护拥戴，也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深恶痛绝。当他的出版事业强大到足以妨碍国民党的统治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使用反动的两手政策对付他，一是收买，要和生活书店搞合营；二是收买不成，便封店捉人，一网打尽。韬奋软硬不吃，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后，1941年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内50余家分店，被封闭得只剩下重庆一家，韬奋眉头也不皱一下，辞去参政员职务，冒万死秘密出走，转移

阵地，继续战斗。这是大智大勇者之所为，把10余年惨淡经营而形成规模巨大的出版事业，完全贡献给祖国人民了。韬奋说过，把他的出版事业，办成“有益于大众、有益于革命的文化事业，只有这样的进步文化事业，才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一同进步（就另一意义说，同时也是时代的推动力）”。韬奋这种不断求进步的思想，不但反映了韬奋一生的行为实践，也体现在他手创的出版事业中，并且确实成了推动时代前进的动力，使韬奋本人和他的出版事业，永生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中。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事业、一个人，如果一旦囿于既得成就，故步自封，沾沾自喜，不能随着时代滚滚潮流，弄潮前进，那他就将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韬奋对他的出版事业的结晶——出版品，名曰“精神粮食”，对于自己的出版品，是高度重视，十分认真的。他的出版品在内容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对读者在思想上有启迪、教育、鼓舞作用，使青年人在精神上得到滋润、补益，培育成才。生活书店前后出版杂志20余种，著作和翻译名著近千种，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从来不出版无聊的、消闲性的低级趣味的作品，也不出版封建性、买办性的歌颂帝王将相、仁义道德和崇洋媚外的书刊。决不为了市场价值，为了骗取钱财，而降低出版品的水平。这些即使在现在看来，还感到是难能可贵的。他从来是把出版事业当作革命的武器、革命的阵地严肃对待的。

韬奋深知要办好出版事业，要出好书，首先必须重视编辑工作。他把编辑比作“花匠”，精心培育奇花异卉，供人民大众品赏观瞻。他认为“编辑是替作者、读者服务的”，因此自己必须有甘当“无名小卒”，然后才能为作者和读者服务得周到地道。世人都知当作家好，有名又有利，都低看了编辑，认为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但韬奋却到死“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这种牺牲自己，一心为读者服务的崇高精神，正是全国千

千万万优秀编辑工作者的集中表现。韬奋对编辑工作者有严格要求，首先要求编辑工作者应当“大公无私”，“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护使威吓利诱或迁就任何私人的情面而作违心的言论”。他又说过“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编辑自己特别要根绝“情面”观点。就我所亲身知道的，韬奋自己一生，确实是这样实践的；向他所主编的刊物投稿，向他办的书店送著作，都不要托人推荐说情，或者像现在所说的“走后门”、送礼。他完全以文论文，以文会友，威胁无用，请托也无用，真正贯彻了编辑道德。除此之外，他要求编辑工作者要具有“锐敏的观察与卓越的识见”，“思想深入”，“有分析、组织及创造等要素的能力”。他要求编辑能“文笔畅达”，能改稿、能写稿、务使刊出的文章通俗流畅，深入浅出，能为最大多数的群众服务。总之，他十分重视编辑工作，对编辑道德和编辑能力有严格和正当的要求，这些无疑是正确的，是我永记不忘的。

办好出版事业，还必须搞好经营管理，做好印刷发行工作，最终使产品能送到读者手中，发挥其“精神粮食”的作用。编辑、印刷、发行，是三者互相衔接，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韬奋对“造货”（印刷出版）强调计划性，认为“无计划最坏，因为无计划便无目标，更无所谓努力前进”。造货有计划性，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财力物力，千方百计缩短印刷周期，提高印刷装帧质量，努力降低成本，降低出版物的定价，并在经济上壮大自己，能更加广泛更加周到地为读者服务。生活书店采取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在抗战爆发前，它已形成遍及全国和港澳南洋一带的发行网，成为一切进步出版物的发行中心。生活书店的门市工作，尤其特色。抗战前在上海福州路一个三层楼上做门市部，天天挤满了购买本版外版书刊的读者，熙熙攘攘，热闹异常，全上海书店中无出其右者。当时我国四大书店——商务、中华、世

界、正中，都有宽大敞亮位于临街楼下的店堂——门市部，但每每门可罗雀，少人问津。抗战以后，生活书店随着战局的推移，它的门市部——分店，遍及大后方中小城市，所到之处，无不成为读者心向往之的所在。生活门市部的特点是：好书皆备，备书皆好，决不出卖任何政治反动或内容上无聊的书刊，决不提供有毒素的有害精神文明的“精神粮食”，开架陈列，便于读者翻阅选购，完全信任读者的人格和品德。工作人员都能做到韬奋要求他们的对读者应当“诚恳、热情、周到、敏捷、有礼貌”、“不怕麻烦”，百问不厌，千方百计满足读者购买心爱读物的要求；甚至有的地方，把门市部办成阅览室，设置凳椅，供无力购买书籍、只能借门市部阅读的贫苦读者所利用。其用心之周到，令人钦敬。

韬奋在接办《生活》周刊后，1930年就设置了书报代办部，接受读者委托购买书刊报纸，协助外埠及海外读者解决购买书报的困难，并引导读者购买和阅读有益的书报，又给读者以九折或九五折的优待。由于无微不至的服务和卓越的信用，到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生活书店邮购户已拥有近5万户。这样，出版机构同读者建立了密切的直接联系，使进步的发行网几乎可说是无远弗届了。顺便说说，当时我们还通过生活书店邮购科的部分同志，把党所发行的巴黎《救国时报》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救亡情报》，递寄给某些邮购户，从而绕过了国民党的禁锢书刊的网罗。

韬奋同志领导下的生活书店，在1935年时，已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但他对于其他进步的力量较小的出版机构，却采取多方帮助其发展的方针。我当时受党的委托，创办新知书店，去找韬奋同志，他就伸出援助之手，在资金上发行上给予大力帮助。抗战后，生活、读书生活和新知书店，形成

兄弟般的战斗友谊。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三家书店亲密无间地互相合作，发展进步的出版事业，并共同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扼杀进步文化事业进行斗争。生活书店自然是老大，但它既无垄断意图，也无本位主义，一切以有利于革命为原则。这和韬奋同志对生活书店的思想领导是分不开的。

1935年前后，在韬奋同志思想政治领导下、徐伯昕同志具体协助筹划下，生活书店已形成了中国的一个完全新型的文化出版事业，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在业务上是全心全意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在经营管理上是民主和科学的，这是中国自有出版事业千余年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这也是韬奋同志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个方面，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切实学习的。

附记：为了写这篇短文，我重新翻阅了《韬奋文集》等书，但本文取材，主要来自钱小柏、雷群明编著的《韬奋与出版》，特此致谢。

（原载《出版史料》第4辑。1984年12月）

附：临终前的韬奋先生

1943年，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在苏皖边区盱眙县的大王庄。10月的一天，华中局一位领导同志交给我一个急要任务，要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敌占区的上海去探望正在病中的邹韬奋先生。

韬奋先生，我是比较熟悉的。我第一次见到韬奋先生，是1935年9月，他刚从美国和苏联考察回来。他所办的为广大进步青年所热爱的《生活》周刊，我也是一个热心的读者。那时党要在上海创办一个出版机关，我去找韬奋先生帮助。他不但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竭力支持我们的工作。这个出版机关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新知书店”。自从鲁迅先生这颗巨星陨落以后，韬奋先生就一直站在文化战线的前列英勇作战。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愤而离渝出走，到香港复刊《大众生活》，猛烈地抨击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罪行，呼吁抗战到底。在这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我们时有过从。1942年秋季，我在苏北，听说韬奋先生也到苏北来了，我心里非常高兴，满以为又可以在军部见面，谁知因敌人对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加上他又患了中耳炎重症，行动不便，被迫去上海就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对韬奋先生都十分关怀，这回是党中央特地来电报，要华中局派人去上海探望先生的病情，向他表示慰问并致赠医药费用。当时全国人民正处在艰辛的抗日战争中，多么需要韬奋先生这样杰出的战士啊！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自然要坚决完成。

到了上海，我先去陈其襄同志家中了解情况。其襄为人沉着机智，长于企业经营，是生活书店最早的骨干之一。他当时正和张锡荣等几位同志在上海从事工商业，用赚来的钱维持生活书店，顶住了国民党对生活书店的残酷摧残。那时我和他们是朋友，但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相互心照不宣而已。现在，他详细谈了韬奋先生的病情和治疗经过，告诉我医生已经确诊：不是中耳炎，是中耳癌。我听了大吃一惊，这不是已经对我们这位尊敬的前辈宣布死刑了么？我的心隐隐绞痛。

我完全没有想到，韬奋先生在上海安全治疗的周密布置和巨额医疗费用筹措的重担，都压在其襄和他们几位同志的身上。我

把从军部领来的一笔伪币现钞交给了他。我说，这区区之数，对于韬奋长期重病治疗的费用，没有多大作用，但是革命事业尚在艰难之中，全体战士正在节衣缩食同敌人浴血战斗，这一点钱只不过是表达党中央和华中局对韬奋先生的尊敬和关注而已。其襄默默地代韬奋先生收了下來，然后陪我去医院探望韬奋先生。

在旧法租界的一家规模不大的私人医院——剑桥医院里，我见到了韬奋先生，他的夫人沈粹缜同志和徐伯昕同志也在他的身边。他躺在病床上，消瘦多了，脸有些歪斜，为了逃避敌人的侦查，还有意留上了一撮小胡子。但我一眼认出了他，他那副正直认真的面容依然如故，双目熠熠有光。当时是在一次大手术之后，正在进行镭锭放射治疗，他尽管遭受着同癌细胞剧烈搏斗的痛苦，却仍然热情地和我握手。我向他缕述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注之情，和奉华中局命令专程前来探望的经过。他一边静静听着，一边不间断地对党表示感谢，反复说明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不值得党中央如此关怀。他十分兴奋激动，向我叙述到苏北根据地后的所见所闻。我怕他说话过多可能引起疲劳，便拿话打断他，告诉他华中反“扫荡”的胜利，全国的抗战形势，特别是延安的整风学习等等。他精神贯注地谛听着，表示出异常的热情和兴趣，象一个健康人的样子。实际上他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处在异常的痛苦中，靠各种麻醉药剂，稍稍缓和一些痛苦。谈话一个多小时，我只得离开他的病榻。过了几天，第二次去看他，向他告别。他要我向党中央毛主席转达他的感情，表示病好之后，一定去根据地，转而去延安的心愿。他说，如有可能，就要写他苏北之行的经历。他交给我一封给华中局的亲笔信，说明了这些意思。徐伯昕、陈其襄两位同志则一再向我表示，他们会负责给韬奋先生治病，筹措一切需要的费用，根据地经济条件太困难，不要再送钱来。

我回到军部后，向华中局领导汇报探病经过，并代为起草了向党中央汇报的电报草稿。当时在军部、华中局工作的钱俊瑞、范长江、于毅夫等同志，同韬奋先生都有深厚的战斗友谊，听到韬奋患此不治之症并同剧烈痛苦作斗争的情况，无不唏嘘扼腕。

1944年二、三月间，陈毅同志突然把我找去，神态沉重地对我说：“韬奋同志在上海病势危殆，华中局根据城工部的报告，决定再度派你去上海探望病情表示慰问，并送去一笔医疗费用，希望摒挡一切，尽速成行。”听说韬奋先生病情危殆，我心里十分着急。无论于公于私，我理应有此一行，所以一口接受了这一任务。

为了安全，韬奋先生又调换了一个私人医院。回想当时的印象，他是席地而卧的。据说，剧痛发作时，他不能自持，痛得满地爬滚，睡在床上，就有跌下床的危险，所以作了这样特殊的安排。半年不见，现在韬奋先生消瘦极了，除大轮廓和一双眼睛之外，几乎很难认识了。他见到我，依然露出满脸高兴的样子，艰难地从棉被里伸出瘦弱的手，和我握了握。我说明来意后，他低声地道谢，迫不及待地对我说：“雪寒先生（对于我这个后辈，他一直以平辈相待），我看来是不行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赶出去，我却再也不能拿起笔保卫祖国、保卫人民了！我的心意，我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党中央，我要求入党，请你代我起草一份遗嘱，也就是一份申请书，请求党在我死了之后，审查我的一生行为，如果还够得上共产党党员这样光荣的称号，请求追认我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接着，他还说了一些对于抗日建国的重大政治问题的意见。要而不繁，若断若续；我理解他，他是用了最后的生命的力量，说出这些出自肺腑的话的。我听了他这些话，心潮起伏，于哀痛万千中感到他的崇高的精神世界的无比力量。但我自知我的能力不足完成他的嘱托。我对他说：“我相信党中央一定会认真考虑你的请求，作出正确的

决定，请你安心治疗，争取早日痊愈。我这个人，跑跑腿是行的，文字上却毫无能耐，不堪完成你的嘱咐。”但是，他却坚持他的要求，我不能违背他的好意，只好答应了。和他告辞，走出了医院，一路上我思前想后，心潮起伏，还想起1936年夏天，在全国救国联合会的一个秘密工作机关里，沈钧儒老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雪寒，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是呀，当时正是风雨如晦，伟大祖国的命运系于一线的年代，我国革命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在七君子中间，韬奋同沈老最为意气相投，亲密无间。现在，沈老正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而韬奋方当壮年，竟为恶病所迫，势将不得不离开战斗队伍，矢志以殁，遥想沈老一旦得知韬奋不幸消息时，将如何老泪纵横，痛悼哀愤呀！想着，想着，我的眼睛不禁润湿了，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上海，那凋零、冷寂、脏乱的街道，回到了住处。

我当时落脚在汤季宏同志的家中，四个人挤在一个6平米的小亭子间住。白天，他们出去奔波，我占有了晚上作为床用的两屉桌，来写韬奋先生嘱咐我写的东西。我的秃笔，要在短短的几百字中，表达他的正义的崇高的请求，真是难呀！写成的稿子总觉得不满意，只得拿去交给韬奋先生。我给他念了一遍，他点点头，说声“谢谢”，就放在枕头旁边。后来正式公布的他的遗嘱，应该说是韬奋先生亲自起草而且是亲笔缮写而成的，同我的草稿是无关的。现在我应韬奋先生的小女儿——邹嘉骊同志多次请求写下这段经过，无非说说韬奋先生在病榻临危前，对于党的热情向往的真实情况而已。

1944年7月24日，韬奋先生被迫放下五彩巨笔与世长辞了。8月中旬徐伯昕同志秘密地携带了韬奋先生的遗嘱，到华中局报丧，报告韬奋逝世的前后详情，并请求把韬奋遗嘱送延安中共中

央。当时陈毅同志已去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一天黄昏时，军部和华中局在新盖的一列草房前的大坪上，召开了韬奋同志追悼会。追悼会由军政治部秘书长邓逸凡同志主持，数千名干部和战士黑压压地坐满一地。当大家听到台上的首长报告韬奋先生战斗的一生，并在临危前写下遗嘱，申请入党时，同志们的脸上无不显示出一副沉痛、严肃和振奋的表情。这时数千人的大会，静谧得只能听到呼吸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9月28日向韬奋先生的家属发出唁电说：“先生遗嘱要求追认为党员，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韬奋为什么在生命临危前才申请入党呢？我当时自然不能当面问他。后来，钱俊瑞同志告诉我：1938年在武汉时，韬奋就曾将亲笔写的入党申请书交给他，要求他转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团。当时王明窃踞首席代表，王明看了申请书后说，党认为，韬奋在党外对革命更有帮助，最好去加入国民党，那末对革命就更有作用了。简单地拒绝了韬奋的一片诚心。当俊瑞把王明的决定告诉韬奋时，他勃然而起说，我活着不能入党，死后也要入党；但要去加入国民党，这是万万办不到的。38个年头过去了，回想起来如同隔日。韬奋先生对党的真诚信仰使我终身难忘。

（原载《新观察》1982年第20期）

回忆与涤新同志五十年 往来中的片断

许涤新同志逝世一周年了。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著作等身，而且傍及生态学、人口学、经济史学著作，蜚声中外，垂誉百世。我在这篇短文中，只想从与他五十多年来的交往中对他为人方面片断追忆。

1934年我在上海，以一个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学习者与作者的身份参加一些研究与写作活动，在《东方杂志》、《新中华》等刊物上，读到涤新写的一些文章，写得论证周密，观点严肃。希望能与他见面请教，但在一般会上都见不到。问起钱俊瑞同志，他说：现在他坐在苏州牢里。

1938年春，武汉成了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政府临时驻地，当时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政治形势较好，我从山东前线回到武汉，党的《新华日报》出版了，有许多朋友在那儿工作，我才碰上和认识了这位心仪已久的朋友。他——涤新，当时负责经济方面的编辑工作，我则在办新知书店兼管长江局出版机构中国出版社出版事宜（对外两块招牌，对内与新知一套机构，由长江局凯丰同志领导，与生活、读书三家仍保持群众性出版机构的面貌）。尽管如此，涤新和我却有较多往来。1939—1940年在重庆时也是如此。《新华日报》上常常刊出涤新同志撰写的经济文章，批评国民党错误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汇政策以及揭露蒋、宋、

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侵吞国家财产，压榨人民生活的文章。文章战斗性很强，理论性也很强，我在十分繁重的书店具体业务的重压之下，挤时间，从无遗漏地阅读，深为钦佩。大致是在1940年夏天，在酷暑的重庆，又是在敌机轰炸季节，我在新知书店门市部，涂新远从郊外化龙桥的《新华日报》社进城来看我说，将近年来所写的经济论文，编成个集子，急等钱用，希望能给他出版。我知道他私人生活困难，文章是我读过的，就立即接下稿子，付给他一笔稿费。当时国民党正在磨刀霍霍，准备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此之前，国民党对图书出版，已实行非常严格的原稿送审制度。我被迫将他的书稿送审，第三天，审查委员会就通知“内容反动，原稿没收，不予发还”。尽管我据理力争，说明文章均已公开发表过，但毫无用处。这本现实性很强的经济学著作，就这样被扼煞了。至今想来，对涂新同志仍深感歉意。

1941年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皖南惨案，当时我在桂林，奉命撤退到华中新四军根据地。1946年春，我奉命到上海、香港等地筹建一批党的经济企业。1947年春我到香港，涂新代表南方局香港工委和我建立联系。我们久别重逢，而且又在香港这个殖民地，来往比较自由。我和同事到香港人地生疏，买卖难以展开。涂新同志领导下有几个店，他一一给我介绍往来，给予我支持。当时香港经济萧条，主要做大陆的转口贸易，而大陆严格管制外汇，所以生意难做。一次涂新来约我在澳门合做黄金买卖，他有个朋友能做这个生意。我相信华南党会有些统战人士，信赖涂新同志，欣然出资合营，前后约近500两黄金的港币，一切通过涂新同志。但结果有去无回，同事们担心受骗了。正在此时（1948年春），涂新给我转来华东局召我回山东根据地的电报，我办了移交，介绍接我手的同志与涂新同志接上关系，就转上海乘机帆船回到胶东。但对这笔黄金买卖一直挂在心上。直到上海解放后，

才知道本钱要回来了，我才放下这条心，因为这是苏皖边区人民的血汗啊！涂新同志是一位大经济学家，忠恕待人，但做买卖毕竟不是他之所长。当时他在香港还有许多工作，如领导办《经济导报》以及统战工作，我们常常讨论重大的政治问题，譬如根据党中央来电征询关于接管大城市的各项政策问题，我在组织有关同志讨论后将意见送交给他。当时指导我们的思想是全国解放后将有一个历史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深深赞同这是符合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伟大创造。涂新还为此出版过一本《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的专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们又重逢了，我们共同接管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他还担任上海市工商局长及市统战工作。华东财委党组经常开会，我们接触的机会多。接管工作政策性很强，解放战争还在进行，财政赤字巨大，通货膨胀严重，人民币不断贬值，投机资本的倒买倒卖活动十分猖獗。当然，这时候党的威望十分崇高，人民群众坚决支持政府。但物价问题毕竟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上海当时是地地道道的市场经济。民生三宝——纱布、大米和煤都有公开市场，我们不能简单地冻结物价，也不能专靠行政管理，而是用国家手中掌握的微薄物资吞吐和华东区人民银行手中头寸的紧松来在公开市场通过经济手段与投机资本斗争。所以财委党组时常要讨论市场斗争，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个性、行动、趋向等进行讨论。在会上我们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讨论结束后彼此毫无芥蒂。1949—1952年在上海华东财委的四年共同工作，留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

1952年“三反”“五反”以后，他和我先后调到北京，他在统战部，我在对外贸易部，工作繁忙，往来少了。1955年4月以后，我陷入莫须有的滔天大祸中，离开了社会生活，直到1978年，才从干校回到北京。但我仍然重罪在身，为人不齿。亲爱的

祖国啊，何处是我容身之所？有几位老朋友将我的情况告诉了涂新和乔木同志。涂新自己当时也处于“文化大革命”的余悸未尽中，刚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不久，他竟然在乔木同志支持下，将我调到经济研究所工作。他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对同志的信任态度，使我绝处逢生。他分配我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当编辑。我的工作环境很好，没有受到歧视或任何委屈。我开始感到又回到同志们间工作之乐了。

1979年，我的在天津的一个大学里教书的女儿，考取了出国进修，但她的档案里塞满了有关我非常荒唐骇人听闻的“罪行”材料，尽管当时已有父母的问题不影响子女前途的规定，但学校竟决定把她刷下来了。这种祸遗子女的“四人帮”余风，给我精神上极大压力，我投告无门，只好去找涂新。他听了很愤慨，提笔就写了一封给天津市委工作的一位老朋友的信，这位同志也是热心人，立即由他请市委组织部派员去学校复查，按政策办事。我的女儿终于成行了。

1981年我的问题总算解决了，调到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涂新同志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顾问，他正集中精力写《广义政治经济学》（三卷本），忙碌异常。经济研究中心常常邀请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座谈，如经济特区货币问题、利改税问题等，每次会议，涂新同志总是尽可能挤时间来参加，来则必定慷慨陈辞，知无不言。但我们的往来就少了。只知道身体尚好，只是失眠严重。

1988年1月，我在北京医院电疗室偶然与涂新相遇，知道他患支气管炎。当我在电疗时，听到医生护士都在讨论物价为什么涨得那样高，他并不像有些理论家讳言真理说有什么菜篮子问题，猪肉供应不足等话，而是坦率地承认钞票发多了，并原原本本地加以解释，不失为一个认真的经济学家的态度。此后不久，听说

他住医院了，我去看他，他显得很高兴。他告诉我他的病好多了，前些天谈话都困难。他问起我经济形势怎样，他身在病房，却时刻关心国家大事。我怕他太累，谈了半点来钟就告辞了，心里还为他病有好转而高兴。过了几天，2月9日早上，冯和法同志电话告诉我涂新同志先一日病逝了，这对我真是个意外霹雳，我为失去这位老战友而万分悲伤，还希望这个消息失实，就去看望了方竹芬同志，才知道他果然离开我先走了。

涂新同志的著作等身，浩瀚博大，随着时代的进步，部份看法有不够创新的地方，但总体上说他的学术思想，科学造诣是有巨大价值的。关于这方面，吴承明、马骝等同志已有专文评述，相信今后一定会有更全面系统地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的著作问世。我这篇短文只谈和他几十年交往相处中体会到他的为人，他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对战友认真负责的人，富有正义感和人情味的人，是一位对敌人决不屈膝的硬汉子，又是一位对受害者甘冒风险、热心援助的崇高者。哲人云亡，我哀靡已！

(1988年9月14日)

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

新知书店是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和阶级矛盾异常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

1934年，我们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开展活动，并成立了中国经济情报社；3月，编辑了《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在《中华日报》上发刊；10月，《中国农村》月刊由黎明书局出版。我们的目的是，遵循和维护党的“六大”决议的精神，通过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全国国民经济的研究，用真凭实据的调查材料和客观现实来论证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任务；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恐日降日的卖国政策，并同托派和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的理论作斗争。当时，钱俊瑞是党的中央“文委”领导下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的宣传委员（书记胡乔木，组织委员邓洁），1935年9月后为“文委”委员（书记周扬），他是我们的名副其实的领导人，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思想上领导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的学术研究活动，取得了进步群众的好评。但是，到了1935年夏，继“新生事件”之后，《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情报》面临被迫停刊的危险。形势迫使我们作出选择：要么任其停刊，要么逆风而上。钱俊瑞领导我们反复讨论了当时的环境、形势和发展前途，最后决定集资合作办书店，创建宣传出版阵地。

一、从创立到“八·一三”抗战

我们作出的决定明确地提出三条：（一）办书店是为了进行革命宣传，书店本身是革命工具；（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专门出版社会科学书籍；（三）充分利用合法方式（甚至主动向法租界巡捕房登记立案），并按企业原则经营管理。

资金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最大难题。当时作为发起人的钱俊瑞、姜君辰、薛暮桥、孙晓村、张锡昌、骆耕漠、朱楚辛、石西民、孙克定、华应申、徐雪寒等，其中除个别人有固定职业收入外，都靠稿费维持生活。我们只能10元、20元地凑集，有的人就干脆“捐献”一篇文章抵充“股本”。我们还通过左翼团体的关系，在进步文化人和职业界募股，10元一股，甚至半股也收。后来，得到两件意外的款项：一是邹韬奋刚从美国、苏联考察回来，经过胡愈之、钱俊瑞的介绍，我去看他，他慨然允诺由生活书店投资1 000元。二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助理工作人员李如柏（即陈少景，现任旅大市委书记）的父亲在1936年初故去，他赶回河南老家卖去部分家产，向书店“投资”500元；这笔钱，相当于我们募集的零星“股本”的总和。到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时，书店的资金总共才有2 000来元。

1935年秋，当募集的股本达500元左右时，我们就按照合作社组织形式，召开了社员大会，创立了新知书店，公推钱俊瑞、姜君辰、张仲实、薛暮桥、孙晓村、张锡昌、徐雪寒等为理事会理事，并选举钱俊瑞为理事长，徐雪寒与华应申负责业务工作，姜君辰主持编辑工作。第二年（1936年），徐雪寒、姜君辰和华应申，先后解决了党的组织关系问题。这样，新知书店从创办起，就完全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书店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钱俊瑞、章乃器、朱楚辛等集体著作的《中国货币制度往那里去？》，该书非常及时地揭露了国民党推行法币政策的反动本质和通过外汇本位制把国家的通货主权奉送给英美帝国主义者们的卖国勾当。法西斯意大利发动对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的武装侵略战争以后，我们立即出版了钱亦石、姜君辰等集体著作的《意阿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孙冶方译述的《帝国主义铁蹄下的阿比西尼亚》两书，表示中国人民对阿比西尼亚人民的支持和声援，谴责法西斯意大利发动侵略战争的滔天罪行。第四本书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是《中国农村》月刊同中国托派大论战一年的结集。全书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任务，彻底驳斥托派错误主张和反动立场，捍卫了党的“六大”决议。当时国民党统治地区农村破产，经济萧条，加之国民党严酷统制文化，动辄查禁书刊，捉人坐牢，象杜重远这样实业界著名的爱国人士，也因“新生事件”而被判刑。但是，我们出版的这几本书却销行很快，初版在极短时期内都迅即售完，在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下，我们这个资金十分微薄、新生的新知书店终于站稳了脚跟。

从创建到1937年“八·一三”抗战，新知书店一共出版了20多种书（全部是社会科学书籍）。其中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即系统地出版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书籍。狄超白著的《通俗经济学》，是我国第一部深入浅出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又将商品、货币、价格等等经济学范畴和我国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的初学入门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前后印了五六版，后来在大后方还发现过翻版。吴大琨译的《大众政治经济学》，是程度较深的中级读物；吴清友译的理论名著《帝国主义论》（增订本），除了列宁著的本文外，还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35年前后世界垄断资本发展的资料，

可说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高级读物了。此外，薛暮桥著的《农村经济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以及钱俊瑞、姜君辰、徐雪寒等合著的《中国经济问题讲话》等书，则是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农村经济和我国国民经济全面情况，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的实际矛盾，从而求得拯救祖国、解放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大众的道路的读物。杜君慧著的《妇女问题讲话》和法国巴比塞著、徐懋庸译的当时世界名著《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传）》等等，都深受读者欢迎，一再重版。此外，除出版《中国农村》月刊外，还出版了叶籁士主编的《语文》月刊和姜君辰主编的理论刊物《新世纪》，后者仅出版两期，就被国民党查禁，《阅读与写作》也只出了两期而被追停刊。

由于新知书店一开始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所以书店还执行了党的其他任务。例如在1936年，曾几次为党印刷供群众示威游行用的传单；当邓洁、孙克定被捕后，又根据党的指示，分别由书店具结保释他们出狱。至于利用书店进行爱国救亡活动，编印宣传品、作交通机构等，更是书店应尽的天职了。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我根据组织决定，离开书店去华北前方工作，而当时新知书店正陷于严重困难境地。除了存书和待收账款外，现金十分拮据，不但无力出版新书，甚至无力继续出《中国农村》月刊。有一个时期，书店工作人员只能靠摆地摊出卖存书来维持生活，并筹集运费。不久战事西移，上海成为“孤岛”，书店又同全国广大地区和农村抗日战场失去了联系。根据党的决定，书店西迁战时中心的武汉。到这年年底，经过千辛万苦，朱执诚（朱希）把一批书经长江运到武汉，华应申、王益把另一批书经海道运到广州。王益就留在广州设立分店，这是新知书店第一个有门市的分店。华应申又疏运部分书籍到武汉。1937年底，在武汉恢复出版发行业务。

二、从武汉时期到皖南事变

在武汉短短的八九个月，是新知书店大发展时期。

当时党的长江局决定建立中国出版社，作为党在国统区以民间企业面貌出现的出版机构，以区别于党的公开宣传机关的《新华日报》及其附设的出版部。中国出版社原来由陈柱天负责，但陈同时又负责青年工作，忙于群众活动，出版社既无干部，又缺资金，工作不能开展。当时正逢我完成党给的临时任务从华北战地辗转回到武汉，组织上即决定我回新知书店工作，并决定中国出版社不另立机构，完全委托新知书店办理。长江局派凯丰领导新知书店和中国出版社的工作；凡用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书籍，书稿一律送凯丰审查决定（当时多半通过卢竟如送来）；凡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书稿编辑费和稿费，一律转为新知书店的股金。在汉口时期，中国出版社曾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反对派》、《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以及《吴玉章抗战言论选集》等书。

武汉时期，抗日救国运动的革命高潮，汹涌澎湃，革命群众对于新知书店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和抗日救国书刊，求购殷切，从上海运来的大批书籍，不旋踵就销售一空。由于营业发达，书店就有了出版的资金。我们除用中国出版社名义出书外，还用新知书店名义出版了胡绳著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翦伯赞著的《历史哲学教程》以及《列宁的故事》、《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一些宣传抗战的小册子。薛暮桥在罗琼协助下，也把《中国农村·战时特刊》从长沙搬到武汉，由新知书店出版。

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我们竭力开设分店。党的浙西特委，凑钱在丽水开设了新知书店分店，通过骆耕漠到武汉公

干之便，要求我们承认，并大量发书去配合当地党的工作，我们当然照办，并派朱执诚前去增设金华分店。湖北省委宣传部在抗战时曾办了一个扬子江出版社，由李实、张光年负责，出版了一些小册子以应抗战急需。这时决定把出版社并入新知书店，并要求新知书店到襄阳开设分店，以便配合武汉撤退后党在鄂西北开展工作。这个要求，我们自然接受了，并派了曾霞初去负责设店。湖南省委通过八路军办事处要我们到湖南设店，我们派了沈静芷到长沙，先建立起办事处，开展批发业务，岳中俊去常德。此外，我们还在南阳、衡阳等地设店，还派人筹备重庆、桂林分店。我们同生活书店共同把革命的出版发行工作推进到中小城市。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汗血书店等所不曾设置分支机构的地方，我们都抢占了阵地。这是我们的胜利。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新知书店也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4月间，号称蒋介石十三太保之一的常德警备司令鄧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封闭了新知书店常德分店。这是当时对革命书店第一次明目张胆的摧残打击。后经长沙革命舆论的责难和当地以商务、中华等为中心的书业公会的出面交涉，鄧悌才在没收部分书刊后被迫启封了事。

1938年7月初，为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叶剑英同志到汉口新知书店作抗日战争军事形势的报告。会议在书店的一间办公兼卧室的普通房间内举行，室内挤得水泄不通。叶剑英同志那天身穿湘云衫裤，手挥大蒲扇，象一位海员工人。他详细地分析了抗战形势和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战略意义，给与会人员及全店同志极大鼓舞，坚定了持久抗战的决心。到了8月间，军事形势恶化，放弃武汉已是势所必然。当时党中央代表团和《新华日报》以及生活、读书的总店决定迁往重庆；我和华应申商量结果，认为桂林将成为西南文化中心，政治环境及印刷出版条件较

好，需要有一个出版机构，以配合作家及文化界的活动，因之决定将新知书店总店迁往桂林，由华应申主持，归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领导；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也迁到桂林；我则往来重庆、桂林间，而长住重庆，以便接受南方局凯丰的领导，办理中国出版社的出版事宜。这一计划，征得凯丰同意后，华应申即于9月间去桂林设店，同时派徐律去重庆建立分店，并先由钱岐押运一批进口报纸和书籍随同《新华日报》西航去渝。不幸的是，当船泊在沙市附近过夜时，遇敌机轰炸，钱岐以身殉职。就我所知，这是抗日战争中为了革命出版事业把年轻的生命献给祖国的第一人。当时财力十分拮据，只能向居住在上海的他的老母敬献微薄的抚恤金。十分遗憾，在全国解放时，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位老人的下落了。

武汉撤退后至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新知书店尽管遭到日军进攻和国土沦陷的打击，撤退中财产损失严重，但业务还是继续发展。我们增设了桃源、辰溪、宜山、柳州、昆明等地分店；和读书出版社合作，在贵阳建立了读新书店。金华分店派出朱晓光去新四军皖南军部设置随军书店，向战地供应书报。王益从广州撤退到桂林，我们派他回上海重建办事处，恢复组稿、出版和发行业务；又先后派俞鸿模、张朝同建立了香港办事处，主要翻印中国出版社的书籍，特别是延安的《解放》杂志等党的书刊，向港澳及东南亚一带供应革命书刊。它在海外华侨中起了一定影响和作用。

华应申在姜君辰、邵荃麟帮助下，在桂林团结进步作家，用预付稿费的办法，支持了一部分作家，使他们能维持生活，进行写作。武汉撤出以后，我们也开始出版文艺书籍。桂林初版新书，有冯雪峰《鲁迅论及其他》，夏衍的《心防》、《小市民》，薛暮桥的《经济学》，梅雨（梅益）译的《对马》，林淡秋译的《巧克力》等书。《经济学》是薛暮桥在皖南新四军教导队教学用的教科书，写

得简明易懂，受到读者欢迎，一再重版。在重庆，以出版中国出版社的书为主，两年中间（皖南事变为止），出版了《什么是列宁主义》（四个分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言论选集》、《马恩论中国》、《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章》和《支部工作纲要》等等。

在重庆时，生活、读书和新知，还常常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1939年夏末的一天，周恩来同志要徐伯昕、黄洛峰和我三人去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当时正遇上空袭警报，整个谈话只好在防空洞中进行。他动员我们，以民间企业的形式，筹备资金，派出干部，到延安联合开设书店，以为发动大后方其他爱国进步的企业家去延安设厂设店的倡导。我们欣然遵办。生活书店派出李济安（李文）等，读书出版社派出赵子诚等，新知书店派出徐律、陈在德（王华）、王德珍，并带去精选的纸型和一部分现金（大致每家出5000元）。他们到太行、延安以后开设了华北书店。后因交通阻隔，和母店失出联系，他们就将资金财产，完全交给当地的党和政府，并在其领导下工作。

同年冬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通知我们，湖南省委所办的《观察日报》被封闭，印刷厂随时有被没收的危险。为保存党的这部分财产和印刷机器，安顿工人的生活，只能设法将该厂迁往桂林。他指示新知书店妥予安排。我们得到党的指示，立即行动起来，由广西文化供应社、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新知书店各出现金数千元，把这个印刷厂盘了下来。这样湖南省委得到一笔现金应付急用，并从中拨出部分资金与三家合股组成了西南印刷厂。李克农指定由新知书店领导这个工厂，我们派沈静芷担任经理，从而使这个工厂仍然掌握在党的手中，作为党的一个据点合法地存在着，直到日军侵占桂林，被迫疏散为止。

第一次反共高潮掀起后，国民党就在各地摧残革命出版机

构。到1940年冬，新知书店的金华、丽水、常德、宜山、衡阳、柳州、辰溪、襄阳等地分店，陆续被捣毁、封闭，或被强迫“自动停业”，工作人员或被逮捕，或被勒令24小时内离境，结果只剩下桂林、贵阳、昆明、重庆四个分店。特别使我们感到悲痛的是，上海时期老战友吴渊（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离店后在八路军平江办事处工作，在1939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平江惨案”中，他和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一同惨遭杀害，是“平江惨案”的十烈士之一。华应申说：“我们在桂林得知他牺牲的噩耗，曾唱着《五月的鲜花》的曲谱配上悼词，编成挽歌来悼念他”。烈士们的鲜血决不能白流，它教育我们要更加坚定地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1940年冬天，形势紧张，风雨满楼，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从书店中挑选一批能做买卖的可靠的党员，到江西、福建、浙江设四五个灰色书店、文具店等等，隐蔽待命，准备在必要时作为掩护和交通站之用。我赶到桂林，正在筹备抽调干部时，皖南事变爆发，我们的部署显得慢了一步。2月间陆续派出李志国、曾霞初、邓昌明、曹健飞、刘逊夫以及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加派来的张纪恩等人，分批出发。这一特殊任务，由于受到皖南事变的影响，以及我和华应申奉命转移到港沪一带之后（虽曾于同年7月通过香港党的电台报告周恩来同志），联系十分困难，随后日军又侵占浙赣铁路一线，因而所设各点均没能站住脚。除了张纪恩回到重庆复命外，书店派出的同志，有的撤回书店，有的与书店挂上钩，都没有派作特殊用途。

皖南事变中，我们原来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开设的随军分店，也在突围中被破坏了。负责人朱晓光被俘，两年后才从上饶集中营脱逃归队。事变以后，桂林、昆明分店被迫停业，贵阳分店（读新书店）被查封，经理孙家林被捕3年2个月后才从集中

营脱逃回来)。这样，在国民党统治区，只剩下重庆一个分店了。重庆分店经理岳中俊，就书店的部署问题，请示八路军办事处。徐冰立即把岳中俊找去，周恩来同志在曾家岩50号接见了她，剴切地对她说：几家书店（指生活、读书、新知）在社会上有影响，有的称你们是进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抗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共产党的书店。如果国民党把这些书店封了，那事实就揭露：是你国民党不要进步，不要抗日，破坏团结合作。重庆是陪都，政治中心，国际国内注目；它如果封书店，在政治上就很被动。因此书店要坚持开下去，等他来封，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自然也要作最坏的准备。岳中俊恍然领悟，回来后立即动员全店同志，周密部署，作好随时被封被捕的安排，终于把重庆分店坚持下来。

我们在桂林，根据李克农的分散、转移、隐蔽的指示，决定华应中、储继、徐雪寒转移到上海；桂林留一个办事处，由周德炎负责，许静等参加工作，以便陆续筹设第二第三线的书店，并将门市部出盘给文化供应社，朱执诚、欧阳文彬等转入该社工作。这时，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也搞反共，拘捕了新知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张朝同，罪名是印刷发售共党书籍，最后虽然判决无罪，但为了避免被押解出境，送给国民党处理的危险，我根据连贯（香港工委负责人之一）的意见，将他调去上海，并将办事处关闭，另派吉少甫到港，与广西文化供应社合设南洋图书公司，以比较隐蔽的方式，继续从事党在港澳和海外一带的出版发行工作。他一直坚持到日军占领香港为止，然后撤到桂林、重庆，接受新的工作。

新知书店本来就穷，抗战后迅速发展，资金更形拮据，除了陈少景再次资助近1000元，艾思奇介绍爱国华侨俞鸿模、柳碧“投资”1500元左右，朱枫变卖母遗纪念首饰“投资”500元之外，全

赖王新元（1936年上海党的临委会领导成员之一）的帮助。他说服李葆和等两位民主进步人士，“投资”两千余元；又帮助我们做了两笔生意，使我们不费分文地赚了几千元。尽管如此，始终改变不了资金微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它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战争的破坏、国民党的一再摧残，而且还赢得了发展，主要靠全店工作人员上下一致的努力。他们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但工作效率却极高，从而为书店形成了自我劳动积累。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对我说过：你们的低薪制，远比根据地的供给制艰苦，很难设想你们是怎样熬过的。这当然是过奖，但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督促。皖南事变后，为了对付国民党进一步的摧残和愈演愈烈的恶性通货膨胀，我们决定派沈静芷、戴琇虹到金华，必要时去上海贩运文具日用百货到大后方售卖，以副业收入来养活书店，以挫败国民党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我们出版事业的卑鄙阴谋。

这里要补叙一下撤到武汉以后，新知书店在孤岛上海和苏北等根据地所从事的工作。

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是1938年由王益前来重建的。它进行组稿、出版和销售业务。销售对象是上海、香港、东南亚的读者和新四军指战员以及新四军所到之处的广大读者。1940年10月，新四军渡江东进后，我们同生活、读书联合去盐城设立大众书店，取三人为众之义。新知派出王益、汤季宏、王宏。三家共推王益为经理，汤季宏负责秘密运输书刊，常住上海。1941年夏，日寇对盐城大扫荡，大众书店转入农村，改为盐阜区党委宣传部领导下的一个出版发行机构。王益后来由党分配到军政治部工作。王宏改去苏中四分区设点供应书刊。1942年春，王宏因患伤寒，又遇日寇扫荡，医治无效，病故于工作岗位上。

1940年，王益调到苏北根据地后，上海办事处改由俞鸿模主持。他在姜椿芳的义务帮助下，组织翻译苏联文学丛书，出版长

篇文学名著。1941年春夏，华应申和我先后到达上海，当时党派梅益领导书店工作。新知书店这时已处于半秘密状态，不与同业公开往来，专印本版（包括中国出版社）书籍；华应申主持泰风公司与远方书店，以比较灰色形式，对外公开，并与香港和后方联系。原来编译的苏联文学丛书，这时陆续出版，计有梅益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楼适夷译的《彼得大帝》、林淡秋译的《时间呀前进》、董秋斯译的《索特》等等，都是以远方书店名义出版的。这一套丛书的计划相当庞大，如金人译的《苦难的历程》（三卷本）等均已交稿；其后还在倪海曙义务帮助下，计划出版《巴尔扎克选集》，并在上海、北京约请作家翻译。当时一些作家既不愿去国统区，又因家庭拖累，不能去抗日根据地，暂时只能隐藏在租界居住。党组织便要求新知书店组织他们翻译文学名著，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

12月12日日寇侵占上海租界后，新知书店已经不可能继续从事出版发行工作了，于是决定转入地下。华应申调到苏北，由华中局分配到盐阜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书店工作人员除因家庭关系不能离沪外，决定全部转入根据地；同时还决定把大量存书分散，分批秘密运输到浦东游击区，再转运到苏中、苏北，甚至运到胶东八路军根据地。书店还协助根据地在上海采办和疏运一部分军需物资。担任秘密运输工作，要机警、勇敢，临危不惧，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并且经常深入虎穴，与敌人斗智斗勇。主持其事的是汤季宏、蒋建忠和孙群等。在一次海上运输中，遇敌舰拦截，王福英勇抵抗，打完了子弹和手榴弹后，便壮烈地投海殉职。1943年初，我调到华中局工作，新知的上海办事处则由汤季宏主持，处理未了事宜。到1944年10月，由于汪伪特务混入内部，上海办事处被日寇破坏，未刊书稿、纸型及物资等等，扫数被劫，大部分工作人员被捕，惨遭严刑逼供，未被捕的工作人员以及后

来释放出来的人员，大多分别陆续撤到新四军军部或四明山地区的三五支队，另行分配工作。前面介绍过的朱枫同志，浙江镇海人，1939年在桂林参加新知书店工作。她原在宁波女子师范读书，“七·七”抗战发生，在当地从事救亡宣传。浙沪失陷，流亡武汉、常德，其后又一度回浙江参加党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在新知书店期间，她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同志诚恳热情，1942年由桂林调到上海。上海办事处被日寇破坏时，她被逮捕，经受住了敌人的残酷刑审，出狱后由我和陈修良同志（当时上海地下党市委组织部长）介绍入党。不久，她被调作党的情报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她因工作需要前赴敌占区，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特务机关追踪搜捕，在某地英勇就义。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朱枫同志贡献了宝贵的生命。由于1944年上海办事处被破坏，新知书店在上海不得不被迫停止了活动。

三、皖南事变以后的斗争

1941年夏，沈静芷到上海，同华应申和我商讨大后方新知书店的坚持问题。我们考虑到种种情况，决定改由他负责大后方书店的领导工作。华应申和我先后离开新知到新四军后，领导全店这副担子，自然而然地完全落到他的肩上。上海办事处当时在资金极度困难下，仍拨出现金交他办了一批文具、西药等物资，经香港运到桂林，变卖后充作国民党统治区新知书店总店的出版经费。

当时，由南方局在桂林地下党负责文化方面的成员张锡昌（当时隐蔽在“工合”主编《中国工业》杂志）担任新知书店行政、人事方面的顾问；由邵荃麟（当时隐蔽在桂林文化供应社编辑部工作）担任新知书店编辑方面的顾问。新知书店总店由周德炎主持会计；吉少甫、刘逊夫负责裕丰贸易行，以经营广东南雄

纸张的进销业务为主；曹健飞负责桂林远方书店，李易安负责桂林实学书局，许静负责新知书店桂林办事处的留守工作。沈静芷对外仍以桂林西南印刷厂负责人的身份出现，但该厂实际上已由昆明分店撤退来的诸宝懋负责。

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领导的“广西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皖南事变前，对待进步的抗日的出版单位送市的书刊，还比较顾全大局。这时则凶相毕露，查禁书刊的通知满天飞。新知书店当时的对策是：适当收缩第一线书店的出版物，第二线书店出版物以世界文学译著为主，新开辟第三线出版机构。第二、三线书店用改头换面的办法重印一些新知书店和中国出版社书籍外，用桂林远方书店的名义，着重出版以介绍苏联文学作品为主的《世界文学译丛》。在再版上海远方书店编印的这套丛书的基础上，还就地约稿，翻译出版了《喀尔巴阡山狂想曲》、《奥勃洛摩夫》等名著。新建的桂林实学书局，出版了一批知识性较强的、内容比较严肃的实用参考书，如《战时国文教材》、《金融工商界应用文》、《英语分类词汇》等等。新知书店总店当时除重庆分店外，还有江西赣州的章贡书店，江西吉安的文山书店。

1941年秋到1943年间，新知书店曾受桂林地区地下党的指示，利用在桂林的分支机构，妥善隐蔽了党的干部：在实学书局，用书店总编辑名义，隐蔽了南方局新派来桂林领导文化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李亚群。在远方书店，用编辑的名义隐蔽了从福建到桂林的地下党员陈丹楠。在西南印刷厂，用负责人亲戚的名义，隐蔽了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以及延安鲁艺毕业后到白区工作的地下党员钟惠兰。直到他（她）们安全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或指定的去处为止。

在这段期间，受地下党的委托，沈静芷于1942年及1943年先后两次去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桂林地区党的出版工作情况。在

重庆曾家岩50号二楼，周恩来同志亲自听取汇报，亲切关注三家革命书店留在桂林干部的安全情况；还针对当时当地的实际，对白区出版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就在1943年那次汇报时，周恩来同志已预见到湘桂一战，国民党必将节节败退，对桂林出版机构如何部署撤退，一一作了周详的指示。记得周恩来同志当时既严肃又很风趣地说：撤退，军队是家常便饭，临到你们搞书店的，就不那么简单了。你们都是有家当的，是舍不得瓶瓶罐罐的。当然，这些确是党的资产，不能随便丢，但主要的是人，是干部，是群众；安全转移，保存了他们，一切都好办了。依我看，你们是不是兵分两路，到时候，一路从陆路向西撤，到重庆来赶热闹，配合主力；另一路，从水路向桂东撤，那边是山地，有十万大山，什么都有，地势很好，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必要时，组织当地人民，干它一家伙。要不要颁发一个书店纵队的番号？回去告诉三家书店的同志，要吸取1938年湖南长沙大火撤退时的严重教训，提高警惕，事先做好准备。撤，就是要大家去撒革命的文化火种！当把周恩来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带回桂林，向党组织汇报并告诉书店同志们时，大家心情激动，充满必胜的信心。周恩来同志的谆谆教导，激励着三家革命书店永远向前！

1944年9月，日寇向湘桂全线进犯之前，新知书店根据党组织的部署，贯彻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会同当时桂林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两个兄弟书店的全部所属机构工作人员一起，连同存书、纸型、资料和印刷器材等共同进行疏散，疏散路线决定分水陆两路，一路向东（水路）疏散，向桂东八步进发。另一路向西（陆路）疏散，目的地为重庆。新知书店水路疏散队伍，由曹健飞率领；陆路疏散队伍由沈静芷负责。西南印刷厂部分排字印刷工人，随同书店从陆路向西疏散。在日寇逼近桂林前夕，三家书店先后撤离桂林。由陆路向西疏散的人员在途中备受艰险，在途

辗转三个月之久，才分别抵达重庆，幸无一人散失。但托运的物资已全部被敌机毁于金城江车站，全店资产蒙受惨重损失。由水路向桂东疏散的人员及物资，也历尽艰险，到达桂东八步，连县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凑了一些现金、存书，配备人员，由吴仲负责，分别设立了兄弟图书公司。他们边后撤边战斗，继续向读者输送进步读物，宣传团结抗日。这一路的其他人员到达桂东昭平后，参加《广西日报》的昭平版工作。这报纸，是利用统战关系办起来的，实际领导是张锡昌。报社的主要骨干，都是新知书店和生活书店的干部。这一路的大部分同志，在日寇投降后，有的随张锡昌撤回桂林。以诸宝懋为骨干，与“工合”挂钩，建立了新时代印刷出版工业生产合作社；有的迅速到达广州，仍以兄弟图书公司名义开设了门市部，由曹健飞、吴仲负责。该公司1946年5月4日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捣毁，部分人员被打伤，但仍坚持开门营业，直至6月21日被封后才撤离广州。八步、连县、广州的兄弟图书公司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组成的第一批“三联书店”。

新知书店总店1944年撤退到重庆后，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亲自听取汇报，指示新知书店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把集中的人员分散安插到有关单位，度过人员过于集中、经济负担过重的难关；并指示，要继续搞出版，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从经济上接济大批集中在重庆的文化界朋友，要团结倾向进步或处于中间状态的党外出版发行同业，共同抵制并孤立反动的由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出版发行机构。我们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对撤退到重庆后的各项工作作了下列部署：

（一）充实加强新知书店重庆分店。在总店疏散到重庆之前，重庆分店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极其艰苦地坚守着出版和发行阵地。分店负责人岳中俊，虽住在医院，仍每周抱病来书店一

次，领导店内党小组活动，安排一周的主要店务。总店迁到重庆以后，就决定岳中俊暂时离职在医院养病，分店改由刘逊夫、刘建华负责，人员也相应作了调整充实。除发行业务外，仍继续组稿，出版“世界文学译丛”，其中有《虹》（曹靖华译）、《前线》（聊伊译、戈宝权校序）、《复仇的火焰》（茅盾译）等新版书。为配合当时话剧界展开的活动，还出版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章泯、郑君里译），剧本创作《祖国在召唤》（宋之的著），再版尚留有纸型的政治、经济类读物。

（二）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为使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能就近买到进步书刊，新知书店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心脏地带建立一个发行据点。我们通过读者的帮助，在上清寺“国民政府”附近觅得了店址，开设了亚美图书社，由欧阳文彬和戴汝明先后负责主持。

（三）充实了重庆分店的副业机构——珠江饮食店，由徐冰介绍梁海云任经理。这个饮食店，座落在重庆闹市区民生路，三层建筑，专售粤味菜点，因地点适中，获利较厚，补贴了书店亏耗。有时，它还作为地下党和文化界朋友联系工作的一个据点。

（四）恢复实学书局业务，仍由李易安负责，利用尚保存着的纸型重印一些读物。为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突然袭击，还及时疏散了一大批存书，去成都建立发行据点，用实学书局成都办事处名义，开展业务。办事处由石立程负责。

（五）及时在重庆就地疏散、隐蔽了一些骨干，由党组织决定抽调吉少甫筹备并主持群益出版社（郭沫若主办，专门出版郭老的著作）工作。

在这一时期，书店的经济状况最为窘困，每个月与同业结帐时，开出的远期支票几乎都是空头的，天天过着年三十的日子。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切我们，经常指示南方局直接经营的地下贸易机构关心书店的经济，经常由柳恕、祝华出面，给我们调度接

济，使我们的困境得到缓和。

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业，这时期几乎都集中在重庆。党指示生活、读书、新知的负责人，配合当时斗争形势，积极开展出版业中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三家书店的党组织成员，经过短期的酝酿，推动了重庆21家书店（后来发展到54家）在自愿的原则下，组成了联营书店，并以生活、读书、新知为主体，建立了重庆新出版业联营书店总管理处。我们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对参加联营总处的成员，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主张并举办座谈会等活动，获得了大家的同情和支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出版业中多次发动了广泛的各种签名运动，揭露、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抗日、推行法西斯独裁、扼杀进步出版业的罪状，并通过报刊公布于众。如在《出版界紧急呼吁》（1945年6月14日载于重庆《大公报》）一文中，要求国民党：1．一律平价供应纸张；2．限制书刊印刷费用狂涨；3．取消邮局教育图书小包收费办法；4．设立出版业文化贷款机构等等。又如在《出版业争取出版自由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1946年1月9日载于重庆《新华日报》）一文中，对当时国是问题提出了四点意见之外，还要求国民党应立即做到：1．废止《出版法》；2．取消期刊登记办法；3．撤销收复区出版检审办法；4．明令取消一切非法检扣书刊；5．取消寄递限制等。在这些揭露国民党罪状的抗议文件上，联署的重庆新出版业就达29家。

四、从上海到香港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党指示在重庆的三家书店，从速办理善后，赶去上海及其他新收复的大城市，与国民党反

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建立党的出版发行阵地。为集中人力、物力，三家书店决定在重庆只保留一个发行据点，于是便把读书、新知两家门市部盘给其他同业。把重庆生活书店门市部改成三联书店重庆分店，公推仲秋元为经理。这样，由三家革命书店组成的“三联书店”的店名遂于1945年10月22日诞生，屹立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组成三联书店重庆分店告同仁书》的结束语中指出：“这种合并，不是结束，而是团结；不是退守，而是前进；不是衰老，而是新生；不是缩小，而是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派出谭允平去北平、马仲扬去武汉、邓昌明（邓晏如）去长沙开设三联分店。为了避免反动派的迫害，用了不同的店名，北平称朝华书店、武汉称联营书店、长沙称兄弟书店，它们经历了曲折的斗争，千辛万苦，一直坚持到当地的解放。

这时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重庆分店的陈少淳（党员，陈少景胞弟），1939年在河南内乡县老家时，因从事革命活动，为当地豪绅恶霸所忌恨，后来转移到重庆工作。当时，以为抗战胜利了，离乡也多年了，就请假回家，探望年迈的母亲。哪知回家后竟被这批反动家伙所活埋。他的牺牲，使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奋发有为的好同志。

1946年春末，沈静芷到了上海。党的地下组织指示：在上海的出版发行工作仍以三店暂时分散各自作战为宜，要尽可能占领门市阵地；副业机构则可逐步合并统一经营。新知书店先后由胡绳、邵荃麟同志负责编辑工作，拟了一个出书计划，着重编辑出版历史类读物，并整理选择一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出版物，继续编印《新知丛书》。除此以外，还配合形势变化的需要，出版一些针对性强的时事小册子。当时，新知的出版资金极度短缺，便决定派刘逊夫去苏北解放区设法筹措。刘逊夫抵达苏北后，见到了当时在苏北区党委宣传部工作的华应申，由苏北区党委指示

贸易单位给予一笔贷款。当时，我由华东局派驻上海，从事经济工作，也给以一笔贷款。这些贷款，用来加强出版新书和充实副业投资，并在上海四川北路8号顶下开设门市部的店屋，抢占了上海的发行阵地。1947年春，上海新知书店门市部就广大读者见面了。

新知书店在上海的工作重点，仍放在出版工作上。它陆续出版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世界历史研究会编著的《近代世界史简编》、哲学研究社编著的《新哲学研究纲要》、历史研究会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纲要》；同时还把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和在上海组织编写的薛暮桥著的《经济学》、《农村经济基本知识》、许涤新著的《现代中国经济教程》、胡绳著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侯外庐著的《新哲学教程》、翦伯赞著的《历史哲学教程》、罗克汀著的《自然科学讲话》、韩启农著的《中国近代史讲话》和杜君慧著的《妇女问题讲话》等十多种书，列为《新知丛书》出版，1938年在桂林时出版的延安抗大教材《社会科学基础教程》（原名《社会科学概论》），这时也改变形式，从全书十章中选择其中杜民著《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和苏华著《论苏联》等八章分别独立成书，另增加杨松著《两次世界大战》和薛暮桥在盐城抗大五分校编著的教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共十种，作为《社会科学读本》丛书于1946年在上海重新印行。这套书新知书店后来在1948年又稍加调整选题，编为《社会科学小丛书》，分作两辑，共十二种，在香港以“南海出版社”名义出版，受到海外和国民党统治区读者的广泛欢迎。当时我们还组织出版了侯外庐著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侯外庐、杜守素（杜国庠）和纪玄冰（赵纪彬）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卷）、宋云彬著的《中国近百年史》、王士菁著的《鲁迅传》和陈原译的《现代世界民主运动史纲》等。狄超白的新著《经济学讲话（通俗本）》也和读者见面。此外，还编印了《新世纪文学译

丛》和《传记丛书》。孙冶方译的《简明哲学辞典》也重排出版。

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全面进攻我解放区，对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也进一步摧残迫害。我们采取了速战速决、快出快卖、一卖就光的对策。当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出版预告的广告于1947年6月26日在上海《大公报》登出后不久，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即大动干戈，于7月17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介绍一本历史奇书》，对范老和《中国通史简编》进行恶毒攻击。当初版发售时，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即追踪而至，包围搜查新知书店门市部，被抄去了70多部。但是敌人太蠢了，经《中央日报》这样一宣传，反而扩大了影响，来门市部购买《中国通史简编》的读者越来越多。同时期，我们又建立了第二线的永年书局，负责人是黄洪年。

1947年11月，我们从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进步读者处，了解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已接到查封新知书店的“指令”。我们得到这消息后，对外不动声色，照常营业，内部则采取紧急措施，迅速转移人员及资产。门市部的房屋，在开明书店傅彬然的帮助下，很快办妥了转顶手续，在取得顶款的当夜，全店动员，坚壁清野，把门市部的存书等转移到秘密仓库，深夜又把“新知书店”四个标准字的招牌卸下。次日原是门市部例假日，同业的顶主乘机迁入，并贴出他们的开张预告。“上海新知书店门市部结束告读者”的广告，也在同一天的上海《大公报》第一版刊出，这是1947年11月11日的事。这样，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查封上海新知书店的阴谋又一次破产。办事处仅留了杨明、俞筱尧两人。在这一期间，新知书店根据党的指示，在“文萃丛刊”被查禁后，以《新认识丛书》和《国际现势丛书》的形式，继续承担了这一宣传出版任务。列入这两套丛书出版的书籍有：《论胡适与

张君勱》、《论知识分子》、《论自由主义》、《论哲人政治》、《战后经济学说》、《论优生学和种族歧视》、《中美之间》、《反扶日论》和《世界的逆流》等。著者有周建人、夏康农、石啸冲、梅碧华（陈翰伯）、李正文、贝逊（陈原）等同志。这两套丛书每册的篇幅一般为3万字左右，短小精悍，针对性很强，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用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和勾结美帝国主义扩大内战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政治主张，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配合和支持了国民党统治区蓬勃发展的民主爱国运动。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党组织还指示我们，要在保证工作人员、资产安全的原则下，迅速作好陆续撤离上海的准备。我们还清了苏北解放区及有关借款，疏散了部分存书和纸型，陆续将工作人员输送到香港和华北及东北等解放区。

早在1946年底，我们曾派唐泽霖去香港九龙设立办事处。1947年，续派张朝同去香港筹设分店。1948年4月，新知书店在香港轩鲤诗道开设了门市部。当时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如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茅盾、陈劭先、邓初民、狄超白、邵荃麟、翦伯赞、侯外庐和宋云彬等均亲笔书写条幅，表示祝贺。这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镇压革命文化事业的抗议。

沈静芷于1948年夏天撤到香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负责人也先后到达。党组织指示我们三家书店进行全面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便集中人力物力，进入解放区，迎接全国大解放。这项工作，是在胡绳、邵荃麟领导下进行的。三家书店都迅速核实全部资产，制订了出版规划，草拟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安排了留港工作人员及分批进入解放区的人员名单。新知书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香港最后宣告结束，这已经是在1948年10月，即全国解放的前夕了。

五、结 束 语

写完了《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之后，最后提出三点看法，作为结束：

（一）新知书店之所以能对革命出版事业作出微薄贡献，首先是党的正确领导，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等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和教导。其次是许多社会人士和广大读者热情的帮助支持，如有的临时通融资金，有的掩护同志免遭迫害，有的利用手中掌握的军车帮助运输书刊和人员，有的帮助被捕人员从牢中脱险，有的帮助采办“禁运”物资，有的帮助书店做成无本的赚钱生意，等等。最后是书店全体工作人员作出的惊人牺牲。新知工作人员不多，但相当精干，解放前先后入党的占一半左右，党外同志绝大部分也具有革命自觉性。大家团结一致，互信互谅，工作情绪饱满，业务技术熟练，吃得起大苦，经得住大难。岗位虽有不同，对革命贡献则难分彼此。

（二）新知书店在十三年中，大致出版了书籍二百几十种，刊物近十种。如果用全国解放后革命出版事业的成就来衡量，当然，在数量上是不够多的，有些书籍的质量现在看来还不够高。但历史地看，这些出版物无疑是革命的，是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

（三）新知书店从1935年8月开创，到1948年10月结束转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止，这十三年的历史，自始至终，是在党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出资者从发起创办的那一天起，就自觉地把微薄的资金，作为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捐献，从来没有分取书店一分钱的利润。新知书店（包括中国出版社）实质上是在私人事业的合法外衣的掩护下，在国民党和敌伪统治区进行

战斗的党的国营出版事业。

最后，还需提到，在这十三年的战斗历程中，新知书店不少同志为革命出版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将为他们另立小传以示纪念。烈士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附记：本文参考华应申和沈静芷等20余位同志的回忆写成，特此说明，并致谢意。1982年10月1日。

上海内外贸易系统接管工作回忆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次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第三野战军联合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三野大军东指，上海解放在即。

上海，当时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对外贸易的枢纽。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预定设在上海，代表中央领导华东区五省一市的工作。华东财委组成接管上海市属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机关和官僚资本、战犯的工商企业的干部队伍，久已集中在安徽定远待命，这时随军渡江，进驻丹阳集中。当时由原山东省政府工商部抽调干部组成的工商大队约100余人，任务是负责接管上海市内有关内外贸易的机关、企业，并且根据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政策和决定，建立起新的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和新的国营内外贸易企业，以恢复生产，稳定市场，促进城乡互助，发展内外交流。这时党中央从北京派遣一批干部前来加强接管队伍，卢绪章同志分配到工商大队，参加领导工作。他是党内对外贸易专家，长期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经营对外贸易，谙熟上海经济贸易情况，这给工作带来了有力的帮助。我们在丹阳驻扎了一个多月，主要是学习党的城市政策、接管政策，了解和熟悉接管对象，培训干部，强化队伍。中间我曾乘隙两次去无锡调查春蚕、春茶

的生产和市场情况，因为这些都是主要出口物资。

5月25日，第三野战军解放了上海最主要的苏州河以南市区。黄逸峰同志率领的铁路接管大队随军前进，修复损坏的线路。24日我们大队登车东进，25日住南翔，午夜奉命疾进，26日清晨2时到达北四川路桥堍邮政总局，时我军尚在天潼路以北一带搜索残敌。3时左右，我们大队到达了原跑马厅（即今人民公园）北侧的金门饭店（即今华侨饭店）。因为不愿惊动旅客，我们全部到楼上弹子房席地蜷宿一宵，一面派员与地下党联系。26日上午，吴雪之同志带来了有关贸易、海关的一批地下党员，奉命参加接管工作。地下党员和根据地党员会师，大大增强了我们的力量。

27日下午，各接管小组陆续出发，分别接管了海关总务司署、江海关、中央信托局、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美援物资机构和仓库，以及战犯、官僚资本的扬子建设公司、孚中公司、西北实业公司、中国植物油公司等等大约三四十处。接管工作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根据中央有关规定，我们所接管的单位，除少数外，都按照企业待遇，对于员工，除个别主管人员劣迹昭著不为群众所容者另作处理外，绝大多数人都原级原薪。即使海关，也不作为国家统治机器予以粉碎，而是按企业待遇接管的。因为海关虽是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工具，但内部却不是官僚组织，不是直接统治人民的衙门，而是一个颇具效率的机构，象列宁所说的邮政局之类的近代化的管理组织。沿海的灯塔、航标等交通设备都需要经常维护，华东军区并批准对其缉私舰艇不予缴械改编，仍旧维持原状。海关里没有国民党党部组织，相反，我们地下党支部相当强大，得到广泛的群众拥护，员工一般都富有爱国心。我们党中央决定的这些实事求是的政策，在执行中获得广大员工的拥护，所以接管工作是相当顺利的，没有遭到抵制或

破坏。那些事先分散隐藏的金银财宝外币和物资，在原单位员工的帮助下，经过接管同志们一二个月不分昼夜的辛勤劳动，终于回归到人民手中。到8月底接管工作初告段落进行总结时，证明全体接管干部都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置身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过着异常清苦的供给制生活，真是分文不取，两袖清风。回忆起35年前这段历史，不禁热泪潸潸，感激我们伟大的党培养出一大批多么好的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

我们的组织机构名称是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属华东财委领导，机关设在圆明园路原中央信托局楼上。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决定，我们贸易处除了完成接管任务外，应当同时尽快尽善地通过稳定市场，促进城乡内外物资交流以恢复工业生产。毛泽东同志说过：“从我们接管城市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所以我们一面进行接管，一面筹设新机构或改组利用旧机构，以恢复和发展业务。

当时上海市的生产流通和经济生活的恢复任务，均由我们华东区一级的接管机构（工业处、金融处、贸易处等）负责，上海市工商局只管上海市内的工商行政工作。这是为了便于调动华东五省（福建到8月19日才解放的）物资支援上海，并使上海工业品尽快流向上述各省，同时也便于直接和中南（武汉）、华北（天津）、东北（沈阳）各大区贸易部门联系。我们先建立了“上海市贸易总公司”（在江西路），以沟通新老解放区同上海的物资交流，同时收购市内各工厂的产品，协助它们克服战争期间货流不畅、产品滞销所造成的流动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以后陆续建立起粮食公司、煤建公司、花纱布公司、茶叶公司、丝绸公司、医药公司、油脂公司、中国进出口公司等等。显然，这些公司对于供应上海市人民生活资料和恢复以纺织工业为主体的轻纺工业，负起自己的责任，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们恢复经济的工作，一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上海解放后，我们明令废止国民党金圆券的流通，发行了人民币（1948年华北解放区统一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人民币，可以说是旧人民币，下同）和华中币（华中银行发行）、北海币（山东省北海银行发行）等解放区货币。但是这些货币发出去，又回来了，很难通过发行货币来积累贸易基金，转而用以支持货币。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之前，它发行的金圆券早已崩溃，等于废纸，我军解放上海后，公布1元华中币（包括旧人民币、北海币）兑换10万元金圆券，并明令禁绝金圆券流通，目的是维护劳动人民和居民的切身利益。但是华中币的发行还远远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量时就发不出去了，这是其他大中城市解放后所不曾出现过的现象。

问题究竟在哪里？据上海解放前华中局设在上海的秘密经济机构同庆钱庄负责人陈其襄同志汇报，上海解放前流通用的货币实际上已经是铸币和贵金属，工人、职员、商店、工厂一领到金圆券，马上兑换成银元、美钞、金块（1两）、金条（10两）等等，这样，金圆券不断发行，不断贬值，成为废纸。华中币发行后，还没有在人民中间建立信用，而原来操纵银元金条买卖的投机家以旧证券交易所为大本营，依然在那里通过银元、美钞、金块的买卖，操纵华中币的发行和流通，使之不能占领市场。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我立即和金融处处长陈穆同志联系，认为必须加以解决。我们一同去向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同志汇报，他随即偕同我们去华东局，几位领导同志都在。听完我们汇报后，邓小平同志果断地决定，立即命令有关军政机关务必对这一货币大投机场所加以歼灭性打击，一网打尽，严加惩处，说完便匆匆起身走了。原来，这时中央已命令二野分兵西征，他率部队动身去前线了。华东局负责人于是立即找来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同志等，一起

讨论如何部署向群众进行推行华中币、禁用银元美钞的宣传教育等一系列工作。6月10日终于一举歼灭了盘踞在旧证券交易所内的货币黑市投机集团。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获得广大市民的同情与拥护。同时人民银行挂牌收兑美钞银元，从此华中币、人民币在流通过程中确立了法定通货的职能。当然，斗争是复杂的，仍有一些不法商人以硬币卖买商品，要继续予以取缔，但毕竟是残余力量了。

当时上海市场上关系国计民生的有三大商品，这就是所谓“二白一黑”，即大米、纱布和煤。由于解放战争仍在西南、中南迅猛推进，全国财政尚有赤字，还不得不增发部分通货，物价因此难以稳定，二白一黑就成为上海投机家投机的对象，不断地在大米、纱布市场上兴风作浪，企图乘机扰乱经济，达到发横财的目的。我们知道单纯用行政力量冻结物价，是难以稳定市场的，必须同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通过经济办法，与投机资本家作斗争，逐步削弱投机资本的力量，才能相对地稳定市场，维护华中币的信用。因此我们推行折实单位制度（每一个折实单位，包含中白粳米1升、12磅龙头布1尺、生油1两、普通煤球1斤，以前一天的趸卖价格计算），职工的工资按折实单位计算，因此，物价上涨了，货币工资也随之增加，从而保证了员工基本生活的安定。银行还采取推行折实存款、折实公债、折实贷款等措施，这是资本上的釜底抽薪。我们贸易机构则在大米、纱布市场上，由市贸总、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派出政治可靠、业务精通的干部，在军管会贸易处领导下，每天参加市场，随机吞吐买卖。我们自知底子尚薄，手中掌握物资有限，而通货仍在增发，只能要求市场相对稳定，物价不致过分波动，打防御战，适当抑制投机商人的活动，而不打硬仗，以免过分消耗自己力量。平时随行就市，有进有出，在一定涨幅内，允许物价微微向上浮动。等到投

机资本家以为时机成熟，连日倾巢而出，人为抬高物价到一定程度，市场形势对我们有利时，我们就组织金融、税收、贸易公司的力量，联合作战，主动抛出商品，抽紧银根，催交税款并加强市场管理，迫使投机商人低价抛出所囤积的商品，遭到惨重打击。这样做，我们很主动，很灵活，能削弱投机商人的力量，而我们反而加强了经济实力，赢得市场物价从最高峰下跌到一定水平，可以稳定一个短时期。这种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与投机资本家作经济斗争，证明是有效的办法。国营经济这时尚在襁褓时期，已经发挥自己的优越性了。那时每逢市场剧烈波动的日子，从上午8时到11时，我们贸易处的负责同志，密切注视着市场物价的动态，随时作出反应措施，就象在战场上一样。

上海解放时，只剩下几天的用煤了，帝国主义者妄想通过封锁石油、煤炭的进口，扼杀我们的工业生产和电力供应，从而使整个经济瘫痪，工人失业，造成人民对我们的不满，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煤，我们有的是，枣庄、徐州、淮南煤矿都有大量煤可以供应，由华东煤建公司负责组织煤的供销业务。问题是运输。这时铁路起了运输主力的作用，济南铁路局和上海铁路局职工以主人翁态度，发扬高度的政治热情，进行运煤工作。美蒋不断出动飞机骚扰沪宁线的煤运，轰炸铁路和戚墅堰机厂，华东军区调高射机枪团保护运煤列车。为了加速津浦路煤车的周转，淮南煤矿的煤部份在浦口或南京卸车，由煤建公司发动上海私商租用民船到那里运煤，到沪后以合理价格收购，从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到8月底，除生产消费和民用消费外，煤的供应已开始好转，到九十月后，供应更加正常。公共汽车尽管没有石油，但有了煤，挂上煤气发生器照常运行自如，我们胜利了。

上海人民向来吃大米，而且主要依靠进口洋米。这时遭到封锁，洋米断绝。我们从山东、苏北、安徽只能运小麦来上海，而

上海人民一般不习惯以小麦为主食。这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七八月间，苏、浙、湘、鄂诸省早稻上市，市贸总鼓励和资助私商到产粮区购运粮食，粮食公司则千方百计疏运大米来沪，并通过工会组织，直接配售粮食给工人、店员和公教人员，得到群众的拥护。其间，陈云同志决定，从东北调大米进关支持上海。我当时视为奇迹，因为我缺乏知识，不知道东北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盛产稻米，而且米质优良。八九月间，这批大米陆续在上海上市，安定了人心，10月间晚稻上市，供应更为稳定。

当时上海是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集中地区，原料向来靠美棉。解放后美棉断绝，棉花供应成为维持纺织厂生产的关键所在。7月上旬，市贸总与纺织厂签订合同，配棉换纱。对外贸易管理局特准纱布出口，换取棉花进口，荣家的申新九厂第一个领到许可证，出口纱布，进口印棉。九月间新棉上市，公私纺纱厂联合组织起来向产棉区购运棉花，花纱布公司积极疏运陕棉、鄂棉来沪。纺建公司定期配布，贸总配纱，作为针织厂、印染厂等加工原料。

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莅沪调查生产贸易情况，指示上海如何克服经济困难。他亲自决定制造数百艘机器拖船和驳船，向机器厂、造船厂加工订货。8月20日，他亲自出席上海产业界座谈会，说明困难是暂时的，公私企业将来都可求得充分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民族工商业家经营企业的信心。经过6、7、8这几个月，我们通过向百货、医药、机器制造、造船，特别是纺织工业等各行各业，进行收购成品、加工订货、供应原料换购成品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协助他们恢复和维持生产，打开销售渠道，逐渐摸索出一套国家资本主义的雏型办法。为了战胜敌人的封锁，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我们在党的教导下，虚心谨慎，依靠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上海解放后，美蒋对我进行经济封锁，企图断绝我们的对外贸易，置我于死地。为了和他们斗争，打破封锁，6月初，在贸易处领导下，成立了华东区对外贸易管理局，颁布对外贸易管理办法及进出口货物甲、乙、丙三类目录附表，并对原私营进出口贸易商办理申请登记，对合格继续经营者颁发许可证。截止7月底，中外商人申请登记者2000余家，其中如法商电车公司于6月28日被批准为进口商。我们征得金融处同意，指定中国银行为外汇结算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原则，确定外汇汇率，并随着内外物价的变动，适时调整汇率，以鼓励出口，奖掖进口原材料。该行为了配合鼓励私商发展对外贸易，举办五种外贸贷款，如内外销物资埠际贷款、出口物资打包贷款等。外贸管理局积极鼓励私商经营对外贸易，提出“为输出而输入，欢迎原料输入”的原则，来制订和修正进出口税则。在私商经营发生困难时，外管局征得天津军管会同意，私商凭华东区外管局的营业许可证，可以到华北地区采购出口物资，经天津口岸出口。为了照顾一部分私商营业清淡，贸易处积极扶植他们转业对内贸易。当时环境是困难的，但我们千方百计地团结私营工商业者，并协同他们来共同战胜困难。

到了8月，工作逐渐走上轨道。8月10日到21日，召开华东区第一次贸易会议，参加者有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四省（福建尚在进行解放战争中）及上海、南京两市代表。会议确定坚决实行对内贸易自由政策，大力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逐渐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扶植生产，稳定市场，降低工业成本，提高农民购买力；保护私商合法利益；按专业和商品流转方向，在经济集中地区设置贸易机构，领导关系上采取按业务垂直领导和党政工作地方一元化的双轨制等等。这些决定，无疑是粗糙的，不完备的，但却是正确的。会议期间，8月

15日，华东军区司令部布告，对内贸易自由，严禁各地留难封锁。这正反映了当时对内贸易战线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9月9日，华东军区命令，组织华东区财政经济委员会，设八部一委员会，军管会贸易处改组为华东贸易部。这标志着财政经济系统的军事接管工作已胜利完成，今后主要任务已是恢复经济，促进内外贸易和物资交流了。

（1984年1月）

后 记

我不是专业理论工作者，而是一个在漫长的革命运动中跑龙套的人；但确实断续地、零星地写过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过。几位老朋友建议我选一些有参考价值、有进一步探讨必要的文章编个文集出版，以抛砖引玉、为四化、为改革作些有益贡献。我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承老友沈静荻同志热心筹划，由俞筱尧同志积极奔走，多方蒐集，杭州商学院副教授孙全同志细心校正文字，复核资料，著名的装帧设计家曹辛之同志精心设计封面，使这部文集得以出版。除衷心感谢他们几位外，我似乎还应当说几句话。

收入文集的文章共69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写的，共26篇，第二部分是建国后写的，共21篇，主要都是财政经济文章，包括少量时事评论；第三部分为回忆、纪念性文章，共12篇；收入文集的各部分文章均以发表或写作时间为序，除在文字上稍作校正外，一概保持原貌，以尊重历史；收入文集中第二部分的文章，有几篇是分别和几位同志合写的，文后都一一注明合作者；文集编成后，承老友薛暮桥同志以84岁高龄阅看了全部稿件，并特地为文集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寓督责于奖掖之中，使我深为惭愧。

收入文集的文章，我自认为普遍的缺点是浅，说理不透，水平不高。文字表达和理论分析，都很不够。但是，我自己认为有一个优点，就是真实。自信每为一文，都是从“不唯上，不唯书，

要唯实”出发的。30年代中期那十几篇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当时条件所能掌握的资料并冒着危险写成的。这些文章虽然拙劣，但它们是真实的，符合此后中国革命的实践的。又如，198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积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限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的人口总政策，以及“到2000年止将我国人口限制在12亿以内”总目标之后，我由衷地拥护，前后写了几万字文章进行探讨。我十分赞成宋健同志主张的中国人口“U”形发展的战略，即经过一百多年或更长些时间，把人口总数调整到7亿左右，使之与自然关系处于协调地位，从而大大地提高人口素质和实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解放前马寅初、董时进等先生节制生育的主张，只有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才具有解决的迫切性和解决的必要条件。1954年，党和政府决定采纳马寅初先生和社会学家们的节制生育的正确主张。可是反右派运动把社会学派主张节制生育的学者批成了右派，而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被批了10年，批出了解放后两次人口高潮。198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重新确定计划生育总政策和总目标，无疑是在吸收历史惨痛教训基础上的最正确的决策。可惜，1985年以后，计划生育上又开了一些小口子。1986年至1987年人口增长率有所回升。据预测，到2000年，人口将超过13亿，而不是12亿以内。心有所忧，不能不言，故于1987年8月又写了《关于我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也收入集子中，以供探讨，并留待将来由实践来检验。

1943年我在新四军直属队参加整风时，非常欣赏毛主席用“墙上芦苇根底浅，山间竹笋腹中空”来描写一些脱离实际而徒事夸夸其谈的学风。从此主动立为座右铭，时时警惕自己，但经过了40多年，我在理论研究工作上仍然无所建树，于人民、于祖

国没有尽到匹夫之责。其中20年迫于处境，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我自己思想懒惰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现在，老了，病了，要搁笔了，有两大遗憾时刻难以忘怀。一是1940年在重庆读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其博大精深，深为倾折。但没有好好学习，认真研究，加以宣传。象中国这样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生产力非常落后，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然后才能创造条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的弯路走得愈多，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愈显得光芒万丈。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航道，把中国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方针，使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新的希望，欢快的心情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只是我对新的经济目标模式和运行机制等等，知之甚少，更谈不到深入的研究。1983年初，我和戴园晨同志合写的《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一文，仅仅是一种预感，一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价格改革的迫切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朦胧想法。我对以通货膨胀来促进高速度增长的思路是存疑的。但自己又没有精力详细研究，正面阐述，为那些正在向正确道路探索前进的思路摇旗呐喊。真是感到难以弥补的遗憾啊！所以我借此机会把问题提出来，希望有志者继续探索。

本世纪到21世纪初，是世界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大改革新发展的关键时刻，处在决定国家兴衰、子孙命运的第二个历史转折点。既有紧迫感，又有新的危机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息尚存，当继续思考、学习，努力鞭策自己。

徐雪寒

1988年8月8日于北京

